

细叙沧桑记流年

作者：叶浅予

电子书制作：萤火虫

叶浅予：民国艺术之魂（代前言）



叶浅予（1907-1995）

有10个叶浅予，中国文艺就复兴了

——徐悲鸿

叶浅予，浙江桐庐人。原名叶纶绮，笔名初萌、性天等。从事画教学和以舞蹈、戏剧人物为主的国画创作。擅人物、花鸟、插图、速写等。笔墨顿挫自如，豪放爽朗，形象生动传神，风格独具，成就显著。中学时自修绘画。1926年起在上海当过柜台伙计，画过广告、教科书插图，并事时装设计、舞台美术布景。1928年任上海漫画社编辑，开始漫画创作。1929年开始创作漫画，后集成《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

艺术成就大类之一：漫画



叶浅予漫画作品《王先生》



叶浅予漫画作品《小陈》

叶先生的以漫画《王先生》、《小陈留京外史》、《天堂记》最为出名。他的漫画形象地展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生活众生相。叶浅予笔下的“王先生”和“小陈”在民国时期一度风靡，成了家喻户晓的漫画明星。

漫画是夸张的艺术。叶先生生性开朗豁达，而又随心所欲不逾矩。他常说：漫画家笔底针对丑，心目中有个美的理想在指导。丑极则美，由丑到美，漫画家是这样处理他的形象素材的。

艺术成就大类之二：速写



叶浅予速写《石景山太平鼓》



叶浅予《汉族舞蹈两帧》



《客堂叙话、毡房小景》

叶浅予的速写，在画界无出其右。在叶先生看来，速写是生活的记录，是创作的素材。他的速写开始是用铅笔线，从《天鹅湖》开始用水墨改画，线条减至无可再减，堪称减笔大师。他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韵味十足、个性强烈、节奏协调的舞蹈人物速写，开拓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在他的后期绘

画中，涵盖了京剧、地方戏及民族舞蹈等诸多表演艺术样式的素材更是占了很大的比重。

艺术成就大类之三：舞蹈人物画



叶浅予《呼和浩特晚会》





少数民族人物画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他长期专攻舞蹈人物画这一课题，画稿无数。他采用敦煌绘画的重彩方式表现舞蹈人物，形成了他浓郁热情的舞蹈人物画风格。黄苗子说他的画有点“马蒂斯”味。他的第一批作品便是他访问印度归来所作的印度舞画。他用敦煌壁画和佛画的手法画天竺舞，用色厚重，线条工整流畅，有点壁画风。对这批画，徐悲鸿的评语是：“浅予之国画，如其速写人物，笔法轻快，动中肯綮。”宗白华的评语是：“浅予的印度舞面，是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到了60年代，他的笔墨解放，出现了画舞的高潮。代表作如婆罗多舞和献花舞，和阆装和夏河装，画上人物洒脱、妩媚、奔放，画界咸谓浅予舞画。

叶浅予——维基百科词条

叶浅予（1907年3月31日－1995年5月8日），原名叶纶绮，笔名初萌、性天等，性别：男，1907年3月31日出生于浙江省桐庐县。中国现代漫画家，画家。配偶：罗彩云，戴爱莲，王人美。1995年5月8日逝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享年88岁。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副主席。



叶浅予与王人美于1956



第9期封面《蛇与妇人》

生平

叶浅予于1907年3月31日生于浙江省桐庐县，他的父亲爱好书法，母亲善于刺绣，姑父是浙江桐庐县的知名书法家，大表姐尤其善于民间剪纸艺术，叶浅予小时候深受他们影响，自小喜爱书画、民间美术和戏剧艺术。1922年，叶浅予进入杭州盐务中学就读，1925年因家贫辍学。翌年被上海三友实业社

录取为绘图员，后改为中原书局画教科书插图。自1927年起，叶浅予开始进行漫画创作。1928年3月，由张光宇任总编、张正宇和叶浅予任副总编的《上海漫画》周刊创刊，叶浅予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开始连载，大受欢迎，后又转到《时代画报》连载，还被改编为电影。1936年，他为南京《朝报》作长篇连环漫画《小陈留京外史》，为《王先生》的续篇。两部漫画皆为喜剧，造型描绘上受西方漫画影响，简练明快，自成一格。

1937年，抗战爆发，叶浅予担任上海《救亡漫画》编委，在南京举办街头抗日画展，并赴武汉、长沙、衡阳和桂林等地，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在重庆作《战时重庆》速写百余幅，描绘了抗日大后方的社会百态。之后，叶浅予又创作了《明日中国》组画，表达对胜利的希望。1942年，叶浅予贵州苗区旅行写生，尝试将民间艺术和传统的中国画笔墨相结合，以创造新的风格。1943年，叶浅予应驻华美军史迪威将军司令部邀请，访问了设在印度兰伽的中印训练营营地，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画了大量印度舞蹈和风物速写，并与归来后举行旅印画展。这是他由漫画向中国画创作的转折。抗战结束后，叶浅予又到西康藏族地区旅行写生，这时期的创作有《打箭炉日记》。1946年，出访美洲，先后在纽约、波士顿等地举办画展；翌年，应徐悲鸿之聘，来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先任国立艺专速写课教师、图案系系主任。后又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画系，叶浅予任系主任。1957年，中国国画院成立，叶浅予任副院长。

1961年，叶浅予进入画舞创作第一个高峰期。自1961年至1964年，创作了大量画舞作品，其中重要作品有《印度鼓手》、《印度献花舞》、《夏河装》、《婆罗多舞》、《凉山舞步》、《共饮一江水》。然而不久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叶浅予惨遭批斗，被关进秦城监狱，封闭达十年之久。1978年，文革结束，叶浅予得以恢复名誉，重新开始创作。叶浅予的绘画技法和风格，对杨之光、陈玉先、阿老等一大批国画家的艺术之路影响颇深。

1987年，叶浅予在八十寿辰宣布暂时封笔，撰写回忆录《细叙沧桑纪流年》。1990年始，叶浅予前后三次组织“叶浅予师生艺术行路团”活动，带领学生深入生活，观察社会，在实践中学习绘画艺术。

1995年5月8日下午，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作品风格

叶浅予的创作生涯由漫画开始，成就表现在漫画艺术、速写和以舞蹈、人物为主的中国画上。他作画择善择要，笔墨伸展自如，线条畅如流水，设色凝重洗练，画风洒脱，善于捕捉富有运动趋向的瞬间舞蹈动作和美的情态。强调形神统一，注重古典与现代美的结合。

参考文献

李锡元. 忆国画一代宗师叶浅予.

本页面最后修订于2021年6月8日(星期二) 11:05。

目 录

叶浅予：民国艺术之魂（代前言）	ii
叶浅予——维基百科词条	viii
第1章 上海创业史	1
1.1 品学皆劣的中学生	1
1.2 在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	5
1.3 拜见画家郑曼陀和杭犀英	11
1.4 进中原书局	13
1.5 画舞台布景与设计印花布	16
1.6 成了海军中尉	19
1.7 《王先生》长篇漫画问世	24
1.8 飞来横祸平安度过	31
1.9 《上海漫画》的最后命运	33
1.10 主编《时代画报》	35
1.11 《王先生别传》与《小陈留京外史》	39
1.12 王先生到农村去	48
1.13 《王先生北传》的诞生	57
1.14 王先生拍电影	62
1.15 《上海漫画》编辑部的朋友们	64
1.16 张光宇和黄文农	68
1.17 黄山之游	72

1.18	从旅行漫画到浅予速写	81
1.19	漫画协会和全国漫画展览	86
1.20	寻根思源话洋场	90
第2章	抗日行踪录	94
2.1	旅顺港口寻往事	94
2.2	卢沟桥的炮声	96
2.3	在上海前线	97
2.4	漫画宣传队与南京的抗战漫画展览	99
2.5	在敌机轰炸下	105
2.6	从南京撤武汉	107
2.7	在政治部三厅编《日寇暴行实录》	109
2.8	长沙大火前后	114
2.9	首次闯桂林	118
2.10	奉命调驻香港	120
2.11	初访重庆	127
2.12	香港历险	129
2.13	桂林喘息	138
2.14	在苗区作画	142
2.15	成了舞蹈教师的家属	145
2.16	出访中美训练管	147
2.17	没有火药味的印度	150
2.18	幽居重庆北温泉	155
2.19	进出中美合作所	158

2.20	向张大千学画国画	163
2.21	难忘的康定之行	164
2.22	归程纪行	174
第3章	“天堂”开眼记——1946年访美日记摘抄	178
第4章	师道与世道	248
4.1	学为人师到甘为人师	248
4.1.1	从国立艺专到中央美院	248
4.1.2	重建国画系	251
4.1.3	普及与提高	256
4.1.4	全国艺术教育会议	259
4.1.5	1980年教改方案	262
4.1.6	三十二字研究班	267
4.2	我的政治鉴定	270
4.3	追记大跃进年代	285
4.4	综观我的创作活动	306
4.5	探索艺术规律	318
4.6	近几年的业务活动	324
4.6.1	山东讲学	324
4.6.2	沈阳、哈尔滨之行	334
第5章	十年荒唐梦	345
5.1	从反右运动说起	348
5.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49

5.3	邢台四清	352
5.4	“文化大革命”号角吹响了	356
5.5	在文化部大牛棚里	361
5.6	抄家	364
5.7	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牛棚	370
5.8	游斗示众内调外调	382
5.9	第一座监狱	393
5.10	第二座监狱	403
5.11	第三座监狱——秦城	410
5.12	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416
5.13	文革厄运（诗六首）	425
第6章	婚姻辩证法	427
6.1	纸上谈兵第一课	429
6.2	父母之命第二课	434
6.3	一见钟情第三课	448
6.4	妇唱夫随第四课	456
6.5	磕磕碰碰第五课	466
	编者后记	485
	电子书制作者后记	486

第1章 上海创业史

§1.1 品学皆劣的中学生

1922年我十五岁时，高小毕业，投考杭州的中学。吸取前一年投考第一师范失败的教训，这次考了三个学校。除一师之外还加考一中和新办的盐务中学。结果，一师仍然落榜，一中和盐中皆被录取。父亲认为盐中是盐运使衙门办的学校，毕业后找工作较有把握。我也想，进一中，毕业后虽有利于升大学，但父亲经商，不一定能送我进大学，于是决定顺从父亲的意愿，读盐务中学。

盐中校长蒋邦彦，金华人，是个奉系官僚，正在浙江盐运使任上。盐是国家专卖商品，盐运使是监督盐商的大官，也是保证提供八国联军赔款的税收机关，权力相当大，油水也相当多。这位蒋运使，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办这所中学，是想培养一批懂外文的青年，为监督盐税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服务。记得入学考试时，这位大官坐着四人抬的官轿，到考场来视察，我的小心灵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轿到处游荡，倒也威风！

入学以后，我第一学期相当用功，功课一点不拉；第二学期，每逢星期天，喜欢到书店去逛逛，看到心爱的画册，买本回来，偷空临摹一番，相当惬意。那时画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鸟石印本，也有古装时装仕女画，我临了一阵，似有所得，于是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也对流行的福尔摩斯侦探小

说发生兴趣。这类小说除了单行本，还可在流行的“礼拜六”派杂志中找到。读了之后，脑子里发生了离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笔来学写侦探小说，竟至于入迷。虽然有了此等课外乐趣，读书还算用功，此等乐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倾向，这和杭州这个新环境的诱导有一定关系。第三学期开始，眼界逐渐开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杭州学生大游行，长途步行到拱宸桥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领事馆提抗议，反对日本乘欧战结束之机，强占原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同时我也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如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从中读到外国文学作品，开始接触外国人的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我的思维境界更加开阔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学年，我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看到西湖边上男女学生并肩笑语，心有所动。碰巧，我的一个在女子师范读书的堂姐，在湖滨见到我，看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便问我，要不要交个女朋友？我脸虽红，却点了头，表示愿意接受。这位堂姐实在热心，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师的会客室，介绍她的同学王文英和我见面，介绍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两人干坐在会客室里默然相对，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我们年龄相同，约定以后在通信中互相对话。匆匆告别，我才如释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回到盐中宿舍，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跑来问长问短，什么女朋友长得可好看等等。我说，我们并肩坐着，谁也不敢正视对方，脸方脸圆没看清，身高身矮站起来倒有个比较，似乎对方比我矮一点。如此回答，同学们当然不满足，可是我这时心还在跳，

不知如何是好，同学们见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谢那一时期读的新文学作品，使我对所谓自由恋爱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框，对如何写情书也有了一点可以借鉴的资料。从这个学年开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当粉红色或浅蓝色的信封从门房那儿取回时，我的心直跳，揣摩信里写的什么，待到打开信封，看完简单平凡的语言时，情绪倒又平静下来。信的重要内容是，下个星期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我心里盘算，到湖滨几公园见面？到岳坟还是湖心亭去玩？得马上回信，可不能耽误时间。等到写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时刻的到来。若遇到星期六天气不好，阴雨连绵，我就无心听课，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负担也就轻一点，不用说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后面《婚姻辩证法》一书里，把写情书叫作“纸上谈兵”。我和王文英在纸上谈了一年的兵，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希望成为永久伴侣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姐为名，这年暑假到我桐庐老家来看我，我却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来的对象。

第三个学年终了，盐中向学生家长通报学生成绩，我的学业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亲虽未向我追究，我心里却直打鼓。交女朋友谈恋爱是个违反校规的操行问题，至于学业丙等，则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为从本学年起，采用外国原版教科书，教师外文水平不高，上课照本宣读，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考试时又要外文答卷，学业成绩如何好得了；加上这学

年终了，我和几个同学拥到英文教员房间，要求免考，被训斥一顿，认为是“越轨行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账上。连拿两个丙等，怎么还有面子上第四学年？于是暗中串连四个成绩差的同学，作越级考大学的准备。当时我们认为厦门大学是个理想的目标，因为那里刚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离校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厦大大伤元气，继续招生时特别愿意把浙江籍学生。我们通过一个浙籍助教和一个浙籍高班学生的关系，了解到考试日期和考试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间；匆匆就道。王文英了解到我的窘况，愿意和我共患难，一同去考厦大。这样，我们五个浙江学生，约好先坐火车去到上海，两天后搭上了去厦门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轮。在轮船码头，码头工人把我们几个乡下青年拦住，强要我们每人出一元钱，把我们的铺盖行李提上船去，说如果不出，便不让我们上船，这是码头规矩。我们只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才得上船。

我们买的是统舱票，因为是夏天，就在船的后甲板上占了个铺位。打开铺盖，露天睡觉，落得凉快。谁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铺盖全部淋湿，只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达厦门，赶到厦大，找到关系人，才知道考期已过，但学校同意补考。考试结果，只有一个姓金的同学被录取，其余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苏、浙江两省军阀正在上海交战，此路不通。怎么办？幸亏浙籍教师帮忙，同意为我们四人办一个补习班，才算安顿下来。

进厦大，想读中国文学，而补习班自然是补中学高班的课。开班第一课是数学，先学代数，我脑子里一盆浆糊，不知

怎么代法；后来学几何，还有点门路，因为它与平面造型有关，和我的美术细胞对劲，我还学得津津有味。在补习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绪不佳，两人之间热度渐退，她和几个老学生有了接触，对我日趋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亲经商失败，他寄来旅费，催我回浙江。补习班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动摇起来，约定一同离开厦门回故乡。我们买了一条货船的客票，一起动身。这次的船有舱位，不像上次那样风餐露宿，浇得一身湿，但这是只“野鸡”船，到上海码头后没有固定泊位，停在黄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们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机勒索，我们又被敲了竹杠才得上岸。

厦门地处闽南，气候较暖，入冬以后出现一种怪现象：夏布长衫和棉袍子一齐过冬。事隔六十余年，1988年秋后，我重访厦门，夏布长衫虽已绝迹，当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裤，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夹外衣，下身是呢子长裤。我想如入严冬，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厦门半年，学得几句厦门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作“吉依洒西吾勒切博狗直”。

§1.2 在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

从厦门回到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迟迟不敢回桐庐。父亲急了，亲自赶来杭州，把我揪了回去。到了家，大受训斥，母亲从旁劝解，气氛才稍稍缓和。我心里那股子委屈劲儿无法形容，一怒而从家中出走。母亲急了，叫人到处寻觅，

直到傍晚，发现我一人坐在“胡母井”的井栏上发呆。他们以为我要投井，一把抓住我，拉了回家。父亲见此情景，不再发脾气了，但一连几天，老是对我发牢骚，说这三年的学费白白浪费，逼我回盐中补读，读到毕业，才算了却一份心愿。我从小养成倔脾气，怎么肯吃回头草，当然拒绝。但我心里也在盘算：进不了大学，又不愿回盐中，难道在家吃老米饭不成？于是下了决心，寻个职业，自力更生。我把此意告诉父亲，同时向盐中同学求援，看他们能否为我觅个饭碗，让我有个立身之地。结果是音讯杳然，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天，一个亲戚拿来一张上海的《申报》，上面登了一则广告，是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招考练习生。投考资格是中学程度，学过现代会计和历史地理常识。投考者可自投有关作业，等候评审，一旦录取，先在门市服务，供给食宿，每月工资十五元。这个天外喜讯乐得我手舞足蹈，父亲也面露笑容，催我赶快作准备。那亲戚还告诉我，这家三友实业社最近创制了一种“自由布”，上海极为流行。他拿来布样给我看，于是我灵机一动，想起了这两年在盐中课余美术班学会的铅笔写生和水彩静物画法，如果画张自由布的广告寄去，也许录取的机会会多一些。因此，我除了作好必需的答卷，还用心仿照报上的广告模式，画了一幅广告画。记得画的是一身自由布的女装，表示我还有美术方面的技能。

考卷寄出，心中一块石头并未落地。一星期后，三友实业社来了信，说考卷合格，催我立刻去上海面试。这我才如同科举时代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大名那样，觉得总算对得起祖

先对我的期望。

十八岁的青年，胆子不小，况且上一年远走厦门，到过上海，所以这次单身出门，父母都放心。到上海后，投宿去年住过的一家小旅馆，离南京路很近，放下行李，就直奔三友实业社。接待我的是名叫王叔汤的年轻总务。他带我见了总经理沈九成，并当场摊开笔墨，叫我画张画。我真有点像过了科举考场，心里发慌。回头看看，总经理在自顾自翻文件；王叔汤站在旁边，一口宁波话，说我寄去的那幅广告画得不错，今天无非是要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手笔，你只管大胆作画，好坏无所谓。我逐渐定下心来，从起稿到着色，大约一小时交了卷。王叔汤拿画给总经理看，交换了一下意见，走来告诉我，我被正式录取了，叫我把行李搬来门市部，正式上班。我心中这块悬在空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今后自力更生的岁月，就从这儿开始。

打听到这次录取的练习生有十余人，都是中学生。王叔汤告诉我，这里许多老职工也都是投考录取的中学生，其中个别还读过大学。三友实业社的总经理沈九成是个有头脑的实业家，他愿吸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作为他的部下，练习生的工资待遇虽然不高，可是店里在生活方面不惜花钱，尽量满足青年人的需要。沈九成治店方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每个星期天上午休业，开一次会，由总经理讲一次话，告诉青年怎样对待顾客，对待自己，对待事业，说得实实在在，没一句空话，没一句训话，时间也很短。开完会，请全体职工吃一次水果，用以调剂营养，然后就自由活动。

沈九成作风民主，待人和气，几个高级职员都是他培养出来的，我们青年人对他非常尊敬。

我进门市部，先被派在三楼布疋部卖布，由老店员教我如何量布，如何剪布，如何包装，如何收款。这些活，在旧式商店里要学三年才能出师，这里三天就能学会，但学会并不等于熟练，人家三年学徒，等到出师，已经成为一个熟练而精明的店员，我当然不能如此相比。至于如何对待顾客，总经理总是循循善诱，反复阐明，我们年轻人也都心悦诚服，从来没发生过和顾客吵架的事。

三友实业社以制造洋蜡烛芯起家，进而生产“三角牌”毛巾，夺取了日本人占领的市场，在国货制造业中赫赫有名。后来又在生活用品方面下工夫，生产毛巾毯、罗纹帐、自由布等棉织品。门市部开设在南京路中段，靠近先施、永安两家大百货公司。这一带是上海的购物中心，三友社以生产国货棉织品为号召，门市部顾客相当踊跃。沈九成看到现代工商业广告竞争激烈，不惜花钱长期在各大日报刊登广告，介绍自己的产品。由于介绍得实事求是，不讲虚套，赢得了广大市民的信任。店里专设一个广告部，由专人设计和安排每天所需的广告内容。这个部有固定职工三人，一个管文字，一个管图画，外加一个练习生。我进店三月后，有时调我到广告部上班，制作门市部大门口的两块广告牌，宣传本社的新产品；有时在各个专业柜台画点小广告，为顾客指明购物方向。

南京路上几家比较大的商场商店都有自己的广告宣传牌，其中要算先施公司的广告面积最大，每个橱窗之间竖立一块

长条广告牌，总共有七八块，上面画着各种各样的货品，定期变换，以吸引顾客。这些广告牌画笔泼辣，色彩夺目，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在南京路一年，我认真看过先施公司的每一期广告大画，从未漏过。1949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画，和教师们讲起这件事，蒋兆和老师笑嘻嘻地对我说，那些画都是他画的。当年他从四川来上海，谋到这个画广告的职务，这对他以后造型能力的提高有很大作用。这话一点不假，我在1982年北京第一次个展的自序中也曾提到，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是从各种职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我和蒋兆和20年代末期神交的历史，到了40年代末期才被说破，说明世界虽大，时间虽久，天涯海角，人间的关系有时也会巧逢在一起，正如老话所说，“咫尺天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南京路是上海的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是文艺娱乐生活的大花园。先施、永安两大公司都有屋顶游乐园，京戏、昆曲、文明戏、电影、曲艺、魔术、杂技，应有尽有，花两角钱可以看个饱。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对面有座市政厅，是洋人独占的地方，每逢星期六晚间，工部局的外国管弦乐队在此演奏，买票入座，票价甚高，高鼻子洋人有点文化教养的，才能在其中占个座位，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地位。三友社广告部那位姓季的专职画家，在上海受过正规美术教育，接触过外国音乐，他告诉我们，市政厅音乐堂的三楼，有免费的座位，可以自由出入，你们有兴趣，可以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十八岁的我，尝过屋顶游乐园各种土产文娱，也颇想尝尝外国音乐的滋味，就跟了去。看到楼下穿戴整齐的绅士淑女，一本正经地坐在

那儿，听完一小段乐曲鼓一阵掌，曲尽人散，秩序井然。我觉得太拘束，太绅士气，不合我的口味。然而，游乐园和大戏院里那种怪声叫好，在观众头上抛掷毛巾的行为，似乎也太野蛮了些。照我的想法，似乎应该各去其弊，适得其中才对。为了新鲜好奇，后来我也时常找个同伴，钻到市政厅三楼听一会听不懂的洋音乐，觉得另有一种乐趣。这是我接触外国音乐文化的开始。与此同时，看外国电影的兴趣也逐渐滋长起来。我那第一幅漫画《两毛钱饱眼福》就是在新开张的北京大戏院眼见的事实。戏院在放电影的休息间隙中，由一个白俄女子赤身在台上表演各种姿态，以娱观众，谁眼馋，谁就买票去看。严格说来，这是一种外国文化。

三友实业社门市部房屋很窄，青年练习生每年有增，原有的宿舍已挤不下。这年春季在老西门租到一幢大屋，所有新老职工，都搬到新宿舍去住，每天由大卡车接送。宿舍里有唱机、唱片，听听京剧名演员的清唱，也是一种娱乐。我从小喜欢看戏，老家门口有座大庙，庙前有戏台，请来戏班子，名义上为了敬神，实际是为居民自娱。我曾向大表姐学习制作纸型小菩萨，编成小戏演给弟妹看。到了上海，看戏机会多了，有时也喜欢哼几句。在老西门宿舍里，我独钟情于唱片中的京剧唱腔，曾反复听谭合培的《坐宫》、杨小楼的《拜山》、时慧宝的《空城计》，同时也学会拉京胡，对一板三眼的腔调略窥门径。这种兴趣，到了1935年初次访问北京时，就大大膨胀起来，几乎每天晚上都得上剧场看戏。记得我看过“富连成”科班中“盛”字辈在前门广和楼的演出；看过杨小

楼的《金钱豹》、杨宝森和某票友的《御碑亭》、荀慧生的《红娘》。到了50年代，在画舞的同时，我也开始画戏。对于画戏，我体会到，一个不懂戏的人，尽管他有很好的速写工夫，也难免要出差错。懂戏还有个深懂浅懂之别。比如，昆曲和京戏风格相近，而实有差别；马连良和周信芳做派不同，一举手一投足，各异其趣。如果不懂得这之间的分寸差别，便画不出各自独具的风采和情趣来。

§1.3 拜见画家郑曼陀和杭犀英

小时候在老家，父亲在县城开南货店，专卖食品，从粮食、火腿、成鱼到糕饼、糖果、瓜子花生，还带卖求神拜佛的香烛纸锭。随着时代进展，纸烟侵入小县城。南货店对面有家茶馆，人说茶烟茶烟，茶离不了烟，吸香烟之风，先在茶馆里流行起来，原来的旱烟筒逐渐被淘汰，茶客嘴上叼起了大英牌或强盗牌香烟。父亲见有利可图，便另组一个专柜专卖纸烟，和南货食品分两本帐，这就是现在的所谓“小金库”，自负盈亏，与本店大股东的盈利分开。开始时仅在纸烟专卖公司作小批量买卖，后来生意做大了，直接从省城整箱进货。上海的烟草公司颇有心眼，在大木箱里附送一种时装美女月份牌，一式数份，既做广告，又当礼品。父亲每开一箱，便将月份牌分给店员，自己只带回家中一份，挂在饭桌墙上。每次只要新到了月份牌，叔伯邻居的女眷都赶来观赏。除了观赏，还可查阅本年的月份、日期和节气等。我对这种新式的美女

画特别感兴趣，觉得画得既像照片又不是照片，面部设色柔润，衣褶分阴阳高低，有立体感，而且姿态娇美，引人爱慕。当时画这类美女画的著名画家，除创始者郑曼陀外，还有后继者杭犀英，最受社会欢迎。

三友社总经理沈九成有经营商业的头脑，舍得在这方面花钱，推广商品宣传。1925年我被调到广告部不久，沈九成的秘书来叫我，说沈经理有事找我。我走进经理室，看见他办公桌旁坐着一位黑脸中年客人，墙上挂着一幅美女月份牌原稿。经理指着那位客人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郑曼陀，他给三友社画了一幅美女画，我们准备交给商务印书馆用洋纸印成明年的月份牌，在年底大减价期间送给顾客。他问我：“你看好不好？”这一下把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给问住了，我只得唯唯诺诺表示赞成。经理继续开言道，小叶呀，要好好用功学，学会郑先生那一套工夫，将来就大有希望，也好当个大画家。看经理那表情，差点让我叩头拜师。郑曼陀却只看了我一眼，脸上毫无表情。我匆匆退了出来，偷偷问经理秘书，这幅画要花多少钱？他说四百块大洋，吓了我一跳。

这年秋天，我那位女朋友王文英从杭州来看我，见到我在三友门市部大门口画的广告画，认为我有出息，说他哥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认识新一代月份牌画家杭犀英，并约定了时间，带我去拜见杭。杭看我这么年轻，居然在南京路上耍起画笔来了，既吃惊，又觉得后生可畏，不免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经过这两次接触，有人以为我对美女月份牌心向往之，大概颇想涉猎一番。其实不然，我的追求目标不在此，

而在报刊上的漫画。

§1.4 进中原书局

我为什么离开了三友实业社，又怎么进的中原书局，事隔六十多年，实在记不清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不是被辞退，而是自动走的。至于为什么要走，怎么走的，只记得某些主观愿望和某些客观因素。

南京路的一年，是我离开故乡，自谋生活关键性的一年。这一年从站柜台到画广告，决定了我一生从事美术事业的前途。又因南京路这一条经济大动脉，华洋杂处，会公众生，把我这带点农民意识的小县城的眼睛，逐渐变成十里洋场的眼睛，脑子里也装满新鲜事物和社会新面貌；又接触了布满南京路的文化艺术环境，使我对所爱的所需的有所认识，进而有所选择。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逐渐意识到需要换一个工作环境，来充实和消化这些东西。在三友社，主要是和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过群体生活，缺少独立的思维活动。只有在和比我们年岁大一点的老店员接触时，才感到思维活动的天地大一些，互相了解多一些。他们对我的绘画才能比较赏识，认为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工作，以发展我的才能。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位大朋友把我引荐给了中原书局，让我有机会直接进入文化事业圈子，获得广阔前途。总之，假使没有这位大朋友的引荐，就谋不到这个新职业，进不了中原书局，那么我也许会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

中原书局的前身是一家翻印石印本古籍文献和绣像小说的老店，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教科书有大利可图，便继世界书局之后，也进入教科书出版商的行列。中原书局在书店林立的棋盘街有一个大门市部，门市部有一个大橱窗。他们把我找去，先放在上海旧城方滨路的编辑室，给一套已编好的小学教科书画插图，同时给门市部大橱窗画广告。编辑主任是位年过半百的老文人，名叫刘铎珊。加上他的一个年轻助手和我，三张写字台占了楼上一间房，这间房有个阳台，可以看到方滨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从这条路一直往东走，到路的尽头便是闹市区小东门，上海县的城隍庙就坐落在这一带。城隍庙是南市区的吃喝玩乐中心，有茶园、酒楼、饭馆、点心铺、手工艺市场等等。最有名的商品是麻将牌，当时已出现一种塑料制品，但因其太轻，不如竹背骨腹的传统制品那么畅销。城隍庙左邻是有名的“豫园”，一座纯粹东方式花园；右邻是著名的“新舞台”戏院，专演海派京剧，也是采用舞台布景的首创者。

提起城隍庙，可以算得十里洋场中唯一的东方型游乐购物中心。住在洋人租界里过洋场生活的人，都要到这儿来寻找中国人的老生活、老情趣。我这个土小子，在方滨路西头工作，也乐意到东头来寻欢作乐，反映出我灵魂深处的储存，土的多于洋的。尽管我以后的艺术活动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越积越多，比如，学美国“怕老婆”长篇漫画，创作了中国的“王先生”；学美国的时装杂志，设计上海时装；还学墨西哥画家阿佛罗比斯画生活速写，可是到最后，我还是拿起毛笔、

宣纸画中国画。

在中原书局编辑部里，三个人各占一张写字台，各干各的，互不干扰，比不得三友实业社，年轻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容易把时间白白度过。我们三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很难谈到一块儿，所以白天的时间只顾工作。下班以后，刘老回家，我和他的助手虽同住编辑室，也因兴趣不同，玩不到一起。晚饭以后，我经常到老西门三友社宿舍去找老朋友，有时候和他们结伴游“大世界”，看戏听曲，消磨前半夜。

两个月以后，书店要我画一幅古人读书画，挂在大橱窗里，作为旧版书的广告背景。这件事即使我高兴，又使我苦恼。高兴者，工作有了新刺激；苦恼者，我画的全是现实人物，从未画过古人。于是我和刘老商量怎么画法。他建议在荷池畔柳荫下画个老学者持书作凝神之状。荷池柳荫好画，老学者也可以参考古画，这一下我开了窍，便动手购置材料，开始起稿。这幅画要占满整个橱窗，尺寸相当大，还得画在布上。颜料可以用广告色，我在三友社用过；布用的是漂白洋布，布面光滑，也还容易掌握。一切准备齐全，我就在编辑室一面空墙上，挂起按尺寸缝好了的布，用木炭在布上起大稿，落墨，填色，忙了一星期，任务完成。送到棋盘街书店门市部橱窗里一挂，引来了不少观众，书店经理说，没想到这小子年纪轻轻还会这一手，我们书店没白养他。这一说，我的个子似乎高了一大截。画是好是坏不管它，光凭这一点胆量，也够我得意的。

§1.5 画舞台布景与设计印花布

完成这一幅大画不久，引来了三友社的一个大朋友。他要我为他家乡常熟县某戏院画一堂舞台布景。我开始有点胆怯，经不起再三鼓励，又得中原书局刘老的同意，让我在编辑室铺开作坊，还嘱咐他的助手帮我一手，我便着手准备。第一步到各戏院和游乐场去参观，找参考资料；第二步置备工具。这回可不是广告颜料和普通画笔所能胜任，要买刷油漆所用的猪鬃刷子和成斤的各色刷墙粉才能济事。为调制颜料，还得自熬牛皮胶。至于那幅正面大堂布景所用的布，得请裁缝加工；布缝成后，还得刷一层铅粉，把缝口和市眼填平了，才能上色作画。大堂之外，另要两幅边景，画成树林野色。这整个工程庞大复杂，我从未干过，能否画成，心里没底。好在有股子闯劲，靠胆量，要干就一定要干成。这回可比不得那幅古人读书图，凭一点画广告牌的的经验就能闯成功，这回工程之大，制作内容之复杂，全靠临时抱佛脚，学来一点油漆匠的技术，才登场表演。

正面的大景，是仿照“新世界”大剧场独创的布景设计的，侧面则是四棵大树矗立两旁。我自觉有点气派，只要给制过程掌握好分寸，技术上不出毛病，不至于全盘失败。这个底，虽不能做到十成把握，有这么七八成收获也就可以向我那位热心的大朋友交差了。中原书局的几位同事对我的新行当颇感兴趣，主动帮我熬胶涮市，端盆端碗。不到两星期，一大幅正景和两片侧景都已画完交货，得了一笔外快，记不

起有多少钱，反正够添置一件绸大褂。回想那整整一个月拼小命的过程，至今还有点怀疑，这股子闯劲，究竟是怎么促成的。

一堂布景画成，报酬到了我手中，至于挂到舞台上的效果如何，那就不在我的盘算中了。可见，一定的报酬，也是一种推动闯劲的动力。不管怎么说，也就闯这么一次，因为我并不想以此为职业。

将近一年的教科书插图工程，使我在造型能力方面有所长进。每天坐在石滨路中原编辑室里的劳动，也培养了我锲而不舍的毅力。在这一年里，我曾经试图向新出版的两种画报投寄漫画稿。《三日画报》发表了我的第一幅漫画《两毛钱饱眼福》，画的是一枚价值两角的银角子上面站了一个赤身裸体的跳舞女人。此画发表以后，《三日画报》的主编张光宇找我谈话，鼓励我继续投稿。谈话时在座的还有张正宇。以后我便常去位于浙江路渭水坊的画报社串门，认识了当时颇负盛名的政治讽刺画家黄文农和王敦庆、鲁少飞等活跃在漫画界的人物。尽管我还是一个才满十八岁的青年，自从和这些知名人士混在一起，仿佛自己也变成一个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了。有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出题目叫我画，我很乐于接受这种名利双收的任务。

从那以后，各大报的副刊刊头画，我也试着投稿了。说也怪，以“浅予”笔名画的刊头画，居然经常和读者见面。其实并不怪，20年代中期的上海，作这类投稿的人并不多，所以编者乐于采用，而像《两毛钱饱眼福》一类的社会讽刺画，由

于怕惹事招非，引来麻烦，一般日报倒不愿采用。当时销路最广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有时发表马星驰的时事讽刺画，其表现手法多属于公式概念化，不痛不痒，不指具体事态，不过是把汉字结构拼拼拆拆，影射某一事件，逗人一乐而已。当时还有一家三天一出的小型报《晶报》，每期发表黄文农的政治讽刺画两幅，一幅对国内，一幅对国外，比较泼辣尖锐。之所以敢于这样惹事招非，是因为它是一张小报，不怕风险。另外还有一家石印的《生生画报》，是专为画家发表人像素描作品的园地，偶而也发表讽刺社会时事的画，当时叫作“滑稽画”。记得其中有老一辈画家丁悚、张章元的作品，偶然也见到上海美专创办人刘海粟的人物素描。这家《生生画报》可能是清末点石斋画报的后继者，可以称作第二代画报的代表。到了《三日画报》和后来的《上海画报》既有画，又有照片，又有小报式的小品文字，可以说是画报的第三代了。我的作品出现在《三日画报》预示着第四代画报《上海漫画》正在十月怀胎之中，不久将出娘体了。

我的学名叫叶纶绮，是祖父取的名。考过三友实业社当练习生站柜台，用的是这个名字。后来偶然看到一本日文刊物名叫《浅草》，很喜欢这个浅字，在“浅”字后面加个“予”字，就拿来作为笔名。投稿时在画上标上一个变形的篆体目字。再后来在《王先生》长篇漫画问世时，学张光宇把光字二字拆开，横写成小兀力于，我也把“浅予”二字拆开，横写成三戈戈了。这个签名既不是汉语的拼音字母，也不是日文的片假名，认真追究起来，岂不是十里洋场洋化了的表演么。

1926年底，中原书局突然改变经营方针，停出教科书，将我辞退了。幸亏三友实业社那位大朋友及时介绍我到一家花布印染厂去当一名设计人员，虽然工资很低，仅勉强能糊口，但我总算暂时有了个吃饭的地方。干这个工作，也像画舞台布景那样，得临时抱佛脚找老师。这老师便是各大百货公司的布疋专柜。我在那儿转悠了几天，心中暗暗记下几种外国新到的新花样，回来照猫儿画虎，改头换面，画出新图样来。老板是个女的，她平常就叫工人到绸布店去采集花布原样刻版仿制，有了我这个专职的采花蜜蜂，就代替了工人沉重的负担。但久而久之，这位女老板发现我这个小青年能量不大，手上所出的新花样并不吸引人，不能为她的小小手工作坊谋取大利，就对我冷淡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这条路行不通，干了两个月便自动告退。在母校盐中一位图画老师开设的绸缎织花制版厂混了几个月，又混不下去。张正宇发现我闲着没事，便招呼我到他的《三日画报》社当个小伙计，帮他划版样，排版面，兼跑印刷厂，我学到了一手编画报的工夫。

§1.6 成了海军中尉

1925年我在三友实业社站柜台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日本纱厂的日本监工打死中国工人的暴行，激起上海市民极大愤怒，南京路巡捕房前又发生了示威群众大流血事件，全市罢工罢市。我们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高踞三友社门市部三楼，从大窗户上望下去，只见南京路两旁的商店都店门

紧闭，路上鸦雀无声，只有印度阿三和高鼻子骑警在来回走动。本来车水马龙的通行大道，如今竟死寂一片，又逢天降大雨，显得更加凄凉。突然，马路西头出现了一个浑身淋得湿透的短发女学生。她举起右手，紧握拳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在滂沱大雨中由西向东大步行进。高鼻子骑警大概是被她的大无畏气势所慑服，竟没敢动她的一根毫毛，目送她扬长而去，消失在雨雾之中。我们这群被禁锢在高楼里的青年，看到这情景，不由得周身热血沸腾，也跟着高喊口号，心里升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五卅”运动我虽未直接参加，可是由此引起的反帝革命情绪，我却亲身感受到。这真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教育，我由此而对国共合作兴师北伐的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对我个人来说，这可以说是两年后参加北伐军政治部工作的先兆。

1927年北伐军进据上海时，我正好请了假回桐庐老家探亲。到了杭州一带，发现浙江省秩序井然，到处是穿着灰布军装的北伐军。军官们佩武装带，扎皮绑腿，雄纠纠，气昂昂，威武非凡。我心有所动，觉得此时此刻要当个革命军人有多威风！正巧这时，接到黄文农来信，叫我马上回上海，参加淞沪警察厅政治部的艺术宣传工作。我没有多考虑，立刻动身，先回《三日画报》落脚，然后马上赶到南市“也是园”淞沪警察厅政治部找黄文农。他已是一身戎装，从一个洋场子弟一变而为革命军官。他当即带我去见政治部主任，办完手续，给了我一个“少尉股员”的职务，在中尉艺术股长黄文

农部下当属员。同股的有水彩画家张眉苏、三友社的老同事季小波等。我们问黄股长，让我们干些什么？股长说，政治部刚成立，班子还没凑齐，具体工作还得等一等。在“也是园”上了三天班，没事干，只得坐在办公室里翻报纸。我心里有点急，找黄文农，他几天不照面；想去找宣传部长，又怕碰钉子。这几天报上可热闹，有一条大新闻：南京政府将成立的那天，被赶到苏北去的孙传芳突然回师，南渡长江，攻到了燕子矶，但蒋介石一挥手，又把孙传芳赶回了苏北去。报上又说汪精卫从海外归来，赶赴武汉当国民政府主席，要和南京的蒋介石唱对台。还听人说蒋介石要在南京自立国民政府，放弃孙中山的国共合作路线，向共产党开刀。总之，大局未定，天下还在乱。

我们这些只懂艺术不懂政治的头脑，看了听了报上的和流传的种种消息，只觉得革命并不那么简单。正在头脑发晕的时候，黄文农突然出现，悄悄对我说，他不想在“也是园”干，决定到新成立的海军政治部去，要我保密，跟他一块走，第二天就去高昌庙报到。我问他张眉苏和季小波怎么办？文农说，让他们留在这儿，就我们两个去海军政治部。我心里想，到海军政治部，也许要穿海军服，这倒新鲜。到了高昌庙，发现政治部的人一律北伐军打扮，穿海军服的盘算落了空。可是跳了一次槽，我们都升了一级，黄文农是上尉，我是中尉了。另一件新鲜事，我们一报到，就叫我们填表加入国民党。我问文农该不该填，他回答很干脆，叫填就填。他说当初在上海活动，入国民党可规定得严哩，现在既然叫填，为

什么不填？过了一星期，党证发下来了，真快。同在海政艺术股工作的画家还有王益三，他也同时填表入了国民党。我们这次奉命参加国民党的事，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由王益三在黑龙江向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造反司令部揭发，于是在我的“反革命历史”中增加了一份反革命人证。其实，就在我加入国民党的这一年秋天，蒋介石为了实行他的清共政策，下令解散海军政治部，并要原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从而肃清国民党内部的异党分子。像我这样的从艺人员，在上海自食其力，独往独来，干吗要自愿去当国民党？奉命是不得已，自愿也就不必要，所以就没再登记。王益三的这次揭发，不管出于个人觉悟还是出于环境所迫，都无损于叶某的一身清白。

在海政期间，组织过一次军民联欢大会，请了当时极负盛名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登台演出《女起解》，张振宇串演解差崇公道。观众人山人海，挤破了城隍庙“新舞台”的大门。剧场门口站着两个纸扎的高大海军士兵作为门卫，这是黄文农出的主意。我们还在黄浦江吴淞口树立一座“打倒帝国主义！”大标语牌，一切外国轮船进出吴淞口，都得从这大标语牌下驶过，我们大大出了一口几十年受洋人欺凌的窝囊气。

在海政约呆了半年，中间一度派我和另一个组织科的成员到福州设立办事处，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办事处设立在福建省政府内，我们两人占了一间办公室，他管外交，我管宣传。所谓宣传，只是画大幅宣传画送到大街上去张贴，宣传内容仍然是北伐大军从广东出发时的三大口号：反帝、反封

建、反北洋军阀。我们知道这三大口号是国共合作所制定的，蒋介石虽然反了共产党，可是不敢改变革命口号，因为长江以北几个省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孙中山所规定的“国民革命尚未成功”的宣传内容，一时还变不了。我的宣传任务也就只能在这方面做文章。

在福州两个月，整天作画，我那位同事却逍遥自在，东逛西游，有时也带我去泡温泉，吃馆子。一次他带了一个福州本地的画家来，说林主任怕我太忙，找个助手给我帮忙。我一看此人画的是山水花鸟，这如何能表现三大口号？只得婉言谢绝，仍然自己一人埋头苦干。福州街头几乎贴遍了我的宣传画。画群众场面时，我把福州女农民头上插的三把刀也画了过去，这三把刀实际是发簪上插的三支大香，外形象把刀，好象是她们的防身武器。我对此特感兴趣，群众看画也对三把刀感兴趣。这类宣传画，一时成为市民围观的新鲜对象。人群站在画下指指点点，评头品足，我就在旁边听他们说些什么，作为改进工作的依据。可惜我不懂福州方言，有时只好请我那位同事给当翻译。

在这期间，上海海政总部黄文农给我来信，说要出一份海军画报，叫我供稿。记得我寄去一张讽刺英帝国主义海军的漫画。寄出不久即到了中秋节，我突然接到总部通知，调我们两人回上海去。回到总部才知道，海军政治部已被蒋介石下令解散，据说他从侧面了解到，海政内部有异党分子霸占重要职务，所以连林知渊主任也被撤职了。

§1.7 《王先生》长篇漫画问世

从海政下来，我和海政宣传科的几个同事在法租界贝勒路合租了一间三楼住房，过了三个月失业生活。将近年底，接到原宣传科长的通知，说他已在上海总工会任职，为支援英美烟草公司罢工工人作后勤活动，当前要紧的事是出一份画报，揭露英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激起上海市民对罢工工人的同情，希望我参加。我接下了这个任务，去找王敦庆，请这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老前辈出主意，找资料。经过研究，决定以揭露东印度公司贩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事实为题材，和英帝国主义算鸦片战争的账。这份画报以这个主题为中心，旁敲侧击，连同英美烟草公司压迫工人的事实，编成一张彩色石印画报，在上海街头张贴。原打算继续出下去，可惜，英美烟草公司当局通过南京政府把工潮压制下去，宣布工潮平息，于是我又失业。

王敦庆得知我又失业，找我说，支援罢工的画报有看头，可以仿照这个样子，自己办个画报出下去，问我有没有劲儿。我说，反正没事做，只要有人支援，我就拼命干。他说，黄文农目前也闲着，他去说动黄，请他合伙画一个长篇，再请几位拿笔杆的朋友合作凑点文章，不就编成了吗！我问，组稿没问题，印刷纸张费从哪儿来？他说，他和印刷厂打交道，可以暂时欠着，等卖报收了钱再还不迟。经过几次碰头，在一家小旅馆租了一间房作临时编辑室。大家夜以继日忙了三天，第一期《上海漫画》编就。记得有黄文农的一个长篇漫画《上

海人》；他还有一幅画的是粪车，标题是《在晨光衰微中，隆隆车声唤醒了梦中的上海人》；另外还有我和王敦庆的反帝讽刺漫画。黄文农画的那幅粪车，给我印象很深，既幽默，又有诗意。但是否在《上海漫画》上发表，可能记错，因为当时还有另一本赵君豪编的《上海生活》杂志，先《上海漫画》出版，可能“粪车”是该刊的一幅插图。

画报出版之前，曾和望平街的报贩子打过招呼，但没有讲清楚画报的形式和内容，报贩子不敢担保准能上市，只是口头上表示可以接受代理。画报印出，我和王敦庆送到望平街，报贩子看到只半面有字有画，另半面空白，就皱起双眉，说这哪像一张报，没法上市。几经商量，仍遭拒绝，我们垂头丧气，只好把画报都拉到废品收购站当废纸卖掉，欠下的印费、纸张费如何偿还，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三人合伙，黄文农供画，我管跑腿，王敦庆管编务。三人中只敦庆在一家中学教书，有固定收入，可能就是掏腰包结束了这场失败的出版活动。这是1927年底的事。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上海漫画》处女作失败，却引来了画报老手的新主意。我正在法租界贝勒路恒庆里一家三层楼上发愁的时候，住在同里的张光宇把我找去，说彩色石印能吸引人，可是单面印不经看，报贩子目的在图利，岂能白白为你发行不值钱的画报？依他看，彩印的另一面用铅印印上照片和文章，仿小报内容以吸引读者，就可能会受欢迎。当时《三日画报》和《上海画报》已停刊，摄影风气正盛行，摄影家们愿意和画家合作，合伙办一份画报，张问我同意否？

这个新主意，拨开了我一脸愁容，立刻兴奋起来。

办画报的老手出了新主意，并不意味《上海漫画》能绝处逢生。和摄影家合作，张光宇心里有底，怎么合作，由张光宇去张罗就是。不几天，光宇告诉我，班子组成了。三个摄影家，一个郎静山，虎标万金油的广告代理人，能画山水，一天到晚提着照相机，探索艺术摄影；一个胡伯翎，也是画家，在英美烟草公司画月份牌广告，有兴趣玩摄影；一个张珍候，是某洋行的买办，做颜料生意，也想在摄影艺术上露一手。他们都是张光宇的朋友。我们画画的也是三人，张光宇、张正宇，加上我这个毛头小伙子。我的有利条件是年轻，作画出手快，能跑腿，懂得一点印刷技术；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尝过一次失败的教训，创出了《上海漫画》这块新牌子。这个小集团的首脑，当然是张光宇。

我们的出版社，定名为“中国美术刊行社”，先出《上海漫画》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一大张，拆成八开的八个版面，四版漫画，彩色石印；四版照片带文章，铜锌版单色铅印。我们已经在望平街租到一间楼面，可以开始筹备出版了。我问资本如何？光宇说，暂定每人投资二十元，总共一百二十元，估计可以够一期纸张印刷费。看来，只要筹得一期的纸张印刷费，就能出版一份小型报刊，这是上海当时的通行办法。光宇还说，漫画方面，王敦庆同意参加合伙。大概三四天后，双方合作者在望平街某号楼上正式会面，王敦庆也来了。大家推张光宇为总经理兼总编辑，张正宇为副经理兼营业主任，我为漫画版编辑，摄影部三人为顾问，并推张光宇当他们的

代理人。当时郎静山提出，麦加圈小教堂有间大空房出租，刊行社可以搬到那边去。张氏兄弟视察后，认为合适，《上海漫画》第一期出版后，我们一伙人就在这个窝里呆了三年。

美术刊行社在望子街成立的当天，王敦庆和张正宁为了某一句话，两人闹翻了，王敦庆一怒而离开了漫画四人集团。这位原《上海漫画》的合作者，直到三年后时代图书公司成立后，才又和我们见面，并且合作参加了《时代画报》的编辑工作。

脱胎换骨后的第一期《上海漫画》周刊出版于1928年3月22日。一百磅道林纸半张，摆叠成八版，彩色石印漫画四版，单色铅印摄影与文字四版，总编是张光宇，副总编是张正宇和叶浅予。四版漫画中，第一版是封面画，四五两版是名家作品，经常供稿的有黄文农、鲁少飞、王敦庆、张正宇诸人，第八版是叶浅予的《王先生》长篇故事画。

《上海漫画》的第二次生命能维持三年之久，最有力的保证是张光宇老大哥的老谋深算，团结有方，加上张正宇的社会活动能力强，拉到不少长期广告合同，给画报增加了经济实力。我是这个群体的小弟弟，最年轻，最卖力。《王先生》长篇漫画的创作任务落到我身上，也因为我有这个比较优越的条件。

提起“漫画”这个名称，应该作个交待。以前大凡表现政治讽刺，社会形态的画，或称谐画，或称笑画，或称滑稽，或称诙谐，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到了20年代末，丰子恺在文学研究会的期刊上发表具有诙谐性质的社会心态画，自称为

“漫画”，说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我们认为可作为这类画的总称。至于后来林语堂所办《论语》所发表的“幽默”画，则是英语“Humer”一字的谐音，“Humer”的含义和中文“诙谐”相似，也可以以“漫画”这个名称来概括。

上海有一份英文日报《China Daily》，中文叫《大陆报》，每周附送一份美国长篇漫画专版，很受读者欢迎。其中有一篇怕老婆的故事，题为《Bringing up Father》，是全版最叫座的一篇。《上海漫画》为了吸引读者，打算仿照这个长篇，创作一个中国的漫画长篇。大家商量由谁来执笔，因为我年轻肯卖力，又无固定职业，可以专心一意为这个长篇下工夫，就叫我干。最初定名为《上海人》，王敦庆说，这个题目在已失败的《上海漫画》见过，太狭窄，又不吉利，干脆把它改为《王先生》可以随便做文章。中国姓王的最多，名字叫得响。他还帮我设计主角的具体形象——瘦长条，尖鼻子，两撇胡子，像个久住上海的乡下财主；给他配上个矮胖太太，加上个爱打扮的女儿。至于他的朋友小陈，是个富家子弟，配上个凶神恶煞般的老婆。五个角色各具性格，关系微妙，比《Bringing up Father》里那个矮胖老头儿的性格复杂得多，因此故事表现的内容也丰富得多。然而我当时才二十一岁，生活经验很少，为人又老实，画来画去，总跳不出王、陈两家之间的男女关系。直到1930年前后，接受了《晨报》画《王先生别传》的任务，思路才开始活跃，题材内容接触到社会的多方面，扩大了读者的圈子。

我在上海混了十年，《王先生》的名声愈来愈大，有人不

免要追究作者凭什么能耐或灵感，创造出这么一个典型的现代小市民。我的回答很简单，就上面所提接受任务的过程来看，有它的偶然性；而七八年来坚持不懈，愈画愈有劲，也有其必然性。我把自己的灵魂融化在王先生的个性中，王先生就是我，我就是王先生。

《上海漫画》从创刊到休刊，从1928年到1930年，共出了一百多期，王先生每周和读者见面，每周要为读者演一场滑稽戏，从家庭小纠纷到社会大关系，很像七八十年代上海流行的滑稽戏那样受观众欢迎。这个故事从最早模仿美国的《Bringing up Father》怕老婆故事开始，逐渐走出家庭，表现社会的各方面、各角落，进而还摘取政治方面的现实，编为笑剧，以娱读者。有时候，我脑子里实在榨不出笑料，不得已向《笑林广记》之类古代笑话寻求帮助。例如，农民王先生扛了一根竹竿进城门，竖着进不去，横着也进不去，小陈替他出主意，由小陈爬到城楼上去接竹竿，让王先生空手进城，然后翻身交给他。《笑林广记》讽刺的是一个笨蛋县官，为那个扛着竹竿进不了城的农民出主意，叫他把竹竿锯成一段段才进了城。小陈却比那个县官高明，没把竹竿锯断也进了城门。

我有时挖空心思，借警察捉赌的行动做文章。一天，王家聚赌打麻将，两个警察来捉赌，把王先生和小陈抓了去，结果是让赌鬼陪警察在监狱里打麻将。有时我想入非非。王先生做投机生意失败，跳黄浦寻短见，结果跳进了一只小舢板，撞得头破血流，还得赔偿船主锅碗瓢盆。一次，王先生当了个小警官，带部下去监视学生的爱国游行。到了半夜，学生的后

勤队向游行队送宵夜，王先生向学生求饶说：“你们有人送宵夜，我们却饿着肚子，求你们行行好，让我们回去休息吧！”

我为《上海漫画》做的具体工作，除《王先生》长篇外，每期四、五两版的版面归我设计，供画的人，就只张光宇、张正宇、黄文农、鲁少飞几位。三天内把画收齐，贴好版样，和第一版封面、第八版长篇一起送到制版所，拍照缩小，然后送到石印厂制套色版，两天内四套色印毕，在这两天内把编好的二、三、六、七四个版的铜锌版和文字稿送到铅印厂排版，星期五晚上把印成的彩色漫画版送到铅印厂，一般要在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上架开印，到天亮印毕，立刻雇车送到望平街报贩手中。五天内跑两家印刷厂，有时在石印厂和工人一起锚石版，每逢星期五下午还必到铅印厂和工人一起排版，一直熬到星期六天亮，把画报送到望平街，才算完工。跑印刷厂的任务，除了我，张正宁也帮一手。麦家圈后期，招收了两个少年练习生，编辑工作有了帮手，才算松了一口气。帮编务的宣文杰，几年后成为《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的得力助手，至今已年逾七十从新华社摄影部退休下来，有时还动动笔杆，写点当年漫画界的掌故，是30年代漫画界的一个重要知情人。

在《上海漫画》时期，除《王先生》长篇之外，有时我在四、五版也作点小画，或轮流画几次封面画，一般都是男女关系的内容，和《两毛钱饱眼福》的处女作有渊源。除此而外，我有时画点妇女时装设计图，因而受到“云裳”时装公司的聘请，当了一个时期的时装设计师。这个新职业等于唱京

戏玩儿票，自得其乐而已，可也发生了社会影响。在此期间，一家英国棉织印花布洋行，通过一家广告公司找到我，要我为印花布办一次时装展览，借以倾销他们的新产品。为了这次展览，我除了设计服装、编印样本，还跑舞厅，约请几位舞女当临时模特儿，在南京路一家著名的外商惠罗百货公司楼上办起了上海第一次时装展览会。在当今时装模特风行一时的80年代看来，那简直像小孩子玩过家家，可是有几位老牌服装设计师见到我，却举起大拇指，说我是时装展览的“开山老祖”。这种际遇，在当时也是意想不到的，我能大着胆子，不计成败地干了起来，说明叶浅予这小子闯世界的劲儿真不小。这可以说是上海创业史中的一个插曲，和1926年单枪匹马画舞台布景，别出心裁设计印花布图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吧。

§1.8 飞来横祸平安度过

《上海漫画》第七版，自1929年起连续发表《世界人体比较》栏目，每期一套女性裸体照片，着重分析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生理特征，由我执笔写说明，照片来源于德国出版的一本世界妇女裸体摄影集。大约十来期以后，突然接到公共租界临时法院通知说《世界人体比较》一稿，租界巡捕房认为有伤风化，向临时法院起诉，定于某月某日上午某时开庭审判，被告人《上海漫画》负责人务必准时出庭受审云云。接到这个通知，我们认为分明是租界巡捕房借题发挥，意图对

我们敲诈，于是决定聘请律师据理力争。但由谁出庭去受审呢？光宇、正宇面有难色，我便挺身而出，自告奋勇，承担了《上海漫画》负责人的名义，准备出庭。正宇为我请了一位名叫詹纪凤的律师作辩护人。詹律师对我说。临时法院是中国政府派在租界里的一个执法机关。成立不久，一定会坚持中国人的立场，保护中国人的合法权益。他叫我放心，说他一定据理力争，使巡捕房的阴谋落空。

开庭那天，光宇、正宇陪我到了法院，我立被告席，他们坐旁听席，詹律师穿起法衣，手抱皮包，皮包里有那本德国版世界妇女裸体摄影集，作为旁证。《上海漫画》一案之前，先审另一起案子。匆匆审毕，轮到审讯以叶浅予为代表的《上海漫画》周刊《世界人体比较》一案。法官读完起诉书，詹律师起立，引经据典，为我辩护，最后拿出那本德文版的人体影集，指出这是一种生理科学研究的文献，与风化无关，《上海漫画》编者的说明文字也完全从人体生理构造出发，论证世界不同民族的不同体态，纯粹是学术探讨，一点也不涉及所谓社会风化问题，希望主审官辨明是非，不为蜚语流言所动。法官当即宣布辩论终结，被告无罪。我站在被告席上不过十来分钟，这场官司打得如此干净利落，完全出于意料。光宇、正宇从旁听席上走过来，向我伸手祝贺。詹律师脱下法衣，走过来对正宇说：“这趟出庭费，清早点送过来！”言下微露得意之色。

回到麦家圈，黄文农、鲁少飞向我问长问短，一致认为这场官司打得是时候，要是从前，治外法权握在人家手里，叶

浅予不坐牢也得罚款，而这一罚，《上海漫画》也许就得关门。现在你看，治外法权收回，“理”在中国人一边，任凭巡捕房势力多大，不能随便欺侮人了！有人插嘴说，假使官司打输，罚了款，说不定《上海漫画》名扬四海，销路大增，广告来源“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不但不会关门，还能发大财呢！这么一说，叶浅予对《上海漫画》的贡献可就大了。七嘴八舌，愈说愈荒唐，变成说笑话寻开心，上海人所谓“吃豆腐”了。

§1.9 《上海漫画》的最后命运

《上海漫画》经过这一番折磨，等于爬过一座高山，两条腿更加硬朗起来，我的干劲也更足。光宇老大哥在这个节骨眼上，干脆辞掉英美烟草公司那份高薪职位，专心一意经营《上海漫画》这份自己创立的事业。也许就是这场官司，把大家的干劲鼓起来了，画报销路上升了，读者的漫画投稿也逐渐多起来。过去，所有的画稿，由我们几个人包揽，特别是第一版封面大画，要求质量特高，出现过黄文农的《大权在握》、张光宇的《腐化的偶像》，经过这一阶段，有人敢于向画报封面大画投稿，我们几个老手也敢于放开手脚，让新手占领这块阵地。记得头一幅入选的封面画，是杭州胡同光画的。这一开放，新手们的劲儿来了，投稿的接连不断。例如，香港的黄苗子，当时还是个中学生，大胆投稿，我们大胆发表。苗子现在是当今重要的美术评论家，成为美术论坛的权

威，30年代初期却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提起张光宇对《上海漫画》的贡献，那是同仁们一致公认的第一位能人。他画的第一期封面，把墨水瓶、铅笔、橡皮、三角板、图针等绘画工具拼凑成一个唐·吉柯德式的骑士，既富于幽默风趣，又带点自我嘲讽的意味，可以说是一篇绝妙的发刊辞。以后他又画了一个老学究的腐朽脑袋瓜，眉毛、胡子、头发全用植物叶子组成，富于立体感，像一坐落后人物的雕像，但从其严肃的表情看来，又是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学者，如此多面的性格造型，完全符合漫画形象的多边效果。我至今一直认为张光宇的漫画创作，是同辈中最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体。

1929年《上海漫画》出到第43期“新春号”，已是个了不起的纪录。为了庆祝这有意义的新春佳节，画报版面第七、八两页，把我们几个“开山老祖”的形象都公开示众。几位老大哥都是成双成对——黄文农、倪英明从南京总政治部下来，结成夫妇；鲁少飞正在和一位姑娘热恋，拍了张若即若离的照片，说明两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叶浅予和张正宇是两条光棍，形单影只。几位老大哥和我们开玩笑说，这期画报到了读者手里，可能会引起姑娘们的遐想，你们准备接受胭脂花粉的腐蚀吧。

《上海漫画》出世以前，上海曾出现一本八开十六页的铅印画报，名叫《良友》，是几个从军队政治部下来的广东青年所创办的，内容以时事、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照片为主。这个画报开本大，篇幅多，每月出一本，很受读者欢

迎，出版以来，销数大增，南洋群岛华侨集中的地方读者尤其多。这个画报原来由新加坡一家中国书店包销，不知什么原因，《良友》代销店被另一家书店抢走。原来的中国书店老板是温州人，他的上海坐庄负责人是我在三友实业社的同事王叔汤。王叔汤在包销《良友》的同时，也采购《上海漫画》，发往新加坡推销。《良友》在新加坡换了主，中国书店不甘心，于是通过王叔汤策动张正宁另编一份同样的画报月刊，取名《时代》和《良友》对抗。由此，《上海漫画》编辑部同时成为《时代》的编辑部。我们的摄影方面合伙者郎、胡、张提出抗议，要求拆伙停办中国美术刊行社。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经不起新加坡书商的利诱，接受了拆伙要求。出了一百多期的《上海漫画》从此收摊。张正宇以“时代出版社”的名义，从麦家圈搬到了南京路日升楼附近一条弄堂里。我当然和漫画群体一起行动，从此以后，和《上海漫画》告别了。

§1.10 主编《时代画报》

好好的一份《上海漫画》竟然弄到拆伙收摊，我实在不甘心受此挫折。然而，刀把子握在张氏兄弟手里，争也没用。那么光宇对他兄弟为何如此迁就呢？关于这一点，当时我并未想过，到了老迈年龄，经历风雨多了，忽然发现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当时并未想过？要是那时发现了，也许《上海漫画》的命运，不至于如此下场。我和张氏兄弟相处三年，觉得老兄是个真正的艺术家，老弟虽也从事漫画创作，所作所为

毕竟带点市侩商人气。那三年，他掌握着《上海漫画》的经济大权，和报贩老板关系打得火热，各家广告客户，由他个人打交道。刊行社有个名义上的会计，是郎静山介绍来的，成了正宇个人的账房先生。在《上海漫画》的生死关头，做老兄的没法辨明是非，一味听老弟指手画脚，而我这个不懂世道的小子，什么都听老大哥的，明知道老弟私下承办《时代画报》有些蹊跷，但也不敢挑明，只能顺水推舟跟着走。

光宇、正宇为了母丧，奔走在上海、无锡之间，把《时代》这副新担子交给了我。正宇平时包的那辆人力车，以及和报贩老板的关系，也一起交给了我。我一下子抖了起来，由小伙计一变而为不大不小的“老板”，心里有点发毛。可是，坐上那辆包月的黄包车，进出南京路，却又有点飘飘然乐滋滋。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历史，看清楚自己的灵魂深处，已经被洋场市侩的细菌侵蚀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张氏兄弟办完丧事回到上海，我仍然恢复到原来的小伙计地位，当了《时代画报》的编辑，《王先生》长篇也从《上海漫画》移到了《时代画报》的版尾。

没有看错，张正宇真是社会活动的干将。几个月后，他宣布已和当时相当活跃的新文人邵询美和画家曹涵美合伙，组成了“时代图书公司”，在四马路租到沿街的铺面，要开设书店，寄售各家出版社的书刊。他说，邵、曹二家都是有钱的主儿，各拿两千元作开办费，张氏兄弟和我都将成为这家公司的合伙投资者，也就是合法的“老板”。为了不使二张一叶感到寒酸，决定将四千元资金分为五股，每股八百元，名义

上二张一叶也成了股东，借以发挥我们三人的积极性。这么说，二张一叶仍是空头老板。可是到了1935年，时代图书公司宣布经营亏损，第一批资金快烛光了，开临时股东会宣布暂时停业，移交邵、曹二人接办，却议定二张一叶对邵、曹二户各负债八百元，我们倒成了负债者。后来，我因家庭变故，从上海迁居南京，受聘为《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连载长篇漫画；张氏兄弟则自立门户，办了个独立出版社，出版《独立漫画》月刊。

写到这里，应该回顾一下时代图书公司的初创和全盛时期。

张正宇宣布时代图书公司成立后，第一次董事会推举张光宇为总经理，曹涵美、张正宇为副经理。邵询美因身任新月书店经理，专管新月书店业务，不愿过问“时代”的事，这一摊子仍归张氏兄弟包揽。这儿得点明一下，曹涵美原本是张家的老二，因舅家无嗣，过继给舅家为子，因而改姓曹。张光宇名义是总经理，经济实权却操在老二涵美手中，而出版业务则归老三正宇经管。叶浅予被任命为《时代画报》主编，宣文杰当了我的助手。此时，由正宇鼓动，邵询美又出资办了个印刷厂，从德国订购了一套影写凹版设备，在平凉路安装齐全。不料快开工时，十九路军在沪北举起抗日大旗，和日本驻军开了火，而“时代厂址正坐落在日本驻军地区。邵询美急命工厂搬迁到法租界某条街上。沪战期间，工厂不能开工，画报暂时停刊。等到战事结束，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被调到福建。不久，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起义，宣布

成立人民政府，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动剿共之军，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此时《时代画报》已经复刊，发表了一组福建人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活动照片。孰料四马路时代公司门市部玻璃橱窗上，被人贴上了一张对《时代画报》的警告信，说画报“有红色嫌疑，当心被砸！”署名“上海反共别动队”。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正在加紧，上海的反共宣传也在加剧。我们只好通过关系，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声明，这批照片是一个读者投的稿，编者不明真相，发错了，以后保证不出错。这样，“反共别动队”才不再光顾了。

时代图书公司的全盛时期应当是1934年搬进汉口路新建成的弄堂房子以后。当时登出广告，宣布同时发行五大杂志：一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二是叶浅予主编的《时代画报》；三是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四是宗淮庭主编的《时代电影》；五是张光宇主编的《万象》月刊。除期刊之外，先后出版了好几本画册和图文并茂的小书，例如叶浅予的《王先生》画册，黄文农的《文农讽刺画集》，张光宇、邵询美合著的《小姐须知》、张光宇的《民间情歌》等等。全盛时期的时代图书公司，自办编辑，自办印刷，自办发行，看起来像一家规模不小的出版商。编辑室人材济济，仅《时代画报》这一组，我任主编，张大任任助编，王敦庆任责编，陆志库任美编，一共四人。三楼布置了一个摄影室，由专任摄影记者王任槐负责，经常请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来留影，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起来。《时代》及各期刊用过的照片，都由宣文杰归总保管。

作为《时代画报》的主编，我和全国各地的职业或业余

摄影家经常保持联系，我自己也拿起摄影机拍摄人像和风景照片，并以“初萌”笔名，在画报上发表我的习作。发表多了，我居然被上海的黑白社吸收为社员，参加了几次黑白社的摄影展。

自从1935年墨西哥漫画家阿佛罗皮斯访问上海和我相识后，我受其影响，也拿起速写本，在生活中画速写，渐渐和摄影机疏远了。这年我有机会第一次畅游华北大地在北平故都，干脆把摄影机丢了，集中全身心画速写。这是我从事美术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在生活中记录形象，也是美术界改变创作风气的一次尝试。

1935年北游回来，时代公司给我出了一本《浅予速写集》，不久上海杂志公司又出了一本我的《旅行漫画》。速写是美术造型训练中的一种手段，过去仅仅作为造型的基本功，并没有把它当作在深入生活中记录形象的手段。我的尝试，后来成为美术界的新风尚。1947年我受徐悲鸿之聘，到北平艺专教画，在国画系一个班上开了“速写”这门课，据说是中国创办现代化美术院校以来最新的课程。

§1.11 《王先生别传》与《小陈留京外史》

30年代初，《晨报》在上海出现，这是国民党夺取舆论和文化阵地的一项重大措施。《晨报》筹办之初，三友实业社那位姓季的画家，向《晨报》主人潘公展献策，主张每逢星期日随报附送一张画报，用以招揽读者，并推荐叶浅予为画报

画一个漫画长篇，填补《上海漫画》的空缺。这个主张为《晨报》所接受，姓季的当即跑来找我，鼓动我干脆把《王先生》搬到《图画晨报》，答应给我每月一百元固定稿费，不过有个附带条件，就是要给《图画晨报》封面封底固定广告户画两幅现代仕女画，也就是把《图画晨报》的四版彩画全部包了。这笔报酬不算少，我心里掂了掂，《时代》每月二套，《晨报》每月四套，吃得消吗？听人说，上海这地方，只要有本事，拼着命干，日子一定过得好。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已经有了一个家，开支够大的，于是壮着胆，把这任务接了下来，为《晨报》卖了五年力。

上海《晨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潘公展集资经营。潘是老上海，是国民党二陈派的重要人物，以前办过报。《晨报》每周附送一张画报，虽非创举，可是在和申新两大报的竞争中却是有利的。我接了这个任务，王先生从《时代画报》又跳到了《图画晨报》。为了和《时代》的王先生有所区别，《晨报》的王先生定名为《王先生别传》，王先生的打扮也有所变动，原来穿西装的，改为白长衫和黑马甲（背心），头上仍戴白盔帽；其他人物一概照旧。原来的九格改为八格，顺序由左行改为右行。从那时起，除了兼任《时代画报》编务，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创作《王先生》长篇上。任务是够重的，但比起1936年为南京《朝报》画每天四格的《小陈留京外史》却还算轻松。

《晨报》主编对“别传”内容从不过问，任作者自由发挥，因而我感到精神十分舒畅。记得有一期画的是王先生当了警

官，带部下去监视学生示威游行，表现了一幕向学生求饶的丑剧，显然是讽刺政府当局的，事后却并未受到指责。另一次画学生募航空救国捐，王先生躲躲藏藏逃避募捐，意味着对募捐的反感，也并无反应。时间愈久，我愈明白，国民党的统治，也像只纸老虎，并不可怕。不过，你要真是异党分子，那可不客气，“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漏过一人。”王先生是个吸引读者的丑角，随便他干什么，绝不能成为异党分子。我这么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反过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吧。

漫画细胞在我的肌体和血液中，在上海的十年中，无疑居于主导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先生》不能在日报画刊中存身，我却拿了这支画笔和漫画界的伙伴们，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在抗日前线 and 后方，以另一种方式发挥漫画的战斗功能。即使在我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年代中，漫画细胞仍然在我的作品中起到“发酵”作用。1982年的《长安怀古》，1984年的《神游天安门》，以及最近的新作《富春人物画谱》，无不反映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讥讽诙谐态度。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红卫兵造反派所迫，承认自己是个“游戏人间的玩世派”，这当然指我的漫画生活造成了我对人生现实的态度。但是，认真检查起来，这不能叫“玩世”或“游戏人生”，实际是指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讥讽和诙谐的态度，正是被这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现实世界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不得不从反面来看这个世界，从丑恶污浊的一面来反衬光明美好的一面。

1936年我为南京《朝报》画的《小陈留京外史》表现南京小官僚的嘴脸，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堂堂首都的官场生活。我认为王先生是封建型的破落地主成分，不宜在官场鬼混，小陈则是上海殖民地出身的富家子弟，和南京官场可以有各种裙带关系。所以我把这两个丑角分了家，安排小陈单独进京去捞世界。《朝报》出现的留京外史第一篇，画的是小陈从上海乘夜车到达南京，清晨在和平门下车，遇到宪兵巡警检查行李。小陈大模大样打开衣箱，衣服上面躺着一封八行书介绍信，收信人不是某局长便是某部长，小陈仰着头似理不理，宪兵巡警只得盖好箱盖，在箱盖上用粉笔划个“已查”的记号。小陈便坐上来迎接的汽车，扬长而去。这个材料我怎么得来？说得巧，就是我初到南京在车站所见的真情实景，我便借用为小陈进京的威风。

在此之前，小陈乘车用的是免票，列车员来查票，一看是路局的免票，便问：“局长是谁？”

小陈答：“是我舅。”

又问：“处长是谁？”

答：“是我丈人。”

进京不久，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这篇《留京外史》遭到非议，说我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和我商量，以后

别画小陈了，还是请王先生登场吧。《留京外史》画了不到半年，改画《王先生到农村去》，半年以后，农村题材也出了毛病，触犯了地方政府的农业政策，最后不得不请王先生离开农村，到夫子庙茶馆书场当老板，把王的女儿阿媛送到书场上卖唱又卖相。卢沟桥炮声一响，王先生的穷途末路也告结束。

大约在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把我的《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原稿全部搜去，印了六本画册，总算给我在社会上留下了一份遗产。而我自己手头所留的这六本画册，却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尸骨全无，找不回来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满脑子教条，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矛盾都不存在了，王先生和小陈已成为历史的残渣余孽，我举起一只脚，把他们踢进了历史垃圾箱。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把我叶浅予也当作历史垃圾，送进了牛棚，关进了监狱，当作历史反革命处理，这才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省悟过来，重新认识了我这段上海创业的历史意义。1986年，经毕克官帮助，从朋友处借到全部王先生和小陈画集，重新编印了一本《王先生与小陈》的选集。面对着这本选集，我思潮澎湃，感慨无已。

在我写这篇“上海创业”的历史过程时，身处浙西的天目山自然保护区，双目所见是古杉新竹，两耳所闻是鸟语虫鸣，心旷神怡，一派虚灵。手头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凭着心灵的飞驰，倒转时间的流向，沉思当年的艰辛岁月。可

是，这位我所杜造出来的老丑角，总是对我嬉皮笑脸，不让我触动灵魂深处的创伤。我握紧拳头，向书桌一击，命令他收起那副怪相，老老实实帮我回忆十年的岁月。他似有所悟，板着脸向我诉起苦来。

他问：当初你硬要我这个瘦老头子模仿美国的那位矮胖子的惧内行为，向读者出丑，弄得我处处遭人调笑，那是为了什么？

我答：王无能唱独脚戏，艾笑笑耍贫嘴，为了吃饭，天经地义，有什么可怨的？

他问：不错，可人家美国佬吃饱饭跑俱乐部，闲得自找烦恼，跟我这乡下财主闲居上海，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为什么非让我学他呢？

我答：问得有理。咱中国人吃饭拿筷，人家吃饭拿刀叉，习惯不同，不能一样生活。不过，上海这十里洋场，到处是西餐馆，罗宋汤一盆只收两角，你老王不也经常上霞飞路吃西餐吗？至于跑俱乐部，自寻快乐，这和你们王陈两家凑成一桌麻将有什么两样？至于惧内怕老婆，更是中国的老传统，怕什么丑？

他问：上海漫画那阵，你那笔下，总把我王家的丑事加油加酱，硬教小陈和我女儿勾勾塔塔，把我女儿名声也败坏了。我见了陈太太，简直抬不起头来。你说这账该不该算？

我答。你姑娘长得漂亮，又爱打扮，怪不得小陈眼馋。你别忘了，陈太太管小陈管得够严的，你姑娘聪明伶俐，从小在你的教育下，调教得心眼特别多，你还怕她受人欺侮？

他问：不对！我姑娘是俊，是灵，有心眼，可不能和他老子相比！我姓王的乡下有田有势，只因共产党闹得我在乡下安身不得，才把家产卖了，来上海做个寓公。我家也是当官出身，懂得诗礼传家，我家姑娘更是知书明礼，洁身自好，你说她心眼多，好像是我故意调教出来的，这不明明在骂我吗？

我答：这就问到点子上了。你姑娘那份聪明，不但要归功于你的调教，也和王家先天遗传有关。你别赖了，我对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简直摸透了。且不提你的姑娘，就说你自己吧。你别吹，你家祖上当过什么官，用不着查；你说共产党闹得你不能在老家存身，这可以查。你们老家根本没闹过共产党，你也够不上一个大地主身份，只不过因为家产被你吸毒吸穷了，才搬来上海找条出路。你说是不是？

经我一点，王先生这才哑口无言。

争论刚完，小陈跳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丑化姓王的不算，还丑化我姓陈的。姓叶的，你那只画笔，真够损人！你说我是洋行小开，富家子弟，没错，可我不是那种寻花问柳见色迷心的人。我和王家小姐来往，并无越轨行动，怎能说我和她勾勾搭搭？这事有我老婆为证，可以对天发誓。

我答：你陈家和王家的关系，到底从何而来，无关宏旨。王家是乡下小财主，和你们洋行买办家庭本来不搭界，你们来往如此热络，我从表面看问题，总觉得你和王家姑娘的关系不正常，因此猜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把你们两家拉到一起。怪我姓叶的社会经验少，文化水平低，把你陈先生看扁了，实在对不起。

陈说：你我在上海混日子，捞世界，井水不犯河水，用不着来这一套！不过，我那几年在南京当了一阵小官，你天天盯着我，出我的丑，未免过份了吧！老实告诉你，我的岳父老丈人最器重我的才华，才请我去南京显一显身手，这又碍你什么事？

我说：也真巧，那阵子，我在上海呆不住，才到南京来摆画摊子。《朝报》老板给我出点子，要我画小京官的嘴脸，出出他们的洋相，又偏偏碰上你这个熟人，我就把你当作我新编故事的主角了。你别见怪，这原是逢场作戏，无中生有，你别往心里去。

他说：混帐！无赖！那次把我背总理遗嘱的窘态出尽了洋相，我岳父直生气，说一定要严办你这个造谣生事的臭文人，把你逐出南京去！幸亏我从旁说好说歹，只对报社老板提了一次警告，没把你怎么样。

我说：够朋友！咱们上海人讲义气，不能为一点小事扯破脸。以后你有什么宏图大略，比如竞选国大代表之类计划，事先给我个信，我一定从旁推波助澜，捧你上天。

陈说：这才够朋友！不过，那次西安事变，你派我到机场去等候蒋委员长，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害得我埋在雪里，差点透不过气来。这种玩笑绝对不能开！

我说：你这就弄拧了，那天到机场迎接蒋大总统，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西安那边情况不明，张学良肯不肯放老蒋，还在和宋子文讨价还价，谁叫你如此莽撞，急急忙忙要去效忠，闹了个大笑话。

陈指着我的鼻子，气冲冲问：就算这次去机场迎蒋，你曾指点我不要莽撞，我也多谢你把我理在雪里。怎么出洋相，也算表现了我对蒋老板的一片赤胆忠心。因此我不敢怪你。然而，那次在中山门轧死一个警察的事，分明是张冠李戴，硬算在我姓陈的账上，未免大欺人了！

我说：口传是虚，眼见是实。我的根据是中山门派出所的交通事故登记册，那上面有你小陈的悔过认罪书，这怎么叫张冠李戴呢！

谈到此处，姓陈的也哑口无言了。

我正在整理我和王陈二人对话的记录，好好总结一下“别传”和“外史”的创作经验，是否合乎我的漫画思维逻辑，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看看面熟，一听口音，便认出是南京《朝报》老板王公韬，连忙请他坐下，问他有何见教？

王说，听说你正在写创业历史，我特来提供一个信息。我问什么信息？他说，“留京外史”在《朝报》发表，着实给《朝报》带来了光彩，也带来了实惠，我得向你道谢。现在我要向你提供的信息是：小陈在纪念周上出洋相，我受到我的后台老板一次警告，当时不敢向你直言，只请编该版的陆小洛发稿时注意社会影响。后来机场迎蒋和轧死交警诸画发表，后台老板虽没说话，却有人直接向报社发行柜台提出书面质问，声言姓叶的再要信口雌黄，胡说乱编，小心你《朝报》的大门被砸！我这才叫小格和你商量，叫小陈休息一段时间，让王先生登场客串几天，平息一下社会的压力。

听了这话，我心里明白过来。当时社会对“外史”的指

责，我也有所耳闻，但没想到压力如此之大。于是对王公韬说，实在对不起，都怪我在上海租界呆久了，对首都实情不甚了解。但也得怪你事先不向我提示在南京摆画摊应注意之点，免得触犯官场中某些大亨的疮疤，以致影响到报社的安危。

公韬哈哈大笑，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叶，《朝报》拉你供稿，一来为小报增光，二来让你在南京有个安身立命之地。《朝报》是个民营报纸，虽有蒋老板手下的幕宾作我的后台，却也从来没人干预报社的决策。你老叶大名鼎鼎，独立创作，谁都知道是个自由主义者，爱国家，爱民族。你爱画什么就画什么，我们全然放心，所以用不着什么提示，为你的创作思路设置框框。不过确有些胸襟狭窄，官病特大的人，容不得别人指指点点，所以发生了一些无理的行动。真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千万别放在心里。不过，报社创刊以来，历经沧桑，经不起无理取闹，当时我们处在困境，不得已才请小陈暂时下台，以度难关。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公韬说完，突然隐身，我神思恍惚，进入了另一境界。

§1.12 王先生到农村去

我走到南京郊区一户农家，一个胖老太手里拿着一把菜刀，向小河边走去，边走边喊：“谁家杀千刀，偷了我家的鸡，该死！该死！”一个年轻姑娘从屋里追出来，向胖老太喊：“妈，鸡没有丢，别喊啦！”老太回过头，瞪起一双小眼

说：“我明明看见河边有鸡毛、鸡血，看这鸡毛，认得是我家那只下蛋的老母鸡！”

“啊呀，那是张家在河边杀自家的鸡，怎么可以瞎骂人家偷鸡呢。”

“那么我家那只老母鸡呢？”

“她躲在窝里下蛋哪。”

“阿也，我真糊涂！”

这时，一个瘦老头儿挑着一担粪从村外走来，嘴上直咕哝：“她妈，有钱人家真造孽，在粪缸里掺水，还撒土，只顾抬价，少了不卖，你说气不气人！”

老太迎了上去，问：“是张财主家的吧？你怎么又上他家去买肥呢，上回不是吵了一架吗？”

瘦老头儿直叹气：“同住一个村，晚上不见白天见，经不起姓张的两句好话，答应明年再让两亩水稻给我种，这个面子怎好不买呢？”

胖老太：“人家一句空话，你就信啦？”

瘦老头：“同在茶馆吃茶的人，个个听得一清二白，张财主当着大家的面就这么说。”

胖老太：“亏你活了半辈子，一无凭，二无据，人家就能认账？”

这时姑娘插嘴了：“妈妈真是，你们一不对劲就顶嘴。这肥么，大家都在抢着买，张财主和爸爸有点交情，愿意卖给我家，吃点亏也算便宜。不然的话，在这个节骨眼上，稻禾正拔节出穗的关键时刻，不抢肥存着，晚了就后悔莫及啦。妈，

你说是不是？”

瘦老头：“还是阿媛通情达理，这担肥要不是我抢得快，说不定撒到阿陆田里去了。”

胖老太：“又是你的理。别扯啦，吃饭吧！”

没进门，先听这家三口人你一言我一语，声音挺耳熟，语气却和以前大不相同。心里正纳闷，老头儿一见我，凝视半天，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老太正转身往灶间走，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敢打招呼。倒是姑娘眼明心亮，认出我是姓叶的，连忙招呼我进屋，说：“多年不见，听说你近来和小陈在一起，混得挺对劲，和我们王家疏远了。这回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经王阿媛这么一说，我就单刀直入，开言道：“小陈这一年混得不错，官不算大，油水挺足。老实说，不是他老丈人拉他一把，这位洋行小开也进不了官场；进了官场，不见得能混得如此顺心。洋房汽车全是公家的，吃饭穿衣有贴心阿姨招呼。陈太太不在身边，他落得寻欢作乐，毫无顾忌。想不到小陈当官当昏了头脑，贪污腐化，贪赃枉法之事无所不为，弄得他老丈人也无法保驾，还险些把这位大靠山牵了进去，你说他糊涂不糊涂？当初陈太太不该放他独自去南京做官，要是她在身边，也许出不了大乱子。如今他老丈人把他一脚踢开，逼他回上海去了。”

这一番话，说得瘦老头拍手叫好，说：“早先我也曾想捞个一官半职，快活下半辈子，小陈硬反对，说我土财主没这个福份。要当官就得有靠山，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原来

朝中有人也并不可靠，这回我算想通了。”

胖老太插嘴：“上海日子过得蛮好，死老头子偏要到什么农村去。现在你看，浇肥，种菜，养鸡，喂猪，弄得我一身脏，我真后悔，不该听老头子的话，过这穷日子。”

瘦老头说：“我祖上原本是种田出身，我父亲手里做了点生意买卖，发了财，放租放债，置田买地，成了个不大不小的财主。老早给我娶了她，怕我出去鬼混，特地教我吸鸦片，成天把我关在家里。害得我四肢懒散，不务正业，把家产吸尽了，才带妻拖女到上海寻条出路。在上海，把剩下的家当做投机买卖，怪我命不好，把本钱输光了，这才走上我祖上的老路。幸亏小时候见过佃户种我家的地，懂得庄户人家如何过日子。你瞧，我年过五十，手脚挺硬朗。刚才你不看见我挑着一担粪从张财主家回来吗？”

我说：“真佩服你老王，有这点硬工夫。以前，我以为你这副浸透鸦片烟毒的骨头，胡吹什么‘到农村去’，谁能相信？今日一见，才知道你家学渊源，并非吹牛。”

阿媛插嘴：“叶伯伯，你别夸他！当初下到这穷地方来时，不但母亲心里别扭，我也苦恼，硬是不肯离开上海。爸爸气得直跳脚，说什么‘你们不走，我就一人走。让你们活活饿死在上海！’你说这话可毒？我们在上海当叫花子，也不至于活活饿死。他愈急，我们愈硬，和妈妈商量好，把私房钱和金银首饰装成一箱，准备到舅舅家去过日子。谁知道爸爸真会动脑筋，乘我们不备，把一箱家当抢走，丢下我们，独自一人买船票出走了。害得我们好找，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鬼地方。没

想到爸爸用我们那一箱金银私房钱，向县里放荒处领了十亩地，竟然在此安家了。到了这一步，我们母女二人也只得认命了。”

瘦老头两手一拍，拿起旱烟筒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然后慢慢说道：“我走长江来到南京郊外，看见街上贴着告示，说长江南岸有一片官荒，县府决定开荒种粮，军民人等如愿领地开荒，每亩交地价二十元即归本人终身使用，立契为据，决不食言云云。我一想，身边还有点本钱，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于是就到县政府办登记，领了这十亩地，搭了个草棚作为安身之处，和周围的邻居搭伙买了条牛，就这么过起穷日子来了。”

胖老太气愤地说：“老头子你好狠心，将近一年，你也不给个信，害得我和阿媛寻得好苦。要不是陈家大嫂接济我们，也找不到这鬼地方。你别逞强要不是我们来到，帮你干这干那，这十亩生荒地能种成这模样？”

我拦住王太太，好言相劝：“你们这日子虽然过得紧些，比上海那阵子摆空架子借债度日，可舒服得多。再比比小陈在官场中混到身败名裂，不更好些吗？”

阿媛对我看了一眼，说道：“我从小娇生惯养，只知饭来张嘴，衣来伸手。长大了也只知道逛公园，荡马路，买吃买穿，全不知这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自从到了农村，才懂得人生在世，不是来享福，而是来生产的。我佩服爸爸‘败子回头金不换’的精神，他教育了我。从今以后，再不稀罕绣花旗袍高跟鞋那一套了。”

这时，胖老太紧闭嘴唇，一言不发，直瞪双眼，对着瘦老头突然扑嗤一笑，半喜半恨地发话：“我和老头子拌嘴拌惯了，稍不顺心，就要发火。现在这日子，确实比上海过得顺心。不过，老头子年岁大了，身子骨究竟挡不起太多风险，我又胖成这样，干不了力气活，只能盼望阿媛挑起这副重担，为我二老多分些心。”

老头子逞强，嘴上挺硬：“这十亩荒地由我一人开垦出来，不靠别的，全靠我这副老骨头经得住磨炼。还有，幸亏读了几年私塾，懂得一点人生在世的道理。我在这长江岸边，远近十多里，哪家的事不来向我请教。”

话音刚落，门外闯进来一个女人，还跟着个小孩，哭哭啼啼加泪鼻涕：“王伯伯，孩子他爹不知害了什么病，躺了三天，昨晚突然抽筋，不省人事，熬到今天早晨，他爹双手一摊，双眼一闭，心也不跳了。我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好。王伯伯，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瘦老头说：“第一，买棺材，办土葬；第二，买白布做孝衣；第三，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

那妇人说：“家里一个钱也没得，买不了棺材，做不起孝衣，更请不起和尚。”

老头：“向左邻右舍借贷，先买棺材找块地葬了。孝衣不做，你们母子头上色块白布也行。至于和尚，不请也罢。”

那妇人问老头：“这主意我听了，先得向你伸手，借点钱给我，不够再向别家去借。”

老头子抓抓头皮，环顾左右，口中喃喃有辞：“我身上穷

得叮当响，再榨也没油水，还是向别家想办法去吧。

那妇人没法，只得默默退出。

我在一旁，觉得怪可怜的，正想摸口袋，老王挡住了我。等那妇人走后，他轻声对我说：“她有个相好，自然会有办法，你就别发慈悲了。”

过了两天，老王到死人那家去看看丧事办得怎样了。一进门，见死人还躺在门板上，那妇人却穿红戴绿，准备做新娘了。老王紧皱双眉，怒目训那妇人道：“丈夫尸骨未寒，你便急着嫁人，太不像话！”

那妇人道：“我不出嫁，哪来的钱买棺材呀？”

站在一旁，我胸中不平，责问老王：“人家穷得买不起棺材，你不加援助，还拿三从四德陈辞滥调训人，太不近人情了！”

老王翘起两撇胡子。瞪着双眼，讲出一篇大道理，想说服我，我便洗耳恭听：

“自从盘古开天地，华夏民族出了个神农大帝，教我们种地聚粮，绩麻养蚕，我们才有吃有穿。后来出了个孔夫子大圣人，教我们君臣、父子、夫妻、子孙之间，各尽其职，各守其礼，决不可乱了伦理道德。尤其是男女之间，界限分明，决不可偷鸡摸狗，违反古训。这妇人既不懂三从四德，又不听我的指点，竟然在男人的尸体旁穿红戴绿，简直目无纲纪，不知羞耻。不训她一顿，还能维持社会秩序吗！”

我问：“你在上海背着王师母，在外面寻花问柳，胡作非为，就懂纲纪羞耻了吗？”

老王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识事务者为俊杰。我老王做事，循的是这个理。”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能屈能伸，随机应变，上海人指的老滑头，就是循的这个理吧？”我立刻回敬他这么几句。

“老叶，你这话说对了。我在乡下能站得住脚，还能制服老太婆和小阿媛随着我过穷日子，也是这个理。”

王先生大谈他的封建家长歪理，我暂不作声，有意看他的实际行动，为《朝报》积聚漫画资料。

一天，王老头赶毛驴进市赶集，出售他的两袋粮食，毛驴受压，趴在地上起不来，瘦老头只得自扛粮食，让毛驴跟着走。

另一日，老王全家出动赶庙会。胖老大提了香烛，要拜城隍老爷；阿媛被耶稣教堂的牧师拉去做礼拜。剩下老头一人，钻进王道士的破庙参拜玉皇大帝。

再一日，长江南岸发大水，庄稼被淹，草棚进水，老头、胖太、阿媛蹲在床上共商对策。胖太主张回上海；阿媛说上海房子卖了，没地方住；老王说，最近便还是进京城住几天，等水退了再回来。

且说那六朝故都，虎踞龙蟠。孙中山在此建立中华民国首都，却被袁世凯篡夺总统大权，不久即被废弃。直到蒋介石北伐成功，苦心经营，才重建新都。以新街口为中心，东至中山门，西至水西门，北通抱江门，南达中华门，修了四条柏油大马路，气派不小。当年小陈凭他岳丈提携，当起了小京官，在秦淮河畔夫子庙六朝金粉集中之处，寻欢作乐，逍遥自在，

点歌女，包茶楼，纸醉金迷，着实阔了一阵。老王身在郊区，似乎也有耳闻。趁这大水漫屋，无处安身之际，搬进南京城来躲避几天，等水退了，再回去种他的十亩官荒。岂知到了南京，竟在秦淮河畔落脚。左邻右舍弦歌不辍，茸茸燕燕，脂粉满巷，不但老头儿见猎心喜，胖老太和阿媛也立刻想起上海那阵舒坦的日子，但愿能在这秦淮河畔多住几天，不再回那粪臭烟意的破草棚。母女商量结果，决定动员老头儿弃农归城，快活下半辈子。王老头一听母女的打算，不加思索，连连点头，立刻拍板。真所谓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从此后，秦淮河畔多了一家姓王的住户。

在《王先生别传》里，老头儿登台串过戏，九腔十八调都会一点，还能玩京胡拉几个过门。阿媛耳德目染，也能哼几句梅派青衣，父女合计，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在夫子庙挂牌卖唱，一家人不愁吃穿。胖老太在旁窃听，马上站出来拍手叫好。老头儿精气神儿十足，马上到乐器店买了把京胡，装好琴弦，教阿媛练嗓子。一听，果然不错。于是王家屋子里同样弦歌不辍。左邻右舍都来串门，有人出主意，说天韵楼主角这几日嗓子闹病，正在找替身，阿媛嗓子好，唱腔正，长相又好，可以去试试。王老板如同意，我马上找天韵楼老板跟你面谈。老头儿听了，自然乐意。既然有人自愿推荐阿媛，也就省得托人找门路了。

不久，秦淮河畔第一号茶馆天韵楼挂出牌子，定于某月某日特请上海名票王阿媛清唱梅派名剧《宇宙峰》，并请王盛老先生操琴云云。

奇怪，老王前些日子还在郊区长江边开荒种田，怎么跑到城里来与阿媛卖唱了呢？得到这个消息，我得请几个夫子庙地头蛇到时去捧场才对。不错，最好在《朝报》发条消息，把这新闻捅出去，那王老头儿就得向我姓叶的感激不尽，也许以后不至于发牢骚了。

自从王家在夫子庙落了户，《朝报》版面出现一种新气象，借王先生父女的一举一动，似乎在揭露夫子庙的奇形怪状，可又像在渲染秦淮河畔南朝后庭的花月市场。王公韬满面笑容对我说：“《留京外史》政治性太强，《到农村去》泥土气太重，这回笔锋一转，转到了秦淮河夫子庙，总算配了南京人的胃口。就怕这题目太窄，文章做不透，小心走进死胡同，没得好下场。”这话说得有理。自从王家姑娘在夫子庙卖唱当歌女，我成天在夫子庙转悠，除了点戏、叫条子、河上夜游等等情节，编不出太多笑话。不出公韬所料，最后只得走上和官场打交道的路子，硬叫王先生把女儿当作钓饵，耍尽无赖，想从官儿们身上捞到一笔不干净的丑钱。扪心自问，这未免太丑化了我那不老实的朋友。

幸亏“七七”抗日大炮一声怒吼，夫子庙的乌烟瘴气一扫而光，王先生也随着《朝报》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1.13 《王先生北传》的诞生

1935年春季，我因偶然机会，身上带着速写本，登上津浦铁路北开的卫生宣传列车，在华北大地上旅行。第一站淮河南

岸的蚌埠。我帮助列车布置好群众大会之后，约了几个伙伴到大街小巷走走。走进一家简易小剧场，台上正在演蹦蹦戏。我拿出速写本记录剧中人物。看客见到我们几个外路人闯进来，个个回头注视，尤其见我手中的动作，几个好奇的人便走过来看是什么名堂。我觉得这会干扰演出，便招呼同伴拔脚就走。以后便吸取教训，及早采取预防被包围的措施。下一站徐州，没什么可画的对象。第三站进入鲁南的克州地区。这里有个枣庄煤矿，除了戴灯盏的煤工，便是缠小脚扎裤腿的山东大娘。她们体格强健，行动迅速，不像江南的小脚大妈扭扭捏捏，看了怪新鲜。我故意站得远远地，叫一个同伴作掩护，手里则加快速度，猎取了七八页速写。这是北上以来第一批收获。再前进便是泰安，宣传列车的例行活动结束后以后，大家结队登泰山。

铁路局的人怕我们几个文弱书生爬不上南天门，特为我们雇了几乘山轿由农民抬着，走在又宽又长的御道石级上。仰望南天门，高到如同在天上。愈来愈高，感到有股子特殊气味冲进鼻子，略一思索，便明白这是从抬山的农民嘴里冲出来的大葱味儿。怪我这南方鼻子过于敏感，连忙伸手捂住，免得有反应。过了南天，但见几株桃花开得正旺，而江南的桃花却早已开败了。这个对季节的新鲜感，使我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记得此行只在玉皇顶走了一转，没有过夜看日出。

下一站是济南，看到奇景“趵突泉”。再前进，在河北的沧州停了一上午，见到一只半身埋在土里的铁狮子，明白这是几世纪以前水文地质变迁的记录。再前进便是津浦铁路的

起点站天津。宣传列车在此结束任务，为了慰劳全体工作人员，把我们的一节卧车车厢挂在京奉路某次列车上，开往北平。

出了站，就和前门箭楼打了照面。这副早已从前门牌香烟纸盒上熟悉的面孔，引起我颇为奇特的新鲜感。在看惯大洋楼的上海人眼睛里，见到这座古色古香的庞然大物，不奇怪才怪呢。正想为它画张速写，无奈行动组长号令众人登上汽车，开往王府井大街南口的王府旅馆，我只好作罢。

故宫、天坛、北海、颐和园、大栅栏、王府井、天桥、鼓楼都游遍了，然后逛琉璃厂、古玩店、东安市场西单市场；又以猎奇的眼光，到雍和宫看蒙古喇嘛，可惜没有看到神秘的“欢喜佛”。

北平是京剧名角的故乡，我白天到天桥看拉洋片、练把式，晚上便进长安、吉祥等戏院看杨小楼、荀慧生、谭小培、郝寿臣演出，过足了戏瘾，当然也留下了大量速写。后来我搬出王府旅馆，在金鱼胡同中华公寓租了间房住下，以便细细品味三朝故都的历史风貌。

不出半月，和北方的漫画同行、摄影诸友及记者文人混得很熟。中山公园的茶座可以经常出现《王先生》作者的海派身影；求画王先生纪念像者忙得我不可开交，干脆在公寓卧室墙上画了王先生和小陈两个头像，让我自己或朋友站在他们前面摄影留念。想当初我躲在上海亭子间里苦思冥想，为报刊绞尽脑汁，如今竟成了画界名人，抛头露面，简直不可思议。那些日子，一面大享受自己奋斗出来的甜蜜果实，一

面还得绷紧脑袋瓜，频开夜车，向上海寄稿。

在北平的日子，天津《庸报》的童漪珊老是缠着我，要我为《庸报》开辟一个栏目，每周发表一套《王先生北传》。这个主意正符合当时盘旋在我脑海里的思路——想让王先生表现一下北方人的生活。于是一拍即合，离开北平前，我就交了两篇《北传》。为此《庸报》邀我在天津住了几天，拜访了泥塑艺人“泥人张”，参观了年画故乡杨柳青。

我给《庸报》画的《王先生北传》和《别传》一样，也是八格一篇，专以这次北游所见所闻为题材。至今还记得，第一篇画的是王老头在山东骗吃的故事。第一格画王先生在一家小饭馆就餐；第二格摸口袋，发现钱包被偷了；第三格，饭馆老板说：“你老身上不便，就请下次会钞吧。”；第四格王先生又到一家饭馆进餐，如法炮制，表示钱包被窃，又白吃了一顿；第五、第六格，老调重弹；第七、第八格相连，老王在前面逃，诸老板拿着棍在后面追，高喊：“俺山东有那么多小偷吗！”这是根据北方人待人厚道，饭馆老板在顾客付款时爱说这么一句客气话：“您甬破钞啦！”

另一篇是我在某胡同看到一家开业大夫家墙上挂满病家送的颂德匾，因自家院墙短，匾多挤不下，便借用邻居的墙面扩大匾区。我灵机一动，让王先生在北平开业行医，自造颂德匾，挂满整条胡同，以广招客。

再有一篇得灵感于北平市上的烤鸭店。一天，王先生见一家鸭铺正在用高粱面团填鸭，打听到一斤重的鸭填一个月即能增重三斤，老王用高价请填鸭师傅到王家干活，等师傅

把填料准备好，师傅问：“鸭子呢？”瘦老头儿张开大口，用手一指：“把我填肥来！”

王先生在天桥看摔跤，老看老看，总是小个子摔倒大个子，他在旁议论开了，说他们是事先规定好的，叫我们看客花冤枉钱。话音刚落，那小个子走来，一把扭住王先生的领子，口称：“是真是假，咱们试试！”吓得王先生拔脚就逃。

还有一次，王先生失踪，胖老太和阿媛急坏了。幸亏找到老头儿留下的字条，说他到内蒙草原看牧场去了。阿媛一算，坐火车走平绥路到绥远要走两天两夜，我们坐飞机，比他先到，于是抢先飞到了绥远车站。但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个月后，王先生才骑着一匹骆驼，姗姗来到。

北游南返之后，既要画《别传》又要画《北传》，负担加倍。此时虽已摆脱《时代》编务，但画速写的兴趣愈来愈大，经常给《汗血》月刊和《时代漫画》提供速写画稿，有点忙不过来。相比之下，画速写要比画王先生轻松得多，所以我权衡轻重，把《庸报》的《北传》腰斩了。

事隔不久，《晨报》停刊，《别传》也告休，我一身轻松。就在此时，上海的《时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事出有因，而实系误传。并非王先生失踪，而是叶浅予移居南京，给《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去了。

§1.14 王先生拍电影

王先生在《图画晨报》登场一年以后，这个喜剧人物所扮演的滑稽故事，忽然引起了电影界的兴趣。明星影片公司的演员汤杰自认为和王先生长得相似，只差鼻子不够尖，靠化妆便能酷似。由此想到，如果能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拍摄王先生影片，不愁没有观众，而有了观众，就能捞钱；另外，对于汤杰来说，也可以从一贯演配角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长期演主角的明星。虽不及电影皇后那样风靡全国，至少也可以学学卓别林，坐上中国第一流丑角的宝座。汤杰把这个主意和明星公司的老板谈了，没费多少口舌，就被老板接受。老板灵机一动，想到王先生是《晨报》吸引读者的诱饵，何不利用这块官方日报的硬招牌，另组一个公司，作为明星公司的子公司，专摄王先生影片呢？成功了，可达到盈利目的；失败了，母公司不担风险。此事酝酿不久即成事实。

记不起是30年代哪一年的某月某日，由明星公司的周剑云出面，在某某西餐馆召开新时代影片公司股东大会，在座的有《晨报》社长潘公展、律师袁仰安、作者叶浅予和其他投资的几位人物。叶浅予以版权作干股，到时和所有股东一样分红利；其他人每股资金500元，总计多少资金，不用我知道。股东会当场宣布叶浅予任公司经理。影片由明星公司代摄制，代发行；摄制组由汤杰任主演及导演，其他成员由汤杰负责组织。

如今回想起来，我这个漫画作者，由一个卖稿为生的艺人，不费一文钱领受了影片公司的一份干股，而且一跃而成为公司的经理，掌握大权，实在意想不到。然而仔细一想，上海滩上由小瘪三一跃而成大富翁的人不在少数，由大富翁因投机失败而跳黄浦江的也不乏其人，我这又有什么稀奇。“新时代”成立后，租到一幢楼房作为据点，经理每天上半天班，和摄制组的所有成员同操一份心，每月一百元的薪金不算白拿；我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不劳而获的大老板。

现查资料，第一部王先生影片，是1934年由“天一”影片公司拍摄，主角汤杰借自明星公司。我手头有一册“天一”公司出版的《王先生奇侠传》特刊，封面是我画的，而我的头脑指示我，我明明白白当的是“新时代”影片公司的经理，怎么到了“天一”，这中间的来龙去脉，实在闹不清了。

最近读到魏绍昌《叶浅予笔下的王先生》一文，其中有一段详记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上海一共拍摄了十一部王先生影片：

- 1、王先生，1934年，天一公司首制
- 2、王先生的秘密，1934年，新时代公司制
- 3、王先生过年，1935年，新时代公司制
- 4、王先生到农村去，1935年，新时代公司制
- 5、王先生奇侠传，1936年，天一公司制
- 6、王先生生财有道，1937年，天一公司制
- 7、王先生吃饭难，1939年
- 8、王先生与二房东，1939年

9、王先生与三房客，1939年

10、王先生做寿，1940年

11、王先生夜探殡仪馆，1940年

最后五部摄于上海孤岛时期，我已离开上海，身处抗日大后方，汤杰的王先生班子还未解散，可能是他另找老板投资摄制的。在此期间，大约是1938年，汤杰曾领了他的班子游击到武汉，登台表演王先生喜剧。

如此看来，我当“新时代”影片公司经理是在“天一”公司拍摄第一部王先生影片之后，原因在于王先生一炮打响，“天一”获得厚利，明星公司见利忘义，把汤杰收回，另组了“新时代”公司。

记得“新时代”时期，我到过明星公司摄影棚，参观汤杰自导自演《王先生到农村去》，我还跟着外景队到嘉兴拍外景。当汤杰因主演角色无法执行导演职务时，我便拿起话筒，口喊“开麦拉！”，当了一次傀儡导演。影片拍成后，我感到有不足之处，特地组织了一次昆山旅行，和汤杰、雪松、左明等人在一条小船上商讨如何充实剧本、补拍镜头等问题。

1936年，我因家庭变故，由上海迁居南京，“新时代”从此解体。汤杰领了他的班底，转到了“天一”公司。“天一”和我订了合同，每拍一部新片，送我五百元版权费。

§1.15 《上海漫画》编辑部的朋友们

望平街向南，过四马路，进入麦家圈，有座耶稣教堂，神

父是个非洲黑人。教堂后面有个小花园，左侧有一座二开间的二层住房，楼下教堂自用，楼上两间出租，右间是静山广告社的办公室，左间便是《上海漫画》的编辑部。经常在此上班的有张正宇和叶浅予，加上会计薛笃甫和练习生宣文杰、王士英。张光宇有固定工作岗位，在英美烟草公司上班，每天来串一次门，安排第二、三、六、七这四个版的版面。张正宇管发行和经济，我管第一、四、五、八这四个版面的调度。我们五人在编辑部吃中午饭，由三马路一家小饭馆包办，有宾客另加菜，无宾客就吃固定的包饭。所谓宾客，都是些和画报业务有关系的画家和文人。其中每周必到的有黄文农、鲁少飞，他二人是画报的特约供稿人。四、五两版彩印漫画，由我预先画好版样，到时他们便来取样，按规定的尺寸、地位、时间交画。如轮到他们画封面，任务就加重。三年以来，他们从未脱过期，缺过稿，而按照当时个人的生活情况和社会交往而言，画报所付给的稿费是微乎其微，带点象征性的。

我和正宇二人在编辑部所处地位，既是老板，又是伙计，每人每月二十元车马费，白吃一顿中午饭，一切包干，不另支稿酬。生活相当清苦，精神却很愉快。

编辑部地处上海文化市场中心，北面有《申报》、《新闻报》两家大报；东面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两家大书店。望平街又是报刊交换的大市场，四马路上书店林立，文人画家走到这个中心来，只要和我们画报有点关系的，都愿意来编辑部歇歇脚，坐坐谈谈，消磨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兴趣来了，拉起胡琴，唱段京戏，热闹一阵；有时高谈阔论，发点牢骚骂

个街，也能促进情绪，磨砺意志。有时来个投稿的陌生人，问长问短，获得满意的答复后，也乐于经常来这儿作客。至于常来串门的客人，凭我的记忆，文人中最常见的是现代派的叶灵凤、穆仁英、施蛰存，他们的《现代》杂志就在四马路上海杂志公司。叶灵凤原本学画，醉心于英国画家披亚兹丽的装饰风，他也画起这一派画，同时还摇起笔杆写小说，被鲁迅讽刺为“洋场恶少派”。

有一时期，傅彦长、张若谷师徒二人经常来串门。傅是上海大学的文学教授，有点学究气，喜欢对海派文艺界的人评头品足；张若谷刚从震旦大学出来，人称青年诗人，说长道短，有点酸气。张给画报写过稿，1935年上海《时报》头条新闻，报道“王先生失踪”，就是他提供的线索。

画家中有个杨清磐，属于老一辈报刊供稿人，和张光宇很熟。此人喜欢哼几句京戏青衣腔，有一天和光宇谈戏谈入了港，戏瘾大发，便自拉自唱《苏三起解》，边唱边说这段腔该怎么唱哪个音该如何发，俨然像个说戏的老内行。唱完戏，又高谈“天马会”怎么样，刘海粟怎么样，丁惊怎么样，说个没完，幸而菜到饭到，吃完饭才作鸟兽散。

当时有个年轻的作家黄振遐，主张作家要深入生活，才能写得真实。有天他来到编辑部，说最近想写战争，准备投到某军某部，参加实际战争，获取灵感。我们想，当时蒋介石正在大力打内战，这位姓黄的作家莫非想从内战中接受真情实感，来体现他的写作主张？

颇负盛名的篆刻家钱瘦铁，是光宇兄弟的朋友，到过日

本传授篆刻艺术，与日本南画派有交往。1928年南画派名人桥本关雪将来沪举行画展，他和光宇商议如何为之誉扬。其时《上海漫画》正在筹备中，尚未出版，决定用画刊名义先出一期《桥本关雪画展》增刊，因此画报诸人受日本驻上海领事之请，参加了欢迎桥本的宴会。这是我第一次跻身于上海文艺界的外事活动。瘦铁也因此常来编辑部串门。

画家江小箱虽不常来画报社，我们却常去他在金神父路的画室串门。那时他正在为先烈陈英土作铜像的泥塑模型。此像不久即铸成铜身，装置在西子湖边，成为西湖博览会的一座纪念像。江氏早年留学巴黎，是接受西方艺术的前驱者，与刘海粟、丁悚等同为“天马会”的发起人。据我所知，江氏为中国人自造纪念铜像的第一人。

摄影家郎静山的办公室就在《上海漫画》编辑部隔壁。他当时是“虎标万金油”的广告代理人，有时请我帮他画万金油的猛虎商标或其他广告所需的图画。此人好吃，有时请我陪他到南京路上新开的新雅酒家进餐。他吃饭不付现款，在发票上签个字就走了，估计他在新雅有投资。这位摄影家进出都带个方盒子反光镜箱，身穿长衫或棉袍，大冷天总是一条单裤，把裤腿塞进长统线袜里，行走匆匆，健步如飞。他年轻时学过画，能画几笔潇洒的水墨山水。他是上海首创的摄影集体“华社”的首脑。他从暗室加工中创造了独具风格的中国画式艺术摄影。1931年杭徽公路开通，我们一道游过黄山，归来后，他用叠印和接印法，创作了一幅巧夺天工的黄山峰峦图。自从他迁居台湾后，国际声誉日隆，如今他已年逾九旬，

还健康地生活着哩。

1990年夏天，我住在天目山写这篇创业回忆录时，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麦家圈三年所接触的人物，都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知名之士，可算是海派文艺的一个小小活动中心。因而我写了一首小诗，作为总结：

办报三年整，宾客常盈门，
三教兼九流，往来无白丁。

§1.16 张光宇和黄文农

我最早认识的老一辈漫画家是张光宇。那是1926年我在中原书局画插图的时候。我向他主编的《三日画报》投稿，他发表了我那幅《两毛钱饱眼福》漫画，并约我到浙江路渭水坊的画报社见面。当时张正宇也在座。这次会面，是老一辈提携后一辈的开端。三年后，他看到我创办《上海漫画》第一版受挫折，主动出主意，招朋友集资，使《上海漫画》复活，由此我经常在麦家圈画报社受其教诲与熏陶，使我学得编画报、跑印刷的经验，也增进了画漫画的思维机敏。他一直是我最心目中最有威望的艺术家老大哥。张光宇对画报的支撑最力，功勋最大。前面提到的几幅封面画，最能表现他的艺术才气，也最能显示他艺术修养的深度。据我所知，他老家无锡，在上海读中学。辍学后，跟随著名画家张孝光，初显身手于“新舞台”的舞台布景，继而进英美烟草公司画香烟小画片，用笔简练，构图方正，独具新意，显示出个人风格。及至时代

图书公司时期，他为邵询美的《小姐须知》一书所作的插图，虽系游戏之笔，但笔笔扎实，图图灵活，又是一番风貌。此书印数甚少，见者不广。等到《时代漫画》问世，他的《民间情歌》不仅显示他对中国民间版画所下的工夫，而且在造型方面透露德国画家的严谨精神，和墨西哥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夸张手段。方是方，圆是圆，达到造型视觉既简练又饱满的趋完整性。这趋完整性，也就和中国民间版画有异曲同工之妙。198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印的《林冲》连环画小书，用笔造型，简洁明快与方圆相济，达到简而不能再简，练而不能再练的极致。这虽是本小书，其艺术水平比之同时代艺术诸大师毫无逊色。难怪当年徐悲鸿出国为中国绘画作国际宣传时，非要光字的那幅《紫石街之春》与之同行。

全国解放后，由我引荐，中央美术学院聘张光宇为图案系教授，讲授《装饰艺术》，不久，张仃受命组织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班子，特聘他担任装饰美术系主任之职。提起张仃，人们知道他在延安是装饰图案的行家，最早在北平学过中国画，30年代在南京画过漫画，《时代漫画》发表过他的画，方笔简形，立刻为光宇赏识，认为是简笔造型的同道。我向光宇透露，张仃的造型用笔受过《民间情歌》的影响，两个姓张的原来走的是一条路。张仃总结光宇的艺术，提出“方”、“圆”两个字，直线成方，曲线成圆，方圆是以线造型的极限，而光宇的造型，方到不能再方，圆到不能再圆，也就是说，简到不能再简，练到不能再练。张仃对光宇的艺术，佩服到几乎双膝下跪，猛叩响头的地步。80年代初，他和黄苗子合写了一篇

研究张光宇艺术道路的文章，想为光宇印一部艺术全集。后来因为光宇家属中某一成员，为了稿费分成问题谈不拢，这部已经编辑将成的书搁了浅。隔了几年，工艺美院为了研究张光宇的艺术，成立了张光宇艺术研究室，向光宇家属借调光宇作品，亦被拒绝。这是一桩使人失望的事。但愿光宇的家属有朝一日省悟过来，不把这位艺术大师的作品当作私人财产永远禁烟起来。

黄文农是另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朋友。

1990年5月24日华君武在杭州浙江美院展览厅举办个人漫画展，我在开幕式上代表美协致辞，指出中国漫画历史上有三位大师：10年代出了个沈泊尘；20年代出了个黄文农，30年代出了个华君武。与会者听了我这番话，有点陌生。记者问我前二位大师是怎么回事，我简单地介绍了沈泊尘在上海画政治讽刺画的历史，他除了向报刊供稿，还办了第一份漫画期刊《上海泼克》。第二位大师黄文农，是上海《晶报》三日刊的长期供稿者。他的作品对时事讽刺特别辛辣，著名的《东方》杂志专门为他开辟专栏，以飨读者。30年代出版过一本《文农讽刺画集》，其中一幅，讽刺上海南京路惨案制造者英帝国主义的凶相，最得人心。至于华君武，人人知道他是当前中国漫画界第一把手，但很少人知道，30年代初期，他的作品就在《时代漫画》出现，后期投奔延安，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新华日报》长期供稿。我把这三位杰出的漫画家尊之为大师，而且是各自代表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国画和油画的著名画家，舆论尊之为大师，漫画这样一个表现时代风

云的先锋画种，为什么不能称之为大师呢？

我之知道漫画界有黄文农，早在20年代读《东方》杂志时期。1925年在三友实业社时，我便注意到这位大师的每一幅画，除了《晶报》，还有《三日画报》。直到和张光宇、张正宇兄弟认识之后，我才有机会面见黄文农。他小小个子，一双机灵的眼睛，上海腔带点松江口音。有一次见到他的父亲，才知道他是基督教家庭出身，读过教会学校秀州中学。他最早在商务印书馆美术室工作，后来逐渐走上创作漫画的道路。我见到他时，他已是望平街一带报刊中心的活跃人物，隔三天要到《晶报》编辑部坐班，趴在写字台上完成下一期《晶报》所需的两幅政治讽刺画。自从和我认识之后，他常常约我到《晶报》看他作画，每次至多花一小时就把任务完成了，思路之敏，用笔之快，使我惊讶。作完画，就和我出去找朋友，寻快乐，看来是个很会生活的人。由于接触面广，他和九流三教人物都有交往。北伐军抵达上海之后，他政治方面的关系便显得很突出。先是参加淞沪警察厅政治部，并把我拉了去，做他的艺术股小伙计。不久我又跟他一起跳槽，投奔海军政治部。从海政下来后，他到过南京，在蒋介石的总政治部混了一阵，为《上海漫画》写过《丁家桥随笔》，记他在南京的见闻。他在南京为时甚短，不久即回上海，带来个女朋友倪英明。不几天，两人宣布结婚，生了个孩子，孩子夭折，夫妻反目，倪氏出走。文农变得精神颓丧，有时来画报社，仍照样供稿，但不像以前那样活泼天真了。大概在1934年那阵，听说文农病了，腹部长了个疮。有次到时代图书公司来，支着手

杖，面容消瘦，交来一份《文农讽刺画集》原稿，一份《初一之画》原稿。这两份画稿，先后由“时代”和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文农和倪英明结婚后，习惯于躲在甜蜜的小天地里，不大和我们这些朋友来往。关于生孩子以及孩子夭折，又和倪英明散伙等事，我们都不了解其前因后果。几个月后，文农的弟弟艺农来向我们报信，说他哥哥腹病恶化，已告别人世了。

黄文农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从他二十岁算起，到他死的那年三十一岁，在艺术上的贡献不过十一年。那十一年中，他在上海报刊中发表的作品也难以计数。他的短暂生命，和他的光辉事业相比，实在叫人不平，叫人心酸。他留下的两本画集，因为印数太少，流传不广，只有和他同时代的人，能充分认识文农作品的思想光辉和艺术价值。我称他为20年代的漫画大师，他是无愧于这个称号的。

§1.17 黄山之游

南京蒋家政府巩固之后，蒋介石为他的浙江老家做了三件一新耳目的事。第一件是举办西湖博览会；第二件是修建钱江大桥；第三件是开通杭徽公路。我之能爬上黄山，有赖于杭州徽州之间开了条公路。时间是1931年春季，浙江省政府建设厅的秘书汪英宾，代表浙江省邀请上海三大画报的主编，游览黄山，一探奇峰怪石之胜，并且说，历来游山玩水者之

间，有句名言，叫做“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意思是说，游了黄山，天下闻名的五岳，也就不必去了，可见黄山之胜，盖过了天下所有名山大岳。近在咫尺，哪有不去之理。于是以郎静山为首的上海游山猎影队，在汪英宾的引导下，由上海乘坐两辆小汽车出发，渡黄浦，走沿海的沪杭公路，到达西子湖边，宿环湖旅馆。同行者有《良友》画报的马国亮、《美术生活》的钟山阴、《时代画报》的叶浅予。一行六人，每人胸前都挂着照相机，郎静山还是提着他那只重一公斤的方盒子大镜箱。

第二天早晨从湖滨出发，经余杭、临安、于潜、昌化这浙西四县，来到浙皖边境的公岭关。一路上坡，过关下坡，下午4时到达以徽墨勘砚出名的徽州撤县县城。我先到胡开文墨店抢购了几锭“顶烟”和“贡烟”。夜宿县城旅馆，了解到杭徽公路到此已是终点，距离黄山还有两天步行路程。汪英宾说，县府已为我们雇好大乘凉轿，第一天宿站芳村，也已准备好每人的床位，大家可以放心休息，不必为旅途担忧。

次晨六人坐上凉轿，向黄山的大路前进。时而在大田塍中，时而在小山沟里，午间经过一个大村庄，一条大溪在村边流过，村中大建筑颇多，嵌着“诗礼传家”、“故大夫第”等显赫门额，看来这是个出过大人物的地方。我们被安排在一座像是祠堂的大厅里，每人一张行军床，干净的被褥，还罩上蚊帐。次早醒来，又坐凉轿。路越走越高，山越逼越紧，山陇中有田，见许多小脚妇女在田里插秧，这在我老家浙江是看不到。于是联想到皖南诸县男人出外经商的多，所以撂下

田地让女人种。

近午到达黄山脚下的汤口镇，这里有饭铺和旅店。记得进场口前几里外，坐在轿上仰视，眼前出现两座并列的高大山岩。心里捉摸这大概就是“归来不看岳”的黄山了。到了汤口一问，这一对奇峰就是黄山西海门以外的云门峰。可是以后深入黄山转悠了三天，始终未到过云门，只知位于北海左边的西海门是通向云门的必经之路。日后每次询问游罢黄山归来的人，都说未曾到过云门。怪了，难道这一对神奇的双峰，永远拒绝人们接近它吗？

由汤口进山，先到祥符寺。寺旁有口温泉，在早春寒气中冒出蒸汽，水温与体温相近，大可脱衣在泉中浸泡一番，可是谁也无此雅兴，大家心里想的，还是急于上山，一探奇峰怪石之妙。由此转身，走上了登山的石阶。在半山亭休息一会，左近有人字瀑。此瀑自天都峰流出，下坡处被一巨石所阻，一分为二，像个人字向两侧分泻而下。

我们六人在汤口下轿后，即和在此等候的食物背负者会合，一同登山。写到此处，应该交待一下。在30年代初期，游山之人极为稀少，除非有寻幽探险大瘾的人如徐霞客，才乐意背负三天的粮食，到这名山来朝拜山神。我们来到祥符寺，打听到山上有两个宿处，一个是玉屏峰的玉屏禅院，一个是北海狮子林的狮林禅院。这两处虽有宿处，却无食处，粮食得游客自己带。这一带农民，除了为游客背食物，还有一种称为“海马”的人，背上挂着一个座椅式的竹背斗，让游客背着身坐在背斗里，由他们背着上山。因为山路陡而且窄，凉

轿山路上不去。我们六人正在壮年，两腿有劲，自己能上去，但所需食物，就得请人运送了。

1931年杭徽公路开通，我们是第一批游客。汤口小镇本来冷冷清清，来了我们六人，加上轿夫十二人，顿时热闹起来。我们与背夫会合后即起步登山，留下轿夫在此等候。三天后我们从后山口下来，绕到汤口，再坐凉轿回撤县。那时可不像现在的年代，汽车直达黄山脚下，上山下山有缆车可乘，所以像刘海粟那样的老人，才有十上黄山的可能。我们那时凭着双腿在山上转了三天，除了两座寺院的两个老和尚，再也看不见别人。哪像现在，宾馆、招待所开得多了，但听说最挤的时候，还得睡地铺呢。

且说我们进得山来，看了人字瀑，过了半山亭，转入天都、玉屏二峰之间的山沟，蓬莱三岛赫然在目。绕过三岛，向前仰视，一条直上玉屏的石级窄道，犹如一道登天云梯在向我招手，问我：“有勇气上来吗？”这叫逼上梁山，不上也得上。此时我在寻思，从前徐霞客游黄山的条件和我们不相上下，他留下的是一篇游记，而我们每人有一架照相机，可以留下每一座奇峰，每一块怪石，每一棵古松，甚至每一个脚印都可公诸于世，让天下人共饱眼福，这有多好！这种心理活动，我有，别人一定也有，天梯既在召唤，两条腿不等命令，早就急不可待地向前冲去了。

从蓬莱三岛到玉屏峰腰这一条直上直下的云梯，共长二里光景，走起来并不太累，比之华山千尺幢，要短得多，可是初上黄山的人，到此却是一个考验。千尺幢两旁有铁链可以

攀扶，让两条腿加把力；走云梯虽无险情，干巴巴直上直下，窄得只能通过一人，也很难走。我们六人，一个盯着一个，一人坐下，别人都得坐下，不坐下就得从人头上跨过去。因此，个个心照不宣，非一口气走到那棵迎客松的立脚处不可。六人中郎静山年岁最大，右手还提着那只夜壶箱（方镜箱的爱称），不时转过身来对镜头，唯恐漏掉背后的好镜头。就只他，有时会阻碍整队的行过速度。至于我，自恃有双锐利的眼睛，只要看到，就能记牢，用速写把它画下来。如是走了一个来小时，全体聚立在迎客松前的大岩石上，瞧着天都侧面那只十分神似的石松鼠，看它能否跳上天都峰去。立观久之，镜箱快门声咋呼不已，谁也不吭气，惟恐失去这得来不易的良辰美景。据闻天都山道久废，无法上去，只得坐在玉屏峰前望峰兴叹。此时，主人汪英宾拉了一位老僧从那座玉屏小寺走出来，告诉大家茶水午餐准备好了，到庙里休息休息吧。

这小小的寺庙，容得五六个人在此留宿。之所以要住下，因为它是明早日出前观赏云铺海的唯一去处。据老和尚说，不少人上山，最要紧的是看这天下奇观，但有些人在此住了几晚也等不着，只好失此眼福，去爬莲花、莲蕊二峰。老僧说，告诉你们，山中连日阴雨，这几日天天云铺海，你们来得巧，保准明晨能看到。

饭后无事，各自出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摄影对象。静山更是忙碌，一会儿对准迎客松，一会儿叫人爬上蒲团松，为他的方镜箱留个影。我立意要给迎客松立个绘画纪念碑，对之端详不已，好日后为我的山水图象找个好角度。

第二天天还没亮，众人被老和尚催出被窝，穿上棉衣，转到玉屏峰背后。耳中只听得松涛声声，眼前仍是朦胧一片。一会儿，鼻孔嗅到一股云气，仰观蓝天，星星闪光，眼皮下面茫茫一大片。仔细看去是云，可又像海，海上有岛，分散在海上的一座座小岛之间，夹着一座大岛，原来就是近在眼前的天都峰。顺着峰影轮廓，找到了那只想跳天都而永远跳不过去的松鼠。五分钟后，红日出于东海之上，阳光四射，“海波”也渐渐散去。我看呆了，竟忘记自己也带着镜箱，只听得人家“咔嚓、咔嚓”，我却沉醉在神奇的高山大海里，神驰于自然的无穷变幻中。

人人庆幸能在玉屏一宿之后，便看到云海奇观。这天的莲花、莲蕊之游，格外兴奋。我登上莲蕊，未登上莲花即转入中海。先下百步云梯，扶着石壁走完阎王壁，又上坡，跨过中海的一片平岗，下坡，到了狮子林的狮林禅院。此庙宽敞，是黄山后海的游览中心，四面背景。所谓层峦叠嶂，目不暇接。在禅院稍息，出门，观察禅院所在地是一片灌木的大洼沟，寺后是狮子林山峰，一孤石如狮子，称之为“狮子望太平”。“太平”者，黄山脚下的一个县城，是芜湖那边进山的必由之路。禅院对面不远处，丛莽中孤立一石岛，岛项长着一棵小松，这石岛叫做“梦笔生花”。

下午，禅院老和尚带我们去看“始信峰”。为什么叫“始信峰”？

我们从中海的一片平岗下来，对面是狮子林大山，山下是松林禅院，岗与山之间是一片开阔的谷地，谷地到处是灌

木丛莽。这后海不像前海那样峰峦罗列，而是四面皆山，无一处奇峰怪石。岂知这后海的妙处，就在这“始信”两个字上。老僧带我们在灌木小径中行走，不到半里，小径中断，出现一道石梁，只容一人行走，长不过两三步，对面是一座孤峰的峰顶，上面长着几株杂木，树荫下可容数人驻足。环顾四周，云雾来去，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可以感到我们是在一座拔地而起的高峰顶上。正在疑虑之间，忽然云开雾散，远远露出参差不齐的一排山峰，浮在云层之上，这才意识到自己也在云层之上，下面肯定是悬崖峭壁，不禁又惊又喜。惊者，我们的立足点是在危峰之巅；喜者，那忽然出现的天际峰群，比之今晨在玉屏、天都之间云海所见的海上列岛，更为虚无缥缈。此时此景此瞬间，最能体现黄山的奇妙，这才体会到“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境界。每人手上的摄影机自发似地“咔嚓咔嚓”响起来。谁知黄山之神非常吝啬，只让我们看了半分钟，便又云闭雾合，逼我们耐心等待第二回出现的半分钟神奇妙景。我们这群人，到底算郎静山为猎影高手，他已请那位领路老僧，端坐在树荫之下，在他四周连拍数片。回到上海，经过暗室魔术，创作出一幅《老僧坐看云起图》，背景当然是昙花一现的天际群峰。

回到狮林禅院，大家七嘴八舌，高谈阔论，交换刚才的观感，无不称赞“始信峰”的神秘奇妙，更无不称赞“始信”两个字的深刻意念。问老和尚，是谁起的这个峰名？他笑笑说，是每一个游客智慧的反映，当然也是我们老一辈师父的神机妙悟。

后海最吸引人的景观当然要推“始信峰”。妙就妙在它的突然出现；妙在它的可望而不可及；妙在它的虚无缥缈。我们由狮子林斜坡下山，一路都能看到天都、玉屏的背面，其中嵌着九龙曲瀑，也算得一处奇观。还有，狮子林大山的侧面坡下，有座云谷寺，道路曲折，据说要去的话，来回得走一天，我们不得不舍弃它而赶回汤口。

上海摄影家和画报主编畅游黄山之后，倡议要给黄山在上海亮个相。汪英宾表示愿意促其实现，并介绍南京来的许世英老先生和大家见面。许老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负责人，祖籍安徽，和汪英宾是同乡，正在规划开辟黄山风景区。见面之后，决定举办一次有关黄山的书画摄影展览会，扩大征集作品范围，邀请黄山老游客张善孖、张大千参加，同时还征集到黄山画派创始人梅碧山的原作数件。展址在八仙桥新建成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开幕那天，许老来，张善孖来，汪英宾来，同游黄山的人全来。展品以摄影为主，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在此一新耳目，其特点是能把一瞬一现的孤立景观衔接起来，把眼中的奇峰怪石古松，提升为意念中的云海峰峦奇观。这本来是中国山水画的美学特征，静山体现到摄影艺术中去，不愧为摄影艺术的一大创造。有了这创造，把黄山风貌提到了一个新境界，使得同时展出的几幅山水画倒显得平淡无奇，而我那幅“迎客松”速写，就更为渺小了。我在山中自许要为黄山风景画树立里程碑的设想，至此宣告破产。

许世英对这次展览的评价，自有其立足点，认为黄山经此一番亮相，他的黄山建设委员会就有了社会基础，从此以

后，杭徽公路的游山队伍必然日益扩大，黄山必将成为旅游热门。可是1932年的“一二八”湖沪抗日之战，以及后来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五次大“围剿”，使社会动荡不安，许老的主观愿望，岂能轻易实现。只有到了八年抗战结束，蒋家王朝被共产党打垮之后，人民当家作主，这颗江南明珠才得闪闪发光，上山之路也才会被挤得水泄不通。

我自那次游山之后，和善孖、大千兄弟结识，我的艺术事业出现了一个新起点。在漫画和速写之外，接触到山水画的写意境界，虽然创作《富春山居新图》的时间还在四十年之后，可是对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却已有所认识，在漫画和速写中运用中画笔墨，也有了个起点。举一个例，这次游黄山过程中，我对如何描绘直上直下的玉屏峰石级有过设想，总觉得这样的山径，难以和山水画的回环、曲折、虚实相协调，而要画黄山，又不能违背这一道直上直下的直线。在黄山画展中，几乎无人接触到这一难题。直到1969年，我在北京琉璃厂画店中觅到张善孖的一个扇面，只见满纸峰峦，玉屏居中，天都、莲花分居左右。那条云梯般的登山小道嵌在玉屏俊岩危石中，可以说是不避艰险，秉笔直画；也可以说是摒弃常规，独具心眼，把最难下笔的黄山正面形象，画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我真佩服张善孖有此异乎常人的胆略。我自从和张氏兄弟结识以来，对二人的艺术风格略有所见，善孖务实，大千务秀。只有有务实的工夫，才能对任何实景无所畏惧。在我画《富春山居新图》的那几年，善孖这件黄山扇面，时时盘踞在我的脑海里，遇到难处，我就打开回忆之窗，向它请教。

非常遗憾，黄山扇面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1.18 从旅行漫画到浅予速写

1935年北游归来，我尝到了画速写的甜头，除了给《时代漫画》供画，还给一家新出版的期刊《汗血月刊》开辟《旅行漫画》专栏，主编是张佛千。我怎么认识他的？也很简单。五方杂处的上海，只要在某次饭局或某个集会见过一面，便成为朋友，何况我正在画速写的兴头上，谁愿意发表我的画，我就给。这是自由职业者的特权。后来了解到这个《汗血月刊》是国民党黄埔系少壮派的机关报。他们必须招揽上海的地方人物为之服务，以引读者。叶浅予是“王先生”的创造者，漫画界的知名人物，恰好是个自由职业者，左翼视之为右翼，而右翼必然成为当权派的盟友，为什么不为之服务呢？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带漫画宣传队晋京，吃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记闷棍，转而投奔南京市党部，奋战两星期，开成了抗战漫画展览会。黄埔系的军委政训处的人认为这批热血青年，大可利用，马上把我们拉去作为政训处的一个附属宣传单位。为什么我要在这创业回忆录中追述这段历史呢？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予我的严重教训。应该好好解剖一下自己，究竟是什么世界观指导我对待社会关系。

当了四十年中国人民的公民，学到一点共产党为人处世的作风。在审查历史的关口，懂得运用自我批评的方法，认

真解剖自己，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和人事部门的信任，便于在往后的岁月中安身立命。

废话少说，言归正传。从1935年开始，我除了画王先生，还开辟了“速写漫画”这一门造型艺术，把我在旅行中所见所闻的人物活动，一一收入速写画册，分类分题发表，直接表达我对社会现象的观感。

因为我从小是个戏迷，在北平时，画得最多的是舞台角色。画过杨小楼的金钱豹、郝寿臣的专诸、金少山的窦尔敦、侯喜瑞的曹操、杨宝森的伍子胥、荀慧生的红娘、梅兰芳的《宇宙峰》等，就是漏掉了余叔岩和程砚秋。

有几天我专逛古董店。我对秦砖汉瓦并无兴趣，对汉马唐俑也认不出是真是假；身上无钞买不起，只好在速写本上留个轮廓，表示我对古代艺术的感情。有一次，从古玩店出来，脑子里漫画细胞活跃起来，心想古玩店如果能收集到杨贵妃用过的澡盆，那就该价值连城了。于是编成一篇《北传》，王先生从古董店买回杨贵妃的澡盆，躺在澡盆旁，渐渐进入梦境。只听得澡盆里发出传话声：“高力士！拿我的浴衣来！”王先生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胖老太在御用澡盆里洗澡呢。

我对小脚健步的山东老大娘特别感到新鲜有趣，喜欢跟在后面追画速写。其他如汉化的蒙古喇嘛，小饭馆跑堂的，长安街人力车比快，中山公园老茶客，天桥练把式、拉洋片、叫卖市头儿，还有天桥茶馆卖唱的，东安市场卖豆汁儿的等等。翻一翻我的原始速写本，应有尽有。可惜这一时期所存的速写本，在抗日时期被日本侵略军烧光了。仅有的一点记录，还

能在1936年上海出版的《旅行漫画》和《浅予速写》两本画册中查到。这两本画册，除了北游退稿，还有部分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社会形象——苏州小大姐，南京小地主，茶楼算命的，浴室搓澡的，十里洋场则有舞厅伴舞的舞女，大旅馆门口的看门人，仓库的值夜人等。

翻开《浅予速写集》某一页，画的是《一洼死水，淘米、洗衣、倒马桶全在这里》、《流民窟之晚餐》和《流民窟的排泄物》排在两对面；《绝对解放的公园茶座》和《澡堂是裸体乐园》排在两对面。

在《旅行漫画》里，每一幅画配上一句俏皮诙谐的话，点明形象所反映的人物性格或社会面貌，既是速写，又是漫画。和我同时在报刊上发表同类图画的，还有陆志牢。他是受德国漫画家乔治·葛路兹的影响而自创的一种社会速写体裁。我这样处理自己的速写画稿，应该追溯到墨西哥漫画家柯佛罗皮斯访问上海时所作的社会速写草稿。他是作为书刊插图的参考，而我，则变其法而用之，直接把速写原稿当作漫画创作的变体，发表在报刊上。我这些作品最后集结为《旅行漫画》这本小画册。我为这本画册写的“自序”中曾经提到：

……北平之游，那种与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情态，我好像采金者觅到了大量金矿似的，乐得无可形容。凡是所见的，都成了我的俘虏，平均每天消耗速写本一册，总共收获在三十册以上。这五六百张画稿，至少对以后作创作漫画的取材与构图有点帮助。后来《时代漫画》发表过一部分。《汗血月刊》约我作漫画通信，此时我正迁居南京，大部分材料均取

给于此。所描写者，虽仅限于社会一角，然而这些不同人物之所以存在复杂的社会阶层里，正是我们画漫画的人所要追究而加以解析的好材料。社会随处都是弱点和矛盾，我们如果留心去寻觅，绝不会感到漫画题材的涸竭了。

《浅予速写集》是不加任何文字渲染的速写原稿小画册，绝大部分是从北游期间速写本上选出来的原始画稿。也许这就是1963年到1980年所出的八种画册速写集的第一个样本。

《旅行漫画》发展为1940年的《重庆行》百幅组画。这套组画，是运用我所发现的“目识、心记、意测”的速写规律，把日间所见所闻，在晚间油灯下，记写成画。既是意中之物，也是眼中之物。例如，重庆遭到敌机大轰炸之后，某幢房屋坍了一面墙，住在屋里的人照常生活。我给这幅画题为《舞台面》，使人联想起话剧《七十二家房客》的一个场景。

从目识中的人物到意想中的人物，即画眼中之人到画意中之人，是个深化认识的过程。这中间有一定困难。例如，画漫画，只注意体态和表情，画速写就得注意整体和细节，注意到视觉的敏感，也就是认识的深化程度。

1935年初我刚画速写时，往往笔不随意，手不随心，反映形象思维从慢到快的转变过程，又反映意中之人的随意性和眼中之人的随目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暂时不能协调。但到最后，两者非协调不可，否则，只能冥想意中之人，不能捉摸眼中之人，不能完全掌握造型的完整思维运动。所以说这是造型能力的深化过程。然而，有些感于西方学院写实主义的人，则认为叶浅予之所以能画速写，得力于中国式的写意方法转

变到西方式的写实方法。表面看来顺理，实则恰恰悖理。请问，中国式的写意方法从何而来？如果不掌握目识、心记、意测的能动认识运动，写意将成一句空话。我很赞成齐白石那“从写意到写生，再从写生到写意，循环反复，乃成神似。”鉴于学院许多素描老师仅注意细节的形似，而忽略大体的神似，以致许多学生面对生气勃勃的生活形象，无所措手。

艺术实践是锻炼造型能力的根本途径。要不是1935至1937年整整两年的速写实践，我就总结不出“目识、心记、意测”这一条造型规律。我认为这规律，才是中国画创作的方法来源。

1942年我在抗日大后方贵州访问苗乡时，领悟到中国人物画表现现实人物的必要性，开始运用中国工具和方法画苗乡的生活。以此为开端，进而画舞蹈人物和戏剧人物，充分运用“目识、心记、意测”这条原理，因而能得心应手，描写其它事物。

我从速写实践提高了自己的造型能力，这对我长期以来从事漫画长篇创作，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漫画创作完全靠生活实践中的形象库存，象厨子做菜的调味过程。把库存中的不同形象，经过捏合、拼合、凑合，塑成自己所需要的人物形象。例如，王先生的瘦长条子，小陈的矮胖个子，经过分解拼凑，塑造画中所需的其他配角，这和生理遗传中所说的遗传因子有点相似。子女从父母的骨骼、形体、耳目口鼻等生理结构割取这一块那一片，加以拼凑，形成自己的面貌，和父母的形体面貌具备基本相似之点。所谓意测，也是如此这般的思维加工，和目识心记的形象基本相似而又自具特征。王

先生和小陈两个相异的形体，经过这种加工，可以辐射出形形色色不同面貌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如果我的创作过程缺少这种思维运动，那么，在生活中不管你画多少速写，也不可能达到意测的较高境界。意测的过程应该是认识论中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反复辩证过程。这里所说认识的深化，无非是要求达到认识的最高境界，获得完全合乎要求的人物形象。

王先生从开始在《上海漫画》登场，发展到《别传》的几年中，有个逐步成熟、逐步深化的过程。在我和王先生互相对话的斗嘴中，王先生对我强迫他模仿《Bringing up Father》那个美国矮胖子的生活方式和惧内行为表示愤慨，我把上海人吃罗宋大菜的新风和惧内的中国传统旧风说给他听，他才哑口无言。这说明任何事物都在发展演变之中。这个道理给予我创作《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以重要启示，使我从模仿中解脱出来，进而跳到社会生活的大海中，去捡拾奇形怪状的贝壳，组成发光的艺术品。

有人问，这不是中国画家提倡的“写意”吗？怪不得你后期所作的中国人物画，也具有这种特征。我回答说，也许就是这么回事。

§1.19 漫画协会和全国漫画展览

贝勒路上有两条弄堂相通，一条叫天梯里，一条叫恒庆里。上海美专的新校舍建在这附近，前辈漫画家丁保住在天祥里，他在美专兼过课；后来张光宇也搬进了恒庆里。这里

房屋新，开间大，房租不贵，交通方便，有无轨电车直通闹市区。因为有丁、张两家在此居住，漫画界中活跃分子黄文农、鲁少飞、王敦庆等经常出入这弄堂。我当时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光棍一条，无牵无挂，干脆就在恒庆里租了间房，在这里落了户。《上海漫画》问世不久，读者日增，销路坚挺，站住了脚，于是这一伙人有组织团体之议。黄文农最起劲，张光宇老大哥也赞成，当即拍板成立“漫画会”，在丁保家大门口钉上一块木板小牌子，记得是黄文农写的老宋体。有人提出要有个会标，黄文农当即按汉砖纹样画了一条蟠龙。这一仅有七个成员的漫画会，是否在《上海漫画》周刊上发过消息，已记不清。饮水思源，这应该是1935年成立“漫画协会”的前身。

《上海漫画》出版三年，最显著的社会影响是投稿者日增，出现了有少才华的年轻一代漫画家。如胡同光、胡考、丁聪、张乐平渐露头角。及至1932年《时代漫画》月刊问世，郑光汉、张奖超、华君武、汪子美、高龙生、黄尧、陶谋基、梁白波、特伟、黄鼎、张愕、蔡若虹等人出现，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阵容。与此相应，新的漫画刊物也相继问世，计有《中国漫画》、《独立漫画》、《生活漫画》、《漫画界》等四五种。其中的《生活漫画》以“美术左联”为背景，以进步漫画的面貌出现于漫画市场，和其他漫画刊物划了一条界线，这条门户界线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才告结束。

这时，连载长篇除了《王先生》还有张乐平的“三毛”，黄尧的“牛鼻子”。如此兴旺的局面，应归功于《时代漫画》

的开放政策和培养新一代漫画家的积极态度。华君武、特伟、张乐平、黄尧脱颖而出，长期在漫画界居于先驱者的地位。等到新中国成立，漫画新一代出现，他们成了老一辈，但仍不失先驱者的光辉。

漫画界人材辈出，地盘扩大，有人登高一呼：“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斗争，让我们组织起来吧！”《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便成为波涛的核心。在一次盛大的聚餐会上，他被推拥为组织“漫画协会”的主心骨。会上还有人提议，不但要有组织，还要有一个俱乐部，作为协会的活动中心。一呼百应，当场推举热心分子办这件事。不几天，就在霞飞路的某餐馆楼上租到一间大房，没等设备齐全，会员们一冲而进，自顾自活动开了。那股狂热情绪，简直无法形容。记得我那年已在南京定居，特地到上海参加“漫协”的成立大会，被拉进这个喧闹不堪的俱乐部。用现代政治术语来说，一言以蔽之，即所谓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狂热表现。

狂热阶段过去，几位组织者头脑清醒过来，向会员们提出应干点实事，主张办一次漫画展，以一种新方式显示漫画家们的艺术才能。这个主意出得及时，既可以压一压狂热的情绪，也可以提高漫画的社会功能，提高漫画家的社会地位。此议一决，俱乐部冷静下来，各人开始埋头思考：“拿什么参加展览？”我回到南京，动了几天脑筋，决定回一幅《游泳池风景线》让每个赤身半露的人口吐真言，表达对游泳的乐趣，实质是反映不同的社会背景。

从报刊的豆腐小方块，一跃而为展览大厅里的大方块，

对漫画创作方式来说，是一次飞跃；对漫画的发表方式来说，是一次新尝试。这个尝试，是将漫画家的作品走出报刊媒介的领域，直接公之于读者；也使习惯于在报刊上欣赏漫画的读者，有机会直接欣赏到漫画家的艺术手笔。这个展览在南京路新开张的大新百货公司四楼举行，要买门票才能进入会场，展览的场租和一切开支，皆取给于此。原来以为要赔钱的，岂知最后结算，还有余款可供服务人员的酬劳费用。这一结果，创造了漫画家的另一条生产门路，使我有勇气承担把画展移到南京去展出的计划。

南京的全国漫画展，租借太平路一所中学的部分教室举行。南京的几位漫画家刘元、高龙生等为此创作了新作品。龙生有一幅画，左边是斯大林与铁锤镰刀，右边是希特勒与“D”字徽号，中间站着一个人长袍马褂，题目是《向何处去？》，我们为慎重起见，事前请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来审查。他看到此画，眉头一皱，对我说：“中国有中国的道路，为什么要走人家的路？”我一听，糟！这幅画要被涮了！谁知检查官笑了笑，不置可否，走了过去。全部作品顺利通过。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多数报刊停版，漫画家无用武之地。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上海文艺界成立了文艺界救亡协会，出了一份《救亡日报》。漫画协会响应号召改名为“中国漫画界救亡协会”，成立了漫画宣传队，于8月下旬赴南京请战。第一批成员有胡考、特伟、张乐平、梁白波、席与群、宣文杰和叶浅予。10月撤到武汉，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扩大组织，吸收第二批成员廖冰兄、麦

非、黄茅、陶洪基、张什、陶令也、叶冈，举起了“中国漫画家抗敌协会”的旗号，办起了《抗战漫画》月刊，继承原漫画协会的事业，和全国漫画家保持联系。武汉撤退，抗战中心移到重庆，漫画宣传队也转到重庆。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艰苦时期，漫宣队的活动被迫停止，继之以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方式，发扬个人的爱国热情，掀起了一股新的漫画展览高潮。开其端者为张光宇的《西游漫记》、继之以廖冰兄的《猫国春秋》、高龙生、汪子美的《幻想曲》、谢趣生的《鬼趣图》。回顾这一时期的活动，漫画不再是报刊的屈服和尾巴，而是冲锋陷阵的庞然大军。因此不能不指出，30年代上海南京路全国漫画展的艺术水平，到了40年代重庆、成都的个人或集体漫画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还应当指出，1937年以后，从上海武汉走向延安的华君武、蔡若虹、张什、胡考，以另一种活动方式，配合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坚持漫画创作，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和国统区的大军在北京会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漫画新潮流。

§1.20 寻根思源话洋场

我1925年独自一人从浙江桐庐故乡投身上海，开始个人奋斗，前后十年，最后成为以创作《王先生》长篇漫画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在这十年中，我从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在南京路上站柜台卖布开始，进而当了三友实业社门市部的广告绘图员，后又逐渐跻身于出版界，结识了活跃于漫画界的知

名人士，被吸收为创办《上海漫画》周刊的同伙人，事业日渐发展。说起来，应该算得上一帆风顺，登龙有术。其实，我不过是凭着一点灵感，顺着某一条水流，任凭漂浮，然后抓到一个登岸的机会；在前进的道路上，又抓抬一切可以装进肚子的饲料，得过且过而已。

回想我的创作道路，1923年我就读的盐务中学，是浙江盐运使衙门办的，校长蒋邦彦是个满脑子崇洋媚外的官僚。他办这所学校，表面是为盐政事业培养后备人员，其实是为他欺世盗名捞个办学的美称。当时中国的关税和盐政，全在帝国主义的监督下行动，根本没有自主权。这个中学从三年级开始，除了国文外全部采用英文课本。我在这个学校读了二年，自问英语学得还算过得去。记得学校的图书阅览室订了一份上海的英文日报《大陆报》。我常有兴趣去翻阅该报的星期日增刊长篇漫画版，其中有一篇惧内故事《Bringing up Father》连载，虽然我不能全看懂，但对画中人物的关系，大体可以理解。“王先生”最早受启发，应该推算到那个时期。及至《上海漫画》问世，我对《大陆报》的星期漫画增刊就看得更有瘾了。

《上海漫画》第二、三、六、七四个版有时翻印点外国画报的新闻图片，如美国旧金山的《三藩市日报》画刊，伦敦的《图画伦敦》周刊，日本的《朝日新闻》画刊，都是来源。上海南京路有家卖外国乐器的“别发”洋行，附设一个卖外国报刊的书摊，我和张光宇经常到“别发”去搜购这类报刊，除了供《上海漫画》翻印外，也寻找个人感兴趣的期刊。我

每期必买的有英国的《Punch》，美国的《纽约客》，还有美国的《Vanity Fair》。我们发现其中有位墨西哥画家珂佛罗皮斯所作的世界名人漫像专栏，光宇吸收了他的夸张手法，我学得了他的速写工夫。1935年他访问上海时，我正担任《时代画报》主编，请他画了幅邵洵美的漫像，发表在画报上。外国画家直接为中国画报供稿，我作为主编，颇为洋洋得意。

此外，我对美国同一出版社出版的《Vogue》时装杂志也发生兴趣，开始在《上海漫画》和《图画晨报》发表时装设计图，还被一家时装店聘为设计师。提起这些，是要说明我在上海十年，受洋场文化的熏陶是多方面的，而《Bringing up Father》对“王先生”的启发尤为重要。这个英文标题直译的话，应该是“把爸爸提起来”，有些费解；若从故事内容的含义来看，应该是反映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矛盾。胖老头是下层社会出身，他的夫人则属于上流社会，女儿受了妈妈的教育，自然成了上流社会的人物。老头儿一举一纵，处处表现他来自下层社会的习惯和意识，经常使老太太生气，母女二人对刻都想把老头儿向上流社会提，而老头儿偏要到处出丑，闹得家庭不和，笑话层出不穷。表面看是怕老婆的故事，实际是社会成分之间的矛盾，不也就是阶级矛盾吗？

英国的《Punch》是一份老牌幽默杂志，经常发表社会讽刺漫画，为中国漫画家所熟悉。我1990年5月在杭州华君武漫画展开幕式上提到一十年代中国出了个沈泊尘漫画大师，就是这位沈大师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上海泼克》漫画期刊，无疑是受《Punch》的影响。从而也说明，中国之有漫画艺术，

不能否认是受了外来文化的启迪。但是，影响归影响，启迪归启迪，中国漫画家的创作才能和智慧，则是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的。沈泊尘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如此；张光宇、黄文农和华君武的政治讽刺画如此；我想，叶浅予的《王先生》也如此吧。

第2章 抗日行踪录

§2.1 旅顺港口寻往事

人们总还记得1894年的中日之战和1904年的日俄之战，辽东半岛留下了这两次战争的许多遗迹，集中点在旅顺口。我于1983年趁去大连度假的机会，访问了这个饱受创伤的港口。

旅顺现属大连市的一个区，港口周围群山环抱。港北有座主峰，原名西官山，当年李鸿章在此建设军港，曾登山观察形势，得知对面山峰名为黄金山，便改西官山为白玉山。登白玉山，旅顺港湾全收眼底。日俄之战，日本海军偷袭旅顺，在港口沉一军舰，堵塞港口，港内俄舰全部就停。日占旅顺后，为夸耀战功，在白玉山顶建一炮弹形高塔，名曰“表忠塔”。现在辟为公园，改名“白玉塔”，塔旁树立一块大牌子，记述此塔来由，让游人知道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可惜这块铁皮油漆牌子经日晒雨淋，字迹早已模糊，失去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如能改一块刻字石碑，该有多好。

另一处与日俄战争有关的遗迹是东鸡冠山的俄国炮台。此地有一块石碑，碑文说：“明治三十七年八月以来，第十一师团造部队发起进攻，十二月十八日占领”云云，出面立碑的是所谓“满洲国战绩保存会”。遗址上还躺着一块残碑，碑文是“昭和十年白玉山三十周年大家纪念”，这是满洲国为讨好日帝的颂德碑，时间是1935年，正是日帝把溥仪扶上满洲国皇帝宝座的第二年。这块碑被打翻在地，无疑是1945年日本

投降后，群众义愤的发泄。

“万忠墓”建于1896年，是甲午战争中惨遭日寇屠杀的旅顺二万同胞的合葬地，墓前有牌子记述同胞被害经过：

“……一八九四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十一月二十二日侵入旅顺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三昼夜血腥大屠杀，我两万同胞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读了这段惨痛历史，使我立刻想起1937年日寇占领南京时震动世界的大屠杀。为什么不为南京的惨死同胞也建立这样一座“万忠墓”呢？据说旅顺的万忠墓是大清朝廷特派道台大人到旅顺来建立的。大清皇帝昏庸无能，遭到甲午之战的失败，却还记得老百姓为他牺牲的惨痛教训，也算表现了一点人性。拜罢万忠墓，心潮澎湃，发而为诗，诗曰：

青山起伏碧波绕，渤海门户在半岛；
强邻压境互称霸，吾土吾民受煎熬；
白玉山头臭表功，万忠墓里血如潮；
旅顺港口寻往事，旗飘五星慰寂寥。

以上是1983年10月我为上海《新民晚报》写的一篇短文，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当时我站在旅顺港口，回顾我们祖先受屈辱的惨痛历史，联想到自己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经历，不禁思绪万千。

§2.2 卢沟桥的炮声

1937年我第二次访问北平。已是何应钦签署《塘沽协定》之后，冀东汉奸自治政府已成立，北平半汉奸特别行政单位也应运而生，日军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出入。北平故都虽然仍在国民党冀察当局的管辖之下，其政权则在亲日派黄郛之手。我于是年6月离开北平，回到南京寓所不久，即发生“七七”日军在卢沟桥向我挑衅事件，我军起而抵抗，从而开始了英勇的八年抗战。卢沟桥炮声一响，延安发表了“国共两党亲密合作，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宣言，蒋介石则在庐山发表了“奋起抗战共赴国难”的号召，表达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在侵略者的心目中，中国的军队似乎不堪一击，所以敢于在北平南郊发动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则认为国共两党已经言和，内战从而结束，枪口可以一致对外，即使一时受挫，至少可以透一透压了七、八年的胸中闷气。

庐山“共赴国难”的号召一发，南京电台改变了长期以来“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整天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等爱国歌曲，南京各报也变了风格，唱起“共赴国难”的高调。我所供稿的《朝报》本来是提供茶余饭后消遣品的，此时此刻，除了出“战况号外”版以刺激神经官能外，无其他可供读者咀嚼的东西了，老板和编辑都在打算如何适应长期抗战的环境。等到8月13日上海战争爆发，南京的气氛更加紧张。日本飞机虽没光临南京，空袭警报可没有少发。我

的血液沸腾起来，感到在这里生活已失去意义，便直奔上海，干脆到火线上去看枪炮的吼叫声。

§2.3 在上海前线

上海是个特别的城市，人口集中在两大租界里，一个是公共租界，是几个帝国主义共管的区域；一个是法租界，是法帝国主义独占的区域。日本帝国主义在公共租界里有其独占区，名为虹口区，贴近中国地界的闸北区。日本兵营就建在闸北区的边上，“八·一三”日本人在此点了火。“七七”卢沟桥一声炮响，南京政府在这里加强了防守。日本军阀早在1932年已在这里试验过它的攻击力量，当时因为投入的兵力有限，又慑于列强压力，不得不和南京政府讲和。这一回可不同了，东条政府决心要占领全中国，除了在北方向蒋介石节节进逼外，蓄意开辟上海战场，向南京进军。蒋介石为了拖延时间，向上海投入的部队相当多，抑制了日本快速占领上海的凶焰。在这个拉锯消耗战中，公共租界成了中国老百姓避难的地方。

虹口有条路叫“老靶子”路，是公共租界和闸北区的交界线，日本侵略军占据老靶子路南边，中国军队占据路的北边。有一天，上海报纸“号外”报导我军胜利消息，说敌军已被击退，退到虹口防区。为了证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可靠性，我和画友鲁少飞一同赶到虹口区，从老靶子路南侧进入一所住宅后门，想探一探老靶子路两军对峙的现状。此时居民早已

搬走，我们大着胆走上楼梯，正要转弯闯进二层住房时，突然从房里走出一个持枪的日本兵，把我们拦住，押进房里。我们这才明白，这里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敌军机枪射击点。我们两个冒失鬼成了敌军的俘虏，不由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好。这时来了一个中国人，像是当翻译的，问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灵机一动，便说这里是一个朋友的家，我们来看看他。这人如实告诉了敌人，便把我们两人押到前门马路上，说这是前线，不准老百姓闯进来。让我们站了一会儿后，又押来几个人，大概也是和我们同样的冒失鬼。又站了一会儿，我心里直嚼咕，要是对面我军发起进攻，这边一还击，我们岂不成了战场上的冤死鬼！正在嘴咕，来了个日本兵，把我们这群俘虏沿着人行道带到北四川路转角一个前哨阵地处，放了。

惊魂稍定，我和鲁少飞额手相庆，以后再不相信报纸“号外”的特别报导了。在上海战争中，这类“号外”常常一天出好几次，一可以振奋人心，二可以借此谋利。不过10月间我军撤离上海时，苏州河畔留守在一座大仓库里的八百壮士的事迹，“号外”上着实费了不少笔墨，灭了敌人威风，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八·一三”沪战开始几天内，我军士气甚旺，把敌人打得龟缩在租界边缘，上海市民处在十分兴奋的状态中。有一天下午，天空有层云，忽听黄浦江边炮声轰鸣，朵朵黑烟在云层中开花。俄顷，三、四架飞机钻出云层，俯冲投弹，我们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首次出动，投弹的目标是停在日本领事馆旁的“出云”敌舰！此时我正在“大世界”附近

的广场上走动，街上的人见此大快人心的壮举，无不昂首鼓掌欢呼。就在这时，一颗炸弹从天外飞来，在广场附近爆炸。有些人受了伤，人群立刻奔去抢救。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我们自己的炸弹，误伤了自己的同胞，但没有人埋怨，因为这是为国牺牲，是光荣，是大义；痛快的是敌人受到了惩罚。

看到我军飞机投弹之后钻进云层，敌人的高射炮弹还在空中开花，此时此刻，我恨不得马上跑到黄浦江边去看看那艘敌舰中了多少中国炸弹。可恨的是，日本领事馆附近已严密警戒，不让上海市民靠近。第二天的日报一上街，群众纷纷抢着看昨天下午那一幕激动人心的空袭敌舰的壮举。不错，是我军一小队飞机首次出击，目标正是那艘敌军的指挥中心‘出云’舰。那天上海的大马路上从早到晚人头挤挤，人们仰望天空，不知今天我军的飞机是否还会出动？

几天以后，报纸又报导了我军一艘快艇，满载弹药偷袭敌舰的故事。上海市民这几天完全处在精神振奋，感受胜利的幸福之中。

§2.4 漫画宣传队与南京的抗战漫画展览

共产党抵御外侮的宣言和国民党共赴国难的号召，促成了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大联合，成立了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这是“左联”纠正关门主义之后举起的一面大旗，美术界首先响应的是漫画界救亡协会。当时上海出版的漫画期刊有四、五种之多，以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资格最老，拥有画

家最多；“左联”的《生活漫画》虽系后出，门户却很严，一般漫画家不容易和它靠拢。在漫画界救亡协会的旗帜下，各组织彼此破除了门户之见，携起手来，共同为抗日救国大业出力，以协会的名义，出版了《救亡漫画》五日刊。我从南京来到上海，看到戏剧界纷纷组织起演剧队，到外地去做发动群众共赴国难的宣传工作，认为南京在宣传工作方面是个空白，漫画家应该去填补空白。于是和上海的漫画家救亡协会的负责人鲁少飞商量，组织一部分漫画家进军南京，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个倡议立刻受到漫画界老战友的响应，一天之内漫画宣传队即成立起来，报名的有张乐平、陆志率、特伟、胡考、白波、宣文杰、陶令也、席与群等。大家推举我当领队，同时，还得到其他救亡团体的资助，使我们有了最低限度药、生活费 and 必要的活动费，于8月31日在上海西站登上沪宁快车，向南京进发。

“八·一三”上海之战爆发，上海北火车站已经成为战场，沪宁铁路改以西站为起点，走一段沪杭线，转入新近铺轨完成的苏嘉线，在苏州转入沪宁线。一路走走停停，所费时间比平时多出一倍以上。我们和开赴前线的兵车逆向行进，8月梢，天还热，各人都是轻装。这一次出行，不知这场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底，一切行动听战局指挥，要我们到哪里就到哪里，要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谁也没有个人打算，一切交给抗日救亡了。我的底也和大家一样，一切都交给了抗日救亡，然而我是领队，又是老南京，我首先要考虑到达目的地以后的活动方式，还要考虑全队的生活与安

全问题。

到了南京，以国府路廊东街德邻村二号我的住所为驻地，没有床，全队人员睡地铺。我带了鲁少飞的介绍信和乐平、特伟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求见部长邵力子。邵立即接见，我们提出漫画宣传队在南京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的要求，希望宣传部能资助一笔活动资。邵首先表示欢迎，继而谈他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他认为这次战争打不长，你们上海文艺界的人组织这个队那个队上南京来，太冲动了，最好不要随便乱跑。接着看了看我们的名单，其中有特伟、白波等名字，他便说你们青年人取这种怪名字，是否别有用意？至于经费嘛，我们研究研究再答复。听了前面泼冷水的话，我们心里已经怀疑；等听了后面训人的话，我们心里更气，说了句“知道了”，便匆匆告别。

回到队里，大家研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态度，明明白白是表示不欢迎民众起来共赴国难，说明庐山官冕堂皇的号召不过是应付一下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豪情壮志，并不真正赞成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共赴国难。华北与上海打起来了，也许是不得已抵抗一阵，并不想和日本拼个你死我活，可见邵力子的话并非信口胡言，而是有国民党的政策依据。走访邵力子使我们明白南京政府对抗日战争的真实态度：一怕日本强敌，怕江山保不住；二怕老百姓起来，打乱国民党的阵脚；三怕共产党混进南京来抢夺共赴国难的宣传阵地。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对我们这伙上海闯来的冒失鬼，以为用几句官腔即可以吓退，根本不理解中国老百姓破釜沉舟和日寇决

一死战的心理。日本的炮火吓不退我们，你邵力子几句空话就能唬住我们吗？

你中央党不资助我们，我们找地方党去！我和国民党南京市特别党部负责人梁寒操在南京的文艺活动中打过交道，我便去找他，告诉他我们碰了邵力子的钉子，问南京市是否要我们做点宣传工作。他拿起电话，通知市党部接待我们，尽可能帮助我们取得必要的工作条件。经过具体商谈，即日起市党部腾出一个大厅作我们的画室，招待一日三餐，并在两星期内以高速度、高标准筹备一个抗战漫画展览会。这时，苏州的陶谋基和南京的张什也参加进来，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我们按时上班，每天一进画室便忙碌起来。大家一起议定了整个画展的主题内容，具体画题分配到每个人。其中一大幅抗战形势地图，由几人合作；一大幅《松花江上》，反映“九·一八”那首歌词的内容，因张什老家在辽宁，他弃家流浪到北京，在京毕美专学画，这个题材就分配给了他；其他的画采取宣传海报形式，按日寇暴行、全民动员、抗日英雄、汉奸丑相、时事讽刺等不同内容，根据个人特长作了分工，各自负责创作。有关绘画工具材料，派专人采办并管理。席与群有一台摄影机，除了作画，还担任摄影工作，拍摄工作进程和展览期间的行动情况，以留作档案并向新闻单位供稿。宣文杰原是《时代漫画》助理员，是主编鲁少飞的得力助手，理所当然地成为漫画宣传队的总秘书和总财务。后来我们转移到武汉后，他还担任漫画界抗敌协会联系全国漫画家的组联总管。我们在武汉出版的《抗战漫画》半月刊，宣文杰驾轻就

熟，一身兼管组稿、印刷、发行等各种业务。抗战八年，漫画宣传队的一切行动，包括全部业务、人事变动、对外关系等等，宣文杰心里都有一笔总账，谁也替代不了他。要写抗日年代的漫画史，就得找他。

1937年9月底，抗战漫画展在南京新街口大华电影院开幕。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打破宣传工作的门户之见，充分信任社会的力量，支持漫画宣传队自发的爱国热忱，执行共赴国难的大政方针。南京电影院人流进出，改变了原来空气沉闷、精神访惶的局面。南京电影院自“八·一三”沪战爆发以来就已停业，它的经理是个美国华侨，此时已经装好行李，准备回纽约去重操活鸡行买卖旧业。抗战漫画在此展出，也算他临行之前为抗日救国作出了一点贡献。

在此期间，经常有人前来联系，要我们出力担任这样那样的任务，我们也在考虑如何发挥更大的力量和以更好的方式去为抗日救国事业服务。我们先接受了镇江市提出的举办流动展的建议，振奋了镇江市民的抗日情绪；继而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派人来联系，希望我们加入他们的美术宣传部门，扩大美术宣传力量。他们本来有一个美术小组，在如此宏伟壮阔的抗日大运动中，感到力不从心，正为难之时，想不到漫画界的核心力量送上门来，而且用不着花大钱就能为它所用，即使最大的傻瓜也不会放弃这么大一笔财富，所以积极和我们合作。在我们自己方面，所考虑的乃是今后的活动天地，总得有个依靠的力量，资助我们的工作；军委会是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我们为这个中心做点工作，也许影

响会更大些。经商议后，我们决定接受政训处的邀请，作为一个独立单位，每月由他们提供三百元经费，在他们指导下，进行有效的抗战宣传工作。

从此以后，我们的工作关系由南京市党部转到了军委政训处。政训处的负责人是袁守谦，这人有点文人气质，不像个军人，因为我们不是他的直属部下，见了我们这群上海来的流浪汉，总是比较客气。当然，他也从南京电影院的展览会里看到了我们对抗战的贡献，所以时常表达出对我们这群流浪汉的敬畏之心。

我们这群人平常靠卖稿过日子，在市党部干了一个月，他们除了供给吃饭，让我们填饱肚子外，不支付其他报酬。在政训处，每月给三百元，包了一切，我们除自己花钱吃饭外，每人还可以支点零花钱，驻地则仍在国府路廊东街我的住处。每天工作完毕，没有其他娱乐，养成了读书学习的风气。这时我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一类马列主义的书。特伟、胡考身上，就带有这一类书，大家轮流阅读，思想境界开阔起来，对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摆得比较端正些。这也许因为我们从事的漫画工作，从来都和社会动荡、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休戚相关。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急之际，大家都能刻苦自励，以大局为重，事事争先；个人如有困难，队员之间也争着解囊相助。记得11月间漫宣队奉命撤往武汉，我口袋里装着的刚领到的一个月三百元经费，在长江轮船上被窃贼偷走，我十分为难，队里马上开会公议，谁身上有钱，谁先垫着，以后再想办法。当时一下子凑了一百多元，全队一个月的生活

有了着落。

在南京的画展里，我根据报上发表的照片，画了一幅上海空袭黄浦江敌舰的空军英雄形象。碰巧几个空军战士来参观，其中一人就是我所画的乐以琴，便邀他和我在画前留了一影。事过五十年，1986年我在北京收到一封四川来信，附寄这幅留影的剪报，说乐以琴在参观画展后不久，即在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来信打听当年我们在展览会场见面的情况。回想起来，这虽是一次巧遇，也可以说明在抗日战争的大事业中，只要你为国家民族贡献一点力量，彼此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和空军烈士乐以琴之间，就有这么一段因缘。

§2.5 在敌机轰炸下

漫画宣传队参加政训处之际，队里派我去上海采购绘画器材，主要是消耗量最大的广告颜料。这时沪战还在胶着状态，无大变化，火车照常行驶。我乘京沪快车出发，一路遇到几次兵车错车，时间有些耽搁。大约在下午1时车过无锡时，看见车站秩序大乱，站长手挥绿旗，神色仓皇，不让我们停车，原来有空袭警报。列车继续前进，我探首车窗外朝天空一看，几架敌机正向车站飞来，为首一架已经俯冲下来，目标对着我们这列列车。车刚开出站外百米处，只听得一声巨响，列车当即停止。我比较警觉，在巨响发出之前，已缩身钻到座间的小桌之下。巨声一响，车窗玻璃震碎，有些乘客的脸被玻璃碎片划破，挂了花，我还以为我们这节车中弹了。

巨响过后，列车停住，敌机还在头上飞，乘客纷纷跳出窗外，向田间乱跑。敌机投完炸弹，低飞用机枪向乘客扫射。我忽然想到手提包中有一架照相机，应该拿它记录这一次敌机的暴行，于是马上奔回车厢，取出相机。这时前一节车厢中了弹，车厢里横七竖八躺着许多乘客的尸体，我马上对准距离，放大光圈，摄下了第一张日寇暴行照片。敌机还在头上盘旋扫射，我跳下车，奔向不远的芦苇丛，连着抓拍几个受伤乘客的镜头。就在我钻进芦苇丛躲避敌机扫射时，一个先躲在里面的乘客叫住我，让我看看他的下体。我看了看，告诉他裤子臀部有一大摊血，但安慰他不要怕，待敌机走后，救伤人员会来救他。我自己也嘀咕，敌机正在头顶扫射，说不定我也会中弹。每当“咯咯……”一阵枪声过后，我就摸摸身上有哪处受伤。从火车中弹，敌机扫射，到警报解除，我感觉时间过得真慢，特别是躲在芦苇丛中那一会儿，好像地球停止了转动；脑神经处在特别兴奋的状态之中，有如多梦的长夜，和恶魔纠缠不已，等到咯咯声停止，嗡嗡声走远，我如夜梦方醒，急忙从芦苇丛中钻出，这才又意识到自己手上还拿着照相机。我的使命是记录敌人造下的罪恶，不能让时间白白溜走，于是又活动开了，一连拍摄了好几个受伤乘客的镜头。走出车站，走上大街，看到无锡人还在奔跑，并且互相招呼，说是第二次警报发出了，快跑！快跑！我这摄影记者太蹩脚，没能把群众惊恐仓皇的神态拍下来。

车站宣布我们这趟列车今晚停开，改在明天清晨继续开往上海。我记起无锡有家报社，心想他们对我这一段冒险经

历一定会感兴趣，便奔向报社，先作了自我介绍。他们对“王先生”的作者、画家叶浅予当然不陌生，我详述了火车站上的惊险场面，并把照相胶卷取出，请他们冲洗放大，随意取用，以让无锡读者看到敌机第一次空袭的实况。

次日晨起，赶上原京沪快车，在苏州稍停，转苏嘉路，到上海西站下车。乘客不多，经打听，沪宁之间已开长途汽车，起点站在大世界南，看来走公路比较安全些。在沪三天，寓中国饭店高层，夜视闸北炮火。回程仍搭火车，画具办足，装了一大柳条箱。在苏州停车时间较长，乃上街走走，经过一家伤兵医院，看到前线退下来的伤员，又看到街道上正烙制“光饼”，供前线战士作主食。据说这种“光饼”是明朝防御倭寇打仗时候用过的食品，现经过仿制，又复活在三百年后的抗日火线上，我不禁感慨系之。

这天傍晚回到南京，向漫画队同仁汇报了这次出差的冒险经历。队里在这几天中已完成了大幅宣传画数幅。我立即投入工作。不几天，闻日寇在金山卫登陆，袭苏嘉路，南京吃紧，上海前线部队已急往后撤。

§2.6 从南京撤武汉

11月初，政训处指令漫画队乘长江轮先撤武汉。张什夫人怀孕，由几个人用绳索把她吊上船去。我知船员的床位可以出售，抢得一个上铺。队里本月的经费三百元都装在我外衣口袋里，我把外衣挂在壁间，出去走了一趟回来，钱已被

偷走，怀疑是对铺那个老江湖所为，但不敢去搜，只得自认倒霉。过去闻知长江轮船窃贼扒手最多，今日果然身受其害，以后吸取严重教训就是。从此，每月领得经费，大家分散保管，丢了一个，丢不了全部。

政训处于12月间在武昌建机关，处主任换了贺衷寒。此人是黄埔系老班子，蓝衣社的重要人物，每星期一上午作纪念周，向部下训话，命两个附属单位负责人参加，一个是漫画宣传队的叶浅予，一个是救亡演剧队的应云卫，我们两人坐在末座，面面相觑怪别扭。记得1935年为南京《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讽刺小官僚在纪念周上背总理遗嘱，结结巴巴背不全，大出洋相，这位贺主任倒背得滚瓜烂熟，无懈可击。我们叨扰本座四五次，即被调到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在郭沫若麾下工作，免了这坐冷板凳的差使，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在贺衷寒麾下，在两个附属单位之上，设立了一个什么“艺术宣传处”，采用北伐当年生活方式，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行动在一起，每人每月发最低的零花钱，倒有点“共产”味道。据我看，他们可能认为我们这批人来历可疑，但还是要用，俗话说“物尽其用”，自愿送上来的廉价劳动力为什么不用？不用说说不定会顽抗。所以我们心里也有数。

一个月之内，我们完成了一套宣传招贴画，共二十余幅，彩色套印，贴遍武汉街头，算是政训处迁到武汉后的一大贡献。当时我们看到武汉有这么好的印刷条件，便设想在这儿出版一个漫画期刊，填补上海沦陷后的出版空缺。可巧上海杂志公司迁来武汉复业，双方协商，一拍即合，指定我和宣

文杰两人负责筹备。创作班子是现成的，费了两天两夜，一期画稿赶出来了，定名为《抗战漫画》半月刊。编辑、出版、跑印刷都是老手，武汉纸张存货又充足，石印套色虽质量稍逊于上海，其作用却超过了上海。这里是全国交通网络中心，通过这本薄薄的刊物，全国漫画家有了一个互相联系的中心，也有了共同作战的阵地。到1938年10月武汉撤退前，总共出版了12期。几十年来，我始终保存着这12期《抗战漫画》合订本，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抄走，1979年平反后又回到我的手里。这个历史性文件，已成为当今写漫画史的重要资料。

§2.7 在政治部三厅编《日寇暴行实录》

1938年春季，武汉形势稍稍稳定，蒋介石在大本营里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的亲信陈诚，并特邀共产党的周恩来和农工民主党的黄琪翔当副部长，象征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周恩来推荐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主持对内对外的文化宣传工作。三年前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留在南京的田汉和阳翰笙，也被吸收进三厅，阳当秘书长，田当第六处艺术处长。在田汉的六处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人才济济。原定徐悲鸿当美术科科长，未到任，由倪貽德接替；戏剧科的首脑是洪深；音乐科有张曙、冼星海；电影科有郑用之、史东山。对外对敌宣传处定为第七处，首脑是原武汉大学教授范寿康，部下有冯乃超。有人把三厅的阵容比之为北伐时代武汉政府的

总政治部，那时郭沫若也在其中。我以为按阵容说，三厅要比当年的总政大得多，不过两者之间的确有相似之处。第一，当时是国共第一次合作阶段，蒋介石尚未叛变，其部长邓演达是第三党首领，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现在的三厅政治部则有共产党的周恩来，第三党的黄琪翔，郭沫若可以说是前后两代政治部的纽带人物。第二，就政治形势和时代背景讲，1927年华北和东南诸省尚在军阀统治之下；1938年华北和东南诸省则已陷入日寇的魔爪之中。所不同者，1927年北伐大军处在气壮山河压倒对方之势，1938年中国人民却处在抵御外侮的怒潮骇浪之中。

我在1927年还是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虽然也经过1925年“五卅”惨案的洗礼，懂得一点匹夫之责，然而对祖国前途该走向什么方向，却是糊涂的。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残杀共产党之际，我跟在朋友后面，前后参加了蒋记淞沪警察厅政治部和海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穿起了军装，背上武装带，还自以为革命队伍中的人了。1938年的叶浅予，却头脑清醒多了，知道中国该走什么道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漫画宣传队加入到三厅的编制之中，仍然保持一贯的朴素作风。六处要我兼任该处的美术科工作，给了我一个中校军衔的科员职位，我把个人应得的中校饷银并入漫画宣传的活动经费，和大家共甘苦。这种共苦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武汉撤退、集中桂林，我被调到七处并派往香港，暂时脱离漫宣队为止。

南京沦陷以后，我军节节败退，日寇沿着长江两岸继续前进，矛头指向武汉。此时三厅已大规模展开了工作。在我记忆中，值得怀念的有这么两次活动：一次是汉口大街上的爱国募捐游行。几十人共抬一面足有一亩田大小的巨大国旗，以大锣大鼓为前导，几辆大卡车装上扩音喇叭，不断播放救亡歌曲和爱国演说。街道两旁商店楼上楼下纷纷向国旗抛金银，飞钞票，声势浩大，惊动全市。演剧队边走边演街头活报剧，漫宣队手擎大布画，浩浩荡荡，通过汉口的五里长街。这气势雄伟的募捐与宣传大游行，一扫南京失陷、我军节节败退以来所造成的低沉空气，重新鼓起共赴国难的高昂情绪。另一次是庆祝台儿庄大胜利。三厅各处全部动员，组织各界群众在黄鹤楼下蛇山矾头长江岸上开群众大会。会场上族旗招展，欢声雷动，郭沫若站在台阶高处，以其洪钟大吕之声，向群众发表演说。长江上的大小轮船与快艇汽笛喇叭齐鸣，我站在漫画宣传队队伍中，联想起三国演义中刘备、孙权两家联盟，火烧曹操十万水军那种冲天气概，感到无限豪情，浑身是劲。晚上回到驻地，和队员们畅谈下午的豪迈气派，谁都觉得中国虽弱，只要全民动员起来，拧成一股劲，这个弱就会变成强，这个道理在毛泽东那篇《论持久战》里说得十分透彻。我们有幸，在国共合作的第二阶段里，得以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和浑身气力，为保卫祖国作出贡献，真是幸福。

三厅六处美术科同人，组成了一个美术工场。为全民抗战制造精神炮弹。大概在八、九月间，全体动手，在蛇山矾下的城墙上画了一幅全民抗战大壁画，为以后的美术宣传开创

了一种新的方式。参加画这幅大壁画的画家有：王式廓、冯法模、李可染、倪貽德、周令别、周多等人。

军委政治部成立后，各战区相继成立政治部，漫画宣传工作受到重视。三战区司令部设在上饶，政治部主任是谷正纲，他向我们提出为他组织一个漫画宣传队。经大家商议后，认为在东南战区扩展我们的工作，有其必要性。这时我队新参加过来几个成员：浙江来了叶冈，广东来了黄茅、麦非、廖冰兄，队里便决定由张乐平领队，陆志库、陶谋基、叶冈、麦非为队员，派往上饶。老队员胡考因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张什、陶令也去西安开辟新阵地，先后离队。我于8月间受三厅委托，去香港督印《日寇暴行实录》也暂时离队。留武汉的队员还有特伟、白波、廖冰兄、宣文杰和黄茅等。

日寇占领南京，大发兽性，屠杀南京人民的暴行在世界传开，也传到武汉。东南前线从日寇俘虏身上接到不少这类照片，汇集到政治部，政治部决定编印一本画册向国内外人民揭露这一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这个任务交给了三厅；由六、七两处派冯乃超、史东山、马彦祥、叶浅予等五人紧急投入工作。我们把这类照片分为烧、杀、淫、劫几类，编成十六开本画册，并搜集日本和外国报刊已发表过的同类照片作为补充，由我携带原稿专程赶赴香港，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代印。将近一个月，印成一万册，交广州铁路局急运武汉。第一批样书由我随身带赴武汉，此时三厅已由武昌昙花林迁到汉口海关大楼，我把样书交给有关领导，任务交待完毕，便等候大批画册运到。不料日寇包围大武汉的攻势愈来愈猛，与

此同时，敌军又出兵攻占了广州，切断我大后方和海外的交通。我很担心这批画册能否及时从广州运到。正在紧急关头，三厅奉命向长沙撤退，我和漫宣队会合，一同撤往长沙，三厅在长沙暂驻，漫宣队全体成员以画壁画为主要任务，在车站、码头、通行大道展开活动。过了几天，秘书处的人告诉我，全部画册已经运到长沙，正在开箱清点，准备分送有关单位。这下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要不然，此书流落广州，若被敌人截获，岂不前功尽弃。

这本《日寇暴行实录》如果能够提早运到武汉，让留在这个抗战中心的中外人士都能看到，其社会影响将无可限量。老实说，我们这些为国为民一心抗日的人，如果头脑清醒，行动迅速，利用武汉的印刷条件，在武汉撤退之前早早印出，早早散发，其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偏偏迷信香港的印刷条件，反倒贻误战机，在宣传上吃了败仗。如今回忆往事，其咎还在于我们太书生气，不能适应瞬息多变的战争形势，加上坐机关沾染上的官僚主义积习，遇事只循常规，不讲效果，每每出错。由此而想到八年抗战，最大的错误在于不能准确估计形势，不能利用有利条件，取得战略战术上的胜算。就这本《日寇暴行实录》而言，在长沙大火之前，管发行工作的人如果真正做到物尽其用，及时散发出去，一本一本送到人们手里，倒也罢了，但照当时办事效率看，我实在怀疑其中有些书是否埋葬在长沙大火之中了。

中日签订和平协定之后，近几年，日本政府无视协定精神，对侵华战争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几次挑起教科书事件

与参拜靖国神社事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马彦祥把《日寇暴行实录》这本书献出来公之于世，警告全世界人民决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1985年南京建成了日寇大屠杀殉难烈士纪念馆，1988年7月又在宛平县建成抗日纪念馆，我这才觉得稍稍松了一口气。

§2.8 长沙大火前后

武汉撤退，三厅驻长沙约两个月。我为漫宣队忙了一阵，未参与六处美术工场的活动，不过和工场的画家们时有接触。两月来最多的接触，是一起品尝湖南菜的滋味。印象较深的有湘江河街的墨鱼炖肉、大盘松菌、炖牛肉、牛肉粉。一次参加田汉在某大饭馆组织的午餐会，桌面之大，筷子之长，举世无匹。席上某人说，湖南人吃饭，常常此座夹菜给对座吃，所以筷子非长不可；还有人说，湖南宴席要斜坐，否则左手拿筷会碰到右座的脸。这些笑话，无非形容筷子之长。自抗战爆发后，我已不画漫画“王先生”，不然的话，以湖南竹筷作题材，倒是极好的笑料。

三厅驻长沙期间，政治部驻地在衡山。有一天，为了给漫宣队领经费，我搭政治部便车跑了一次衡山。归程天将黑，车队调度员指定我和宣文杰搭一空车回长沙。衡长间不到一百公里，黑夜行车，在砂石路面上跑得飞快，颠得够呛，渡湘江时才平静了半小时。车到长沙，已过晚餐时间，我匆匆在街上吃了碗牛肉米粉，聊以解馋。

战局逼近长沙，守将决定弃城，将一片焦土留给日寇。三厅秘书处通知各有关单位，某日下午5时轻装步行撤离长沙，并暗地指示，待我们撤离后，整个城市将纵火焚烧。三厅全体人员在驻地集合，待命出发。漫画宣传队是个独立单位，几个月来积累了相当多的画幅和资料，舍不得抛弃，临时弄到一辆双轮手推板车，装扎妥当，随着大队走出长沙，沿着公路向南前进。走着走着，和大队走散了，大约将近午夜，回头一看，远处一片火光，知道长沙已被汽油点着。这位守将实行焦土政策，敌人未到，自己先提前解除武装，名义上搞什么“焦土”以“表示抗战到底决心”，实际上就是嘴上说得很动听。想想这“焦土政策”执行起来，将牵动多少问题！机关撤退，一道命令，一走了事；这全城的房屋财产，到底是老百姓辛勤劳动，惨淡经营积累起来的，付之一炬，你不痛心吗？！你把长沙烧成一片焦土，敌人就不敢进来了吗？

遥望一片火海，想到此时此刻，长沙居民有多少人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老窝！他们在火海中挣扎，将尽可能保存一席存身之地，以在残垣焦木中重振家园，但那些纵火持枪者，哪容得你扑救残火，他们会把你当作通敌的好细，格杀勿论！我这样想，也许过份了。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把大火烧得过早了，日寇前哨还远离长沙就停止前进，一点没受损失。一个月以后，纵火者不得不拨出大批救济物资，派员前去救济那些坚持在沟壑之间求生存的长沙老百姓。这时三厅已撤到衡阳以西的三塘，奉命派宣传队伍返回长沙做慰问工作。这一场教训，充分说明我们的作战指挥官在敌人面前吓破了胆，唯

恐逃得不快。蒋介石的治军名言叫做“不成功便成仁”，在此关头，它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长沙到底烧成怎么样，我未看到。从常识判断，即按照我们许多行动迟缓和不彻底的做法看，长沙绝不至于烧成一片焦土。长沙大火是在1938年底，而敌人发动的湘桂大攻势则在1943年，长沙的寿命延续了五年，可能已经恢复了原状。后来这个战区的指挥官变得聪明了，不再执行“焦土政策”，长沙免遭第二次大火的浩劫。

漫画宣传队和三厅大队伍失散之后，回头看到长沙一片大火，大家心里十分沉痛，行军脚步越走越慢，加上一板车的物资与行李，再也拖不动了。这时已近午夜，公路上有些撤退下来的卡车从我们身旁疾驰而过，更增加了我们这两条腿的份量。走着走着，昏暗中发现路旁有个小村庄，不知是谁发出第一信号：“就在这儿过夜吧，说不定老百姓会欢迎我们这批抗日的志愿兵呢！”第二个信号说：“反正已经落伍了，等天明再找队伍也来得及。”第三、第四个反应自然齐声赞同。于是两条腿的劲儿也上来了，大家一齐把板车推上坡去。先是小声敲老乡的门，礼貌地询问能不能让我们进去过一夜。一家、两家、三家敲过去，哪家也不应声，我们怀疑是不是老乡不欢迎我们这批半夜敲门的丘八大人。再一想，是不是全村的人都跑光了？这儿离开长沙不远呀，火烧长沙的消息，不会把老乡都吓跑了？也好，既然家家主人都不在，干脆采取丘八行动，破门而入。幸好有一家大门没有闩牢，一播就开，我们便反客为主，用手电寻着床铺，倒头便睡。次早醒来，钻

进厨房，发现水缸里有水，还有现成柴禾，便烧水洗脸，并把我们的水壶灌满开水，溜之大吉。

我们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属下的一个单位，是三厅南撤大军的一个行军小分队，按理应有一定的纪律，一定的行军目标。要说纪律，夜来撬开老乡的大门，自由占睡人家的床铺，自由用人家的柴禾烧水，临走应该留下点柴禾钱，至少留个道谢的字条，否则，和军阀的强盗兵有什么两样？这且不说，至于行军的目标，谁也没有闹清，队伍该在什么地方集合，大约我这个领队的该负责吧。次早上路，只见车群、人群都沿公路往南走，我们也就跟着走。大约两小时之后，走到一处渡口，看对岸是一个城镇，我们也不打听，便跟着车队上了渡船，反正这是公家的，谁也不来问你是哪个部分的。和我们一同渡江的是前线撤下来的一辆辆炮车，仔细观察，原来是德国造的新式野战大炮车，车上对面坐着两排炮兵，车后拖着一门大炮，怪神气。可惜，这炮车没有在前线发挥什么威力就往后方撤，因为我们看到车上的炮兵和车后的大炮都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好像刚从演习场上开回来似的。我们随着一辆辆炮车过了河，一上岸，才知道这儿是齐白石也是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城。打听到三厅的集合地点在衡山，往南还有几十公里，我们赶快又回头返回西岸。也真巧，一辆军用卡车和我们同渡，彼此一招呼，知道卡车是政治部第二厅送军属从湘西那边来。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衡山，但车上的军官知道我们是三厅掉队的人员，同意让我们搭车去衡山下摄司渡口。这样一凑合，便宜了我们十条腿，就在渡船上，

连人带板车一起爬上了卡车，很快到达目的地。

下摄司交通站告诉我们说，三厅全部人员在衡阳湘桂铁路三塘车站集中。我已记不清是二厅卡车还是交通站的车把我们送到衡阳。到了三塘，三厅为我们安排了驻地，说是从武汉撤下来的军委机关，都要转移到桂林，然后陆续撤往重庆。湘桂铁路是抗日战争爆发前不久才修通的，此时此刻成了西南大后方唯一的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其拥挤可知，我们只能在三塘安心等待。

在三塘期间，听了一次周恩来的形势报告。他对武汉撤退和长沙大火后的战局作了分析。从中知道日本侵略军在长沙外围按兵不动，不敢进长沙，可能是怕陷进我们的包围圈。总之，目前战局比较稳定，我们可以从容安排大后方持久抗战的条件。报告中对从长沙仓促撤退以及火烧长沙的行动似乎有所批评，不过，他说长沙正在恢复和重建之中，希望三厅同仁拿出热情来参加这一行动，对灾区人民进行抚慰与帮助。会后，三厅立刻派遣以田汉为首的慰问团前往长沙，漫宣队派席与群随团出发。

§2.9 首次闯桂林

三厅全部人马终于来到了桂林。湘桂铁路沿线是平原，一因新铺路轨，二因挂的车皮特长，车行极慢。三厅驻地在一所中学校里，双层床连成行，一间教室住四五十人。我睡下铺，邻铺是个湖南姑娘带了一个10岁左右的弟弟。他们是美

术工场一位画家的亲戚，在大军撤退中夹带来的难民。带着他们行军虽犯纪律，却是大慈大悲的大好事。长沙大火，不知多少家庭被拆散，姐弟二人能够逃出火场，来到这山明水秀远离前线的桂林，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漫宣队在漓江东岸一个菜农家租到一间房，作为据点。工于是，息于是，食于是，躲警报于是。隔江的桂林市区，敌人几乎天天派飞机来轰炸，这里的山洞是天然防空洞，但却在城外，躲警报要走一、二里路。有的人胆大，不愿跑，谁知这天敌机临空，在市区丢下几颗炸弹，偏偏命中三厅驻地那所中学，音乐家张曙和他的小女儿不幸牺牲。这是三厅成立以来在敌机轰炸下牺牲的第一位烈士，我们为他在漓江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郭沫若代表全厅致悼辞。当时有人说闲话，说张曙不该不跑，跑了便不至于丧生。这等于说，在敌人面前就该跑，不跑是大傻瓜。在战争环境中，看你对这场战争抱什么态度，鼓励逃跑，讽刺牺牲，不是软骨头便是贪生怕死之徒。

张曙之死，反映了抗日阵营里两种不同的战争观。一种是藐视敌人，不怕牺牲的积极态度；一种是害怕敌人，处处躲避的活命哲学。张曙是创作群众歌曲的高手，他的牺牲是音乐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当然非常惋惜。但他的死，对那些混在抗日阵容里贪生怕死的寄生虫，是极有意义的对比。

武汉撤退与长沙大火之后的形势，影响到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我们撤到桂林不久，张乐平所带的分队全体人员，从上饶来到桂林，漫画宣传队内部起了一点风波。这风波反映

了个人对战局的不同观点，其根源在于对抗日战争的基本态度，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当然也有处于中间状态，抱着随大流的态度。经过思想交锋，克服了消极情绪，决定上饶分队仍然回上饶去，桂林本队随三厅撤往重庆，两队人员作了调整。特伟在武汉期间调到广州帮助鲁少飞编《总动员画报》。广州沦陷后回到桂林本队；原在上饶的陶谋基，想回苏州老家去看看，同意他暂离分队，回老家去。

§2.10 奉命调驻香港

这时叶浅予奉三厅之命，调去香港为第七处筹备出版一个对外宣传画刊。因为我曾在上海主编过《时代画报》，熟悉业务，8月间又到过香港督印《日寇暴行实录》，是个老手，所以全权交给我独自出发。漫宣队内部研究之后，决定桂林本队领队一职，交给特伟负责，由他带去重庆。在桂林期间，新加入一个队员廖未林，广西人，是全队最年轻的队员。

敌占广州之后，后方对外通道只剩广州湾赤坎一号出口可通香港，可是最近消息，为保卫广西，通广州湾的公路已经破坏，不通汽车，只能步行。此外另有一条通路，须绕道越南海防港，乘船直达香港。研究结果，考虑到这次还有一个任务是护送两位女客去香港，为安全起见，最可靠的路是走越南。出发前曾试了一下欧亚航空公司的渝港航班，想趁该航班在桂林暂停之际登上飞机去，结果失败，于是决定搭乘广西部队的军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再由龙州搭班车经凭

祥、镇南关，进入越南的同登，然后乘火车取道琼山到河内，由河内转海防，搭海轮去香港。

同行的两位女客，一位是中国旅行剧团的唐若青，一位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唐去香港归国，那演员去香港会亲。唐在桂林时间较久，为广西的国防剧团演过话剧，和广西地方关系较密，我们能够搭上班车，是唐之功劳。

出发之期已靠近农历年关。第一站宿柳州，第二站宿南宁，第三站宿龙州。龙州是广西紧靠越南的要塞，驻有大部队，还有外交办事处。我们在龙州稍事停留，部队为我们办好出国手续，兑换了越币，买好客车票，我们顺利地到达越南境内第一关同登。在同登遇到一件麻烦事。我的衣箱里装有七八张抗日宣传画，是对外刊物要用的资料。越南海关检查行李的官员是法国人，他翻出这些画，通过翻译人员问我这些画是商品吗？我说不是；又问是你自己画的吗？我说是，他说要上税。我说既不是商品，为什么要上税？他说法国法律，凡是艺术品都得上税；考虑到是你自己的作品，税可以减轻些。到底交了多少税，我现在已记不清了，反正不太重，身上带的越币足够付税。后来在越港海轮上，这几幅画几乎又使我出一身冷汗。原来船过广西北海口，一艘日本军舰拦住去路，派兵登船搜查有无军用物资。我怕搜出这几幅抗日宣传画会惹出麻烦，急忙把画取出塞到船舱角落里。手脚刚做完，敌舰的汽艇已经驶离我们的海船，我们的船继续破浪向香港前进，一场虚惊到此结束。

1939年的越南还是法国的殖民地。自从日寇占领广州之

后，我国抗战大后方的外来供应，全靠越南这个通道进出。日寇对越南的压力很大，日舰停在北部湾，主要目的是监视战争物资的出入。通道经过缅甸的仰光。两年以后，1941年初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越南和缅甸都被日寇占领，我们对外的海路也就都被截断了。

且说我们一行在同登上了火车，顺利到达河内，休息了两天。这个法国总督所在地，正沉浸于中国农历新年的气氛之中。我们由一位四川商人作向导，观光市容，发现这儿华侨甚多，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越南人的风俗习惯大多反映出中国的影响，过农历年就是明显的例子。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香港成为孤岛，漫画界的朋友陆续来到香港。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和丁聪从上海来；鲁少飞、黄苗子从广州来；我到香港时，鲁少飞带了家眷正准备随同《新疆日报》新班子出发，绕道越南长征新疆，这是个伟大的计划。据了解，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雄心勃勃，正利用中苏之间这片土地大展宏图。他在蒋介石和斯大林之间拥兵自重，而且利用中共的势力，在政治上另搞一套，这个政治谋略，由盛世才的同乡杜重远为之策划。《新疆日报》招兵买马，邀请大作家茅盾担任主编，在香港置办器材，组织班子，浩浩荡荡开往新疆。鲁少飞一家五日，将在大卡车上颠簸几个星期，我既为他们的安危捏一把汗，又对少飞的雄心壮志表示钦佩。要不是为了拯救祖国，建设新疆，谁愿意抛弃上海那个安乐窝，拖儿带女，餐风宿露，奔往大西北？

我到香港次日，即鲁家出发之时。我赶到码头送别，向

少飞传授走这条路的经验，祝他一路平安。事后知道，盛世才的文化班子，除《新疆日报》一行，还有作家、演员、艺术家。到了1944年，盛世才这个军阀忽然变卦，从极左变到极右，从反蒋变到拥蒋，新班子中重要人物大都遭到厄运，被关进监狱，有的甚至被处死，其中就有中共代表毛泽民。著名演员赵丹在盛世才的监狱里蹲了好几年，直到张治中带兵进驻新疆，盛世才交出军政两权，才把一批吃冤枉官司的爱国志士释放出来。鲁少飞为《新疆日报》工作了几年，因为没有列入盛世才的黑名单，还算平安无事，趁着张治中放人的机会，离开新疆，转到了兰州。

在东南亚颇有影响的《良友》画报准备在香港复刊，老编辑班子马国亮和丁聪从上海来到香港，在中环一家电影院楼上租到一间大写字间。我就在《良友》编辑部放了一张写字台，组织我的《今日中国》编辑班子。第一个坐上写字台的当然是我；第二个是特伟的弟弟盛舜，此人去过一趟延安，不知什么原因又退回到澳门，由特伟介绍给我，迁来香港作我的助手。他是广东人，能说广东话，主要任务是跑印刷厂，兼管钱财；第三个是刘邦保，原在上海沪江大学上学，日寇占领上海，大学停办，刘来到香港，由同学冯亦代介绍给我。刘的父亲是陕西人，母亲是英国人，混血，能说英语，帮我处理有关外文的事务，主要是和《今日中国》第四个成员、外语编辑爱泼斯坦之间联络。爱泼斯坦是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原在上海给外国通讯社和外文报刊写稿，经朋友介绍，特约他为《今日中国》的图片写英文、俄文说明；第五个

是位广东的年轻人，由朋友介绍来当学徒，专任跑腿打杂，人很聪明，与我相处两年，学会了画漫画。

经过一个月筹备，第一期《今日中国》于1939年上半年出版。承担印刷的是原承印《日寇暴行实录》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印刷厂，是香港唯一的一家拥有新式凹版印刷机的厂家。画刊印出后怎么发行？第一批对象是本港和东南亚各地的书店；第二批对象是美洲和欧洲可能联系上的大书商；第三批对象是大后方的书店；第四批对象是政治部的部与厅；第五批对象是赠阅者，包括我国驻外使领馆、各国元首、各国外交机构等。记得各国元首名单中有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苏联的斯大林和英国的邱吉尔。至于这些大人物能否收到《今日中国》那就不得而知了。从1939年到1940年，每月一期，总共出了十二期。画刊的印刷和编辑开支，每月向重庆政治部驻香港的代表“设计委员”成舍我领取。每当领经费时，成舍我总有些政治部的指示传达给我；加上成本人对画刊的内容表示一点意见。综合起来，记得有以下几条：

一、某期画刊封面印了重要抗日将领的头像，其中有冯玉祥、李宗仁、陈诚……诸人，成表示陈诚应占突出地位。二、某期介绍延安木刻艺术，认为不妥。三、某期介绍八路军战绩，认为不妥。四、某期发表游击战士形象，认为不妥。五、某期发表宋氏姐妹在重庆的活动，表示满意。六、要多宣传蒋介石。

这些意见使我明白，成舍我是陈诚所信赖的人。他本来在上海办小型日报《立报》，主编为萨空了。萨于1939年初随

《新疆日报》长征团到了新疆，帮助茅盾主持该报的编务。《立报》在香港复刊，看来其政治后台是蒋介石最亲信的将领陈诚。成舍我于抗日胜利后随陈诚去了台湾。

1939年到1940年在香港两年，政治部通过成舍我对我控制，我感到不是滋味；同时我在三厅的代理人和供稿人席与群，有时也来信转达三厅的意见，大致和成舍我的意见相似，不过加了点“作料”，就是说还得为三厅本身做点宣传。我感到我这个《时代画报》老编辑的头脑已不能适应官场需要，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每次去见成舍我老板，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因而在编完十二期后，我特意到重庆去看看，是否还能把《今日中国》编下去。

1940年夏，我取道广州湾，经广西玉林，在资县和桂平搭拖渡到柳州，然后乘湘桂路火车在桂林打了一转，经贵阳到达重庆。一路上遇到不少从重庆出来的朋友，说局势变了，新四军在安徽被蒋介石包围，损失很大，国共合作被老蒋破坏了，你还来重庆干什么？我明知重庆情况不妙，但总得亲眼看看，辨辨滋味，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关于在重庆的情况，我下一节再写，这里还要说一说在香港办画展的事。

1939年我初到香港时，由于和漫画界老朋友会合，又结识了几位原在香港的漫画家李凡夫、余所亚、郑家镇，大家常在一起饮茶，谈到漫画宣传队在大后方的活动，挑起了在香港组织一次漫画展的想法。我把随身带的几幅宣传布画给大家看，当即一致决定按照这种形式画一批新作，找个人多热闹的地方，以“中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的名义举办一

次抗战漫画展览会。一言为定，每人回去动手就画，不到两星期，作品已陆续交到《今日中国》编辑部，展览地点就定在编辑部楼下电影院大厅里。这次画展规模虽不及1937年南京电影院那次大，参观的人数却多得多。在此期间，适逢《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路过香港，经爱泼斯坦邀请，他与宋庆龄一起参观了我们的画展。

香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纯粹是个工商城市，文化生活单调，除了电影院，就是广东戏，报刊没几家。这个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其经济活动和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上海、武汉、广州沦陷后，香港人口骤然膨胀起来。金山、王莹带领的剧团来这儿演过话剧，其中有名的抗日剧目《放下你的鞭子》和反法西斯剧目《马门教授》一新香港人的耳目。中共在这儿办了个《华商报》，总编是笔名“乔木”的乔冠华；廖承志是延安派在这儿的总头头。国民党的海外部长吴铁城也坐镇香港，代表蒋介石办理对外、对侨事务，黄苗子在他的办事处做秘书工作；《今日中国》能在香港立足，有时也得向他请教。国民党除了这个部门，也还有其他部门和派别的人物在此活动。陈诚的《立报》，老板成舍我是《今日中国》的顶头上司，我得每月和他打交道。此外，戴笠的特务机关也派了人在这儿活动，此人叫王新衡，因偶然的的机会，在港九轮渡上，由一个中央信托局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他。那朋友事后说，认得此人，在某种场合会有作用。此话在此五方杂处的地方也许有一定意义。三年以后此人在重庆起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后面我还要写到。

§2.11 初访重庆

1940年夏初，我经过长途跋涉到了重庆，重庆的政治形势果然大变。蒋介石的政治部已经改组，部长陈诚换成了张治中，三厅厅长、换成了黄少谷；郭沫若的原三厅全副班子换了块招牌，叫做“文化工作委员会”，算是政治部的一个附属单位，被打入冷宫；周恩来的副部长被架空了。《今日中国》主编叶浅予仍归三厅管，得向新厅长汇报工作。如果是老三厅，熟人好说话，这位黄少谷却是初次打交道。我打听到他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后来投靠了蒋介石。新官上任，十分傲慢，从他和我说话的口气就能辨出味道。

问：几时到的重庆？一路辛苦。香港条件怎么样？画刊还能继续办下去吗？

答：欧洲大战发生以来，香港受些影响，画刊发行将遇到困难，但要坚持还是可能的。

问：你是国民党员吗？

答：1927年参加海军政治部工作时，奉命入过党，当年海军政治部撤销，人员解散，就不是了。

问：现在军委政治部已经改组，你又在外面工作，应该重新入党。

答：容我考虑。

问：张治中部长知道你来到重庆，要见见你，同意吗？

答：当然同意。

过了几天，黄安排我向张治中汇报工作，地点在张公馆，时间是晚上。张问了香港情况，表示画刊还要办下去。我表示本人在香港久了，想到东南亚去走走，仍然做我的漫画宣传工作，希望画刊另派别人接编。此话一提，张有点惊讶，马上和黄交换意见，向我表示可以考虑。

三天后，由席与群转达，命我回香港办移交。我当即写信给盛舜，请他准备移交手续，待接任者来接收。辞了《今日中国》的编务，在重庆又住了一段时间，秋末我才买到飞机票直飞香港。

初到重庆，遇到日寇的疲劳轰炸，每天24小时空袭警报不停。敌人的飞机每隔几小时就出动一批，丢下炸弹飞走，如是者持续一星期。重庆整个山城地下是整块岩石，防空洞里倒相当安全，但闹市区有一条长达一里的群众防空洞，可容近万人，由于连续不断的空袭，警报不解除，群众出不来，洞内氧气耗竭，造成一次上千人窒息而死的惨事。我刚到重庆时，寄寓在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次空袭后，他家的房子中弹，我只得搬到沿江的一家小旅馆暂住。几天之后，搬到中国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家，郑家是新建的实砖住宅，除非直接中弹，一般震不坍。但在连续一周的轰炸后，郑家的房子也经不住震动，屋顶厚瓦大部震碎，遇到下雨天，屋里就得撑伞。

敌人占领武汉、广州之后，连同华北一大片，控制了沿海半个中国。统治这一大片几倍于日本本土的土地与人民，不是件容易的事。早在南京沦陷之后，日本就向蒋介石诱降，企图结束战争，结果没有得逞。后来看到蒋介石向新四军开刀，

国共合作的局面出现裂缝，日本又展开诱降手段，一面派人潜入重庆讲条件，一面实施疲劳轰炸，企图压迫蒋政府就范。双管齐下果然奏效，软骨头汪精卫首先上了钩。汪带了他的班底，偷偷溜出重庆，在香港发表反重庆的宣言，响应“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代表国民党向日本求和，接着便到南京走马上任，成立南京傀儡政府，还老着脸皮到日本去觐见天皇，并和满洲国溥仪结成“友好邻邦”，共同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重庆的蒋介石曾经声讨汪精卫是卖国贼，并重新申明抗战救国的决心，这赢得了英美的支持。等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下决心和日本拼一死战，对蒋介石更是要钱给钱，要军火给军火，要飞机给飞机，而且进一步派史迪威在重庆组织美军司令部。据我所知，美军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在于巩固国共合作，所以史迪威也派代表驻在延安，协调延安和重庆的关系。

日本诱降结果虽没有说动蒋介石，可是抓到了汪精卫，分裂了国民党，也算在政治上赢了一着棋，此后的局面，便是全力扶持南京的汪精卫政权，巩固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

§2.12 香港历险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生活的艰苦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

用土纸和墨笔，画成200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在我看来，却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未免有失画家的职责。我把这套画带到香港，首先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引起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画展在半山腰的某教会会堂举行，以《重庆行》作标题，概括全部内容。等到交付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此事搁浅。幸而朋友藏好原稿，后来把它带到桂林，交还给我。

画展之后，我在香港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准备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可能的话，就在东南亚放开我的视野，开拓我的新生活。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即遇日寇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哩峻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劈劈啪啪作响。过了一会，枪声渐远，我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写得这里，忘了说一说那晚和我一起我在树林里躲枪弹的，还有我新结婚的伴侣戴爱莲。这以后，我俩度过了一段惊险艰难的生活。

1939年我和舞蹈家戴爱莲在香港认识，我帮她在半岛酒

店举办了一次舞蹈晚会后不久我们即结了婚。1940年夏初同去重庆，同去见了周恩来，表达我们想去延安的心愿。周说，我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延安大得多，劝我们留在重庆。受此指点，我们打消了去延安的计划。留重庆期间，我们共同尝到了疲劳轰炸的滋味，一天躲几次防空洞，饱一顿，饿一顿，今晚住这儿，明晚不知住哪儿。这样的流浪生活，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乐。爱莲在重庆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为马的三支提琴曲编了三个舞，参加了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周恩来所说的“大有用武之地”，真是说着了，我们怎么不引以为乐！不久爱莲因病先回香港，在玛丽医院动手术。我回香港时把她从医院接出来，我们一同住到沙田，那晚在树林里她同我一起听了一夜的枪声。次日早晨，和我一起躲进树林的那一家农民从家里捧来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请我们尝尝滋味，我们也就不客气，乐得暖暖肚子。谈到这场战争，我自命是老资格，告诉他这是日本人打香港，日本人来了，英国人就得走；我们是大陆来的，是日本人的死对头，我们也得逃，但不知逃到哪里去。老乡说，山上有个山尾村，是我房东的老家，不妨去躲一躲。听了他的话，我马上回新居；房东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你走，他就带我们上山。走到山尾村，才知道山上有田地，有村庄，这是原来想不到的。我们庆幸有了藏身的地方，先住下，再慢慢想办法逃出去。

山村和外界隔绝，香港情况如何，无法知道，心里真急。偏偏日寇的散兵游勇时时光临，搅乱了这世外桃源。看来日寇已在沙田驻扎部队，其士兵一有机会便到穷乡僻壤来搜寻

猎物。他们进了村，看到鸡就捉，看到猪就砍，看到女人就追，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来，完全把山尾村搅乱了。每天清晨，村里的妇女们早早备了干粮，带着孩子，躲到远处老林岩洞里，傍晚才回来；男子在村里应付强盗们。有一天强盗来得特早，妇女们来不及躲避，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被强盗抓住，他们把她拉到树林里发泄兽性，还派同伙在林外放哨，怕村民进去抢人救人。远远听到那女孩喊救命，我们束手无策，一腔怒火只能咬住牙关忍着。房东老人洪道英，是村里的长者，硬着头皮去见日寇驻军头目，请求保护。从那以后，山尾村稍稍安静了些。老人回来说，香港九龙早已被日寇占领，市面逐渐恢复，有的沙田村民已经担菜去市里卖，建议我们夫妇担着菜混进市里去看看。我也想，躲在山里不是长久之计，每天提心吊胆，不如冒一次险，进市里去和朋友们取得联系，也好商量个逃离香港的办法。于是我们下决心离开这与世隔绝的山村。我俩向房东借了衣服、扁担、菜筐，乔装改扮成茶农，和老人的长子，即我在沙田的房东，一同出发，进九龙去卖菜。

12月9日进山，1月8日出山，在山尾村住了一个月。临走之时，心想老人家招待我们住了这么久，总要有点实际表示，向他道谢才对。但身上囊空如洗，光说空话怎么行。爱莲当即取出她仅有的一副耳环、一串项链，送给了老人。

房东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夫妇下得山来，老远看见几个日本骑兵拦住几个担菜的妇女，把菜抢去喂了马。我们立即绕道躲开，走上公路，向九龙方向前进。走不多远，遇到一支

日本后撤陆军。他们一路走，一路拉夫为他们肩负抢来的财物，其中有软件，也有硬件。我们三人走过时，正碰上他们就地休息，于是三人都成了他们现成的猎物。房东先被拉住，其次是我，女的不要。我示意爱莲担菜先走，去远处等我。我察言观色，贼兵是想把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的财物撿给我们代挑，我若真被拉走，不知到何时何地才能放回。我便捧着肚子蹲在地上装病，执意不肯就范，同时示意房东撿下菜筐向前狂奔。贼兵见了，想追又不敢追，只跑几步便折回来。此时突然听到带队的喊官一声哈喝，两个贼兵马上拔脚归队。我趁势溜之大吉，还把房东撿下的菜拉了，双排在肩，赶去和爱莲及房东会会。大家捏着一把汗，直待敌兵走完，才又上路奔向九龙。

房东领我们在他的一家小商号休息，吃过了饭，我便开始寻找熟人。第一家找的是姓黄的画友，他正在家。看我们这副打扮，知道是从乡下来，便问我们沙田情况如何。我把山尾村避难情况说了，问他香港那边怎么样，过得了海吗？他说现在局势开始稳定，港九已恢复交通，而且日军已在下令疏散人口，可以有机会离开香港了。我问他生活如何，他说他能说日本话，在地方治安机关服务，做救济难民和疏散人口的工作。他看我们的狼狈相，建议我们在他家住一晚，换换装，明天再过海去。

这天下午我找机会看了看九龙街头的情况。店铺家家关门，街上布满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可见粮食已很紧张，怪不得敌

人要疏散人口。这晚黄家在骑楼上搭了个临时铺，招待我们夫妇睡了。次早醒来，我问老黄到底给日本人做什么事，他说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不信，今早上班，你跟我去看看。此话正中下怀，我正想要看看日本人怎样统治英国殖民地的中国人。吃早饭时，黄大嫂和老黄咬了一阵耳朵，老黄说：“怕什么，拿出来吃了算啦，明天缺吃的，我会想办法。”原来这位地方维持会第一把手的家庭也缺粮。我对爱莲用英语说：“咱们省着点吃吧。”

早餐后，老黄带我同他去维持会上班。只见围墙里有个广场，看来这儿原是个学校，这广场便是操场。操场上已站了不少人，都是邻近的居民，后面人还在继续进来。几个贼兵散在四周维持秩序，老黄进去，一个贼兵头头和他叽哩咕噜说了一阵日本话，他便招呼人们好好站着听日本人训话。日本官站出来说了几句，老黄接着大声宣布：“港九粮食紧缺，皇军要求大家回老家去，免得在这里饿肚子。过两天港澳轮渡开始复航，大家要懂得皇军一番好意，回去和左邻右舍都说，能走的快点走，千万别耽误啦！”

老黄说完话，又和贼头咕噜了一阵，然后宣布散会，同时向我示意：可以走了。

这天上午我们夫妇二人换上还算体面的服装，一同过了海，找到西环学上台旧居的朋友们，相见之下，有隔世之感。他们以为我们这久没消息，可能在沙田前线牺牲了，现在活着回来，大出意料。我把在九龙和老黄打交道的事说了一遍，他们说此人曾留学日本，在上海是美术“左联”的人，如今日

本人来了，该是他“交鸿运”的机会了。

我到了这里才明白，日寇对香港的突然袭击，是太平洋大战中的一个小小战役。香港自1939年起已经是一个孤岛，日寇占领香港，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大批文化人被困在香港，这个打击却不小。日本当局的疏散政策，对我们是逃脱魔爪的大好机会。我对朋友们表示，只要港澳轮渡开航，我第一个上船，到澳门想办法通过沦陷区回大后方去。当时响应者有徐迟一家三口和盛舜一家两口，加上新近闯来香港的罗寄梅，连我们两口，一共八人。澳门我虽去过，但不熟悉，澳门以后如何行动，心里也没底。好在八人中盛舜住过澳门，他母亲现在还住在澳门，一切全靠他安排了。

港澳之间船行两小时即到。澳门表面上还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已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统治之下，澳门北面的中山县，早被日寇占领，中山的县治所在地石歧，和澳门之间通公路班车。我们从香港来的八个难民，打着回乡的旗号，领到回乡证，买了票，登上了班车。这班车是辆运货大卡车，车尾装行李，货位装旅客，塞得严严实实。上车前，由日寇特务机关把住关口，检查行李和证件。那个特务头子身穿便衣，挺胸凸肚，腰间跨一口日本军刀，威风凛凛。好不容易通过检查站，驶出澳门，进入中山县境，又是一道关口——敌军的岗哨。一个日本兵爬上车来东张西望，看了几眼，便叫放行，我们总算顺利通过。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日寇占领区旅行，成了沦陷区的顺民。近午离开澳门，傍晚到达石歧，在车站被一位旅馆伙计拉去住店。盛舜出面打听去鹤山的路途。鹤

山是贴近西江沦陷区的我军控制区，我们心里把它叫做自由区。盛舜打听到明天即可搭内河小轮去江门，在江门买良民证后可以通过日军岗哨走出沦陷区。我在石歧旅店安顿就绪后，拉了盛舜到街上看看。走到一处十字路口，远远看到一个敌军岗哨，行人走近，必须向日本人鞠躬行礼才能通过。中山沦陷已有三年，老百姓习惯了这种显示占领者威风的霸道行径，各个人彬彬有利地鞠躬如仪，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过。我们看了一会，一股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堵塞胸口，扭转身返回旅店。

第二天一早，在码头上吃了美味的鱼生粥。这儿没有澳门那样的检查站，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很从容地上船。在船上，脑子里闪过一道意念：看来当沦陷区的顺民并不很难，可这想法又被昨晚看到的敌军岗哨的威风打退了。这一水程，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道小河，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江门是这一水程的重要码头，梁启超在新会县的老家就在这江门镇上。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贼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因这船驶在我们轮渡前面，我们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叫人气破肚子，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里，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送人过境是本乡的一个好差使，良民证卖钱，送过境也要收钱。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地作欢

迎状。起初觉得纳闷，后来想起，乡长曾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敌人看到我们这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早已偷偷戴在隔肢窝下，搜查时，两手故意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贼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被抢走了，派克牌钢笔、皮鞋他们也要，女人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括，每人行李都减轻了。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那怕被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括完毕，敌军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由衷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后，前行几十步，人人松了一口气。停下来交换意见，都说目的地离此十来里，在这两不管地区，一怕遇盗，二怕敌人进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人说，遇盗不怕，把剩下物资全部奉送，两手空空，落得轻松。至于敌人进攻，看来可能性不大，想想刚才敌人岗哨上那种抢劫行为，他们哪还想冒生命危险扩大什么战果！这么一说，大家心情突然开朗起来，步子迈大了，嘴上也唱起来。一小时以后来到了鹤山。

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这一带的人从来和港澳有来往，这一传，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便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以及和重庆的关系，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而

且居然下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这个意外的打击，使我们一颗颗爱国心顿时凉了下來。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的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那些人一看我们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接通了重庆，证实我们确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这么一来，我们从阶下囚一下子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爱莲新病初愈，大家怕她走不动，可她体质好，表示挺得住，我们便决定步子放慢，行程拉长。好在敌人已被我们甩得老远，肇庆的关系也已搭上，可以松松劲，慢慢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

肇庆是广东省的一个专区，坐落西江南岸，是出端砚的地方，据说端石矿已经开深到西江江底。逃难途中，无此闲情寻问端砚的出处，倒是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轮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水路上走的轮船叫拖渡，拖渡上能睡管吃。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2.13 桂林喘息

1938年从长沙撤退，第一次到桂林；1940年夏季经广州湾去重庆，途径桂林，住了几天，是第二次；1941年逃出香港又

第三次来到桂林。这次住了一年多。我对桂林颇有好感，第一是山水之美，第二是人物之秀。第一次来时三厅全部人物汇集在此；这一次，欧阳予倩在此创办艺术馆，主要是发扬桂戏艺术，其次是招揽过境文化界人士为广西开展文化艺术事业。我们八人，罗寄梅和徐迟一家在柳州分手，赶赴重庆；我们夫妇和盛舜夫妇来到桂林，住一段时间再作打算。我在丽泽门里一家老宅中租到二楼一间卧室，与艺术馆的钢琴家石嗣芬为邻。不久，爱泼斯坦和爱尔赛巧茉荣这一对患难夫妻也从香港的日本集中营逃出，来到桂林。我招待他们住到堂屋后面一间小房里。我们三家合请了一个厨娘，为我们做饭，小日子过得不错。这期间，从香港走出的朋友陆续来到。两个月以后，香港和广州湾通航，张光宇、张正宇兄弟两家也来到桂林暂住。桂林的人愈聚愈多，这个小城市天天在膨胀，不到半年，形成了南方的经济文化中心。桂林面貌日新月异，漓江上的浮桥改建为走汽车的钢骨水泥大桥，大街上建起了大剧场和电影院，原在上海做地皮建筑生意的工程师也聚到桂林，为繁荣经济大展鸿图。还有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军事因素就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在桂林设立了行营机关，统一指挥南方战场，其主任是桂系元老李济深。他虽是个军人，实际是国民党内代表南方利益的政治派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都曾经是他的部下。李老有时也干预国共磨擦中发生的问题，例如蒋介石下令要逮捕什么人，李老就可以装聋作哑，阳奉阴违，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人们暗地议论：在李老的治下，桂林好像上海的租界，老蒋管不着。

桂林这个因战争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特别在香港沦于敌手之后，其膨胀速度简直惊人。在一次建筑承包商人的宴会上，桂林市长感慨地说：“政治赶不上经济”，向商人表示他的歉意。这是实情，连我这个一头钻在艺术里的书呆子也连连点头。

我1941年春到1942年秋在桂林住了一年半，画了一套《逃出香港》的组画共二十多幅，连同那套《战时重庆》在桂林开了个画展。戴爱莲向桂戏名演员小飞燕学会了一个折子戏《哑子背疯》，开始了向民间民族舞蹈学习的创作道路。1942年夏天，她接受重庆歌剧学校王泊生的聘请，担任该校舞蹈教师，我们于这年秋季离开桂林走向重庆。

在桂林的日子里，有几件事值得一记：

一是和郁风作伴，到柳江运江县的一处农场作客，画了不少速写。

二是作家茅盾发起的一次湘漓源头之游。湖南的湘江和广西的漓江同出一源，在广西兴安分流，湘江向北，漓江向南。这处古老的分流工程，据说和四川的都江堰同时建成，兴安的工程叫灵渠。我们看到满江船从灵渠出发，驶往桂林和阳朔。

三是某银行发起阳朔之游，通过石嗣芬的关系，招待部分文艺界人士。同船者有丁聪、马思聪、叶冈和艺术馆几位音乐家。第一晚途中夜泊，其时皓月当空，引发了音乐家的雅兴，就在江岸摆开场地，马思聪的小提琴奏起《思乡曲》，戴爱莲翩翩起舞，还有声乐家歌唱。次晨在兴评停泊，观赏

漓江最美的自然景色。

四是看了田汉组织的话剧会演。“新中国剧团”和三厅的几个演剧队聚集在桂林，各自演出拿手好戏，记得都北京人(?)《钦差大臣》、《十八天战争》等剧目。这是抗战大后方的一件盛事。

五是漫画家和木刻家合作，编印了一本画集，书名《奎宁君奇遇记》，桂林印刷条件差，没有照相制版设备，漫画家要发表作品，只得和木刻家合作，用木刻刀刻漫画。现在我还留着这一大后方的版本，经过60年代“文化大革命”浩劫，这本画册居然又回到我的手中。

六是戴爱莲和石嗣芬举行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演出在励志社的电影院举行，事先动员好多朋友帮忙推销票，才得抵消全部开支。

七是重庆的救济委员会闻知大批文化人从香港逃出，滞留桂林，特派一位专员动员我们到重庆去，每人发给一笔旅费。我们得以用这笔钱，组成一个江湖卖艺团到了贵阳，由贵阳再转赴重庆。

八是到过一次衡阳，展览了我的《战时重庆》和《逃出香港》两套组画。《战时重庆》中有一幅《暴发户》，讽刺汽车运输商，引起汽车司机的公愤，我险遭殴打，后来他们强迫我卸下了这幅画。我借此机会游了一次南岳衡山。

我们的江湖卖艺团，包括叶浅予、戴爱莲、丁聪、马国霖、林声绪和叶冈，其中有画家、舞蹈家、作曲家、声乐家。到了贵阳，被《中央日报》贵阳版的卜少夫截住，要求我们为

该报劝募滑翔机办一次筹款演出。于是，这副班子暂时搁在贵阳，以我的画展为先导，《战时重庆》和《逃出香港》在此露了脸，然后是音乐舞蹈表演会。卜少夫这个人在南京住久了，不免有点官气，多少还带点江湖的流气。在租用西南运输公司礼堂的过程中，没有和该公司的工作人员打好交道，表演开幕那晚，这批人抢进会场，占领座位并提出条件，要求招待一场。老卜这下抓了瞎，怎么办？官气用不上，只好用江湖流气，拍胸脯答应另演一场招待，对付着度过了难关。在大后方这类看白戏的陋习到处可见，只有以官气和流气交叉运用的办法才能制止。卜少夫最后还是利用官场的压力摆脱了那晚说漏了嘴的招待场。

§2.14 在苗区作画

来贵阳之前，早就计划要到苗家地区实地考察一下苗族妇女的打扮。为什么我对苗族妇女的打扮这么感兴趣？这要回顾到3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上海画过时装设计，并在一家名叫“云裳”的时装店当过设计师，还有一次为一家英国花布进口公司办过一次时装表演会。这是我画漫画之外的又一职业，最后连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也约我画了一套时装设计图。除了一些老朋友，如今谁也不知道我曾经是老牌时装设计家。在贵阳的表演结束以后，我把卖艺团送走，便独自一人访问了花溪、惠水、摆金三处苗乡。采访中心是惠水。惠水县原名走番县，是历史上汉族征服苗族的一个诬蔑性地

名，后来国民党政府借用一条小河的名称把它改为惠水县。

惠水地处贵州高原的西南角，县城逢场，四乡农民便赶来交换农产品，十分热闹，规模也很大，大概就是原始商品交换的遗风。每五日一集，既是城市商人收购农产品的机会，也是农村妇女亮装争艳的好时光。我趁此机会猎取形象。除此之外我也深入农村了解苗家风俗。记得在花溪参加过一次新娘嫁前的歌唱会，晚饭后起唱，一直唱到次日天明新娘起身。歌词内容我听不懂，总的含义是小姐妹们临别赠言，上至天文，下至庄稼，旁及人间，无所不包，都是随感而发，出口成章。我想，古代的诗经、楚辞，以及后来的五言七言诗，怕都和我们老祖宗这类吟唱传统有关。参加了这次歌唱会，想起我1939年在香港参加的那次扫箕湾渔民嫁女歌唱会，其形式是基本相同的。当时我曾怀疑这两个民族是否同一祖先，现在看来，这种习俗我们汉民族祖先也会有的，否则诗经从何处来？

“摆金”这个地名很特别，也许是苗语的谐音。这地方是惠水以东靠近平塘的一处苗乡，要翻山越岭，走三四十里才能到达。我请县卫生院一个苗族学徒陪我访问，那里是他的家乡。在这藏在山沟里的穷乡僻壤中，我见了那位学徒的父母及和他一样年轻的妻子以及抱在怀里的孩子。他家灶间墙根放着一个牛头，墙上挂着一只铜鼓，这两件实物标志苗族古老文化的特征，至于它们所象征的内容，不便多问，即使问，这位苗族小伙怕也答不上来。好在有些民族学者已作过考证，恕我不浪费笔墨了。

这位青年带我们看了一处溶洞，洞底一条流水，洞壁有个台阶，放着几座棺木，和四川山区凿岩为穴的洞葬或岩壁悬棺的风俗有些相似，是否同一来源，不得而知。不过这位青年说，这几座棺木是多少年前乡间某次械斗中丧生者的遗体，因是冤死，不得埋葬。

这里的房屋都是木结构，底层是牛栏猪圈，二楼是主人居室，当中一个火塘，长年烧着炭火，一家人在此进餐，冬季则在此烤火。本乡有个小学，一个贵阳女青年在此当教师，小学生接受的当然是汉文化。老人、妇女一般都是文盲，她们在家说苗语，在集场上都能说汉语。苗乡活动也通用汉语，比不得藏族地区，非有翻译不可。

在苗区住了两个月，白天出门采访画速写，晚间在住处琢磨如何表现苗区生活。首先考虑的是形式问题，还用《战时重庆》那种漫画速写形式吗？尽管那套画已开始运用中国画的笔法，造型仍带有夸张变形的漫画气质，显然不符合我在苗区感觉到的自然而质朴的美。几次尝试，逐渐明白漫画手法已不适用，新的表现方法必须另辟途径，这就是我向中国人物画传统画法追求的开始。1979年我在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写的《漫画与速写——答读者问》那篇文章中追述了这一追求：

1942年我在贵州苗族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正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可是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

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找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来找去，觉得应该下苦功向国画传统中的先辈们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速写是这二者之间的桥梁。以前，我的速写为漫画服务，以后开始为国画服务，这一转变的动力是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我为自己画了一幅讽刺画——我躲在树干后面偷窥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手遮住脸不让我画。

十年漫画创作生活，在我的人生观中孕育了一种“玩世”的思想，在艺术观中形成了一种“丑极即美、美极即丑”的观念。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拯救民族的爱国情感冲跨了这种小市民趣味，毅然走上抗日斗争的大道，促使我的思想境界豁然开阔起来，认识到丑恶的东西固然应该坚决揭露，美好的东西尤其应该大力歌颂。揭露丑恶的笔和歌颂美好的笔固然应有区别，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沟通，互相渗透。这种沟通与渗透，反映在我的苗区速写中，成为美丑杂陈，真伪交错，待到加工为国画创作，便是一锅夹生饭。

§2.15 成了舞蹈教师的家属

访问苗乡结束，从贵阳搭车，二次来到重庆，已是严冬天气，立即积极筹备我的画展。画展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内容除《战时重庆》一百幅，《逃出香港》二十幅，还有苗乡生

活中国画。我把后者这粗制滥造的夹生饭挂出来，是为了显示我的创作道路正在转向，看看能否提供大后方一种新鲜的精神食粮。展出结果，居然卖出了几幅苗区形象画，我不禁暗暗自喜。

作为戴爱莲的家属，我住进了她所工作的歌剧学校。这是一所老式大房子，原先是个什么会馆。大厅很宽敞，搭了个小台，排练、演戏、上课，一台三用。爱莲新开的舞蹈课，作为演员形体训练的基本功，教的是芭蕾舞的基础动作，和戏曲的毯子功起到类似的作用。歌剧学校的前身是山东省立剧校，以训练戏曲演员为主，抗战初期迁来重庆，校长王泊生，文武昆乱（？）都懂得，也有实践经验。他还从山东带来一个京剧团，经常在七星岩一家小剧场演出，演员大都兼任剧校教师。剧校除教戏曲基本功，还教西方的乐理乐谱。戴爱莲来校后，和一位钢琴教师合得来，舞蹈课就请那位钢琴教师弹伴奏。这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施，中西杂陈，新老共用，很像四川饭馆那味“杂烩”。有一次王泊生忽发戏瘾，在那个舞台上演了一场昆曲《贩马记》，的确也让战时陪都的外来戏迷过了瘾，我是个喜欢看戏、画戏的老戏迷，这晚大有收获，我那位芭蕾舞教师当然也大开眼界。

剧校在重庆郊区嘉陵江畔的北碚镇上找到一所新校址，1943年春，迁到北碚上课。王泊生觉得我这个教师家属有一技之长，特地邀我开一门舞台美术基本训练课，教学生素描和写生。我还推荐作家徐迟担任美学课，这么一来，这所学校的课程设施，俨然像一所正规戏剧学院的派头。中国那时

已经有一所国立戏剧学院，校长余上沉，院址原在南京，战时迁到四川江津，专门培养话剧演员。

此时我正处在漫画家向中国画家转变的过程中，忽然要我为学戏的学生上舞台美术课，搞得我头昏脑胀。勉强凑合了一学期即辞去公职，也让王泊生卸了一个包袱。

§2.16 出访中美训练管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美军遭受重大损失，美国随即向日本宣战。日军在进攻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后又进攻缅甸，蒋介石派远征军支援英军抵抗，结果也被日军打败，远征军残部退入印度境内。美军驻重庆司令史迪威借用英军在印度的兰伽军营，收容援缅败退的中国军队，并由蒋介石再抽调部队补充该军，编成两个师，由郑洞国当军长。史迪威派美军军官在兰伽训练这支部队。

这年夏天，爱泼斯坦介绍我和美军总部对外联络处负责人相识，并建议我以“访问记者”名义去印度看看史迪威所办的中美训练营，搜集一点中国军队在美军训练下的形象资料，画一批画。这是符合我意愿的一个任务，趁此机会可以在印度各地走走，看看这唐僧取过经的佛教圣地。当时讲明，交通工具由美军提供，费用由画家自理，访问成果由画家自由处理。交通条件有了，要我自筹在印度的费用咋办？只好和在财政部供职的黄苗子商量。苗子真够朋友，一回答应借给我一千元印币罗比，并为我办好了印度汇票。美军的汽车把我送

到重庆九龙坡机场，搭上美军的交通机送到昆明。此时正是盛夏，在机场烈日下等候去印度的运输机。奇怪，皮肤不发烫，身上不出汗，原来这儿是云贵高原，海拔高，气温低，比之重庆的高温火炉，真有天渊之别。在机场候机两小时，只见美国军用飞机起起落落，如布机穿梭，忙乱不堪。正在凝视之际，听到扩音机喊话，叫“Visiting Correspondent Ye Chien-Yu”的名字，说已排好座位，可搭乘一架运输机去印度边境站，叫我去调度室领乘机证。办好手续，运输机驾驶员领我上了他的飞机。只见机舱里装的全是一袋一袋的钨砂，没想到江西的钨矿砂竟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出口去印度，这种巧遇只有在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才会出现。看来这架飞机从印度运来的是战争物资和武器，运走的是另一种战争物资钨砂，我这个“访问记者”，则是顺便捎带的另一件战争工具。待我进入机舱，驾驶员交给我一具氧气罩，教我如何在必要时带上，然后他进入驾驶舱，飞机起飞。升到高空，飞出云南，我从舷窗俯瞰，下面山峦重叠，一条条南北向的河流夹在其中。不久飞越缅甸北部的高山区，地图上标的名称是野人山。我国援缅部队就是忍受千辛万苦通过野人山进入印度境内的。运输机在印缅边境一处航空转运站降落。这是个秘密基地，周围是印度产菜区。转运站把我安置在一个临时帐篷里过夜，还给我送来晚餐盒子。这时天还未黑，茶园地里还有印度工人在干活。

第二天清晨，美军把我接到机场，搭上另一架运输机飞往加尔各答。升天不久，飞机出了毛病，两个发动机中的一个

冒了火，只靠一个发动机倾斜着下降。好容易在一个机场降落后，马上搭上另一架运输机飞到了加尔各答机场。美军把我送到一家大旅馆休息，告诉我，想要哪天去兰伽，可以和美军驻加尔各答联络处联系。在印度，英语是通用语言，我的英语水平还是在中学里学得的那一点儿，不过日常生活用语还能对付。在大旅馆住了一夜，吃了地道的印度咖哩鸡，到中国银行印度分支支了钞，和驻印领事馆及一家华文报社取得联系，然后打听去兰伽的走法，知道有火车可通，距加市往北只半天路程。打听明白之后，预备在加市住几天。有人建议我搬到一家华侨旅店去住，可以省些钱，也可以吃到中国餐。我当天就从大旅馆搬出来。

这里有个华侨区，旅馆、饭馆、衣店、鞋店、副食店、古玩店，一应俱全。我搬进一家中国旅馆没几天，突然发烧，一连几天高烧不退，饮食无味，服务员说我患的是“热病”。他说初到印度，水土不服，谁都会碰到这个下马威，叫我放心，等烧退就好。此话真灵，五天后烧退，饮食恢复正常，我便又行动起来，立即通知美军联络处，为我准备去兰伽的车票。

兰伽是印度比哈尔邦的一个镇，记不得我是哪天到兰伽的。训练营的对外联络处派车把我送到郑洞国的司令部，郑留我作为他的客人，就住在司令部里，和他的幕僚们一起吃饭。这回吃的是中国饭，使我感到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中国。我在这儿住了两星期，每天由美军联络官陪我到各个练兵点去参观，练兵项目有步兵打靶、炮兵射击、地对空联络、坦克驾驶、兵车驾驶等；还有练枪刺，练拳击，练木马，练单杠。

我们还看了兵营生活，战士在营里打草鞋，我问这是为什么？战士说穿大皮鞋做操练兵怪笨重，打双草鞋穿着舒服。有一次参加战士会餐，上了一道红烧肘子，我觉得不像猪肉，像狗肉，火头军说：“印度农民也喂猪，可是瘦得像野猪，没一点膘。弟兄们要吃猪肉，只得买来先喂着，等它长了膘再杀，可怎么也喂不肥。”

我说：“牛羊肉一样是肉，干吗非吃猪肉不可？”

火头军说：“我们平常吃的全是牛羊肉，今天打牙祭，战士们硬要吃猪肉。你刚从国内来，嘴不馋，我们在这儿一年多，怎么不馋呢！”

战士说：“猪虽瘦，到底是猪，味儿不一样。”

为了表现我国战士在外国受训的生活，我着重突出了打草鞋和吃猪叶子两个题材，画了两幅画，投给加尔各答的华文报。一幅题为《印度的瘦猪害得中国战士常恋祖国之梦》，一幅题为《学打草鞋，好叫双脚从大皮鞋里解放出来》。

此外，以练木马为题材，画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跳过野人山，如天兵下凡，吓坏了缅甸的日本兵。用这幅画祝贺我军某部从印度出发，开始向缅甸反攻。

§2.17 没有火药味的印度

兰伽中国远征军营房周围是印度农民的村庄，农民的孩子时时间到营地来玩耍，我得有机会画了许多农村孩子的形象。兵营附近的兰伽镇，是农民赶集的中心，我也抓住机会

去赶集，收集了比哈尔省不少的村民形象。有一次遇到一个江湖剧团在镇上演戏，我买票进去看，画了印度的戏，那表现形式载歌载舞，情节都是历史故事，和中国的戏曲相近似。我还间到后台去看演员化装，了解他们的生活，这个机会真是难得。

还有一桩值得纪念的事。我打听到印度古代佛教胜地“菩提伽雅”离营地不远，征得郑洞国的同意，要了一辆吉普车，由他的一位师长开车，专程去观光玄奘到过的佛教古迹。在那儿见到几位中国和尚和锡兰和尚，联想到唐代玄奘大法师不也和这些僧人一样，跌坐在佛塔下那块佛脚印大石上，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吗？

在伽雅勾了些速写画稿。1945年寓成都张大千家时，大千在昭觉寺作画，我几次去昭觉寺，方文定慧要我画一幅画，我灵机一动，画了个跌坐在菩提树下的锡兰和尚。解放后，佛教学会的赵朴初说见到了那幅画，要我为他重画一幅，我至今还欠着这笔债。

我在印度的足迹，从极东的缅亚米，横穿印度大陆，到极西的孟买。这中间在加尔各答停留较久，除了北上兰伽专访中国远征军营地，还由朋友作向导，访问了寂乡诗人泰戈尔办的国际大学。这大学附设一所中国学院，由谭平山主持，吴晓铃在这儿当教师。我就住在中国学院，吃到以甜食为主的地道印度餐。碰巧，在这儿遇上泰戈尔的忌辰纪念日，在校师生为诗翁举行纪念节，献鲜花，致悼词，还由女生们手捧鲜花，赤着脚在校园草坪上漫步环行，口念泰翁诗句，使

我沉浸在幽雅肃穆，极富诗意的环境中。我之接触印度的美妙舞姿，也是在国际大学的舞蹈学院教室里开始的。

在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君建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我的画展，其内容为《战时重庆》和《逃出香港》，观众以华人为主，间有印度知识分子。太平洋大战爆发，缅甸失陷以后，日本的海陆军逼近了印度东部边境，加尔各答开始灯火管制，夜间一片漆黑，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大白天却是阳光普照，车水马龙，大街上熙熙攘攘，仍然是一片和平气氛。有时乔林基大街上偶然出现几个美国兵，敏感的印度知识分子不免有所感慨，特别是在我的展览会上看到重庆的战争创伤，他们对我说：

“你们中国人过去由几个帝国统治，现在日本独占；我们印度一直由英国人统治，现在世界大战，美国人钻了进来，变成双重统治了。”

画展中《战时重庆》的作品，加市的一家书店发生兴趣，要求印个画集，当即选了二十二幅，定名为《今日中国》交付出版。两星期后我从孟买回来，画集已经出来了，这个出版周期可算得最快的了，比之我们现在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六年的出版周期，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1983年，我将在印度画的速写画稿编成一本《印度风情》画集，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个画集的“前记”里，我记述了印度来访的一些观感：

（一）劳动人民

踏上印度大陆，最先接触的是农民。他们肩上扛着锄。又

挂着伞，全身赤露，只在小腹处缠一条“T”字形的白布。这地方真热，那柄伞既遮阳又遮雨。妇女赤着上身，用长幅纱丽的末端措在胸前，行动时器物顶在头上，不用手提肩挑。那年印度闹饥荒，农民缺粮，面有饥色，竟有人躺在地下挨饿，不呻吟，不求乞，也许是出于某种信仰，甘愿早日离开这尘世。要是在中国，农民不逃荒就得造反。

（二）知识分子

这种称呼对于印度的读书人或学者来说，也许不很确切。他（她）们的地位肯定居于社会上层，是古老印度文化的继承人，又是现代印度的缔造者，大都是甘地和尼赫鲁的信徒。我访问过诗翁泰戈尔的寂乡学院，他的弟弟、画家阿卜庭特拉那斯接任了学院院长。

（三）集市风光

点心摊儿，糖摊儿，摇着铃儿招呼顾客。三根木棍支个架，搭成个羊肉摊儿，肉卖完了，正在叫卖羊头。在火热的烈日下，顾客右手撑着伞，左手举着小镜，和理发匠合作，凑成个临时理发篷。挑选纱丽裙料的农村妇女，指手画脚，摇头晃脑，和商人讨价还价。卖小零碎的老年妇人，躲在阴凉处等候顾客，有些老资格的商人有自己独占的商亭，不怕烈日晒烤；在大的集市里，也有公家搭的大凉篷，要出租金才可摆摊。集市风光丰采多姿，是搜集形象的好地方。

（四）社会状貌

神牛在加尔各答大街上行走坐卧，行人车辆皆得为它让路，而从事生产的凡牛，却一对对被绑在一起耕地或拉车。大

象在公园里载客散步；驯蛇在街头起舞娱客；孔雀是名贵的珍禽，印度人尊之为国鸟。榕树是热带的特产，一棵老树，垂下枝来落地生根，能占地数亩。双轮人力车是廉价的交通工具。大肚老板，挺腰巡警，苦行老人，翘胡力士，王府管家，缠头侍者，各色人等，很有个性，都可入画。此外，双熊打滚，猩猩吸烟，孟买海滨吸椰露，陋巷屋顶栽花朵，也别有情趣。

（五）戏·乐·舞

在比哈尔邦兰伽镇遇到一个江湖剧团，演的全是历史剧，有说有唱有舞，近似中国舞台上的戏曲。我访寂乡学院时，适逢诗翁泰戈尔忌辰，人们唱诗献舞，散花祝福，如履仙境。印度人喜爱音乐，城市角落或乡镇路口，到处可以听到铿锵的手鼓节拍和手风琴乐曲，从乐曲节拍中引出了低沉悦耳、如泣如诉的歌声。

（六）大吉岭

喜马拉雅山脉的中部有座喀钦姜伽雪峰，它耸立在印度、锡金、尼泊尔三角地带。山下一处名叫大吉岭的避暑胜地，居民主要是尼泊尔人与锡金人，也有中国人在这儿做生意。这儿的居民抬头就能看到那白皑皑的雪峰，这块仙境般的宝地，注定要成为世界游客的乐园。遗憾的是，世界正在大战，岭上冷冷清清，而锡金人和尼泊尔人的佛教庙宇里依然生气勃勃。

（七）俟来芬太

孟买以西，印度洋中有个小岛，全岛是座孤立的石山，印度教徒凿穿这座石山，雕出庙宇殿堂。大殿正中供奉一头三

面的大像，几十个护法菩萨和男女圣徒立在石柱周围，菩萨脚下踏着诛儒，和我国云冈龙门的石窟相似。进门处有石狮守卫。印度宗教石刻，举世闻名，有位英国雕塑家，在孟买办了一所艺术学校，教学生学习西方现代雕刻，他自己却潜心研究印度的古代雕刻艺术，希望从中汲取营养，提高自己的艺术追求。他感慨地说，这个时代，东方人向西方人学习，西方人则认为向东方人学习是反常的现象。我认为西方艺术家已走到尽头，要另找出路，眼睛须转向东方；而东方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于是转向了西方。久而久之，大家恢复了自信，就不至于继续反常了。可是当前有些人则认为这不是反常，是东西文化的交流，交流结果，便会产生世界一体的新文化。

§2.18 幽居重庆北温泉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附近的璧山县开办了一所“社会教育学院”，它附设的一所电化教育训练班则办在嘉陵江畔的北温泉，目的在培养电影从业人员。训练班聘请了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郑君里，音乐家盛家伦，画家冯法授和摄影家冯四知为教师，还把戴爱莲从歌剧学校拉到这所训练班教舞蹈。班里分给戴爱莲一间住房，坐落在北温泉后山的松林新村。我从印度回来，就作为戴老师的家属搬进了爱莲的宿舍。这里是嘉陵江畔的一个风景区，山下有温泉寺，寺旁有一处温泉游泳池，冬天可以在室内温泉池中好水。要是不怕劳累，

登上山顶，有一座纪云寺，可供游目骋怀，环赏四周山水之胜。三里外有一处澄江镇，是个集市，可以买到鱼肉蔬菜。走出松林几十步，在叫做“三花石”的山坡边，一位原在武汉江轮上工作的西餐厨师，带着家眷在此搭了个草棚，开起饭馆，专供训练班师生解馋，同时给单身汉包伙食，可谓大有利于周围住户的生活需求。

爱莲离歌校时，带来四个心爱的学生，两男两女，作为训练班的旁听生，条件是生活自理，自付饭费。四个学生中三个是沦陷区的流亡青年，哪有钱付饭费。爱莲专为此进城找朋友，请他们作为学生的保护人，按月供给饭费。记得冯亦代、黄苗子各负担一人，另一人由我负担。冯、黄二人都在机关工作，有固定收入，我则靠卖稿度日，勉强能供给另一个人吃饭。好在艰苦的日夺过惯了，也自有一种乐趣。

在北温泉的日子，有房住，有饭吃，需要时还可到三花石那家小饭馆吃“煎饼”，到温泉游泳池练练身体；若有朋友来访，则可登山到纪云寺同赏川中大好河山。这一带林木森森，居民极少，但兽类不少。有一次登山，看到一对金钱豹在对面山腰晒太阳，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奇观。山居幽静，正好整理我的印度画稿。拿出去年在贵州苗乡画的那批“夹生饭”，反复推敲，准备在印度画稿中提高一步。战时重庆买不到安徽宣纸。便用夹江竹纸和贵州皮纸代替。这两种纸吸墨吸水性能较差，正好符合我的中国画技术水平。花青、藤黄、朱砂等好颜料不易买到，便拿印度带回的英国水彩颜料代替。至于好墨，重庆市上一家笔墨店还能买到。没有画案，借到邻

居一扇大门板，铺上军毯，算得称心如意了。工具备齐，就看手上的工夫能不能体现新要求。两种纸试用结果，还是贵州皮纸墨韵好，于是专程跑去重庆大梁子街上找纸店，发现只有一家备有最好质量和最大尺寸的皮纸，赶快买了一大卷回来存着。

战争期间，大后方什么用品都缺。重庆陆续办起了一批小工厂，日用品最缺的热水瓶胆可以自制了，铁壳无原料，竹工发明了竹壳，解决了大困难。也有人办起文具厂，供应墨水、三角尺、画笔、练习本、试管、试瓶等。电力不足，我们住乡下，只能用油盏，《战时重庆》那套画中，有一幅画了只大油盏，油盏下坐了个叶浅予正在读书，它表达了我对这件古老灯具的感情。北温泉有座小小的发电站，晚上截住流泉，用以发电，可供此处一部分用户。

幽居几个月，到年底，完成了中美训练营生活报导二十多幅，印度人物画二十多幅。印度人物画以舞蹈形象为主，这是我以后创作舞蹈人物画的开端。训练营的生活报导，仍然带有漫画风格，例如那幅练木马跳过野人山的画，原是加尔各答华文报发表过的一幅漫画，这次把它放大，用中国人物画和山水画结合的方法使它成了漫画和中国画的混血体。又如史迪威日含长烟嘴吸烟，颇具幽默感；另一幅训练营招待蒋纬国的宴会，颇像喜剧电影镜头。这批画被史迪威外联处要了去，说是准备拿到美国去展览，至今无下落。好在我手头还留着几幅废稿，可以作为抗日行踪的纪念品。这两套画于1944年初以“旅印画展”之名在重庆中印学会公开展览过。

展览期间，有人指出中国人物画形象要完整，不宜像山水花鸟那样截边去角。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画内容可变，形式不能变；山水可以有马一角，花卉可以折枝，人物则必须完整无缺，因为他看到有一幅印度舞姬，纱丽裙飞出画外，便认为不妥。当时中国画还没有什么革新画派，人们习惯于欣赏老形式，我的印度人物画已经出奇，衣裙飞出画外，就更加出格了。事隔四十余年，现在绘画新观念风靡一时，几乎把中国画的传统看成历史残渣，我的舞蹈人物画用的是传统线描，反倒成了“保守派”了。

当时那位美术界的权威人物对我作品的评论，我倒是乐意接受的，因为我对中国画传统标准还是个门外汉。我画的苗区人物本来是夹生饭，尽管印度人物画有了一点改进，在内行人看来仍然不太顺眼。艺术欣赏的标准，各有所好，不能强求一致。在这次展览中，另一位美术界的权威人物徐悲鸿却对印度人物画颇为赞许，不仅买了我两幅，后来还约我参加他的教学班子，到国立北平艺专去当教师。

§2.19 进出中美合作所

日寇为打通粤汉铁路线，于1944年进攻长沙、衡阳、桂林，造成湘桂大撤退。这次突如其来的大进攻，说明日寇在太平洋大战中虽然占了大便宜，可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却也大伤脑筋。这时美军已开始反攻，太平洋上展开逐岛争夺，目标指向日本本土。日本为了挽救海上的失利，不惜孤注一掷，

集中陆上兵力，打通粤汉、湘桂二线，巩固其在中国的阵地。想不到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软弱无力，竟然不堪一击，一退再退；退到了贵州边缘。好不容易壮大起来的西南后方中心桂林，狼狈撤守，湘桂路秩序大乱，重庆市上谣传纷起，人心惶惶不安。

此时此刻，美蒋双方正在重庆郊区组织一个秘密行动机关，准备接应美国海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侵华日寇。其中有个“心理战争组”由美国陈军情报组负责，要聘请一个漫画家为他们设计对敌宣传品。美军提出请我担任此职。这样，我又和抗日战争的具体行动挂上钩，这本是我一贯的志愿，于是一拍即合，只等讲待遇、讲条件。不想拦腰杀出个程咬金，那位在香港认识的军统人物王新衡出面和我打交道。他说，中美合作所请我担任漫画设计的事，事先征得军统头子戴笠的同意，并且呈请蒋委员长批准；戴老板非常重视这件事，中美所能够请到你真不易呀，云云。说来说去，好像此事和美军无关，全靠他在出力。我心里明白，要不是美军的的关系，我怎么会为军统效劳呢？我想1938年在武汉三厅时，全厅人员排着队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无非是为了一个抗日；戴笠要见我，要不是为了抗日，我才不理他呢。

某天下午，王新衡陪我到上清寺戴公馆。来之前，就听说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紧靠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果然不错，戴公馆就在这条街上的一座小洋房里。戴笠彬彬有利地接待了我，不是用茶，而是用咖啡招待我。先谈些闲话，谈到俄国革命时，他大讲画家如何为革命战争服务，意思当然是指中国

画家也应该为抗日战争出力。也许他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我就带了队伍参加到抗日阵营中来，到如今已近八年了。最后谈到待遇问题，戴说美军方面主张由美方负担，给美金；他反复解释，认为我是中国人，应该由中国方面发薪金，不过现在物价贵，他们将按照特殊条件给我发薪。到第一个月发薪时，中美所的中方负责人说我是少将待遇，饷银之外，另发生活补助费，加起来等于两个少将的饷银。现在我才明白，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戴上‘少将特务’的高帽子，来历如此。

接见完毕，王新衡送我到黄苗子家，大谈戴老板如何如何接待叶老兄，说他从来未见过戴老板亲自给客人倒咖啡，叶老兄的面子真不小，这个那个说了一大堆，无非要把我捧得晕头转向，好铁着心为他的戴老板在美军面前撑场面。我虽没有晕，可是所谓双重少将待遇的饷银，好像使我脖子上套了根绳，胸口挂着块“中美双料特务”的牌子。

美军司令部得知我已接受中美所的任务，即将进所工作，便由陆军情报部派在重庆的负责人，和中美所美方心理战的人员一起，在重庆举行了一次招待晚宴，宴请叶浅予和中方心理战争组的负责人，表示双方精诚合作，共同对付日本敌人。从此开始，约定两星期一次，我从北温泉到磁器口中美所本部上班，在所里住一星期，和美方人员研究分析前线搜集来的材料，制订漫画创作计划。美方也有个画家，据他自己说参加过好莱坞迪司耐动画制片厂工作。每次这样的会晤，中方派一个翻译参加，我因略有英语水平，有时不带翻译，直

接和美方人员研究工作。从1944年秋到1945年春，我连续工作了半年，画过两套爱国故事连环画，加上些零星宣传画，工作量不算大，来往奔走花费的时间却很多。

在中美所期间，心理战中方派给我两名学过画的青年，请我培养，兼当助手。一个是泰国华侨，一个是福建流亡学生，问其来历，知道是受军队蒙骗招募来的，情绪很不稳定。与他们同时招募来的还有其他青年，这些人进到中美所，要填表入所时才发现这是个特务机关，不愿填表，要求离开，弄得军统头头非常狼狈，最后不得不让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去。这情况是两个助手告诉我的，我问你们怎么样？他们说出去也找不到工作，暂时在此躲一躲，躲过这场战争，再回老家去。

磁器口在重庆郊区嘉陵江畔，歌乐山下，原是军统机关关押高级政治犯的地方，著名的“渣滓洞”和“白公馆”杀人魔窟就在此山沟里。山坡上有座戴公馆，大概是戴笠的别墅。自从开辟中美合作所，山上就建了许多房屋。最大规模的一座房屋是美国海军训练中国特务的营房。中美所有个“行动组”，归美海军指挥，由一些熟练的军统特工人员组成，经常派人潜入日寇占领区去活动，侦察上海沿海一带准备美军登陆的地形。我所作的连环画故事，是根据他们在上海搜集来的敌后爱国故事编成的，“行动组”就把我画好、印好了的宣传品带到敌后去散发。

从1944年秋到1945年春，日寇打通粤汉、湘桂铁路，震动了重庆，中美所的人也在议论纷纷，彼此互问再逃该逃到哪儿去。

有人问：“咱这中美所撤不撤？”

有人答：“撤？别开玩笑！我们应该向前进，送到敌后，进到上海去！”

有人插话：“说的也是。戴老板不是在浙江天目山有座洋房吗？那可能是个好基地。”

有人说：“不！慌什么，敌人还没到贵阳呢！”

有人答：“到贵阳就来不及了。”

在这动乱关头，重庆各民主党派发起了一个争取民主签名运动。凡是有点爱国思想的人，无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态度表示愤慨，纷纷响应号召，签了名。《新华日报》发表了这个名单，叶浅予的名字也在其中，中美所中凡属军统的人，无不表示惊讶。不属军统的，如新招募来的进步学生，以及我这样的客卿，就觉得无所谓。问题的严重性是军统的人把民主运动看作对国民党专政的敌对行动，他们发现我的签名在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那岂不表示我就是国民党的敌人了吗！中美所军统负责人向我责问，我表示，对抗日我愿效劳，对政治我却有个人的理想，这不能勉强！他当即表示，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合作了，你得离开中美合作所。我看到问题相当严重，便去找美方心战头头，要求安全保护，要他保证我顺利离开中美所。在美方挂了号后，我立即进重庆去找那位军统重要人物王新衡，要他保证我马上脱离中美所。这位姓王的讲点江湖义气，保证我能安全离开，但要我介绍一个画家接替工作。我明白这是交换条件，也只得接受，这场交易总算谈成了。不久，我推荐廖冰兄接替了我的工作，

廖比我有心机，一进中美所就直接和美方打交道，军统的人无可奈何。

我和王新衡打好交道后，王向我做了一番反共的政治攻势，说什么共产党的地下人员正在南京和汪精卫勾结，劝我不要相信共产党云云。我装作哼哼哈哈，似信非信，从此和他告别。

§2.20 向张大千学画国画

我走向中国画的心愿愈来愈坚定，步子也愈来愈急促。张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带回来魏唐各代佛教壁画大量摹本在重庆展览，对我有极大吸引力，马上决定去成都向大千学习中国画技法。我先写了信给他，他复信表示欢迎，并同意我就住在他家，以便朝夕相处。我和大千相识在其兄善孖之后，大约是1936年他在南京举行画展时初次交往，1937年在北平，1938年在香港又都有接触。我认为张大千是当前中国画界学识修养和手上功夫比较深的一位画家，我之从漫画转向国画，也是在大千作品的引导之下成熟起来的。这次去成都，另一个因素是戴爱莲于1944年秋脱离电化教育训练班，转到育才学校办舞蹈专修班。她和她的老学生们，为发扬民族舞蹈艺术，组织了一个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研究会，并组成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小组，准备去西北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采集资料，正好和我的成都计划结合起来。以成都为据点，向川西北及西康辐射出去，都很方便。因而我和爱莲先期出发，端午节

前到了成都，在大千家落脚。

大千作画喜欢有人在旁闲谈，客人常来常往，作画不怕干扰；没有客人时，自有学生在旁看画问答。我来之后，因为是朋友，所以并无拘束，连续在他画案旁站了一个多月，学到了不少手上的功夫。比如用笔用墨之法，层层着色之法，重复勾线之法，衬底路染之法，在心领神会之后，用到自己的人物造型中去，获得不少益处。有时我关起门来画我的印度舞蹈人物，请大千指点，大千却反过来借用我的画稿，用他自己的敦煌造型方法，画成大千式的印度舞蹈人物，并且题上字句，说明画稿来源，无疑是对我的鼓励。我在大千家从端午节起一直住到这年8月日本投降。

在此期间，爱莲和华西大学社会系取得联系，知道他们利用暑假，组织师生到川西北甲戎族和羌族地区作社会调查。她征得他们同意，立刻打电报到育才学校，调她的学生彭松赶来成都参加这个调查组。彭松赶到，随组出发，溯温江而上，一直深入到汶川、理县羌族甲戎族地区。这两个民族是藏族的一个支系，生活习惯和语言体系多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保持着藏族的历史遗传。彭松初次出马，记录了不少资料回来，以后在1946年重庆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上演出了《甲戌酒会》和《端公驱鬼》两个节目。

§2.21 难忘的康定之行

在成都庆祝抗战胜利之后，我和爱莲会合摄影家庄学本，

于9月15日首途赴西康，采集藏民的音乐舞蹈资料。在康定住了一个多月，两人收获不小。爱莲将学得的康定锅庄和巴安弦子编成《春游》和《巴安弦子》两个集体舞，在重庆的边疆乐舞大会上演出；我写成了带插图的《打箭炉日记》，在上海《世界晨报》发表。这本日记是我访问西康的观感记录，现在这儿选录几段，用以充实关于抗日行踪的回忆。

9月16日

……约五里，渡过急流湍湍的雅水，回到川康公路。三十里，飞仙关午餐，第一次看见“溜索”渡河的惊险场面。一条直径两寸粗的竹索，扎紧在两岸岩石上，渡河的人自备一个特制的对剖木筒，套在竹索上，用棕绳绑紧，绳的另一头帮在自己腰部，出发时耸身一跃，可以溜过竹索的一半，后半就得使用腕力，抓住竹索，一手倒一手攀缘过去，直达彼岸。当停在中途的时候，身体高悬空中，下面是百尺深潭，很像马戏班里空中飞人的情景，旁观的人都得捏一把汗。我担心以后的路途中是否也得要我们表演一下这种“三上吊”的节目，幸亏庄学本说并不需要，我这才安下心来。

从前读到别人记载这条路上滑竿夫为吸食鸦片大伤脑筋的事，我们所雇的三乘滑竿和一个背子中，果然有个人面有烟容。走不到五里，我的滑竿渐渐落后，我便和滑竿夫们攀谈，知道这条路上每隔五里十里便有大烟馆，好像美国公路上的加油站。这帮两条腿的“汽车”随处可以“加油打气”，方便得很。他们每天在这上面的消耗大概在一二千元之谱。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拿这笔钱吃鱼吃肉，他似乎也羡慕每天打

牙祭的享受，但他们说戒烟是一桩难于登天的事，过不上瘾，就等于汽车断了油，只好在路上抛锚，而断了烟的人，只能躺在路上腐烂。

在我们行进途中，看见一个青年，正蜷缩在一家门槛上发瘾。他一头乱发，一脸烟容，眼光无神，鼻孔流涕，狼狈之状不易形容。古人画鬼用绿色，这个青年的脸色几乎近之。

9月17日

中途，公路断桥两处，我们循着索桥走。同路的还有背茶包的背子，偶然遇到一二辆三匹骡子拉的大板车，也满载茶包。茶叶是藏人的生活必需品，全部靠四川、云南两省供给，茶包便成为康藏和内地经济联系的唯一物品。这里的一切交易都用茶包作计算单位。

在移子地遇见两个从康定徒步走来的美国空军驾驶员，由一个中国同胞陪着。看他们一拐一摆走着的样子，脚上一定起了水泡。一问，原来是飞机失事，这两个美国人在康定那边跳伞着陆，现在送他们回成都基地。

9月18日

公路绕着二郎山走，滑竿要抄近路，斜穿降牛子，可少走二十里，赶到乾海子宿夜。有一帮藏族驮队在山坡上打野露宿，二三十匹马在山上吃草，茶包堆得整整齐齐。一经打听，知道他们长期在两路口与康定之间运条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三，将圆的明月已经挂在高空。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今晚的月亮特别大，特别近，原来自己站在六千尺高的二郎山上。

9月19日

泸定是历史上有名的汉藏交界处，明太祖朱元璋曾立在大渡河东岸，手执宝剑，指着河水一挥，将大渡河以西之地划为化外之邦。泸定桥横在大渡河上，象征汉藏两个民族互相交融的一条纽带。过泸定桥，沿着大渡河向北走，渐渐出现一些简陋的藏式平顶房屋。这里的妇女打扮，也和河东的不同，辫子盘在头上，长袍外系一条围裙，不是藏人汉化，定是汉人藏化。

旅店里住着一位画师，正在埋头画一幅十殿阎王图。我和他互相攀谈起来，他说他是湖北人，十年前在刘湘部下做过事，对山水、人物、花鸟都能来一手，这几年在西康跑跑，生活还过得去。他手上的画是一个道士请他画的，十殿阎王一共十幅，可得八万元。他的收入比我还多，但看他那副穷困的样子，不懂他的生活费用是怎样安排的。等他抬起头来，仔细观察，原来是一脸烟容，话题便转到鸦片上来。他似乎痛感潦倒之苦，我乘势劝他戒烟，他有气无力地说，他能作画，全靠鸦片支持。没有鸦片便没有精神，没有精神便不能作画，不能作画便没有收入，没有收入便不能戒烟；不能戒烟，不如不戒。这位画师和这条路上的滑竿夫同一命运。千千万万的人被锁在这条鸦片锁链上，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把这条锁链融化掉！

9月20日

这一路经过的地方如“瓦斯沟”、“日地”、“柳杨”、“大升航”，尽是些怪地名，后来知道是从羌人或藏人叫的原名译

过来的。“大升航”是一处相当大的坝子，省府利用天然水力资源在这里建设了一个发电厂，供应康定用电。康定的电灯特别亮，据说才用了总电压的四分之一。这几年后方城市没一处不闹电荒，想不到来到这个荒僻地方，还有如此好的物质享受。

9月21日

康定妇女用红缨给结辫，盘在头顶，双耳挂着大耳环，长袍大袖，足登皮靴，处处表现明清两朝混合装束之美。有些妇女负水过市，一条皮带套住胸口，四平八稳，滴水不漏。

9月22日

西康省面积比四川省大，康定以西以北占全省十分之八的藏族地区称为康区；以西昌为中心，东接四川，西南接云南，整个夷族地区称为宁区；雅安附近几县原属四川，称为雅区。抗战期中，西康正式建省，筑成乐西和康青两条公路，南通云南，北通青海，并在西昌设立行营，原来蛮荒之地，一变而成大后方的重镇。康青公路筑成之后从未通过车，目前已成废路，仍靠滑竿、驴马维持交通。

我由康藏贸易公司经理格桑悦希陪同，拜访了原康区明正土司。土司姓贾，是汉王朝册封的本民族封建统治者，早已失势，徒有其名而已。走进贾府大门，院子里搭了个大帐篷，是前几天土司嫁女设宴的地方，可惜我们迟到几天，没能观赏到贵族藏人嫁娶的大场面。我们转弯抹角上了楼，揭开门帘，一个矮胖子正在整理瓶瓶罐罐，大小口袋堆满一桌，原来明正土司还是一位藏医制药师。我的眼光向房间四周一

扫，留下了一个汉藏混合布置的印象。这一家是打箭炉的真正土著。在清末改土归流以前，东起大渡河，西至雅龙江，北至泰宁、道李二县，南呈贡格雪山，这大片土地山河全在明正土司的管辖之下。如今贾家虽是个普通平民，但在藏族心目中，多少还保持着以往的一点特殊身份。

10月7日

西藏政教合一由来已久，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由寺院管理。寺院之外都是芸芸众生，是受治的小民，没有权利享受文化教育。无论贫富，把子弟送进寺院，才可以读书识字念经。虽没规定识字读书是喇嘛的特权，但因寺外没有学校，要读书识字就得当喇嘛，而当了喇嘛，受了教育，通了经典，成了知识分子，就高出俗人一头了。寺院拥有大量土地财产，需要各种人才经营，这种人材，当然取之于本寺的喇嘛。管田地的，管牲口的，管工场的，管采办的，管运输的，管交易的，一概是喇嘛，于是乎除了念经之外，喇嘛还被分配到各个生产单位去，有朝一日升为堪布，总揽全寺大权，那就出人头地，连俗家的事务也得求教于他，伊然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了。从积极方面看，当喇嘛就是为的求一个出身之处。富家子弟当了喇嘛，对于他的家族声势地位，可以相得益彰。

寺院还通行喇嘛私有财产制度。一个喇嘛如果经营得法，很容易积聚财富。他的子侄辈在本院当喇嘛，可以继承他的财产。按寺院规矩，喇嘛死后没有继承人的话，他的财产应归公有。为了继承财产，他们乐于把子弟送进寺院去。一旦

因为环境需要，喇嘛也可以还俗，不像内地寺院，认为还俗是丢脸的事。西康某地，一个土司死了，没有儿子继承官职，地方上的人要他的当喇嘛的老弟出山就任，这位佛教徒就顺从公意，弃僧还俗，当了土司。

格桑悦希在拉萨当过喇嘛，认为喇嘛制度阻碍了康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有此障碍，西康的一切建设计划将成为空谈。要强制改革寺院制度，并非不可能，但是这个制度已经和康藏的生活方式不能分割，若操之过急，可能激起人们的反感。最好从提高喇嘛的品质做起，造成寺院的清高地位，使喇嘛逐渐脱离俗务，专心于宗教事业。另一方面多办学校，普及教育，自然而然减少了制造小喇嘛的机会。等到寺院不问世事，当喇嘛的只管念经拜佛，习净养性，一般利禄之徒自然不愿把子弟送进寺院去了。这是格桑悦希的移风易俗法，不脱佛教徒的消极本色。我虽不以为然，但他是西康人，当然更懂得西康人所愿意接受的一套理论。

10月26日

西康的从政者，为了顺应本地的风俗习惯，多多少少都愿意带点宗教色彩。张代主席家里有经堂；李会办有经堂；刘县长有经堂；武委员是佛教徒；省党部书记长也相信风水巫卜之术；刘主席有四个大经堂，分设在雅安、成都、康定和他的家乡。康定经堂供着一百多尊铜佛，四壁挂满“淌卡”佛画，由两位女喇嘛管理供养。信佛的风气，成为从政者的必要条件，我能够理解。然而，宗教的束缚，毕竟是康区社会走向进步的一大障碍，为了改变西康社会的落后状态，我衷心

希望能够打破这种旧观念。

10月29日

三十多匹牲口的驮队，上午11时齐集康定东关，学本、爱莲和我三个人各骑一马，随带行李四驮，其余牲口都装康藏贸易公司的硼砂和布疋，格桑老太太坐了一乘滑竿，夹在队伍里。管牲口的七个人腰佩短刀，背挂“格乌”（保护神），雄赳赳，气昂昂，散在队伍前后。他们还有一条大狗，在牲口中间穿进穿出，像个押队的。我们和悦希夫妇告别，上了马，随队伍出发。这时，有个叫化子点起一串鞭炮，劈劈啪啪，向我们讨利市钱。这倒是旅行中初次遇到的事，旅程遥远，为了求个平安，落得花几个钱，讨个放鞭送行的欢喜。

按照西康人的习惯，这样的驮队到了宿地，人和牲口要一道在野外露宿。因为有格桑老太太，加上我们几个文弱汉人，驮队特地带了个帐篷，免得我们被风吹雨打。驮队5点半到达瓦斯沟，不进街市，就在一里外折多水边卸货、放牲口、搭帐篷，不到半小时，一切就绪，菜也煮好了，大家围着野灶喝奶茶。这时牲口都已上山吃草，等到暮色渐浓，管牲口的放开嗓子叫起“达、达、追、追”，把牲口唤回来，地上钉了绳索，拴住牲口的前脚，马和骡子就服服贴贴地站着，把胃里的青草倒到嘴里，用牙齿细细磨嚼，然后吞下装进另一个胃囊。三十多匹牲口围着帐篷悄悄地反刍它们的晚餐。我们的晚餐也准备好了，是牛肉和锅魁（一种烧饼），加上酥油茶。

帐篷里格桑老太太睡帆布折叠床，学本、爱莲和我就地铺了毯子，盖上被，睡了。驮队和滑竿伏在外面打野露宿，逐

水草而居的生活从此开始。

10月30日

5时起身，曙光渐露，下弦月还徘徊在山顶上。我们在溪水边洗了脸，刷了牙，又喝了茶。格桑老太太的滑竿和我们三匹牲口先出发，绕了一段山路，通过瓦斯沟市镇，走到大渡河边。对面来了一乘滑竿，滑竿夫和我们打招呼，仔细一瞧，原就是来时抬学本的那个不吸鸦片的陕西人。

两点半到达泸定桥边，牲口过索桥颇费周折。先卸下货箱，将牲口一一强拉过桥，再雇背子把货箱运到对岸。牲口过桥，每一匹要付一百元过桥费。将近天黑，才布置好宿营地。

泸定设立了一个运米的临时机关，凡驮帮经过此地，都实行康定的乌拉劳役制度，强制拉米去康定，一个来回就得四天。我们的牲口刚过完桥，驮帮就被拉去，强迫他服一次劳役。幸亏学本和运米机关的总管相识，人家给了个面子，允许从雅安回来后再当差，否则我们就得在泸定搁浅四天。

拜访泸定县长，打听二郎山上安全问题。县长说那晚抢劫干海子的土匪一共十三人，已抓到九个，这几天正在大规模清乡，山上驻扎了部队，放心上山吧。

11月1日

一夜大风雪，二郎山顶全部变白，我们躲在帐篷里不算太冷。管牲口的人穿起生羊皮袄，睡在露天，现正从雪窝里钻出来。驮队转过山背，路上已经冻冰，马蹄在冰上走，发出铿锵的声音，惊破了静寂世界。这一段路特多小树枯枝，迎风的一面，粘着的雪冻成了冰，真所谓玉树银花晶莹夺目。冰

冻路滑，不敢抄小路，一直沿着公路走，山高雾重。四小时后走出了云雾，却是另一个世界，只见红叶满山，流水温偏。走到两路口，红叶不见了，山是青的，草是绿的，我们已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11月3日

从康定出发，我脚上穿的是藏式“蛮靴”，腰间挎着藏刀；爱莲头上戴的是狐皮藏帽。驮队快到天全时，村子里男女老少一哄而出，看蛮男、蛮妇、蛮狗、蛮马。我们穿过天全大街，好象马戏团过境。

11月4日

今天是骑马的最后一天路程，我们起得特别早，6点45分就离开猴子坡宿营地。将近始阳场时，有父女二人跟在我们马后面走，互相攀谈起来，知他俩是从名山县受雇背货到天全，在天全交了货，现在回家去。他们来回要走五天，代价却不高，除了住店及伙食费，剩下的钱极少，出来的目的，不过是节省家里的粮食而已。那父亲有烟瘾，一到始阳场就钻进了鸦片馆，女儿很结实，一直跟着我们走，对于父亲的嗜好，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快到飞仙关时，父亲过足了瘾追上来了。

这一次四百里长途，骑在马背，宿在帐篷，不但嗅不到鸦片气味，连烟容满面的人也少见。今天路上见到这个吸鸦片的父亲，使我重新想起9月间这条路上滑竿夫的脸相。

11月6日

学本接洽好小包车，今天从雅安出发回成都。小包车虽

然比路局的班车贵五六倍，可是又快又平安，多花点钱也值得。听说前几天在名山附近翻了一辆卡车，死了二十余人。小汽车停在车站上装行李，武装人物送来两条“黄鱼”（私带旅客），要司机带走，司机只能听命。“黄鱼”也是武装人物，攀在车窗外，站在踏板上，御风而行，活像早年军阀座车两旁站着马夫，而坐在后座的我们，等于带了两个保镖的大人物，小包车可以横冲直撞了。

§2.22 归程纪行

我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一个月走访康定的。在康定的时候，原以为重庆的朋友们，乘飞机的乘飞机，搭轮船的搭轮船，早已各走各路，“复员”去了。我还唯恐自己落后，和大家失去联络，所以匆匆忙忙赶回来。岂知重庆一切如旧，朋友们一个也没走成。不过街上多了些上海报纸，买来看看，陡然增添了怀乡的情绪，只得和大家一样平静下来，不去想什么飞机和轮船了。

爱莲回到草街子育才学校，整理她的西康舞蹈资料，准备编排新节目，带着学生演出一次。我在重庆市区借到了朋友的一间房，安下心来，把五十三天康定日记草稿整理加工完毕，并画了插图，以《打箭炉日记》为篇名，交文艺通讯社向报刊发连载文稿。除此之外，希望在离开重庆之前，完成我的《西康记游》画展。我曾在日记的后记中记着这笔账，可始终没有实现。勉强称得上“西康记游”之画的，只是日记所

附的数十幅插图而已。这套画的原稿，可惜已失落在以后的访美期间，找不回来了。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套《画家行脚》丛书，收进了我的《打箭炉日记》并附插图，那插图是从1946年上海《世界晨报》上翻印的。

帮助爱莲筹办“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碰巧康定的格桑悦希来到重庆，表示愿意把旅居重庆的藏族同乡组织起来，参加几个节目，使边疆乐舞会的民族色彩更加浓厚。演出由中国民间舞蹈研究会、中央大学边疆研究会、西藏文化促进会和新疆同乡会联合主办，戴爱莲总指导。演出日期从1946年3月6日起一连三场，地点在青年馆。这次演出首场为重庆市政府招待驻重庆外国使节和其他外宾，这样可以免缴娱乐税，节约演出开支。

音乐舞蹈会结束后，我们开始考虑怎么“复员”的问题。本来打算走长江回上海，顺便领略一下三峡天险的景色。但那时长江客舱早已被政府单位全包了，只有神通特大的人才能谋到一个舱位，我自知无份，因而弃水就陆，决定走公路，先往北，然后往东，到徐州往南，从南京往东到上海。幸而弄到了走川陕路的邮车坐票，穿过三国时诸葛亮伐魏的褒斜道，在宝鸡搭火车，奔西安，然后沿陇海路东进，在徐州换津浦路转沪宁路前往上海。如此舍近就远，虽费时间，可这一路的名胜古迹都看饱了。在西安瞻仰了杨贵妃的华清池，试了试温泉浴；在陕县登上羊角山，俯瞰黄河汤浊；在洛阳走访龙门石窟，在古阳洞里看到了北魏“龙门二十品”原石；在郑州车站见到一座日本侵略军留下的大碉堡，还在其附近看

到拉煤渣的穷苦老百姓；在开封走访了著名的相国寺，并有幸在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部嘉庆版的《十竹斋书画谱》。

上海是我和伙伴们组成漫画宣传队，作了八年长征的抗日出发地，一旦回来，赤手空拳，严重的问题是以后怎么生活？好在手上还有一支画笔，身边还有一叠画稿，年龄是三十九岁，足以开始另一次长征。这次陆路大回转，看到日寇蹂躏后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我手捧速写本，难以下笔。

回到上海，在丁聪家三楼后房“挂单”。丁聪夫妇健在，又见到许多旧友，精力似皆旺盛，没有被日寇暴力压垮，彼此相见，恍如隔世。

在大后方发了国难财的人，有的复员到上海，当上了接收大员，又大发横财；有的人神通广大，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当上接收小员，发个小财。例如，早在抗日前认识的一个姓刘的人，自命为“东北抗日英雄”，在大后方招摇撞骗，混迹官场，复员后居然在上海虹口原日本区接收了几处日本人的房产，办起了“军之友社”。他雇了一批舞女，开起跳舞厅，招待我们几个重庆穷朋友。我们流浪汉别无选择，只能找个不花钱的安身之处。这所房子看来原本是日本人的一家货栈，空空荡荡，无遮无拦，大热天，我们短裤汗衫，拖鞋蒲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痛快了一阵子。

我在这一“避难所”里为爱莲画成几幅舞蹈形象，作为她不久将去美国访问演出时充作广告宣传之用。我自己则把《战时重庆》和《逃出香港》两套画重新装校起来，准备带去美国展览。

现在得交待一下，怎么我会作“美国之行”的打算呢？说来也巧，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为了扩大她对全世界的影响，制订了一个“国际人物交流计划”，邀请有关盟国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到美国参观访问。他们从重庆文艺界中选了三个人作为邀请对象，一个老舍，一个曹禺，一个叶浅予。我提出要和爱莲同行，美方同意，便算决定。我们从陆路由重庆转到南京时，正式和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范朋克夫人取得联系，由她交给我正式邀请文件，当即向外交部申请并取得了出国护照。

逗留上海期间，我们作了必需的出国准备，购置服装行李，整理带出去的画件，等等。在此紧张关头，为了顺应上海友辈的敦促，还为爱莲筹办了一次舞蹈表演会。演出场地定在逸园，爱莲的育才班底还在重庆，光杆一人怎么演出？不用愁，海派朋友们自有办法，第一个支持者是夏衍，他当时公开身份是《世界晨报》主笔；第二个支持者是《世界晨报》的经理冯亦代，他任表演会的经理，总揽前台事务；第三个支持者是黄佐临，他自告奋勇，当舞台监督，总揽后台事务；黄佐临又推荐苦干剧团两位男演员当爱莲的舞伴。临时组成的乐队有指挥李德伦；合唱队里有瞿希贤。吴祖光和丁聪的《清明》编辑部全力支持宣传；欧阳山尊刚从延安来，自告奋勇为演出画海报。这是从抗日大后方搬来上海的第一台新鲜的文艺演出，演出那天，逸园座无虚席，掌声雷动，别提戴爱莲有多高兴了。

第3章 “天堂”开眼记——1946年访美日记

摘抄

在《抗日行踪录》结尾，提到了我曾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访问美国一年，中间穿插一次中美洲英国殖民地特利尼达之行。我是在1946年9月离开上海，1947年10月回国的。

在我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时，那位领事知道我是画漫画的，带着微笑风趣地对我说：“我们美国不是样样都好，你可以不客气地挖我们的疮疤。”回国以后，我于1948年给北平《新民报》画了一套《天堂记》漫画，以我自己作主角，扮演了三十多场美国生活方式。这套画原本打算长期画下去，按照那位领事的意愿，狠挖一下黄金帝国的疮疤。没想到1949年初，故都解放，社会大变，《新民报》停刊，《天堂记》也就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旅美期间，我每天写日记。所记的事，有些是疮疤，有些是美容，有些是悲剧，有些是喜剧。总起来说，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所谓的人间天堂。以前读过别人写的“出国记”、“留洋记”之类文章，恨不得自己也能亲眼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经过8年抗日艰苦生活，也真想有个机会，轻松愉快一个时期。没想到真的苦尽甘来，天赐良机，在“天堂”兜了一圈，大开眼界，在我一生中，也算是一件大事。当然，在80年代的中国青年看来，到一趟外国，有什

么了不起。调查一下同辈的一些朋友，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子女在外国学习或定居，的确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40年代，战后的美国，也和我们一样闹房荒；美国国会有所谓麦卡锡法案，压制共产党，虽没有蒋政权那样凶狠，一般老百姓对“红色”也是颇有戒心的。现在我把亲眼目睹、亲身感受的事，照日记原稿，一一抄来。我想这要比重写一篇，亲切真实得多。

1946年9月2日

爱莲的意思准备8点上船，但昨晚益君谋来电话说，9点联华派车来送我们。10点多司徒慧敏坐了辆吉普车来。他这次和我们同船去美国，以后还要到加拿大清理家产。车开到外滩，路堵塞了，这时离统舱最后上船时间上午11点仅余半小时，我们心里急得很。11点到达公和祥码头，旅客已排成长蛇阵，等待海关检查。许多朋友来送行，史东山和韩仲良为我们拍了一段电影。等到将近1点半才挤上船。秩序之乱，有如逃难。上船后找舱位，挤出一身臭汗，幸亏碰到一位在香港上船的陆君，领我们到“1B”统舱，那是由货舱改装的所谓紧急舱位。原先这条“麦慎将军”号是海军运输船，最近恢复自由运营。船舶只分房舱和统舱两级，房舱住官，统舱住兵。统舱床分四层，上下铺距只二尺光景，全舱要住几百人。舱里那么热，人那么多，如同进了地狱。我心想船公司为什么不肯卖房舱票给我们，也许因为我们不是拿红色官员护照的吧。然而，冯玉祥将军的随员吴组缜以及其他几位水利专家，明明是中国政府指派随冯将军考察水利官员，怎么也睡统舱呢？

船员对中国旅客的歧视非常明显，爱莲买的是“2B”舱

位，舱里住的几乎全是高鼻子西方女人，管理员露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招呼爱莲，气得爱莲搬进了中国人的“3B”舱里去。

4点起锚，统舱开饭，又是长蛇阵。旅客自己搬餐具，吃完送到洗涤柜上去。食堂像个大蒸笼，一片汗臭，侍者一脸凶相，呼么喝六，当旅客是罪犯。中午在码头没有进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汗尽管流，气尽管受，这顿饭还是非吃不可。

上船时，托人买了把躺椅，放在房舱处的甲板上。开船后，船员来清场，把统舱客赶到船头船尾，那儿没有遮阳的篷，太阳那么毒，如何受得了？只好在救生船的余荫下找个藏身之地。全船旅客近二千人，中国人占半数以上，犹太人也不少，没一个人的衣服不是湿透的。

一小时后，出吴淞口，海波万顷，帆影点点，船一直往东走，祖国的海岸远远抛在后面。

9月3日

昨晚在铺上一直淌汗，像洗了一次土耳其浴。

海水蓝得像派克墨水，飞鱼一阵阵从激浪中飞出，作弧形抛物线降落在激浪中。

太阳太强烈，我们将帆布躺椅放到房舱甲板上，又被船员赶走。

下午4时左右，看到海岛一群，据说是琉球群岛。傍晚过长崎海岸。

冯玉祥到统舱来访客，吴组湘告诉我，冯友兰和华罗庚两位教授也搭乘统舱。冯将军看到我们这些局促一隅的统舱

客，写信给船长，希望让我们自由出入房舱甲板，结果当然没有“允如所请”。

上午伙食柜开门，买啤酒的旅客排成长蛇阵，司徒夹在其中，可是将轮到他时，关了门。下午我去排队，买得四瓶啤酒，一条吉士烟。四包巧克力，花了二元二角，找回来的都是银角子，这东西久违了，颇觉新奇。

三餐很丰富，可惜全是罐头货，只有水果是新鲜的。

船上的秩序已较昨天有进步，在甲板上躺了一天，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希望明天能画点速写。

许多旅客搬到甲板上睡，我怕着凉，把躺椅搬进舱里，找到一处风口，美美地睡了一晚。

9月4日

船已偏向东北走，吃饭时候虽然热，但比昨天好多了。近午下了一阵大雨，立刻凉下来。到进晚餐时，不淌汗了。

下午雨过，天空特别晴朗。船头是统舱客的天堂，一堆一堆人，唱的唱，玩的玩，一位四川同胞在弹琵琶，围着一圈人。犹太人占据甲板的一大片，小孩特别多。对于这些失去祖国的漂泊者，前面的一片大陆，将成为他们的极乐世界。中国人学生居多，是到美国去上大学；其次是返美的华侨；外交官和政府派出国的考察官员也不少。像我们夫妇这种“江湖艺人”，恐怕是少数中的极少数。

早晨最动人的景象是犹太人的晨祷。头上顶一个小方匣子，左臂缠一条黑带子，右手捧经，闭起双眼，身靠船沿，前后俯仰，口中喃喃有辞，像小学生背书一般。

午睡醒来，见同舱旅客在穿救生衣。从前在人家的“出洋记”中读到演习救生艇的场面，想来他们是准备上课了。我躺在铺上懒得动。所以没有看到这一幕假戏。

9月5日

船向北走，已过东京湾。甲板风很大，气温突降，可穿毛背心了。女人对气候特别敏感，都披上了大衣。大邮船好像一家大旅馆，爱打扮的女人在此可以大翻行头，表演给人家看，有的人一天要换几次装。外国人特别讲究，有的穿海边短衣裙，不大顺眼。东方女人体格先天弱小，不能和欧美人相比，但有的人偏要模仿西方人的体格，这船上就有，装着假胸，高得和身体不相称；还有一位装着假鼻梁，大概里面出了毛病，鼻梁隆起一块疙瘩，弄巧成拙。

傍晚，远处一群大鱼在海上跳跃，李君说那是海豚，是起雾刮风的先兆。

9月6日

今天晴朗，风不大，船摇得挺凶，好些人晕船。

三餐饭时间挤得太紧，早7点，午12点，晚5点。每顿吃得又丰富，吃剩的食物一桶一桶往海里倒。

好多人买了“麦慎将军”号大照片请同船的人签名，这也许是乘大邮船的传统风俗。

船横渡太平洋，每天在向西半球靠拢，每天时钟要拨快半小时至一小时。那就是说，我们度过的不是24小时，而是23或23小时半。

所有的人无所事事，都觉得无聊，想法子让时间度过去。

统舱里有几处赌局，甲板上到处是“桥”局。晚上前甲板有旅客自己组织的跳舞会，手风琴、吉他、提琴合奏。

一对外国男女拥抱在一张躺椅上，动作热烈，旁若无人。

早晨画了几张速写，精神不振，发觉吃得太多。

9月7日

每天定出时间读余绍家编的《画法要录》，今天读到人物篇《传神要录》，其中以清代沈宗春所着《芥舟学画篇》最得我心。此书对人物画用笔、用墨、用色、章法、气韵，讲得精到之至；他对肖像亦即“传神”画法，有相当科学化的分析。比如说高有突光，低有隙光；面型分为由、甲、田、申、用、白、目、四等八字状。虽系旧说，对我却是初见。从来画论、画史，多以山水为主，论人物较少。以后一定要买到原书，详加研究。

黎东方教授也在船上，明天将在清华同学会上开讲《三国志》。

又有几组同学会开会。医师、护士也有3个临时组织，将开始为同胞旅客服务。

十四、五岁的外国小姑娘，白天还在玩跳绳，晚上嘴唇涂得血红，在甲板上交男朋友。那个装假胸的女人，今天突然胸部平贴下去，常常有同胞男友围绕着她，她却时时用眼色膘向高大粗壮的外国人。

9月8日

明天起要过两个9月9日，后天起算是美洲的日期了。今晚晚餐有鸡，有冰淇淋，是上船以来第一顿好饭。

交谊厅举行舞会，没有乐队，请统舱客中玩乐器的人去奏曲。乐队要求让统舱客自由参加，作为交换条件，为统舱客吐了一口气。

9月9日

睡到10点多起床，决定放弃全部甜味的早餐，空着肚子吃午餐，胃口大开。

“麦滨华友联谊社”是个新组织，本定今日下午4时在前甲板举行“土风舞”表演会，因天雨作罢。晚上请冯玉祥在大舱厅讲“利他哲学”，冯将军近日闹海病，讲的时间很短。

天气渐冷，甲板游荡的人已大减，船头甲板没人敢去。大餐厅突然拥挤起来，晚饭以后如不预先抢占座位，便无地自容。

上午办好了护照行李等登记手续，这是为旧金山海关检查预先布置的。上岸时怎么检查行李，使客人预先有个准备。行李员特别声明，勿向海关人员送礼。

9月9日

过两次9月9日的反应是新鲜的。这第二个9月9日是美洲的时间。

爱莲整天坐“桥”局。船上的旅客除了吃和睡，就是想法子消磨这百无聊赖的时间。每个角落占满了桥局和赌局，读书的人也不少，预备进学校的人正好准备功课。我读完了《画法要录》，今天开始读中国美术史。

再走5天可以到旧金山了。“麦滨华友联谊社”开始为同胞接洽旧金山的住处，贴出布告，征求报名，每人花一角电

报费。另外贴出布告，征求合包公共汽车，从旧金山到芝加哥作一次游览，限15人，主要游览区是黄石公园。司徒和我夫妇决定走洛杉矶好莱坞去华盛顿。

9月10日

今日中秋，中秋无月。

下午到6B舱访张任哲、华罗庚、黎东方，得速写三页，月饼一角。

浪大，船摇得很凶，身体得斜着走，原定在船头举行中秋晚会，又告流产。

船上工人开会，一光头作主席，隔窗听不清他们在讨论什么，旅客担心他们要罢工，首先考虑明天有没有饭吃。

9月11日

发电报给国务院驻旧金山的代表坚更司太太，请她给我们准备住处。

国务院聘请的教授除华罗庚、冯友兰、黎东方之外，还有一位黎天熹。获国务院奖学金的中国学生二十五人中的十八人也在“麦慎将军”号上。

天晴转暖，下午3时演习救火，好多旅客穿上救生衣，我作壁上观。

有一位太太会看手相，许多姑娘听她谈命运，我给她画了个速写像，她回给我一次手相，说我这几年心绪烦恼，到43岁才能澄清。

饭菜愈吃愈乏味，每次吃饭成为例行公事，不得不塞点什么到肚子里去。十分想念祖国的豆腐咸菜，希望旧金山唐

人街能吃到。

贴出布告，要大家猜测本船14日早晨进金门大桥的时间，猜中者可得奖。这也是一种赌博。

晚上参加赌Bingo游戏，一桌子5人，我抛出赌本1元5角，赢得1元5角。

有几位旅客在整理行装，登陆气氛浓起来。

海上数千里，无煤灰，无尘土，陆上无此清福。

9月12日

10日那晚水手工人开会，神经过敏者以为要罢工了。今朝海上厨子侍役工会贴出布告，那晚他们通过了几项严肃的决议，抄录两条：

海上厨子侍役工会9月10日会员会全体通过接纳船上委员会的建议：

(1) 响应美国各工会及民众团体反对美政府以物资接济蒋介石政府助长中国内乱。

(2) 救济香港中华海员工会失业会员。

下午发登陆证，舱里和甲板上的旅客全被船员赶进了餐厅，挤得透不过气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真是一桩麻烦事，世界几时才能变成一家呢？

冯玉祥为我画了一幅苦力图，冯夫人拿了那幅画满船找我，我应该好好为冯将军画一幅画。

9月13日

早晨阳光普照，海面波平如西子湖。十多天来从未见过如此平静的海面，可以象征明天的快乐登陆。

晚饭后气候突变，乌云遮天。社交室将举行舞会，到看到“金门”为止。

个人忙着整行装，我洗了澡，刮了胡子，清出了明天该穿的衣服，早早躺上铺，准备明朝踏上美洲大陆。

船上12天，有吃有睡，有烟吸，只是每天吃罐头，胃口有些败兴，但一想这是在船上，何必苛求。惹人生气的是等级待遇差别，随处都在提醒你统舱客的身份。那个巡查甲板和交谊室的管事，那副铁板面孔，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统舱餐厅伙夫侍役对旅客像对难民罪犯似的一副恶相。希望踏上美洲大陆以后，不这样对待我们。

今晚一个吃醉的美国人，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傲慢地问我：“你是个正经的中国人吗？”

我说：“随你怎么想吧。”

他说：“我丢了一把大剪刀。”

我说：“我倒有把小剪刀。”

他又说了一些醉话，我就不和他斗嘴了。船上高鼻子歧视黄面孔的事太多了，我今晚才身受一次。明天登陆不知会发生什么气人的事。

9月14日

兴奋使人失眠，昨晚整夜睡不着。

8点，海关人员办旅客登记。每人报了一个号码就通过。10点，开始检查护照和入境询问，麻烦来了。既查又问，每人要花5分到10分钟，一千五百人由五个移民局人员执行，坏就坏在不按号码，于是秩序大乱，无论中西旅客，无不怨

气冲天。不通过这一关，无法上岸。挤在人堆里，预测非到晚上9点不能离船。于是灵机一动，向船上职员作毛遂自荐，说明是国务院请的文化使节，侥幸被列入特殊地位，先行通过。下午5点下了船，在货栈里见到接我们的坚更司太太。她在这里从早晨9点等起，招呼国务院有关的客人。见了她便如见了救星。为了领取托运的行李，又在码头等了一个钟头。海关检查行李，为一个朋友托带的一匹绸子付了20美元关税。晚8点，一辆出租汽车把我们夫妇送到毛律司旅馆，这才如释重负，吐了一口大气。

在船上约好司徒慧敏同走，因我抄了近路，使他落到后面。灵机一动，在他的行李上留了个旅馆地址。

毛律司旅馆307号的浴室、地毯、弹簧床给了我们夫妇极大温暖，好像一下子冲进了母亲的怀抱。

美国人常常夸耀美国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今天一整天过关的滋味，使我大开眼界，明白所谓自由和民主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界限的，特别是在美国。对黄面孔的东方人限制更多。在船上等候询问过关那一阵，谁也要后悔不该作这样不愉快的旅行。

西海岸美国海员正在罢工，照例，我们这条船靠岸后，旅客没法登陆。罢工委员会；临时通告码头工人照常工作，等旅客出清后，继续罢工。否则的话，我们也许得在船上搁浅，等候罢工解除，才得上岸。感谢伟大的工人对旅客的同情。

有一位教授拿的是游历护照，海关询问时他却说是被聘来教课的，结果被扣留。中国领事馆在设法营救他。

旅馆斜对面有一家中国餐馆，招牌写着“CHOUP SONY”，我们叫了两盆“杂碎”，原来就是北方饭馆的合菜，豆芽炒肉丝蛋皮丝。那位收钱的中国账房告诉我，要吃真正中国饭，到唐人街去。

9月15日

唐人街离旅馆不远，午晚两餐都在这儿吃。这儿集中了饭馆、伙食店和古董手工艺店；洗衣店散布在全市各区。这唐人街，简直就是小香港，可以使你忘记身在外国。通用语是广东话。

9月16日

昨天旧金山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报社记者都去跑这件新闻了。坚更司太太约我们和记者见面的事告吹了。

9月17日

坚更司太太开车带我们游览了全市。

加利福尼亚的水果，举世闻名。金山橙在上海身价每只六七百元，在这里却是最便宜的水果。蜜瓜甜若广东的木瓜，葡萄大如橄榄，李子大如桃子，西瓜极甜。此外还有柿子、苹果、洋梨。晚饭后样样买齐，回旅馆大嚼。

9月18日

到帝·杨博物馆看艺术品。有中国、日本、波斯、阿拉斯加、印第安等陈列室。第一次看到凡高、马耐、罗梭等印象派画家的原作。

下午到旧金山博物馆，陈列的美术品全是西方现代流派的画。野兽、构成、立体、超现实，应有尽有，可惜时间不够，

未看到毕加索、马蒂斯的画。

9月19日

上午蒂略博物馆的海尔博士、勃通夫人、海勃尔小姐来旅馆看我的画。海勃尔建议我在旧金山开一次画展。我因必须赶去华盛顿，约定以后有机会再来旧金山。

下午画家安东尼奥·司德买耶陪我参观加州美术学校，安东尼奥是这学校的教师。展览室有墨西哥画家地耶哥里维拉的一墙壁画。这所学校是旧金山画风最新的一所，内设摄影、陶瓷、雕塑、字体、工艺图案、装演设计、首饰图案、机械画、广告画、插图、绘画诸部门，教学方法以启发灵感，鼓励创造为主，一反旧学院作风。美国的高速度社会生活方式，使艺术风气走向尖端化，灵感化。工商业的高度发展，促进工商实用美术的高度发展。

11月12日

在洛杉矶好莱坞兜了一转，碰到好莱坞电影城大罢工，只参观了华尔特·迪司耐的动画制片厂。该厂送给我几片赛罗璐原画作为纪念。未见到迪司耐本人。

离洛杉矶，搭火车直奔华盛顿。和国务院接待室的负责人见了面，表示我这个中国客人已经接受邀请来到美国首都。

在大街上见到一家华人开的伙食店，进去和老板交谈了几句。老板见我刚从国内来，把藏在心底的几句话倾吐出来。他认为我们国家“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这是他在美国住久了的观点。其实中国的问题在于封建制度造成“生之者众，食之者亦众”，因而效率不高。

在华盛顿住了四五天，即乘火车到了经济文化中心纽约市。

花了3小时在都市博物馆兜了一圈，细细看了两间中国肖像画室，一间明代，一间清代。清代的画有两幅是郎世宁的。这里收藏的古埃及艺术品极为丰富，一个大厅里排满了木乃伊，如入森罗殿中。

11月13日

左翼漫画家威廉·格罗拔来看我的画，送给我五本他的作品集。我以中国宣纸、水印信笺为报。谈到画家工作态度，彼此同意应该和一切技术工人一样，天天工作。对目下美国现代画派追随法国画风的时髦趋势表示遗憾。我给他画了一张速写，预备寄回国去发表。

凯歇尔夫妇来看画。他们将为我接洽展览会场。

《生活画报》(Life)的Prideaux和摄影师Milli来商量给爱莲拍照的计划。他们请我们在一家叫做赛地司的意大利饭馆吃饭，这里是戏剧界名人常光临的地方，四壁挂满这些人的画像。

11月14日

我在上海主编过几年《时代画报》，最高销数为一万份，对销数高达二百万份的《生活画报》早已心向往之。到纽约的目的之一，便是想看看《生活》的编辑部。我把此意告诉了丢克斯，他立刻为我安排好参观时间，并由他作向导，参观了他们的编辑部。

《时代与生活》大楼在洛克菲勒中心“无线电城”建筑

群之间。《生活》编辑部占了第三十三和三十四两层。总编之下设Weeks, Events, Article, Close up, Photographic Essay, Radio, Transportation, Modern, Living, Movies, Theatres, Sports, Books, Science, Arts, Education, Speaking of Pictures 等十余专题部。各部编辑只管搜集和采访材料,取舍由总编决定。编好的材料先一星期陆续送到芝加哥印刷厂,彩色版先六星期发稿。排版室有十余人工作,各部编辑四五人至十余人不等。排版室划定版样,交回各部限定在划定地位内写说明文字。丢克斯负责戏剧部门编辑,他试写说明文字给我看,写好后用绿色铅笔注明可以删节的文字,给排字工人以伸缩余地。从前我在上海编《时代画报》,取材、排版、写说明,一人包办,必要时还得画插图、写标题,后来发展到增加一个到两个助编,总共才三个人。《生活》编辑部,编辑、摄影、绘图、排版、管理等人,估计当在二三百人之间。

《新群众》(New Masses)是美共机关报,它的美术编辑彼德来看我的画,一直谈到深夜。谈话中得知美国人对共产党是相当害怕的。他讲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故事。有一次她因罢工被警察抓进女监狱,这儿被拘留的多数是卖淫的妓女。她一进去,狱卒一面取笑她,一面安慰她:“不要紧,住几天就可以出去。”她反驳说:“No! I am Red”(不!我是“红”的!)把那狱卒吓得辟易三步,连叫“No! No!”(不!不!)就此讨厌她。看起来,在狱卒眼中,妓女比共产党更高尚些。

目前美国人的心态,对于多要求民主的人,都看作左派、红色、共产党。这几天联合国在纽约开会,报纸上的论调和

闻标题，处处显出美苏之间的敌对态势。有几张报简直把斯大林看作了希特勒。有一套反苏漫画，在各地大报分别刊载，前一月我在洛杉矶见过，这几天又在纽约出现。这次大战以后，美国人的观点，好像除了美国，世界上不该有和她同样强大的国家存在。美国群众的心态是跟着报纸舆论走的。目前报纸正在鼓吹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稍加研究，大概是原子弹的威力，支撑了美国“自大”和“独尊”的心态。

11月15日

莉莲带我们到赫德森河畔的福德油来翁公园去参观一座欧洲15世纪宗教建筑。这是一座名叫克劳色司脱的教堂，是整座建筑从法国买下，拆迁到这儿的，名义上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处分馆。教堂里面陈列着同时期的宗教艺术品。这公园远离市区，幽静得松鼠在路上踏方步，并从游人手里取食。我们暂时忘记了百老汇大街上的喧闹忙碌，这是三星期来最恬静的一个下午。

（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抄家，旅美日记被抄走，红卫兵用断章取义的方法，从日记中截取一段话，载了我一个“咒骂共产党”的罪状。这段话的出处在1946年11月14日所记那个女共产党员的故事。我对美共的遭遇发了一点感想，没料到会移花接木，接到中国共产党身上来。“文革”结束，我获得政治平反，旅美日记原稿发还，可惜已残破不堪。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这部分已经丢失，这一段记事变为空白。

1947年3月2日

中国文化剧团来纽约，今晚在百老汇大街附近的佩来司库剧场演出，我们冒雨去看。节目中有一场京戏《霸王别姬》。演员是上海三四流角色，卖的是虞姬舞剑；另一个节目，洋嗓子唱主曲子，不伦不类。只有那位弹琵琶的演员较有工夫，也挺地道。据说这个剧团1938年来过美国，那时有武生票友周志斌，能演《夜奔》、《雅观楼》等昆曲剧目。我在重庆欣赏过他的表演。

3月3日

国务院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约我对中国演讲9分钟，选定以《美国的漫画》为题。我费了一天时间，写好二千字的讲稿，主要内容认为发展漫画艺术需要民主政治的良好环境。

3月4日

新学院决定4月3日为我开画展，欧鹏小姐下午和我研究细节，4月1日挂画，2日预展。

3月5日

外国报刊协会（Foreign Press Association）邀请戴爱莲在巴比松卜拉加旅馆的音乐厅作地在纽约的初次演出。我为她画的六幅舞装画挂在穿堂里，五百多个座位坐得满满的。我在后台管乔治和却尔斯两位舞伴的服装。8点半开始，10点15分结束，演出了《哑子背疯》、《嘉成酒会》、《青春舞曲》、《坎巴尔汗》、《摇人之鼓》、《快乐的鸟》、《春愉》、《端公驱鬼》八个节目。观众和主人对此大为惊奇，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活泼兴奋的中国舞蹈。今晚最了不起的是司徒慧敏，他为

表演会请到了唐人街的广东乐队为爱莲伴奏，又借到了一个舞狮的大鼓，使《摇人之鼓》大为增色。散场后，主办单位请爱莲和她的班底在巴比松酒吧间吃宵夜。回家时又拉莉莲、却尔斯和他的女友、郑用之、司徒慧敏、万超尘吃菜和第二天宵夜，早晨4点才睡。爱莲第一炮打响，兴奋过度。

3月9日

版画家林华特请我到他家晚餐。他家在赫德森河对岸，饭前参观了他的工作室。他送给我两本他的故事画集《上帝的人》和《昏晕》，前者是早期作品，题材甚佳；木刻技术尚欠成熟；后者以1933年美国的经济恐慌为背景，描写一对少年男女和一个资本家的故事。资本家的刻毒造成这一对男女的悲惨命运。华特是纽约进步艺术家团体领导人之一，我在一次晚会上和他相识。他的木刻故事画集都是印的限定本，印数一千到两千。华特除了创作版画小说，还为著名作家画插图。今晚饱读了他的作品，我也带了国内木刻家的作品给他看，他对古元和荒烟的作品颇为推许。

3月11日

2 时半到国务院的国际广播电台录制演讲稿，在录音片上读了那篇写好的《美国的漫画》讲稿，录完后放给我听，初次广播，还算得体，发音自然，咬字也还准确，头一次信任了自己的国语讲话。前些日子郑用之、司徒慧敏、翁万戈合伙办的“中国电影摄影公司”为我拍了一部画戴爱莲的小影片，我上了镜头，现在又上了电台，不久还要开画展，算得在外国出头露面了吧。

下午6时半参加曾景文的水彩画预展。色彩的对比，光影的对比，人物建筑的对比，创造了水彩画的新境界。他还喜欢在风景画里点缀飞鸟或烟雾，增加了形象的生动性。他用中国毛笔作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有笔有墨的情趣，这是外国水彩画家办不到的。曾景文生于旧金山，在广州受教育，受过中国绘画的熏陶。他在美国画坛已有相当地位。看了曾氏的画，想到自己今后在发展中国画的未来中，应该走什么道路？仅仅接受洋画的色彩和光影吗？所谓批判地接受外来影响，没那么简单。

3月14日

爱莲忙了一整天，预备明晚在勃罗克林音乐厅演出舞蹈。约定李周二君灌制全部音乐伴奏唱片，只灌成《快乐之鸟》、《青春舞曲》、《端公驱鬼》三片，最重要的《哑子背疯》没有灌成。明晚登台怎么办？

3月15日

音乐厅的舞台无前幕。原定下午5点半作一次排练，因事前未得负责人通知，舞台工作人员均未到场，无法排练。租来的两台留声机，发现一台是坏的。开幕前半小时，舞台工作人员才到齐，拉景，搭桥，安电，忙成一团。临时抓人管唱机、管服装，勉强开了场。《哑子背疯》无音乐，准备改为《思乡曲》，乔治竭力反对，于是临时凑成三人乐队——我打锣，乔治打鼓，却尔斯的女朋友打镇（？），取消唱的部分，缩短表演时间。幸亏抓紧时间后台草草排了一下，总算搬上了台。爱莲估计节目太短，又加了个《思乡曲》。

开台前，报告了今晚唱机出毛病的情况，请求观众谅解。第三个节目下来，爱莲右膀忽然吊筋，痛得要哭，化妆间里大家慌成一团，七手八脚为她按摩，并用围巾扎起来。推其原因，可能是换装着了凉。司徒慧敏是公举的舞台监督，在台上招呼搬道具，因为无前幕，得用暗转法换节目。8点15分开始，10点终场。这一场紧张混乱、毛病百出的表演会总算没闹成砸锅或退票，人人都为爱莲捏了一把汗。她当然比谁都紧张，好在她懂得如何做到“放松”，做到随机应变，在台上不慌不乱，冷静自然，没出差错。这场紧张混乱、毛病百出的表演会，究其原因，问题在于我们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养成一种善于钻空子搞突击的习惯。到了美国这样一个安定的社会，一切都得按常规行事，只要稍有疏忽，或安排不当，就得出漏子。得此教训，以后再有什么演出，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安排必须十分周全。话又得说回来，这场演出没有闹成砸锅，全靠我们周围这帮经验丰富，勇于作战的朋友，司徒这位舞台监督是其中最能干又沉着的一个。

3月19日

昨日仿大千笔法画《入藏记》一图失败，今日重作，足足画了六小时。后劲不足，草草完成。用笔太软，用墨太滞，大千见之，将笑煞。

7点参加画家威廉·司密士的鸡尾酒会。

9点参加美国画家同盟的会员大会。他们讨论会务，议决征集新会员一百人，入会费二元（有主张增到五元的，有主张不交入会费的，结果照原议二元通过）。常务秘书报告“五

一”劳动节准备工作，征求义务作海报宣传画的人，即有人响应。今晚的会使我想起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的半月会议，不同者他们人数多，我们少，开会租用会场则一样。ALA 也是一个穷团体，有会员二百人，租不起大会所，今晚租用的是另一个团体会所。他们的会员大会每月一次，理事会每周一次。今晚会长洛克威尔肯特未到，副会长林华特和唐柯尔内在座。会议结束，由林华特介绍我和大家见面，我报告了中国漫画家近况，会后喝啤酒。

4月1日

后天将在新学院举行叶浅予画展，明天下午是预展。今天下午司徒慧敏帮我挂画。主要内容是《战时重庆》组画和《逃出香港》部分作品，此外还有几幅中国人物画小品。主办单位是“东方与西方协会”，新学院和我自己发出了几百张请帖，不知来客成数到底如何。挂画之际，新学院一位职员想买我的白描小品，嫌定价太贵，希望能在展品之外卖张便宜的给他。本次画展定价最低四十元，最高二百元，照美国市场看，这是很便宜的。

4月2日

晨起大雨，下午预展，老天开我玩笑。

2点半到了会场，爱莲和我把四十幅画的标题贴上。窗外雨下得很大，新学院给我帮忙的人个个为我着急，说他们请了好些报社编辑和批评家，下这场雨，人们怕难得来了。3点半第一个到的是南美女画家德伽尼雷，她半年前在这儿开过画展；却尔斯开拉给我带来2月间A·L·A欢迎会的照片；老

舍来得也早；爱莲的姨母金夫人带了个朋友来；作家布尔白克（赛珍珠）和东方与西方协会秘书爱德儿曼夫人同来。爱莲、我、布尔白克和新学院院长布林·爱·豪特一起照了一张纪念相。用之带了四川夏氏三姐妹；冯若斯和几个朋友同来；威廉·司密士也冒雨赶来；纽约的几个熟人差不多都来了。爱莲给客人沏茶，从3点到5点半，陆陆续续来了将近一百五十人。下这么大雨，这么多人到场，新学院的人都向我道贺。据说卖出了三幅画，会场开支有着落了。

M·P·的记者向布尔白克建议把重庆生活和香港受难两部分画在M·P·发表。曾景文最后赶到，说要给我介绍《纽约客》编者见面。两个半小时的紧张场面过去，走出新学院大门，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纽约的个展总算开出来了。美国人过去只看得见山水花鸟或古装仕女之类中国画，我把现代中国生活的一角，通过新绘画形式，公开在纽约展览，偿了几年来的一大心愿。

4月3日

已经买好4月5日的飞机票，准备去美国西北角的蒙塔那作旅行表演。此事是布尔白克的东方与西方协会布置的。昨天在展览会场，她告诉我说蒙塔那方面的负责人忽然失踪，要我等她的消息再准备行装。下午消息来了，说蒙塔那的那个人是个大骗子。这次合同原定在蒙塔那举行演讲表演十五场，消息和宣传已在那儿的报上公开。此人大概美美地骗了蒙塔那人一笔钱来举办此事。前两天布尔白克有数事要和此人作最后决定，忽然失去联络。今天她才发现此人在蒙塔那

没有历史，他到那儿利用作家布尔白克的声誉，专和上流社会交际，组织了几个乡邻总会，蒙骗了蒙塔那人。此人在纽约拜访了布尔白克，商定用东方与西方协会名义介绍中国文化的节目，回到蒙塔那吹牛，借此筹集了一笔经费。目的既达，前两天突告失踪。这故事颇像俄国果戈里小说《死魂灵》中的乞乞可夫其人。布尔白克虽然只花了些电讯费用，可是受了骗，精神打击不算小。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相当复杂，有人组织社会团体办点文化活动，也有人利用此等组织达到个人目的。我们在这次骗局中当了一个配角，算得在美国的一次反面教训。事后知道，这次旅行表演合同，爱莲可得一千元酬金，这笔钱正好用作去特里尼达探亲的旅费。既然落空，就得另想别法了。

4月6日

在China House 听孙裕德的琵琶和国乐队的演奏，相当满意。听完，去中央公园兜了一转。春已深，但树梢尚未发芽，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的弄情姿态，春意甚浓。

今天是美国人的东方星期日。5号爱文义路上女人穿得万紫千红，头上帽子花样百出，帽上插满了花，远看像头上顶着个花瓶。

杨刚和陈梦家夫妇来看我们，梦家从前常写诗，在《新月》发表，目前在芝加哥某大学讲语言学。来看我们之前，向杨刚打听我们是京派还是海派。打了八年仗，此种偏见还存在，看来此人自以为是京派。

4月7日

在14街坐高架电车去曼哈顿南端渡口。过唐人街，电车钻进华尔街一带的摩天大楼区。我特地在车头找到个坐位，欣赏这纽约的奇景。这一带是曼哈顿下城区，旧街道弯弯曲曲，电车在楼群夹缝中穿来穿去，百来层高的摩天楼活像黄山的奇峰怪石，壁立周围，中间夹着几处小车站，正像黄山的几处破庙。钢轨曲成流线型，闪着亮光，又访佛桂林山水中的一条漓江。打算过一天再在这地区走一趟，画点速写，表现纽约的人造山水风景。

4月8日

大好太阳，和爱莲坐高架车到布隆克斯动物园逛了一小时。第一次看熊猫的真模样，这儿叫潘大（Panda）。看见一群孔雀，其中有几只全身白毛，所谓白孔雀者是也。又听到狮子吼，因时间太晚，不能畅游，匆匆出园，乘地下铁回寓。

4月11日

在唐人街买了几支好画笔，一锭四两重的旧墨，大为高兴。司徒带我到他堂兄弟经营的华生鸡栏去买活鸡，不期遇到战前南京新街口大华电影院的司徒经理。他说大华在战时被火烧了，后来汉奸和日本人把它重修起来。我去年经过南京时曾进去看了场电影。还记得1937年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到南京，经过两星期突击，借大华开成了首次抗战漫画展。司徒经理那时还在南京，很帮了大忙，现在他当了华生鸡栏的账房，布衣粗服，和电影院经理大不一样了。这里市场买鸡，都是冷藏库供应的，味道不鲜，饭馆卖的鲜味全靠活杀的鸡鸭。司徒说意大利人和中国人开的饭馆全用活鸡，华生鸡栏

由专人到农场和农户搜购活鸡供应饭馆。纽约的中国饭馆据说有一千左右。

4月12日

爱泼斯坦夫妇陪我到爱克登岛中部一处美国独立战争的纪念地，这一带有几座古建筑。一所法庭，是英国人刚到纽约时的建筑；一所大屋，是荷兰人留下的最老建筑；一所教堂，是为纪念独立战争死难烈士建筑的，围着教堂的墓地，散散乱乱的石碑上刻明白都是18世纪年间长眠的人物。教堂前面，一弯流水，一株衰柳，飘着嫩绿枝条，林间有鸟唱。我们在坟场草地躺了一回，在阳光暖照下仿佛看见欧洲人到这里开辟新世界的情景，同时又仿佛回到中国小桥流水和古寺寒林的境界，决不相信这里竟和高速度现代文明的繁华世界曼哈顿近在咫尺。玩赏久之，夕阳将坠，沿着公路穿过高尔夫球场，又穿过几处农场，在一家养鸡场买了一打鲜蛋。这家农场主妇的两个儿子驾着拖拉机在耕地，场上堆满了破木箱、破汽车，呈现一片荒凉景象。再往前走，夕阳已下沉，天空中几架私人小飞机尚在翱翔，度那最后几分钟的周末空游。走到西海岸已经天黑，搭公共汽车到渡口，回到寓所已经9点多了。今日之游，无意中看到美国农村的一角，看到美国历史的一角。

4月13日

从杨刚那里借到张恨水的《八十一梦》，读得津津有味。文艺界认为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最后一人，其标志是他的成名作《啼笑姻缘》。此公在八年抗战中从鸳鸯蝴蝶思想

中解放出来，他的最后杰作《八十一梦》获得书评界的隆誉。今天读到，使我温习了一番暂别的祖国现实。

晚上初次看美国的乐剧《Fini's Rainbow》主题是讽刺顽固的白人歧视黑人的美国现实问题。女主角噪音甚怪，并不悦耳，美国观众似颇满意。其中一哑女舞蹈甚佳，爱莲认为是她所看到的纽约最好的现代派舞蹈家，此人是美国现代舞大师玛莎·葛兰姆的学生。

4月19日

国内半官方的农民教育影片公司，前三个月派万超尘来美考察卡通，最近又派夏同光来考察装置美术，今晚二人同来看我。老夏是北温泉松林山村的邻居，我们一起回忆北温泉时代的浪漫生活。那时我刚从印度回来，爱莲在电化教育系教舞蹈，盛家伦、舒强、郑君里、史东山、冯法很、特伟、冰兄朝夕过从。缙云寺的六朝石刻，夏溪口赶场打牙祭，嘉陵江上的民听轮，北碚的烤白薯，二岩的煤矿工人，松林画会的画展，电化教育系的演剧，油盏和洋蜡的气味，米猪牌的香烟等等，都富于历史意义。张光宇从桂林逃难来四川，在北温泉公园租到一个亭子，安了家，生产出《西游漫记》那一套富于讽刺意味的漫画。

4月20日

参加华侨农馆联合会十四周年纪念会。此会在美国经济恐慌年代，受外籍洗衣馆的压迫，团结、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接着一个衣联职员站起来说，衣联会曾经受过人家的收

买，也曾经受过人家的分化，被收买的买走了，被分化的分出去了，但还是消灭不了我们。讲后满堂鼓掌。叙餐中间插入一位黑女歌者，用英语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家用中文和之。

这样的集会在国内是开不成的。他们会所里挂着宋庆龄和董必武的大照片。我很羡慕他们有这种自由集会的权利，也钦佩他们那种天真、老实、诚恳的心肠。

4月25日

画展延期，今天最后一天。欧鹏夫人给我开鸡尾酒会，招人买画。图案设计家亨利·地休买了我三幅画，请我和欧鹏夫人吃晚饭，饭后到欧鹏夫人家夜饮。亨利嗜酒，酒后大谈其从穷画家到设计家的经历。他说美国人的生哲学是“金钱万能”，每人坐办公厅，听电话，谈生意经，莫名其妙地追求钱！钱！钱！你一旦得法，自然会有人来捧你，推你，拉你，事业愈推愈大，钱愈滚愈多，到时候欲罢不能。他说在格林威治当穷画家的时候，倒很快活，但时势所逼，不甘心老过穷日子，于是钻进了商业美术圈子，画过卡通，作过笑料人（Gag man），后来又钻进舞台圈子做设计工作，无往不利。现在有一幢房子在长岛海边，有看门的、做饭的。照他的酒态看来，似乎牢骚满腹，并不满意现在的生活。

1943年在印度兰伽中美训练营相识的美国画家劳埃司盖脱，今天来看我的画展。事隔4年，居然在纽约又见面，真是天涯若比邻啊。

5月4日

卡内琪堂是纽约的音乐活动中心。今天冬季花园放映一

部影片，以卡内琪音乐节目为内容，穿插一个音乐青年的故事。全世界顶儿尖儿的男高音、男中音、女高音、钢琴家、提琴家，指挥家，聚集一片，听得我陶然欲醉。还看到利翁普尔司岛考夫斯基的指挥。只见他的手在舞，爱莲说，看了他的指挥，证明舞蹈可以指挥乐队。

《纽约时报》杂志内按尼尔潘福写的一篇《中国特写》，指出中国政府以赤化危机威胁美国政府，警告美国外交政策不要上中国政府的当。他主张美国军队以及一切军事指导训练人员立即退出中国。《纽约时报》对中国内情看得相当清楚。这两天华北共产党胜利的消息，证明美国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完全是一种浪费。潘福的文章发表得正是时候。

5月7日

爱眉舍弗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过，现正住在纽约。看过她几次，只知她能写文章，但没读过她写的书。最近她的朋友告诉我，她正在替一个富翁代写一本书。久已听说美国有所谓Ghost Writer，按中文直译，应该叫做“鬼魂作家”，原来爱眉就是给人代笔写书的鬼魂作家。

5月18日

纽约鸽子满街飞，和在国内见到的麻雀一般，不足为奇。用之约我们今早开车去匹克涅克，天不做美，下起雨来。推开窗子看看天色是否有晴的希望，发现一对鸽子在下一层阳台上做窝，雌的伏在窝里孵蛋，雄的在踏方步。三五只，七八只，一群群鸽子穿来穿去，忽而飞到屋顶，忽而飞到对街窗沿上，也有一对对追来追去，飞着求爱的。纽约人正在闲房荒，

鸽子们随便在屋檐下找个空隙，堆上一些草，便成了家。今天在呼号街住得不合适，明天便飞到华尔街筑个新居。纽约时报广场是纽约最热闹的地区，那座铜像下面老是有一群鸽子在觅食。第5号大街是纽约最阔气的购物中心，有一天我看见一只鸽子在贵妇人的腿林中踏方步，可算得个美景。在这个生产机械化，生活高速度，神经尖锐化的繁华城市里，最闲逸、最潇洒的要算这群天之骄子了。

匹克汉克去不成，用之请我们到他家吃回锅肉。这顿饭到下午3点才吃成。饭后天晴，开车到对河新泽西的一个游乐场去玩。此游乐场和洛杉矶的长滩游乐场相似，特色是有多处变相的赌场，人围得满满的。此处只在夏季营业，游泳池尚未开放；晚上有音乐可供跳舞。坐飞机，骑木马，开电车，玩意儿多到十余种。这是青年人和孩子们的乐园。在电影上常见一对新相识的青年男女到这样的游乐场享受半天兴奋狂欢的时间，感情冲动，紧抱狂吻，尝了初恋的滋味；倦极之后，一杯冰淇淋，一只“热狗”（Hot Dog），痛快之至。我们在这儿兜了一圈，不过看看众人之乐以为乐，自己已没有那份劲儿在人堆里坐飞机开电车了。傍晚雷雨交加，在一家点心店屋檐下躲雨，半小时后雨停。我们来时汽车走华盛顿桥，归时汽车乘125街的轮渡过河。

5月19日

写打箭炉画稿说明，成十二图。这部画稿是去年春天在重庆画成的，原只打算作为日记的插图，这回要以画为主，文字为副，作为一本画集出版，定名为《画里东藏》，感到不够

份量。这两天写说明文字时，愈写愈觉得有重画的必要。发现自己作品的缺陷，既是苦恼，又是快慰。

5月21日

新认识的朋友威尔史岛脱夫妇带我们到范加特夜总会去。这个小夜总会在格林威治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除一个酒吧、一个乐台之外，排了一百二十人的座位，剩下供跳舞的地方不到10平米。这大概是纽约最小的一家夜总会，地处格林威治穷画家活动并集居地区，便成了穷汉穷婆买醉的中心。墙上有超现实壁画：一匹马在弹钢琴，一个裸女人在饮酒。10点半有一次表演节目，第一折是三个黑人的疯扭乐曲；第二折是一个半黑女人唱阴阳怪气的打油歌；第三折是完全不同格调的美国古老民歌。主人替我们每人要了一杯叫作“普兰德司愤趣”的混合酒，酒杯上浮着一层冰屑，一粒樱桃，半片广柑，样子好看，味道酸、甜、冷。至于跳舞，那么挤，醉翁之意不在舞，而在挤与抱。

爱莲劝驾，我们两人在人堆里挤了一阵。全部座上客，约五六十人之话，一对对作着种种亲密姿态，灯光暗淡，气氛神秘。每人面前虽然有一杯酒，可是谁也不敢尽量喝，一是怕花钱多，二是怕喝醉了出洋相吧？一个特别的感觉是：在这本不该拘谨的地方，彼此靠得那么近，却感到那么远。这个名为夜总会的地方，既不能忘人，又不能忘我，我还是喜欢我老家的小酒店或小舞场，比这自然痛快多了。夜总会总算见识过，比想像的气氛有距离。

5月22日

写了一天打箭炉画稿说明，愈写愈穷，因叹文字修养太差，更叹那次旅行所留印象不够深刻。

翻翻中国地图册，读读各省地势、人文、物产、交通的说明，发现吉林省有以渔猎为生、身穿鱼皮的瓦尔喀人，这倒是个新鲜的采访研究项目。瓦尔喀族在东北俗称“鱼皮达子”，可能是满族的一个支系。准备到自然博物馆去看看，有没有瓦尔喀人的实物资料。

5月23日

在自然博物馆消磨了3小时，“鱼皮达子”的材料未找到，找到了西伯利亚土著民族吉尔雅克、哥尔特、爱纽等的生活资料。这些人也是穿鱼皮的，瓦尔喀可能和他们是同一民族的支系，分布在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的下游。

在中国部分陈列室里发现17世纪清代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宗教宣传画，基本上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但接受了中世纪欧洲绘画的阴阳法。其中两幅基督故事画，木刻水印墨底，手工上色，风格和现存的木板门神年画相似。另一幅手画的标题为“天堂之路”、“地狱之路”的劝世图，反映了当时天主教排挤佛道二教的宣传手段，图中有“天堂之路”三十条，“地狱之路”三十条，以六十组人物故事挤在一幅画上。摘录天堂、地狱之路各七条如下：

天堂之路地狱之路8、领教入洗（一婴儿受洗礼）40、烧香拜佛（反佛）9、罗马教皇41、和尚道士（反佛道）11、圣贤帝王（颂欧洲皇室）42、尼姑仙女（反佛道）14、甘贫乞丐（拾孔门余唾）55、妄信相面（反迷信）15、洁净贞女（迎合旧礼

教) 56. 择日算命(反迷信) 16. 守节寡妇(迎合旧礼教) 57. 测字起课(反迷信) 19. 民之父母(画一县令) 58. 江湖卖拳(反武术)

5月24日

却尔斯开勒将于29日赴波士顿结婚,今天他的朋友为他举行“派对”庆贺。所发请柬声明此会纯为寻乐,不谈政治,凡画家必须带作品一件方准入场,非画家则须供给酒类。地址为司丹勃鸽画室,时间自下午3时起,非至兴尽不散,来时宜渴宜旱,以迟退并湿透为豪;“湿透”者烂醉也。此请柬颇为别致,是以反映格林威治村艺术家生活之一角。我和爱莲去时因无现成的画可送,临时买了一瓶威士忌,一瓶葡萄酒,十五只广东老婆饼。老婆饼是昨日在唐人街偶然发现的,到时一抢而光。

5月27日

美国艺术同盟是美国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从昨天起在纽约举行年会,学术讨论三天。该会机关刊物《艺术杂志》(Magazine of Art)编者毛尔斯寄给我一份节目单,知道今明两天有两场学术会议,特地起了个早,赶到大都会博物馆去参加。

上午一场的中心题目是“艺术与犹内司库”(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发言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侯尔纯爱德曼,讲题为《艺术与文明》;第二个发言者为国务院参加犹内司库的代表哈伐特爱内森。他说,“文化合作对建立世界和平的作用很大,这个联合国机构应该好好运用”。犹内

司库美国代表亨利·泡脱罗前夫人的讲题是“巴黎的第一次犹内司库会议”；第四个发言者画家亨利别林司缺席；第五个发言者是旧金山艺术博物馆监督毛来夫人，我在旧金山见过，开会前和她打了招呼，她的讲题是“犹内司库的任务、要求和希望”。讲完，本来预定举行问答，后因时间过长，宣布散会。

下午第二场会议中心议题是“劳工、商业、工业与艺术”，是生动的题目，也正与美国工商美术发达的现状相适应。第一个发言者是密歇根大学美术助教，讲述美术与劳工、工商业因缘的发生及其关系。这是工业革命以后社会发生变化才产生的问题；第二个发言，本应该是惠田曲来卜公司美术指导，未到，改由另一广告画家代替，讲述广告把美术带到了日常生活领域里；第三个发言者俱尼尔与德芬巴乞，讲话之后，讨论中心从传统美术和工商美术之分界到工商美术家应懂得工商知识，尤其是工业品设计家必须具有现代工业的知识，否则他所设计的图样将不合实际制造及应用。工商美术家是工业革命以后才产生的新人物，和传统美术家不同其宗。

晚上还有一场会议讨论“美术与经济”，我因太疲倦没去听，但去看了柯泼尤令美术学校的学期成绩展览。该校注重工商美术，有几个学生的书籍插图，画得相当好。

5月28日

下午参加美术家年会最后一场会议，是美术杂志主持的一次座谈会。讨论中心是对国务院停止对外画展发出不平之鸣。第一个发言者爱尔弗来小拜尔，纽约现代美术馆作品征

集指导，根据当场放映的德国和苏联的美术作品，指出集权国家标榜高度民族主义，排斥现代艺术，暗示国务院的审查及阻止出国美展是集权国家的作风。第二位发言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润土巴尚，讲题为“批评的自由”。他不用讲稿，不愧为教授。第三位发言者是《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家爱德华·爱尔盾·裘惠尔，讲题是“来自报刊的评论”。第四位发言者画家雷比努·曼格雷伐德，讲题为“来自画家的观点”。他严重提出对国务院事件的抗议。第五个发言者是纽约现代美术馆管理部指导瑞尼·D·哈农老脱，讲题为“外国看我们的政策”。讲完举行问答，主张进一步向国务院作行动上的抗议。会议反映对政府摧残文化的愤慨。这使我想起以前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销毁墨西哥画家地耶哥里维勒所作大壁画的事件，也曾引起艺术家的公愤。那次事件是赫尔报纸发其端，大富翁毁了自己花钱买的大壁画。这次也是赫斯系报纸对出国美术展开了炮，引起杜鲁门和议员们的干预，出国美展搁了浅。那次是资本家和共产党的冲突，这次是顽固派和维新派的斗争。这次美术家年会所提出的艺术表现自由问题，反映民主国家骨子里并没有民主。

接冈弟来信，说上海的《文汇》、《联合》、《新民》三报被封。比较敢讲话的报纸从此绝迹。南京的《新民报》居然还留着一口气，态度大概温和多了。

5月29日

格林威治村的穷画家在华盛顿广场开露天画展，一处处的画摊，有些像中国过年时候的年画摊儿。画家坐在自己的

画摊前管生意。多数是年龄相当大的，年轻人也有。有的标价卖画像：侧像1元，八分像2元，正面像3元。看了一圈，作品中还有比较成熟的，但多数庸俗而有匠气，售价一般在二三十元之间，有些标价到一百多元。画家们很快活，他们把姓名、住址的卡片嵌在画框上，也有些把参加过画廊展览的或报刊的记录一并在作品上标出，以广招徕。一个画家出卖粉画肖像，搭了个小帐篷给顾客坐，自己在太阳底下工作；有一个青年叫喊着招主顾，像马戏班门口招生意。画都挂在住户门口的矮铁栏杆上。附近有座教堂内设有露天展的办事处，办事处里挂着退伍军人的作品。我在参观中画了些速写。

5月30日

晚上和司徒到125街黑人区散步，街上很难见到一两个白人。橱窗里的穿衣模型都是白皮肤和高鼻子。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十，有出色的人才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司徒说以前见过黑肤色的穿衣模型，今晚走了几条街都没见到。

从黑人区退出来，在赫德森河边公园走了一小时，冷冷清清，却碰到两对中国人在谈恋爱。

5月31日

和中国银行的周维乃到唐人街饮广东早茶，茶后，我带他到华盛顿广场看露天画展，拍了些照片，然后，由周带我去布罗克林的普鲁司配克脱公园看人家划船。那里颇像汉口中山公园和南京五洲公园，但要拥挤得多。出公园换乘M·T·地面电车去考内岛的海滨游乐场，规模之大，远在洛杉矶长

滩之上。虽未到盛夏，游客浴客已相当拥挤。这里海滩有三英里长，海滩边上一只一只铁丝垃圾筐排得像围棋子，这是很有趣的点缀。街上什么玩意都有，吃食有冰淇淋、热狗、爆米花；应时食品有煮熟的嫩包谷。游泳池一家连一家，有一处，排了百来张躺椅，上有布遮阳，用木栅栏围着，门口标着每小时租金二角五分。我相信如果在这儿开一家四川式茶馆，论时间收费，生意一定大好。考内岛是纽约平民的消夏中心，星期天会有一二十万人集中到这儿来。街上有一所蜡人馆，门口立着英国温沙公爵夫妇之像。我们好奇心切，每人花了二角，进去参观一番。里面阴森森，布置的都是些凶杀故事，颇像东狱庙的十殿阎王地狱景象。有一大橱窗里面是墨索里尼被吊死的场面，颇有现代历史价值。另一室是些名人塑像，我认识杜鲁门、罗斯福、林肯这几位大总统。另一室左面是斯大林，右面是宋美龄，中间是前任纽约市市长拉加第。馆里有一位印度算命先生，周硬被他拉着算了一次印度命。

6月5日

国内学生展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政府用高压手段捕杀学生，一星期来失踪者、被杀者、被捕者难以数计，当局比袁世凯称帝和北伐前军阀统治更为残暴。读报之余，忧心如焚。

6月9日在波士顿

早饭请用之、慧敏和陈博士夫妇在旅馆吃早点。用之昨天开车从纽约来波士顿，快到波士顿时车头和前车的屁股撞了一下，车鼻子撞扁，幸未伤及汽缸，今天还预备开到朴来

茅斯去游览。约他们下午5点来司岛脱画廊看我的画展。

上午把画挂好，从援华会借来一百只茶杯，四把茶壶，比尔从乡下带来了钢开水壶，我从纽约带来了茶叶，前天从这儿唐人街买来一百五十个杏仁饼，今天的招待茶点解决了。主客二位，一是王恭守领事。一是援华会的却尔斯·A·普罗克脱夫人。比尔全家都到。陆陆续续来了六七位客人。5点开始，7点散场，定出了6张画，比纽约的成绩好，这儿印的目录也比纽约的漂亮。多数人欣赏我的白描漫画。

6月10日

早晨陪用之、爱莲到哈佛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参观玻璃植物标本。有一室陈列水晶玉石矿物标本，发现玛瑙的构成原为古代树干的化石。有一大块玛瑙横断面，树的年轮纹路极清楚。

12点从剑桥出发，乘用之的车沿着一号国道走，1点过隆特岛省城普劳维腾斯，然后沿大西洋海岸走，一路有游览者小屋，供驾车旅客夜宿，恨不得停下来在海滨过一夜。美国职业阶层每年夏季都有一月假期，多数消磨在海滨或山林中，生活富裕乃有此清福。车过纽海文，走上了全国标准公路，横路都用旱桥，不用红绿灯，节省了时间，车速可开到每小时五十五英里以上。沿途点心店、饭馆甚多，饭馆以海鲜吸引过路人。这是第一次在公路上长途旅行，回想当年在成渝路、渝贵路上乘邮车和交通车的情形，大不相同。8时到达纽约，纽约已经热得穿不住上衣了。

6月12日

在河边散步，青年男女在草地上一对对交颈而躺，只差没脱衣服。我们这些礼仪之邦的大国之民看了，反而觉得自己难以为情。

赫德森河畔原来是火车道，市政府在路基上建起钢铁架子，上面铺了土，种上草和树，变成大公园。纽约是寸金地，地面上是摩天楼，地下有三四层地下车道，所有建筑都有地下层。现代美术馆设有地下电影院，定期放映电影历史资料，是一座电影博物馆。我觉得如果市政当局能划一全市的建筑，大可以把所有的屋顶用天桥连接起来，铺上草，种上树，修成空中公园。

6月14日

司徒乔夫人冯伊调来谈，乔的肺病已大有起色，再要在医院住半年。她原来在《美洲日报》工作，发现该报常常制造新闻，破坏和平，精神非常痛苦。最近在一家专给联合国排印华文文件的印刷厂做校对工作。这厂在长岛，每天上班要在路上走3小时，周末还做点零碎工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位夫人的刻苦精神令人钦佩。

6月16日

百事可乐（Pepsi-Cola）公司今晚在河滨公园举办美国土风舞会，参加者多男女中学生，女孩子尤多。指挥台上用扩音器指导步法，略加说明后，群众立刻学会。此会在整个夏季中，分区在各大公园举行。美国商人做广告的本事真大。

向爱莲建议，中国的土风舞应该打入群众生活中去。回国后第一步工作应将西藏、新疆、云南、贵州苗彝瑶等民间

舞步教给大中学生，使之成为主要的中国社交舞。

6月18日

偶然在125街发现一家华侨烫衣馆，专烫衬衫。一件衬衣由三个人分工烫成：第一人管二部烫机，一部烫领子袖口，一部烫前襟；第二人也管二部烫机，一部烫背面，一部烫袖子，烫袖子是两具圆锥体，上小下大，两只袖子套进去即成；第三人管整理、招叠。第一、二两人工序和机器一样，第三人用的是—只小熨斗，比较花工夫。工资分配：第一、二道工序，每道得一分半，第三道得三分。烫衣馆向洗衣铺每件取费九分。此衣馆有工人一百余，二十四小时不停工作，工作快速的人每星期可得工资百余元。洗衣业洗归洗，烫归烫，工效大增。

6月24日

翁万戈、司徒慧敏合办了个中国电影企业公司，将为爱莲摄制一部舞蹈小片，定明日开拍。今天要完成《瑶人之鼓》背景。我爬在地上，从中午12点画到午夜12点，请同光和超尘帮忙涂色，晚饭后万戈加入勾线，凑成一幅南北派混种的大山水，弄得大家腰腿都伸不直了。

6月27日

慧敏今日拍摄爱莲的《哑子背疯》，上午我一人赶制桥面，正式做市景工人。下午开拍，晚间10时余结束，用之开车请我们到兰姆斯园吃中国宵夜。

6月29日

爱莲接受中国学院之聘，到新泽西州的上蒙脱克来教师大学暑期班，讲授中国土风舞两星期。同时受聘者有冯友兰

和陈远两教授。公共汽车穿过赫德森河下的林肯隧道。校园中野兔松鼠乱窜，鸟语花香，十分幽静。晚饭后开会商议开学事务，9点上床。住纽约半年来，破题儿第一次早睡。

6月30日

7点起床，7点半早餐。好天气，又早起，精神一振。后海没带画具来，若住满一星期，必大有收获。

暑期班学生共五十余人，全是女教师，只一位男先生。爱莲开了一班中国土风舞，冯友兰讲中国哲学，陈远讲中国社会，又一位广东陈老师讲中国文化、生活、家事、烹饪诸题。午餐后叙会，中国学院干事益治教唱中国国歌，女声盖过男声。

晚饭后孟治开车送我们上街买用品和吃食之类。我找到邮局，发了几封信。这小街约几十家店铺，照例是A与P伙食公司、狐尔华期五分一角商店、药房、电影院，跑遍美国小镇，千篇一律。

7月1日至4日

搭盖治的车回纽约。补成《苗人赶场图》，色彩太重，决定弃之。

2日成画2张，一苗家姑娘，一斗鸡图。

3日成画4张，一牵驴图，一藏舞图，一饲鸡图，一苗妇图。

4日作出藏图，完成后觉得远山天空太轻太散，灵机一动，裁去上截空面三分之一，人物立刻突出，气氛亦见深郁。从此得一布局的启发。

三弟来函，内附儿子申第一信，要我买钢笔、衣服、手表等物。具名称自己为“不孝男”，大概表示长久不写信的一点歉意吧。信中提到三弟常常有钱接济他，他将终身不忘。此儿感情丰富。三弟函内说起儿女问题，劝我回国，这两封信，增强了我回国的决心。

5日完成《喇嘛驯类图》。

7月12日

7日去波士顿取画，画廊和我结账，我还要找还他们配镜框钱八十元，答应给他们一张画抵消欠账。这次画展只卖了四张小品，除三成佣金，实得不到一百元。为了此画展，跑了四次波士顿，花钱当在三百元之谱。做了一次蚀本生意，不过，波士顿之行，大开眼界，在博物馆看到不少国内看不到的古代名画，所得大于所失。

访南美一岛千里达

7月14日

为了要去千里达（即特立尼达）访问爱莲的故乡，这几天办了许多离纽约前的事务。7日上午到入息税办事处办出境手续，一个钟头之内来办手续的人总有一、二百人之多。美国入息税（即所得税）之重，全世界无出其右。这是罗斯福总统新政之一，其目的在限制收入过多的人，入息愈多，抽税愈重，怪不得顽固派要骂罗斯福是共产党了。共产党议员正在进行减低入息税的法案，富翁将拍手称快。我的十元一天收入，结算结果，不用付分文入息税，一小时内办完手续，可

飞千里达矣。

行李昨天都整理好了，今天相当轻松。近午理发，下午毛弟姨母替我们买了些礼物。6点离寓，雇出租车到42街航空旅客站，行李超重七十磅，要付七十元行李费，身上钱不够，临时请司徒去银行兑了现款来。7点半坐航空公司的客车到洛加典机场，菲尔考克司和司徒送我们。这是第一次在美国坐飞机，PAA机站是一座圆形建筑，站内墙上画了航空历史壁画，相当好。办了旅客机票登记，付了行李费，最后办了移民局出境手续。9点上飞机，旅客仅二十余人，虚席甚多。9点一刻起飞，在纽约上空兜了一转，飞向海上。10点光景服务员送来三明治和果汁，吃后熄灯，闭上眼，靠在椅上半睡。

7月15日

5点醒来，机在云上飞，云隙中看见下面是海水。东方旭日渐升，6点到达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现在属于美国的山皇岛，飞机下降，大部乘客离去，千里达旅客也下机休息。山皇岛大部分是西班牙和黑人的混血，说西班牙语，虽是美国属地，西班牙情调十足。7点半再上机，换了一批乘客，人数更少，机师服务员也都换了班，仍在海上飞。

10点半在千里达的西班牙港着陆，爱莲的亲戚多人在站上接我们。大太阳照耀下，忽然一阵大雨，这一刹那充分表现了热带天气。下机后和戴家亲戚一一见面。其中原来认识的只有在香港住过的姨母李夫人。最亲的人是爱莲的二姐葛雷丝，其余的是姨母、舅父、表姐之类，一下记不清。爱莲表演会的经理人汤姆带女儿及新闻记者数人，给我们照了相，并

作了几分钟访问。检查行李时只开了一只箱子，因为爱莲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移民局的人非常客气地招呼她。

机场离西班牙港市二十一英里，陈家表姊开车送我们先在她家休息，喝了椰子水，吃了点心，然后进市区。路上满是花草，高大的斑杨树冠，盖满榴火颜色的红花，甚是奇观。李夫人把我们安置在播波罗克街3号外祖母老家，爱莲父亲早在那儿等候我们。一时间，爱莲的表兄弟姐妹、舅父、舅母、姨母、姨丈见了一大群。刘家外祖母有十二个孩子，爱莲母亲是第七个，多散在千里达住。这刘家老宅还住着一个未出嫁的姨，一个出嫁给陈友仁兄弟的姨，以及香港认识的那位李夫人姨。爱莲十六年不回家了，见了父亲，辛酸得流下泪来。午餐用中国饭招待远客，但不用筷。岳父和二姐下午回“柯伐”乡下去，约我们明天下午去住一星期。

千里达人口三分之一是印度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中国人、欧洲人、西班牙人和混血人。中国人分土生与家生两部分，刘家、陈家、戴家都是三代以上的土生，谁也不知道故乡在广东哪个县。为此，颇想对这几家作一番考证工作。外祖母八十三岁，还记得些广东话，不难找出点线索。

虽在热带，晚上颇凉，盖了薄毯子还觉得凉。前三天的纽约比这儿还热。千里达是个岛，凉风不断，最近进入雨季，所以更加凉爽。想像中的热带天气，以为一天到晚要流汗，到此方知不然。

7月16日

陈友仁的母亲是刘家外祖母的大姐，九十五岁，出生于

中国，特去访问。这位陈老太太和她的一个未出嫁的女儿以及另一位混血的老妇人同住在一座小房子里，三个老妇人相互依恋着，好像住在孤老院里。西方社会，对老年人毫无怜恤敬慰之忱，大异中国。陈老太太干瘦得只剩一副骨骼，能说些广东话。她说她出生中国，八岁来美洲，母亲是上海人，父亲是广西人，原在政府做事。她说她说的是“白话”，凭这点可以证明她家原籍广西。广西北部靠近湖南、贵州、云南那一带人说官话，南部、东部西江一带说白话，也就是广东话。她的记忆没错。

下午4点半岳丈来接我们，雇了一辆出租车到爱莲老家“柯伐”去。一路尽是蔗田和椰林。柯伐（Couván）是个小镇，戴家在此三代，做杂货生意。原有大店一处，被岳丈在赌博中输去，后移住对面一座小屋，仍开杂货店。我七年前托李夫人带给岳丈的一幅造船图，挂在店堂后壁上，因漏雨已有一处发霉。二姐葛蕾丝有个男孩子叫安裘来，已四岁了，父亲是欧洲人，这是戴家三姐妹唯一的孩子，祖父很溺爱他。

岳丈是戴家独子，祖父开赌场。他读书时和祖父相处，又得祖母溺爱，年轻时染上赌博嗜好，把家产赌光了，夫妻破裂，三个女儿跟母亲到了伦敦。如今败子回头，苦苦地守着现在的这份买卖。大姐在英国，有时还靠父亲接济。岳丈的外国名字叫弗来得艾若克，他的祖父叫阿戴，这是戴姓的由来。但他今晚告诉我，当有人问他父亲贵姓时，父亲常答姓“吴”，那么，戴家也许姓吴，尚待考证。

千里达之有中国人，是英国殖民者从中国招来的农民。

中国农民没受教育，连自己的姓都记不清，天主教堂诱他们入教，替他们取外国名字，几代以后，便无从查考真姓名了。戴家在此，人们只知他家叫艾若克，岳丈自己也弄不清是否姓戴。从岳文的祖父自称“阿戴”，可能是广东话“阿大”的谐音，阿大就此变阿戴了。

7月17日

访问了戴家祖母的妹妹及其未嫁的女儿，这是第二座“孤老院”。这位未嫁的老姑娘带我们到一英里外的坟场去上爱莲她祖母的坟。这个岛既五方杂处，又远离祖国，在婚姻问题上要保持自己的民族血统，实有困难。这几天见到了三个中国老处女，反映出海外侨胞在婚姻上的困难处境。武汉政府时代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据说他原配夫人是一位中国人和非洲人的混血种，我怀疑和陈老太太住在一起的那位混血黑老太太是否就是陈友仁的原配夫人。

岳丈有个女佣是黑人，带着四个孩子在此工作，第一第二是黑皮肤，第三第四是白皮肤，面部轮廓和他们的母亲一样，这白皮肤也许是变种，也许是混血，弄不清。

7月20日

尤涅克姨母是老刘家唯一嫁给外族的姑娘，当时颇受姐妹非难，足见土生侨胞种族观念还很深。姨母嫁给一位印度医生，住在十二英里外的商佛南陀，有二子一女，长子在美 国求学，女儿读中学，高鼻梁，大眼睛，嘴边两个大酒窝，显示中印混血之美。小儿子十一岁，斯文得很。

坐火车到商佛南陀，过一小站，见一简陋印度神庙，男

男女朝拜者甚众。将近目的地时，车沿西海岸走，经一炼油区，油管纵横，显示这儿产油丰富，输油码头伸入海中半英里，几条大船等着装油。油井区在商佛南阳南，本岛的南海岸一带。千里达产石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重要物资供应基地之一。美国人在此占用了大片土地和海港。千里达人着实享受了几年战时繁荣。

岛上家家后院种果树，芒果、广柑、刺果、菠萝、洋枇、椰子、香蕉，果多得来不及吃，让它自生自灭。

今天星期日，男男女女穿得整整齐齐，早晨上教堂，下午寻欢作乐。天黑，一群群人唱着歌回家。

给葛雷丝的儿子安裘来起了个中国名字，在他的照片上题了一段文字：

戴安权，二姐金兰之子，生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七日，叶浅予一九四七年七月客千里达柯伐题。

此次访岳家，不知何日再来，留下这题字，也许将来会成为有价值的家史文献。

7月22日

爱莲舞蹈表演会的舞伴乔治·费尔考克斯，将于今晚从纽约到达千里达，我们和经理人汤姆斯父女二人到机场去接，回市时在汤姆斯的办公室接见了记者。

这里的钱也叫“大拉”（Dallor），散钱有先令和便士，美金一元合本地大拉一元二角左右。这里的女佣管洗衣做饭，工资每月在十到十五元之间，比上海稍高。

邓启源君出生于本岛，二岁返国，抗日战争时曾在国立

音乐院学钢琴，在交响乐团演奏过。因父母去世，最近回千里达，接管父亲的饮料店。下午来看我们，大讲国语，颇为痛快。问他还弄音乐否？说等弄够了钱就买钢琴。他的店在离大埠五十里的“三只手”（Three Hands）小镇，每星期来大埠办货一次。

黎任夫君曾受过国内教育，民国元年来本岛，知侨民掌故甚多，和夫人及包医生来看我们，医生善谈，人情世故学识相当透彻，谈岛上华侨经济衰落情况，又谈印度人犹太人经济势力膨胀，评述颇详。

黎君开车约我到中华学校看了一次，教中文的陈先生战时在贵阳读书，是侨生，另一位王小姐教英文，不懂华语；学生三十余人，多数不能说华语。学校办了已五年，校舍是侨民集资买的，据说中国领事馆的房屋也是侨民集资买的。有些华侨最近从国内探亲回来，对国内政治腐败，地方土豪劣绅暴虐，极为愤慨。今天在学校见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学生，因战时生活困难，家人把他卖掉，最近才由其父母回广东家乡赎回来。卖儿事件，在国内屡见不鲜，华侨对祖国的反感情绪，这不过一端而已。

7月24日

晚上潘君宴会上，谈及战时为祖国捐款的事，他说一次陈庆云来募飞机捐，一下拿走十万，陈说政府将发给他们价值十万的公债，至今毫无下落。席上周领事说孙科最近来信要修总理陵墓，命领事筹募捐款，现在连修坟墓的钱都要侨胞出了。

今晚宴席上主人潘君告诉我，戴家确实姓吴，其曾祖叫吴石，商会有记载。吴家是从鹤山县来的。提起鹤山，记得1941年从香港逃出，走过鹤山龙口镇时，地方民团误会我们这群难民是奸细，我们险些被捕，幸亏同行者罗寄梅拿出中央社的证明，才弄明白。当时已近腊尽，风雨载道，心怀祖国，经过波折，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的黑暗更为警惕。

7月25日

爱尔勃脱舅家经营果园，在市北海岸山坞里，生产可可为主，其他如咖啡、柑桔、木瓜、香蕉、菠萝等热带水果，应有尽有。可可是一种形似苦瓜果的果实，长在树干或粗枝上，瓢不可食，瓢内的子就是可可。坞中雨过，白云浮在山腰，颇似江南。今日之游，证实热带土地生产之丰，种植之易。

胡子长得很快，每天要刮两次。

千里达有家《侨生报》，每逢星期四出一期，消息来源大都剪自纽约华文报，称共军为“共匪”，无疑是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与此相反，一位商人大发牢骚、痛骂国内政治。

7月29日

欣伙夫人开车陪我们看岛南的沥青池。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沥青池，是铺路的好材料。我国所谓柏油大马路，就是沥青铺的路。此地归美国人经营，地宽周围约二英里，池中心作胶状，其周围硬化。工人天天挖掘，沥青从地底涌上，次日即填平。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神话梦境。沥青地周围四五千工人，中国人在此经营伙食杂货店有百余年历史。外祖刘家及李家为其创始者，现在已发展至十余家，最大一家

姓邓。

8月1日

英国殖民地的气味到处一样，香港、印度、千里达，共同点是那一套英国绅士气。这么热的天，衬衣之外必须穿上衣，装领带，实在不舒服。这几天懒得出门。

黎君刻了一颗“千里达一月”的图章送给我，作为旅岛纪念。难得在此遥远的海外，遇到这位离祖国三十年，始终带著名士气的人物。黎君是广东新会人，民国元年来此。因为是读书人，不善经营，不像其他华侨那样轻易发财。见了面，自叹出国的错误，足见他想念祖国之切。他有二子一女，俱已长成，他已作了四次祖父。命运注定他不得不在此落籍，子女都不懂中国话。

晚上以《中国艺术》为题，在美术协会演讲，听众都是该会会员，黑人居多，华人四、五位。原拟约黎君翻译，他有事不能到场，我只得看着中文提纲，用半吊子英语讲出。从五代铜器、汉魏石刻、唐代佛画、宋元院画、明清文人画，一直到近年新的中国画。讲了一小时，讲完放映两部艺术纪录片，一部是我的《画中国人物》；一部是《中国皮影戏》。这两部短片是纽约翁万戈监制，我带来为“中国制片公司”作宣传。映完到廊下看我的画。会员向我提出中国水彩画（外国通称中国画为中国水彩画）的技巧问题，我一一加以回答。今晚是中国文化与千里达人见面，会员中的白人、黑人、印度人对此都陌生。我国的周领事也在座，似乎颇觉自豪。

黑人画家问我，在纽约卖画，代价一定很高，足见他们

非常羡慕美国画家的生活。我告诉他，美国穷画家很多，只有少数知名画家的作品才能卖高价。

8月4日

今日为哥伦布发现千里达岛的纪念日，市民举行化装游行，极尽欢乐。

8月6日

上午为爱莲的表演会装台。两个木匠制成了《哑子背疯》那座桥，下午试演，桥塌下来，擦伤了我的右手臂。

晚上9点舞蹈表演会开幕。从幕后窥视前台，男男女女，个个穿晚装，中国女人尽量打扮中国装，古老的右襟高领旗袍也穿出来了。10时完场，富有的姨丈姨母请我们吃宵夜。和纽约一样，这是至亲好友之间的一种社交形式。

8月7日

晚上请《假日》记者米克夫妇在岭南楼吃饭，五个人花了十六元，相当贵。饭后开车到乡下看黑人跳“香哥”舞，一种原始的生活情调，把我们带到了非洲的原始森林里。黑人来到了千里达，把家乡的风俗文化也带来了。

收音机里听到有黑人跳“香哥”之歌，记录如下：

女独唱：阿黑，开开；男群唱：强开开，乌开开，强；女独唱：乌开，开强；男群唱：强开开，乌开开，强。

8月15日

印度独立纪念，岛上印度人举行大规模庆祝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旗到处飘扬。被英帝国统治了将近二百年的印度人，从此扬眉吐气了。

8月16日

康家在南海岸玛牙罗消夏，约我们同往。晨7时偕爱尔弗来乘火车出发，通过本岛腹地，10时15分到达尾站里翁克雷。全程不过三、四十英里，每隔二英里停一站，耗费时间太多。康家乔治开车来接，11时顷到达大西洋岸的“大洋天堂”别墅。这一带全是椰子林，海滩长及十英里，左近有一渔村，黑人在涨潮时下网捕鱼。今天逢新月，潮特大，鱼群亦多，渔主在海岸观察，遥见鱼跃海上，知鱼群弄潮，即推舟下海，撒网成半圆形，远及半里，数十人在滩上，执网两端，奋力拽之，如鱼不漏网，每网可获二、三千磅大鱼，小鱼则弃之沙滩，任人拾取。每次收网，鸦群盘旋空中，得以啄食残余。

傍晚康家亲友咸集，男女约四、五十人，晚餐如军队就食。餐后玩牌，共四、五组。粤人嗜赌，今晚牌局有玩至清晨2时者。

临睡床铺不敷分配，地板躺满了人，我和爱尔弗来是外客，特蒙优待，各占一床。

8月17日

清晨6时起床，数人走林间行猎，携回松鼠、雀类十余只。某君在海滩射大嘴派力根，击中一只，展翅长及六尺。

今日为渔民幸运之日，目睹拉网五次，获鱼三卡车，康宅人谓玛牙罗海岸的丰收日每月不过二、三日而已。

周末行乐结束，度假者傍晚纷纷归去。我与爱尔弗来搭一小卡车启程，走东海岸公路，渡河两次，第二渡遥见对岸黑人在椰林下台汽油桶奏乐，发音响亮，旋律优美，并见男女在

乐声中狂舞。途中同行一小汽车在路边抛锚，我车曳之而行。最后在椰林穿行2小时，抵大埠已晚10点，携归大鱼2条，备明日大嚼。

8月18日

我的画展结账，售画七幅，得款六百元。半数给中华学校，今晨将款送去。

在一华侨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台山人，来岛廿余年，战前尝读《良友》画报，故与“王先生”有缘。

爱莲定24日晚在三邑同乡会表演，要我写广告三张，下午急成之。

8月26日

应约到达本岛东北角一小岛，游蓬卜舍尔海湾。此处海湾极平静，清澈见海底，换上游泳衣，如在池中畅游，为两年来最痛快的一次游泳。经营此岛者为一中国家庭，收费低廉，有宿舍、食堂，游客每人付一元七角五分，包括汽艇接送及午餐一顿。

8月27日

二次上岳家，住处虽简陋，却比外祖母家自由随便得多。第一穿着毋须整齐，汗衫短裤拖鞋十分随便；第二人少。免去许多礼节与应酬；第三住在乡下，行动自由，没有社交活动。附近有黑人社会，欢迎中国人参加他们的“香哥”活动。

8月30日

回纽约的航班原定上午10时起飞，临时通知改至晚间10时。岳丈于上午8时携外孙安权来送我们。因店中无人照料，又赶

回柯伐。晚9时二姨母派车送我们上机场，辞别时岳父双眼已湿。同机者有乔治·考克斯。

8月31日

晨10时半抵纽约。移民局及海关手续并不简于旧金山登陆之日。此次由千里达来，系领的过境签证，限9月27日前离开美境。问我有多少现款，我答四百元，移民局认为四百元不够两人回中国旅费，我答：我系美国国务院的宾客，我的旅费由美国政府负责，并出示聘书，始得通过。待领到行李，通过海关检查，出机场已近下午1点。九十七街305号原住公寓无空房，乃在附近一所名为巴黎族社的小旅馆租得一房，房小仅容一床，但有浴室，尚觉方便。

千里达六星期，飞去又飞回，真像一场梦。爱莲这场梦又快乐又辛酸，不知何年何月再能见到她的老父。

9月2日

上午到国务院驻纽约办事处，找贝尔德夫人，告诉她我们准备回国的日子，她马上打电话通知华盛顿为我们定船位。她说我在千里达六星期，也许能在聘约期满后补足。那么，我们可以在美国多住六星期了。本来我们回国的旅费不很够，这六星期的驻留资能省吃俭用，就可以弥补了。

下午钱家骥陪我们到他的新寓所吃晚饭。自离纽约以来，久未进厨房，今晚为钱家做白鸡一味，和家骥对饮啤酒，饱餐一顿。钱夫人顾菊育近已就联合国职务，他们的新寓就是联合国配给的。

9月4日

三弟来信，说父亲的新屋即将动工，催钱甚急，特托中国银行周维乃代汇美金一百元，约合市价国币三百七、八十万元。三弟云新屋全部工价约一千万出头，有三百美金就够了。

9月8日

贝尔德夫人来电话说我们的回国船票已定在10月3日。上午特到总统轮船公司去填旅客登记表，估计现有的钱不够两人的旅费，心里十分焦急。

9月10日

琼代出版公司想出版我的打前炉画稿，特请杨刚为我翻译英文说明，因系手稿，乃请爱泼斯坦夫人找打字社打印，约定星期一去取。

9月11日

上午跑邮局，把包扎好的书籍邮寄回国。下午和《市镇与乡村》杂志编辑潘福尔特夫人见面，她希望我回国后为该杂志社供稿。之后又去看了文艺经纪社的负责人梅特林市兰南小姐，请她当我的画稿代理人，她当即为我介绍了另一位画家代理人内梯金小姐，预备明天找找她。离美在即，匆匆找出版商，找杂志社，找代理人，无非为自己在美国留一条卖稿的后路。

慧敏今晚将去加拿大故乡，定月底回纽约。我们定25日离纽约去旧金山，在美国已无再见面的机会，下午6点特地赶到加拿大航空公司去送他。

华盛顿已将我们的船票、车票寄来，并附一信，谓已通

知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要我到上海后即去南京使馆报到，结束聘约使命。因为我去年来美是从南京出发的，今番回去，仍把我送回南京，手续算得周到。

9月12日

爱莲出卖舞蹈服装，补充回国旅费。今天出马尚称顺利，藏装二件，新疆马甲一件，卖得三十五元。

到永兴吃晚饭，照例在门口等候空座，突见慧敏出现在门口，不胜惊讶。他昨天去加拿大，怎么今天又在纽约？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他的游历护照后天就要满期，递延期一年的申请书，移民局尚未批下来，出了国境，要等四个月才能获得重入美国的签证，加拿大朋友要他今天赶回纽约，等候延期申请批下来，再去加拿大。

9月15日

和翁万龙商定。到北平为他们的中国电影企业公司拍摄记录影片，他们供给我16厘米摄影机一架，底片三十卷，商定题材为北平建筑、中国手工艺、平民游乐场、面人制作等。

9月17日

周维乃通知我，说汪君有辆汽车托我带回上海，他开车从纽约送我们到旧金山，一路可以看风景游地方，行李交铁路快运。我心中一动，动了游兴，下午忙了半日，整理行装。

9月18日

钱家请我们吃饭，朋友们一致反对我们坐汽车去西海岸。说西岸距纽约三千里，十天才能赶到，每天走三百里，哪有时间游览？而且这两天铁路快车有罢工风潮，行李也许到不了

西岸。于是采纳众意，改乘火车。当即打电话到车站定了25日卧车票。

9月25日

昨晚突然失眠，大概是前几天疲劳过度，睡得太多了吧？脑子一直在回想过去陈年旧事，并兜起今后的忧虑。纽约的最后一夜，给了我总结四十年得失的机会。想出了几个字作为今后自勉的座右铭：

第一、“安贫”。勉励自己不要过于考虑，患得患失。第二，“积极”。过去许多事多为“退堂鼓”所误。表面消极，骨子里应该积极，若是表面积极而骨子里消极，仍不免犯老错误。第三，“气壮”。我从小有“灶边老虎”之讥，与人接触，总有点畏缩，与人意见相左时，不敢坚持己见，这是气不壮之故。

这“安贫、积极、气壮”六个字，可当作我的六字真言。

考察国内环境，北平堪作自我进修之地。安贫固好，但怕住久了会变懒。

天亮了，脑子才停止活动。11点光景，爱莲叫醒我，出街吃了饭，理了发，两点整叫出租车到火车站。爱莲办交行李手续，我赶到C·F·E·去取摄影机附件，和万龙告别，等赶回车站，行李已托运完毕。杨刚、慧敏、夏大姐、乔治、赫庆生来送行。东方标准时间下午3点35分，西行列车开动了。从此与纽约分手。

9月26日

今晨车抵芝加哥，有3小时停留。事先已请国务院和《时

代与生活》的印刷发行部接洽好，去参观他们设在芝加哥的印刷厂。车到站晚了一小时，到时代公司办公大楼已是上午11点15分，公司派人领我们到另一座大楼，那是R·R·同内尔父子印刷公司，办事人领我们到八楼总办公厅，办事人员在一间一间玻璃间隔的小房里工作，这是同内尔的神经枢纽，计划、分配和管理全工场的工作。办事人带我们到大楼彩印部，大转筒机一次可印《生活》画报十六页，同样的印机有十余台。彩色版要在出刊前两星期上机开印；双色版提前十天，黑白版新闻稿在前一日上印机。这里全是凸版印机，下一层是平版机，专印大公司的货样本。再下一层是排版房，工人正在排10月13日出版的那期画报版面，其邻室是装订包扎部，印好的书页要搬到这里来折、钉、切，用的工人很多。《生活画报》现销五百五十万册，其中四百三十万册本厂印，四十万册在洛杉矶印，八十万册在费城印，都是从这里将铸好了的合金版寄去付印。每期面报一星期前已印好，从星期一起开始装订并陆续寄出，星期四是最后一天，星期五全国各地报摊都出售了。

看完装订邮寄部，原来还想看看制版部，因正是午餐时间，乃匆匆辞别。印刷机上有黑女人在做工。

12点40分，车离芝加哥。

9月27日

清晨抵丹佛前，车在大平原上走，甚荒凉，间或看见一两处牛群。丹佛是卡罗拉多省城，火车将在此停留四小时。我们搭电车到本省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了一遍，其特点是将每

一地区的自然面貌和动植物分布状况，布置在大橱窗里，比起纽约的自然博物馆，并无逊色。例如，其中一北极熊的橱窗表现北极地带的冰雪世界，光线昏暗，使人感到寒气凛然，既真且美。

下午2时火车复开，车上导游者宣布整个下午将在落基山脉中穿行，风景甚美，望旅客不要错过。车离省城，即住高处爬，二十分钟后，车已爬到秃山半腰，悬崖仪容一条单轨，壁立处穿山洞而过；经过一二十处山洞，愈爬愈高，爬到了海拔一万三千余英尺的詹姆主峰东侧峰脚，车钻入极长的蒙把隧道，出口处已是詹姆士峰西麓，这是卡罗拉多河的发源处。车沿溪水而行，两面岩山壁立，颇像西康大渡河景色。铁路当局自夸为世界上风景最美的一条铁路，印了彩色风景图册在车上发售。晚餐有卡罗拉多急水鱼一味，甚美。

9月28日

车误点，早晨9点到盐湖城，换上了西太平洋铁路公司车头。半小时后开行，沿着盐湖岸走。盐湖广不见对岸，走尽湖区，便入沙漠地带，满目沙丘枯草，看了一整天，中间几处小站，点缀了树林和房屋。内华达是美国最穷的州，果然是一片荒凉，和昨日那样水光山色和曲折回环的路途一比，相差太远了。

车上管事的关照，明晨7点50分车停奥克兰，然后换渡轮到三藩市旧金山，约定6点半叫醒我们。

9月29日

晨7时半抵达加利福尼亚府奥克兰，换轮渡过海，回到分

别一年的旧金山。国务院给我们订的旅馆仍然是毛律司，柜上的人还认识我们。

下午在轮渡码头向车站领了托运的行李，交联合运输公司给送到“玛森爱特”邮船停泊的四十四号码头。

10月1日

上午到菲律宾领事馆办了登岸的签证手续，又上总统邮船公司登记了船票。午饭后去看了上次没看成的“Leagion Cof Hunor”美术馆。此馆藏品中，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特多。馆在林肯公园中，国在太平洋海岸边，金门大桥即在左边，风景绝佳。

华侨民主青年团开鸡尾酒会招待我们。他们表演了一节《两个游击队员》。

10月3日

服从出境防疫规定，昨日在一个广东医生处补打霍乱预防针，医生竭力劝我们再打伤寒预防针。如其所愿，我们两人并付诊费十五元，两臂同时打了三种不同的针，立刻起反应，觉得头晕。过了一夜，疫外反应更重，晨起四肢无力，体温升高，有点发烧。由爱莲去向国务院办事处的坚更司夫人告别。1点钟上了“玛林爱特”。这回买的是头等舱，每舱住十四人，分上下两层，连只座椅也没有。此船比去年的“麦慎将军”小一半，排水量一万吨。船小载客不多。出金门桥以后，虽然海浪大不，却摇摆得厉害，5点半开晚餐，有人吃了一半，便上床躺下了。

10月4日

“玛林爱特”第二日，阴天，浪不大，船在晃，爱莲躺了一整天未起身。我独自上吸烟室写日记。有几个天主教神父在做晨祷，小道具带得特多。这次船上没有犹太人，觉得少了点缀。日记写了一半，有点头晕，马上停笔。午餐桌仅一半人在座，邻桌原坐十二人，只见两人在吃，可见晕船者不少，但高鼻子缺席者不多。下午补写了日记，又写了几封信给香港的乔木、特伟、冰兄、光宇，通知他们过港日期，拟与之相叙一日。此信将在檀香山投空邮。

10月5日

风平浪静。饱食三顿，无所事事。爱莲今晨起床，强拉之进早餐，她不能下咽，一整天以咸饼干及苹果度过。此船三等舱和头等舱一样，设上下两层铺，比之“麦浪将军”号的四层铺人道多矣。华籍水手午后起即在舱中赌牌九，直至深夜才止，赌注有大至百元者。

10月6日

船上公布8日晨7时到火奴鲁鲁。下午菲律宾及香港上海客领登岸证，船公司预备了周游火奴鲁鲁岛的汽车，游览五小时，收费六元，我和爱莲报了名。

中国海关通告，上海旅客登岸时，须将携带的外币数额填报，由海关兑予国币，如不填报，一经查出，即予充公，这就等于抢劫外币。

船向西南行，天气渐热，初秋变成初夏。

晚餐后坐在甲板上仰观星斗，银河正在头顶，“玛林爱特”邮船如秋风一叶浮在大海上。想起白天同舱旅客谈论美

国要领导全世界的雄心，觉得我们这一粒小星星上的人类，真有些荒唐。

中国海关另一人口违禁品通告中，把宣传共产主义书籍与赛跑狗并列。

邻舱有人建议筹备庆祝国庆双十节，授意要我发动，我建议请船上的大官出头。

10月8日

上午8点船靠檀香山码头，许多手持花环的人在接客人。我们踱上岸，夏威夷土生妇女围上来兜售花环，一时众香扑鼻，立刻嗅出了电影中所熟悉的南海情调。五角钱一圈，买了圈赠给爱莲。我们已经在船上买了卡美哈美拉游览车的票，在码头等候10点开车，有些营业汽车却来兜生意，说每人花四元就能游览全岛，鼓动我们退票改乘他们的车，足见旅游业竞争激烈。

火奴鲁鲁在乌阿呼岛南端，珍珠港即在市西五六里。车过该港，看见几只破旧的军舰泊在港内，也许是当年日本偷袭该港的遗物。过了港，便是大片蔗田和菠萝田，农民正在种菠萝苗。一小时后车到北海岸，在海来洼一家日本餐馆进午餐，大个龙虾，新鲜鲍鱼，新鲜菠萝汁，尝到岛上的特殊口味。

夏威夷群岛总人口三十万，有十几万日本侨民，如果当年日军偷袭成功，这块土地他们是唾手可得的。岛上中国侨民三万多，土著五六万，其他则是白人、黑人和混血人。

午餐后，车向东北沿海行，碧波自治，心旷神怡，在一名

为卡柯柯的小镇停车，旅客挤到邮局授发贴美国邮票的最后几封信。过此，车向东南行，参观了一处毛门教堂。此教是美国人所创基督教别派，据说入教的人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再向南行，过伏狮岩、竹笠岛（土称中国苦力帽）、龟岛，又在一处小镇停下来，导游者大肆宣传本岛特产香蕉和木瓜，为一家日本果品店招徕生意。过了此镇，车走上弯弯曲曲的山路，颇像重庆青木关爬金刚坡、上歌乐山之概。高处一垭口名叫“潘历”，是本岛一处古迹，据说是夏威夷王战胜敌人之处。大家下车来看看这形胜之地。对面秀峰三叠，颇似华山绝顶，游客中中国人居多，以欣赏山水的习惯，对此胜景赞美一番。垭口风极尖厉，吹得人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由此折向西南，到了火奴鲁鲁游乐区威克克海滩。这儿是游程终点，也是地方色彩最浓厚的地方。游览车把旅客送到水族馆门口便开走了。从水族馆出来，沿着海滨按滩走，见海浴者随波逐浪，自己恨不得也跳下去。有脚踩滑板弄潮者，为本岛海浴场的特殊体育活动。海滩沿街多游乐饮食场所，人们穿着游泳衣在街上行走，有的男人上身穿着花花绿绿的衬衣，这就是中国人称之所谓“夏威夷衫”了。

回到船上，发现在这儿新上船的旅客不少，个个人脖子上挂着花环，有挂到十多圈的，几乎成了一个花人。新旅客大都是华侨回故乡的，这情景比之旧金山开船时还要热烈，热带人的感情从这儿表现出来了。

今天观感，这儿的土著民族，在生活上几乎全部美国化了。身材、肤色、表情，属于红印第安人，男子身材粗壮，女

子肥硕、大眼。游览车导游者是个女的，高个子、大眼睛、小鼻子、厚嘴唇，看起来像中国人和土著人的混血种，或竟是纯土著。她自己却说是西班牙人，一切生活习惯西方化了以后，耻于说自己是土著民族了。

10月9日

船向西南行，天气大热，躺在舱里要流汗，人都挤到甲板上，檀香山上了二百位客，显得格外拥挤。

从三藩市出发以来，时间每天拨后一小时或半小时不等，与去年来时相反。

太阳甲板原有躺椅十余只，前些日子由加拿大教会中人和我们几个中国人占着。现在人多了，迟去便抢不着。船上另外出租帆布躺椅，从三藩市起索租金五元一只，比售价还贵。这些椅子都属前趟乘客所有，下船后被弃，船上职工收集起来，编号出租。不费分文，白捞租费，可谓生财有道。目前，太平洋上只有总统邮船一家通航，独霸航道。一年以来，不但舱位如旧，设备如旧，头等舱不如战前三等舱，三等舱则像难民营，船票也涨价了。

10月20日

早晨7点，远处看见山影，菲人以手遥指，奔走相告，欣喜欲狂。一菲人已将手提无线电接通天线，人们立刻聚拢来听马尼拉的广播。电台正在报告时间，大家拿出表来对时。他们似乎很骄傲，一种对家乡的亲切之情流露无遗。反过来，中国乘客如果看见了自家的土地，想起国内烽火连天，民不聊生，恐怕不会有丝毫愉快，反而引起满腹牢骚与无限悲愤吧。

早餐过后，船已进入菲律宾内海，青山绿波，如在内湖中航行。

晚上华人举行座谈会，讨论旅美观感。主席提问，美国是否必会发生经济恐慌？有人认为目前美国政府种种措施，目的为防止发生经济恐慌，但政府不能调和劳资纠纷，除非刷新内政，再来一次罗斯福新政，可以纠正目前的畸形经济。看来只有社会主义措施才能缓和资本主义矛盾。有人提议谈中国问题，我说一提中国问题，必然满肚子牢骚，谁也没有救国灵丹；问题太大，不谈为妙，不妨谈些小事，以小观大，比较实际。我先提了去年在华盛顿见到一位华侨伙食店老板，他似有把握地说中国的问题在于“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主张移民。我认为这是代表美国人的观点，难道把四亿人统统送到外国去就解决问题了吗？提到华侨，有人说了个加利福尼亚的故事。说“IGO”及“Oh, NO”两镇，均为华侨创立，后来白人侵占进来，逼得华人不得安身，只得说“IGO”（我走），他们迁走，另建一村，白人又侵占进来。华人想这回不能让了，于是说“Oh, No!”以示拒绝，但仍被白人挤走。第三人说，美国人说中国人生产者少，消费者多，此是实情。美国人七八十岁还天天上办公室，中国人到四五十岁就想享福。第四人讲机器和人力的关系。机器生产，国家常常发生失业问题。印度甘地反对印度机器生产，提倡手工生产，因为印度人口太多。中国天天谈现代化、工业化，似乎也应注意到人口问题。第五人讲华侨社会帮会内幕，目前国内的所谓华侨参政员和国民代表，多数是帮会的领袖，有学问有见识的

人实在少。又有华侨谈了国语问题。最后大家唱了《何日君再来》，散会。

10月21日

晨6时扩音器催旅客起床，准备护照和健康证书接受检查，知船已进马尼拉港，菲海关关员医生上船。见香港、上海旅客拟在此登岸者，先经医生检验健康证书，然后再经移民局签证，才得上岸。岂知海关医生草草了事，不负责任，移民局拒绝签证，旅客颇为气愤。向邮船账房交涉，延至10时顷，请回一位医生，补验健康证书，一场风波才算过去了。

这城市，美军反攻时破坏严重，港中沉船颇多。见此遗迹，使我想起当年香港沦陷时的景象。马尼拉岸上一片废墟。残破的房屋，其钢骨水泥支架，如残废老人彼此支撑着。废墟中穿插了许多美制临时房屋。

码头接客的人十分拥挤，有一队军乐吹吹打打欢迎两个火奴鲁鲁的拳斗师，一是华人，一是土籍。我们同船十多天，旅客中有这么一位华侨拳击师却不知道；另一群引人注目的是出国回来的菲律宾童子军乐队。

在梯桥底下，海面上浮着几个人，时时探头向船上旅客注视，这些大概是潜水求赏的人，可惜身上没有银币，不能使他们一显身手，别的旅客也没有有钱的。

返舱收拾东西，爱莲忽来告诉我说有一位自称姓高的人来接我们，完全出乎意外，因为我们没有熟人在马尼拉。见了面才知道是爱莲的一位在香港的姨母潘太太的朋友，潘太太写信给他说我们要过马尼拉，同船还有林君一家也托他接

待。得此新识，便不愁没向导了。和高君同上船的一位田君，与海关人员相识，很快为我们办了签证手续，我们跟他们上了岸。两辆簇新的汽车等着我们，林、叶两家各乘一辆到了高家。一路到处是残破的建筑，修也难，拆也难，只得让它们站在那儿作为战争的纪念物。

高家是新建的大公馆，一望而知是这儿的富户。大厅里一盆橡树，两盆大芋叶。橡树栽盆司空见惯，芋叶栽盆却十分新鲜。坐了一回，见了高太太和儿女们。吃过饭，高君陪我们上街，车辆之挤，不下于上海南京路。店铺摆着的全是美国货，小摊上卖的也是美国货。到这儿不用找唐人街，大小买卖多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街上除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还有一种吉普车改装的吉普尼，随处上下客人，一车可坐五六人至十余人，取费甚廉。另有一种小马车，仅坐三人，只在繁华区域做短程生意。没有人力车，是一大好事。

高君带我们看了一家雪茄厂，小吕家的雪茄烟赫赫有名；临走装了一口袋。离烟厂，参观了高氏兄弟经营的锯木厂，两三抱的大树，在轮锯上每一分钟锯下一片木板。菲岛多森林，出口木材，上海通用的柳枝木就来自菲律宾。

晚上高君宴远客，同席者有本地华侨商人，其中交通银行协理是苏州人，丁君是福建人，能讲上海话。丁君说此地华人多福建泉州、漳州、厦门籍，厦门话是这儿的通用语。经他一说，我才知道主人高君实姓吴，田君姓郑，从早到晚，连主人的姓也没搞清楚，原来是闽南发音把我弄糊涂了。

晚饭后，主人请全体宾客上爱尔卡罗夜总会。总会内部

装演使用土产草席、藤、竹等材料，颇为别致。舞客中菲籍妇女全穿洋服，我想看看本地装束，竟一个也见不着。夜总会出来，留宿主人家。

10月22日

晨7时醒来，独自出门观赏周围的风光。吴宅对面空地有几家草屋，住着本地人，一老妇上身袒露，下身着沙笼裙，其他妇女在洗衣晒衣，我作速写数页。

10时由吴君之佳陪我们参观菲律宾大学艺术院。大学校舍无一完屋，艺术院三楼无完壁，已废置；二楼是音乐系，底层是美术系。音乐系主任接待我们，我问了一些日本占领时期的情况。他们说日本军部曾派画家藤田嗣治和音乐家某某来过菲岛，名为“文化联络”。音乐系的钢琴，好的被日本人抢走，搬回国去，差的被军人推出窗外。这位系主任发现我问得很细，就提出中菲交换乐队指挥的想法。他自我介绍，他是菲岛交响乐团的指挥，希望到上海和北平去看看。如果中国方面有意的话，他们将请一、二位中国音乐家到马尼拉作为交换。我告诉他马思聪的一些情况，他知道马思聪的大名，颇愿见一见马思聪。

楼下的美术系正在上课。一个课堂正在作石膏水彩写生；一个课堂在作石膏木炭素描写生；一个课堂在做雕塑。此外还有商业美术一科。他们的写生架很特别，我在速写本上勾了一个图样。

全校在千疮百孔的钢骨水泥架子里，用木板和草席避风雨，与1941年大轰炸下的重庆差不多。

4 点要开船，吴君开车送我们到码头，道谢而别。新上船的旅客甚少，扩音器送出音乐，对此罗马废墟式的码头，不胜凄凉之感。4 时正，梯桥撤去，船慢慢浮开去，有两个水手匆匆赶到，缘绳而登船。

10月24日

香港仍用惜阴时间，船7 时泊港，天尚未大明。香港是自由港，中国乘客不检查护照，只查外国人的。一只只小艇聚拢来，赤着身体未成年的孩子潜水抢夺旅客投下海的银角子。有几只悬着旅店旗号的接客大艇，挂出了要接的旅客姓名，向旅客打招呼。

下船不久，讨钱的小艇愈聚愈多。这时船上刚开早餐，旅客有投下面包的，置家妇女以长竿网争接，但不久即被部上的水龙头驱散。置家妇女被水浇得浑身淋漓，待水龙头停浇时，她们又聚拢来。这种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人民的场面，叫人气煞。

船泊九龙，定明晨11时启航。旅客9 点多上了岸。爱莲的亲戚潘太太来接。10点多，光宇、唐瑜、老复、特伟来到码头，一齐去半岛酒店喝茶。喝了茶，去光宇为代理厂长的大中华影业公司参观。见了好些以前在重庆“中制”的老朋友，爱莲的学生高第安、季禾子夫妇也在这厂当演员，可惜没见着。

午后2 时渡海，出席人间画会的欢迎会，见到冰兄和丽亚，谈了一点美国艺术界的观感。晚上，几个朋友同至石塘咀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餐后去看乔木夫妇，10时半回九龙，宿蒋君超家。

香港在战争期间破坏甚少，早已恢复旧观，和1939、1940年我生活过的香港没什么区别。在美国时，听到朋友们在此生活艰苦，颇为着急，今天见面，知道目前还过得去。不过，卖稿生活，要比以前加倍生产，才得维持衣食。朋友们希望我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工作，我说我已接受徐悲鸿聘请，不得不赶到北平去接受教学任务，只得互道珍重而别。

10月25日

10时归船，同船香港客特来送行。11时启航，试用了一下我的16厘米电影摄影机，风浪大，手拿不稳。

香港上来的旅客不多，甲板上、大厅里颇形冷清。海上飘着十几只帆船，这是中国海上的动人景象。

同桌进餐的十二个人，在香港走了八个，今天换上了去美国的新客，其中有青年男女1对，一望而知是美国兵G·I·带他的新娘回美国。新娘看上去只十七八岁，从未出过门，晚饭时靠在椅背上不想吃。海面虽然很平静，她却晕船了。

10月26日

上午船的左舷看见福建海岛，下午在浙江海外走。船上宣布明天上午10点进吴淞口，情绪开始激动。

上海乘客开话别会。庄君发表战后欧洲国家印象，批评美国文化浅薄。曾武官认为美加北冰洋国防远落苏联之后，苏美之间存在战机。苏君认为美国经济恐慌暂时不会发生。唐君新自上海飞港，接夫人同船返沪，谈上海生活及物价情况。话别会各抒己见，对世界多了一层了解，对祖国多了一层忧虑。

10月27日

晨起见海水混浊，知已近长江口。下午1时进吴淞口，2时泊黄浦江码头。一些卖樟木箱、漆器、木雕等工艺品的舢板围上来，船上旅客有拿现款买，也有拿香烟换的。一条骆驼烟可换一只漆匣或一只竹雕小艇。只见一只水上警察汽艇开过来，捉了一只舢板，不久就放走。船员笑嘻嘻对我说“Paid off”（付钱开发了）。

1946年9月2日离开上海，1947年10月27日回到上海。美国之行足足花了一年零二十五天。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曾到老家看了老父老母，他们正在修建新屋。原来的老屋在1937年被日本侵略军炸毁了，这新屋是我们几个弟兄凑钱帮着盖的。到了11月中，我买船票从上海到天津，然后乘火车去北平应徐悲鸿之聘，在国立北平艺专当了国画系教师。

第4章 师道与世道

§4.1 学为人师到甘为人师

§4.1.1 从国立艺专到中央美院

徐悲鸿的鼓励，把我引进了美术教育岗位。1947年冬季，我到原北平艺专教速写课，1948年又被推到图案系当主任，也许是徐的权宜之计，让我管一管这个不被重视却缺个主任的专业。因为我是外行，遭到这个系主要教师的反对，北平解放不久我下了台。徐又交给我国画系一个班，叫我带到毕业。1949年北平艺专改组，原有的音乐系分出去成立了中央音乐学院；留下的国画、油画、雕塑、图案四个专业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国油合并，改为绘画系；不久，图案系吸收西湖艺专的图案教师，改为实用美术系；雕塑系仍旧。这年绘画系扩大招生，培养普及美术干部，主要课程是：素描、勾勒、水彩、油画四门基本练习课，年画、连环画、宣传画三门创作课。我负责勾勒教研组，所有国画教师都集中在教研组进修，进修内容是对模特儿写生，画白描。经常在这个组写生的有李苦禅、王青芳、黄均、陆鸿年、刘力上、田世光和我。蒋兆和那时专任一个班的素描，宗其香专任几个班的水彩。勾勒课的任务明确规定为年画、连环画的线描打基础。为什么不设国画而设油画？因为当时认为山水花鸟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只有人物的勾勒有保留价值，而画

革命领袖像必须用油彩。

在那去旧布新的年代，一切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设什么课，得服从革命的需要。革命需要大量普及工作的干部，既然山水花鸟不能上阵，国画专业只能靠边了。勾勒线描从国画技法体系抽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基础课，也算对革命有了贡献。后来知道这是新的教学体系。认识到这是一场文艺革命，也就心安理得。从旧艺专到新美院这一段经历，是一次教育方针的突变，我这个从未沾过学院边的学院教师，真有点惶惑不知所措，但革命心切，跟着革命走总不会错。新体系由旧艺专班子教基础，华大班子数创作。新型绘画系1949年到1950年招生三次，1953年和1954年毕业二百余人，这二百余人分配到全国美术工作单位，主要在教育和出版岗位服务，其中多数人现已成为美术界的领导骨干。

1954年初开学不久，院领导找我谈话，说已选定三个毕业留校学生，要我带他们去敦煌学习艺术传统，准备培养他们成为国画专业的后备教师，并暗示不久将恢复国画系。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以实现我久慕敦煌的夙愿，但事情来得突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这些年来，学生头脑里装的全是工农兵，对老祖宗的艺术传统能否接受，全无把握。院部交给我的三个学生，都是业务尖子，有造型能力，有视觉敏感，他们是刘勃舒、詹建俊、汪志杰。我心里想，即使他们不能虚心接受古代艺术的熏陶，临摹一批魏隋唐的摹本回来，作为教材也是大有用处的，于是坦然受命成行。

这次敦煌学习，除了我院师生四人，还有浙江美院的老

师邓白、金浪、李震坚和学生周昌谷、方增先、宋宗元。四、五、六三个月在敦煌期间，白天临摹，晚上交谈，定期交换学习心得，最后结业，每人写一篇学习总结。表面看来，大家对民族绘画的特点以及古代画家表现生活的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从临摹过程中所反映的学习态度稍加分析，便发现他们所感兴趣的不是古人表现生活的独特方法，而是壁画本身剥落斑斓和变色现状；不是对壁画临摹，而是对壁画写生。在撤离敦煌的途中，他们向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敦煌艺术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是很容易回答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回答。我只能带点神秘的口气说：“将来你们自己会作出正确的回答。”

离敦煌后，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采风。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一切活动靠翻译，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取消“三同”，自由作画。白天找形象画速写，晚上在灯下画加工，这段生活过得相当活跃。学生们最后骑马进牧区夏草场，住帐篷，吃奶茶，看赛马，回夏河时满面春风，意气洋洋，对我不去牧场表示遗憾。我觉得这样放手让学生在生活中驰骋，要比那种盯着学生交思想、交认识而故意回避形象思维的方式活泼得多。我之敢于打破常规，自行其是，主要是因为学习任务已经完成，可以作一次轻松的旅行，调节劳逸；其次是尝试一下新的生活方式，看是否能取得创作成果。

记得1952年我参加了由艾中信、侯一民带队，绘画系一个班在大同煤矿的实习。当时认为自己是改造对象，一切行动

服从全队的安排，高标准，严要求，和学生一样。前一阶段规定参加劳动，和矿工交朋友，改造思想为主，第二阶段可以画点速写和头像。说实话，在热火朝天的生活里不让作画，手实在痒，可一想下来是为了改造，必须暂时忘记自己是个画家，也就有股子硬劲，拿得起，放得下，一切可以服从要求去做，但这究竟太勉强，太机械。例如，在交朋友阶段，有个女学生面有难色畏缩不前，她说，要我劳动不难，要我和男矿工交朋友实在不好意思。同学们笑她头脑封建，我心里却不以为然，但又不敢站出来为她辩解，只好默不作声。总之，在那种条件下，只能随大流，不能独立思考。而甘南夏河之行，独立带队，远离组织，得有机会尝试一下新方式。那时头脑里另有一个想法，学生们带了敦煌的艺术熏陶下去，也许能建立起从事国画专业的兴趣和信心。

这年9月从甘肃回到北京时，学院已聘来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办起了油画训练班，对青年有极大吸引力，詹建俊脱离了我的小小班子，转到油画训练班去了。刘勃舒是徐悲鸿的信徒，专业思想比较坚定；汪志杰后来为江丰的“自由职业”设想所动，当职业画家去了。

§4.1.2 重建国画系

1954年美院重建国画系，在统一招生中分配来了卢沉、蒋来萍、焦可群、张扬等人，动员来的多，志愿来的少，这是意料中的事。原国画系教师全部归队，当务之急是确定教学方针。

北平艺专时期的国画系，执行的是徐悲鸿体系。造型基础课主要是木炭素描，画的对象是人；山水和花鸟两门课由教师示范，学生临摹。当时教山水的有黄宾虹、李可染；教花鸟的有李苦禅、田世光；徐悲鸿自己教人物和动物，他的教法也是示范。有的教师整堂课一面画一面讲，留下画稿给学生临。我来校后，添了一门速写课，对象是穿衣模特儿，我的教法是和同学们一起画，教学生抓对象特点，用简练笔法画。那时，教员会什么就教什么，没有系统的教学方案和进度。各个教师每周轮流上一堂课，各教各的，互不通气；学生可以各取所需，对某一教师的画法感兴趣，在课下特别加劲学，进度较快。缺少心眼的学生，好像天桥看耍把式，好看学不会；有心眼的学生，则能在示范中学到老师的一招一式，为自己所用；最有主意的学生，可以到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家去看画，现在的术语叫做“吃偏饭”。据说王雪涛在老艺专当学生时，特别喜欢王梦白的画，可能经常在王老师家吃偏饭。

我之进北平艺专当教师，是1944年徐悲鸿看了我的旅印画展，对我的印度人物形象发生了兴趣。抗日战争结束后，徐受命接办北平艺专，邀我担任国画系的人物课。我只知创作，只知向社会学习，只知向报刊供稿，却不知怎么当老师，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当时不敢同意，直到1947年才决定闯一闯美术学府的关。从1947年到1954年，我已有七年教龄，稍稍懂得一点教课的门径，但要我独当一面，抓一个系，却仍胆怯。何况1954年的国画系和1947年的国画系相比，所处环境和培养目标已大不相同，系主任的职责也大不相同，要确定

一个符合新环境、新目标的教学方针，谈何容易。回忆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培养普及干部的突击任务已完成，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未变，新任务是在此方针指导下，如何向学有专长的目标前进。

（二）苏联的学院式体系已移植过来，油画系可以套用，国画系旧教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必须建立新体系，但又不能套用苏联的，怎么办？

（三）新体系只能从七年来的教学经验中去芜存青，寻找出路。徐悲鸿作画是中西结合体，素描和国画未必有内在联系，效果究竟如何，只能走着瞧。

（四）老师示范有其优越性，但满汉全席，不一定消化得了；临摹与写生二者肯定要并用，是先临后写还是先写后临？

（五）新体系要有个实践过程，不能单靠理论来建立。中西结合法还得用一阵，问题是国画系的素描课要不要独创？要不要用线造型？

（六）国画系有两类教师，一类是老派，即上述以示范为主的教师，主张多临摹；一类是新派，承认素描培养造型能力的作用，主张多写生。课时怎么分配？

（七）有人主张专业应以工具来分，油画用油，国画用水，国画应该正名，应该叫做水画或水墨画；有人说国画也用重彩，应叫彩墨画；有人说国画名称沿用已久，不能改；有人说，社会都要革命，改个名称有什么了不起。

（八）有人对用线造型的国画特点发生怀疑，认为欧洲中世纪的画也用线，近代外国素描也有用线的，线不是中国画的特点，时至今日，用线造型早已落后。有人说没骨法老早就有了，证明可以废线。可那时正当提倡年画，又不能废线。

（九）不少人反对文人画，反对欧洲现代流派，主张写实。陈衡恪赞扬文人画错了吗？倪质逸笔草草是写意，写意不算写实吗？究竟怎么算写实？

（十）舆论认为国画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应该转而为工农兵服务。姜燕的《考考妈妈》被肯定为画人物画样板，山水花鸟还要不要？

（十一）宋徽宗是皇帝，董其昌是大地主，郑板桥当过官，扬州八怪是大盐商门下的清客，我们如何学中国绘画史？

一系列问题，一环套一环，如何解决？一条原则，就是“推陈出新”。我们的理解是：有陈可推，才能有新可出，没有陈就没有新。看来老东西还得学，老技术也得掌握，纸墨笔砚这一套工具还得继承，老教师还得发挥作用，新教师有了素描基础，还得为国画服务。至于“学好素描，拿起毛笔就是国画”之谈，还得看实践的效果如何。重建国画系的方针，不得不继续执行中西结合的双管齐下之法。

当时主要的观点，认为写实的造型基础可以为革命美术服务，各系陈设专业所需的课程，造型基础的“素描”定为全院共同大课。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强调明暗面的素描和国画线描造型有矛盾，决定自派教师，独立上素描课，从而缓和了矛盾。当时国画系上素描课的老师有蒋兆和与李斛。

教学实践中一个新问题是基本训练和创作实践的关系。一头是基本训练课，一头是创作课，各自为政，互不相关，创作老师缺少国画技法，要配一个人物老师作技法指导。国画系除了素描与线描造型之矛盾外，又多了创作与技法的矛盾，一时颇觉棘手，只得在实践中探索出路。

北平艺专时期，只重基本训练，不重创作实践，认为学好技术，就能创作。那时还认为好的习作就是创作，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在国画教学中，习作和创作往往是统一的，老师的示范作品就是老师的创作，山水课的树法、石法、水法，花鸟课的勾法、点法、染法，人物课的描法、擦法、粉法等等技法都安排在示范中穿插进行，所以习作和创作结合很紧，这本来是很合理的教学方法。

中央美院建立后，着重并强化创作课，保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国画系，除以人物为主，山水花鸟为辅外，创作独立成课，内容以年画、连环画为主，等于加设了两门课。把技法与创作有机结合的体制，全部打碎，却又没有一条新的结合途径，系的教研工作对此分割现象也无能为力。我处在这个环境中很是苦恼，真想离开教学岗位，回到卖稿卖画的生活中去。可是我这个人已为中央美院所有，除非自动辞职才能走，可“辞职”等于脱离革命，很不光彩。幸亏此时江丰给了我半年创作假，我几个月不去领工资，学院却叫人送来了。怎么办？能自拿工资不干活吗？于是硬着头皮再干下去。

干下去的第一个想法是改变技法与创作的分家制度，自动提出要求教高班创作课，为技法教师兼教创作带个头。我

认为教得好坏是水平问题，教不教却是愿不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想不到我这个大胆行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和党争夺青年”的一条罪状。由此可以看到，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除非彻里彻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教这门要害的课。那么，不禁要问，谁能保证自己是完美无缺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4.1.3 普及与提高

到了1957年，争论的问题不是国画系要不要学素描，而是什么“离开了素描就失去了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帽子相当吓人。他们硬说国画“落后”、“不科学”，“毒害青年，耽误革命”；硬说“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硬说“国画没有自己的造型基础”，等等。那时，沿用已久的国画名称已被改为“彩墨”，以上种种论调不断向国画系袭来，搞得教师丧气，学生苦恼，我们不得不向文化部请示，国画系到底该怎么办？文化部回答说：可以实行双轨制，一轨照传统方法学习，一轨照徐悲鸿方法学习。这个主张虽然不太积极，也还可以聊慰人心。

为了说明国画系的困难处境，不妨重提一下当年的某些言论。

“不管笔墨不笔墨，拿起毛笔来画就是。”

“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当然也是国画的基础。”

“中国画论中所谈的造型问题，无一不是素描问题。”

“齐白石没有学过素描，可是他从几十年的锻炼中已经体会到素描的关系。”意思是说不学素描，想做齐白石也做不成。

“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已经体现在契斯恰可夫的素描教学原则里，用不着另起炉灶搞什么国画造型基础了。”

我说，不学素描的中国画家是社会存在，不是什么诡辩否定得了的。国画要不要学素描，本来不那么绝对，可以学，也可以不学，何况一般老画家并不反对青年学素描。然而只要对素描提出一点意见，有些人就沉不住气了，他们高喊：“你们不懂素描，你们反对素描！”他们对国画传统予以否定，说什么“徐悲鸿到李斛就是传统，要继承就继承这个！”我想，徐悲鸿要是活着，决不会如此自负，李斛那时在国画系教素描，虽然对发展国画有自己的主张，也决不至于以“传统”自居。这不是明明向国画系施加压力，强迫国画系屈从于他们的民族虚无主义吗？

反右运动以后，美院的领导层换了陈沛和齐速，他们两人都是外行，想加强政治工作来解决学术矛盾。首先把各系的负责人组织起来学习政治，其实，脱离艺术实际而空谈政治，收效不大。学来学去，碰到了中央美院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普及？是提高？”

反右斗争批臭了资产阶级，普及意味着无产阶级，提高意味着资产阶级。谁还敢提“提高”？在一片“普及”声中，陈沛沉思之后，突然唱起反调，说国家办高等教育，当然是培养“提高”人才，美院培养学生，当然也是为了“提高”。陈沛这

么一说，全场为之震惊。有的同志仍坚持“普及”，说，反右斗争好不容易得来胜利，美院不为工农兵，难道为资产阶级？问题一揭开，糊涂脑子突然清醒过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不是有两句名言吗？“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为了提高，提高为了普及，下里巴人不能永远是下里巴人，也要向阳春白雪看齐呀。这二者应该是统一的。然而宁左勿右的思想已在人们头脑里占了上风，怎么拧也拧不过来。我们在教学中总是战战兢兢，唯恐太高太专，怕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

反右以后，彩墨系恢复国画系的原名。

陈沛的独立思考，对我颇有影响，坚定了我自1956年以来探索中国画艺术特征的研究，从而认识到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发展民族绘画的障碍，而虚无主义的影响在青年中尤为普遍，要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必须让学生充分认识民族绘画传统的优点和特点。在此思想基础上，鼓起勇气，钻了一阵画史、画论和画迹，对以下几个问题讲了课或写了文章：

1956年为《新观察》写了《中国画的艺术技巧》；

1956年在天津讲了《关于线描》；

1959年在北京国画院讲了《中国画的构图》；

1960年在国画系讲了《中国画的色彩》；

1961年在北京画院讲了《中国画的透视》；

1961年为《人民日报》写了《掌握全面和专攻一门》；

1962年在国画系讲了《中国人物画的基本功》；

以上这些研究，很粗略很肤浅，距离系统的中国画美学

特征还很远，但是为引导青年正确认识祖国的绘画遗产是尽了力的。当然，也回答了某些嘲笑和曲解中国画的虚无主义者，告诉他们我们祖先的艺术成就多么丰富与深远。

§4.1.4 全国艺术教育会议

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交出了我那块搞创作的“自留地”。从那一时起，坐班的时间多了，作画的时间少了，表面上安心做系的工作，骨子里教学与创作矛盾尖锐，有怨气，逢人便说我是个业余画家，只能在星期天作画。按理说，在美院当教师，当然是专业画家，怎能自称业余呢？这说明交出自留地是不甘心的。

普及与提高之争，虽经陈沛一语道破，高等院校培养提高人材是天经地义，然而“左”的普及思潮怎能一冲便冲垮？大跃进势头来得特别迅猛，正规课程都被冲，我两次带学生下乡，一次在永定河青白口，一次在河北省束鹿县南吕村。南吕村那次是1959年春节后，已是大跃进高潮，“三同”内容大不相同：同吃是和农民一起吃大食堂；同住是分男女和青年突击队睡大炕；同劳动是自由参加生产队干轻活。最后阶段在村子里画壁画，表扬新人新事，歌颂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搞得人胡思乱想，反映在学生创作小品的内容，不是杜造神话，便是夸大现实。我画过一幅脚踩飞轮跨进共产主义的“六臂神农”，算得有创造性了，其实是套用敦煌壁画中的“如意轮观音”菩萨形象。这时我开始学写农民的顺口溜，在晚会上和农民同台朗诵，着实疯了

一阵。可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在南吕村看到一幅周思聪的创作小稿，画她在老乡家里病了，躺在床上，惊动了左邻右舍的老大娘小媳妇，给她送汤送吃，问寒问暖。我向同学指出，这才叫和农民打成一片，痛痒相关，什么老太扭秧歌呀，同吃大锅饭呀，模范戴红花呀，芝麻大如瓜呀，都是表面文章，不算真正反映农民的精神面貌。

大跃进是搞普及搞得最欢的时期，学生在教室里坐不住了，老师也觉得基本训练不一定要那么多，只要多搞创作就能提高造型能力，这就是所谓“创作带习作”。我们不否定创作可以带动造型能力的提高，我以往就是在各种美术工作实践中逐渐提高造型能力的。可现在是办教育，不能按照这个方式去拉长学习的时间。“创作带造型”的思想，引出了把教室搬到农村或工厂的想法，认为只有这样，才和生活靠得更近，保证能杜绝资产阶级思想，保证能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把教室搬到农村工厂去的做法，自然而然会发展成把整座学校迁离城市，以保证培养出来学生彻底工农化。“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整改阶段，不正是这样干的吗。据我所知，浙江美术学院把全院师生赶下乡去，在我老家桐庐县的一个山沟里建起了新校舍，可惜好景不长，空想的共产主义到底是空想，这股共产风刮得愈有劲，消失得也愈快。

大跃进的风刮过以后，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艺术，变成历史陈迹，艺术教育战线于1961年在北京举行艺术教育会议，重新肯定基本功的重要性，分专业的必要性。

在这个会议上，国画小组着重讨论了人物、山水、花鸟分科的问题。主张分科的理由，认为这几年美术院校大力提倡人物画，人物基础较好，山水花鸟基础很差，不能满足社会对山水花鸟的需要，因此必须改变现行的着重培养人物画家的方针，加强山水花鸟画家的培养，使这两门人才不致中断。不主张分科的理由，认为专长一门是毕业后个人创作实践和社会供求所促成的结果，院校的任务只能给学生向专长发展的必要基础，不能走单打一的近路；但也看到这几年过于侧重人物基础，大大削弱了山水花鸟的比重，已经出现这两门专业后继无人的状况，同意适当削弱人物课，加强山水花鸟课，达到掌握全面，平衡发展。

讨论结果，责成各院校考虑自己的条件，提早分科，扭转山水花鸟后继无人的紧急状况。

我是不主张分科的，为了服从会议的决定，开始准备人物、山水、花鸟分科学习，先由在校的三年级试点分科，经动员后，由学生自愿选择专业。这一班共有学生十九人，分科之后，计人物八人，由我和蒋兆和分别教，蒋兆和任科主任；山水七人，由李可染、宗其香教，宗其香任科主任；花鸟四人，由李苦禅、郭味美和田世光教，郭味单任科主任。1963年这班毕业，分配遇到困难：第一，必须照顾专业对口，如不对口，分科制度算不合实际；第二，全国范围用人单位可能去向，首先是教学单位，其次是创作单位，再其次是出版和工艺单位。我院人事部门虽然做了调查，只能求近，不能求远，北京国画院吸收了二名人物、二名山水……最后剩下二名花

鸟，分配到湖南轻工部门，一个分配在湘绣厂，一个分配在工艺美校。1964年第二分科班毕业，分配情况我不清楚，据说比第一班困难些。正在此时，政治运动又来了，这次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两个批示为纲，检查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整党内走资派，党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跑不了。系里积极分子把我1961年在广西、浙江画的速写画稿批了一通，还听说琉璃厂奉命不卖我的画了，为人民大会堂画的一幅画也退回来了，全国性的画展也排除了我的作品，非正式地给我戴上了“资产阶级画家”的帽子。陈沛成了美院最大的走资派，被打下乡去改造，美院背上了“黑色大染缸”的黑锅，全院师生被赶到邢台去搞“四清”，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大特务叶浅予”的大字报满街贴，先住牛棚，后住监狱，长达十年。1975年我从监狱被放出来，还不能定案，交本单位监督劳动改造，1979年才正式平反，还要我当系主任。十年动乱，个人受罪，学院关门，豺狼当道，斯文扫地，全国人民遭难，不多说了。

§4.1.5 1980年教改方案

长期以来，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路线，迂回曲折，循环反复，十年“文化大革命”，弄到关门大吉；加上“四人帮”的“批黑画”，把国画家打进十八层地狱。幸而“四人帮”及时垮台，给了我们一线生机。这番经历，算得多灾多难了。拨乱反正痛定思痛，应该冷静地思考，尊重客观实际，按照艺术规律进行教学。我一直认为，中国画教学中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要什么样的“造型基础”的问题。本来，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是需要“百花齐放”的，然而长期以来，“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之说，给中国画教学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深感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我回到国画系之际，“工农班”已届毕业，人物研究班刚招来，新一届正规班已读了一年，“左”的压力也已排除。在这样一个有利时机，我认为国画系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为了纠正长期以来重人物、轻山水花鸟的习惯势力，并排除“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紧箍咒”，我于1980年提出一个教学试行方案，主要措施是两条：

第一条，按照以人物为主的习惯思想，把花鸟山水提到优先学习的地位，来一个矫枉过正，分花鸟、山水、人物三个大单元，三年中轮学二次，第一学期为花鸟大单元，第二学期为山水大单元，第三学期为人物大单元；第四、第五、第六学期重复一次；第七第八学期定为侧重一门，自学为主。这样排列也是为了扭转单打一的思想，要求学生掌握全面，最后有所侧重。

第二条，以白描为主要的造型基础，写生与临摹并重，练形与练笔结合，打破长期以来练形练笔互相脱离、各自为政的局面；提倡在练形中练笔，练笔中练形。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反对灌输，提倡自学。规定一、二年级星期六为自学时间，三、四年级每周两个上午为自学时间。

此外，还实行教学班主任制，配备教师四人（班主任在内），助教一人，人物山水花鸟齐全，从一年级带到毕业。班

主任负责安排全班课程，督促检查教学。

这个新方案经全系教师会议通过，于1980年秋季招第一班学生。这个班1984年毕业，毕业创作每人三件，包括人物、山水、花鸟，这是新方案规定的毕业创作要求，都做到了，但水平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是这几年学生思想活跃，不大听老师的话；第二条是新方案不单设创作课，创作由专业教师带，加上农业政策改变以来，下乡实习遇到新情况，不能适应；第三条是“康素描”和“不以人物为主”的新措施，教师不能适应，甚至还有抵触。他们实际上在花鸟山水大单元中插了人物小单元，说是要保证人物造型能力。这是我们设计的新方案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待在实践中改正。

提出教学新方案之前，我对如何学习中国画的问题，作过多方面的思考，1979年我为《广州文艺》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人物画基本功问题。我认为，要学好中国人物画，在技术上应具备下列几个基本条件：（一）透彻认识人体构造和运动的解剖知识；（二）准确熟练地掌握比例、透视等视觉运动的规律；（三）具有明确、肯定而富于变化的线描技能，画出人的精确生动的形象。这样的基本功叫做白描功夫。我国历代画家对白描作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以“骨法用笔”四个字概括中国画的造型基础。如果我们对白描下的功夫愈多愈深，造型能力就愈强。

有人问，素描不是已经成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了吗？干吗还要另搞一套白描？不错，多数学校都已采用素描作为造型训练的基础课，问题在于中国画有自己的造型特点，而

且早已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自成体系。我们只能吸收素描教学的某些因素，例如体积凹凸和透视转折，这对认识对象的结构有好处；其缺点是往往受外光干扰，不能深入精确认识对象的原本结构，容易养成浮光掠影而不求甚解的习惯。特别重要的是，素描工具是铅笔或炭条，白描工具是毛笔，前者硬，后者软；前者用指力，后者用腕力；前者笔触变化小，后者笔触变化大，效果很不相同。有人素描相当好，一拿毛笔就走样，原因在于素描论者把毛笔这个工具看得过分简单，不知道它要经过长期锻炼才能运用自如。

有人说，白描造型的长处是刻划物象的外部轮廓，不能充分表现物象的体积、质感、光源、投影等因素。我并不反对学生学素描，可以作为分析和认识对象的拐杖，可以为白描打前站，但到时必须甩掉这根拐杖。至于造型的上述因素，要看你从事的是哪一门绘画，是否必须强调所有这些因素。对国画来说，既然以线造型，它在表现物象时，只能根据这个需要来决定这些因素的强弱和取舍。比如版画，也有自己的独特表现方法，也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其它素描基础，是为近代油画服务的，怎么能强求其他画种和它取得一致呢。

同是造型艺术，为什么要有国画、版画、油画之分呢？同是版画，也还有苏联版画和中国民族版画之分，都是因为各画种有其各自发展的条件和历史，从而形成其特点。国画以线造型，正是为了发挥它的特点。形成画种特点的因素，除了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因素，还有一个物质基础，即不同的工

具：国画用墨用水，版画用刀用板，油画用油用布，不能互相代替。承认不同画种的特点与个性，并不排除互相影响与渗透，但是必须在不损害其特点和个性的前提下进行这种影响与渗透。有一个时期，版画愈刻愈大，套色愈套愈多，向国画油画看齐，造成版画创作脱离版画特点的危机。也许作者不以为是危机，读者的批评却很尖锐，他们说，看国画油画好了，为什么要看版画？国画有个时期，也有这种倾向，曾经流行过“素描加水彩”。

一花独放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条，束缚了我们二十年，1980年的素描教学会议才开始解冻，承认素描的百花齐放，承认要根据不同画种的需要决定教或不教和怎么教。我在这个会上作了书面发言，除对素描表达了我的看法，也对国画教学特点提出了我的意见：

（一）线描造型是中国画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有手段，从来学画都是从白描双勾入手，以骨法用笔取形；一开始就用毛笔造型，在练笔中练形，在练形中练笔，二者齐头并进。

（二）学国画的传统方法是光临摹、后写生，二者反复交替进行，提高造型和用笔的能力；临摹并非单纯练笔，要兼学造型；写生着重练形，同时学练笔；二者方法不同，目的一致，使造型与笔墨紧密结合。

（三）我国“五四”以后兴起了美术教育制度，从西方移植过来，先学素描，从而发展了油画版画新品种，但在解放以前的美术院校中，国画专业教学仍然遵循传统的方法而自成体系；解放以后，这个体系被“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打乱了。

（四）素描课的对象是人，从石膏到人体都是为了研究人，表现人。认为只要把人画好了，造型能力就解决了，甚至认为只要把素描画好了，拿起毛笔画宣纸，就是中国画了。事实证明，这是不科学的。以山水花鸟为例，不去研究自然界的一切生态，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画人，不能保证能画好山水花鸟。

（五）过去二十年过份强调以人物为主的教学方针，排斥了山水花鸟，出现山水花鸟的断线，从而也枯竭了人物画的技法营养。

新的教学方针所以把人物、山水、花鸟颠倒过来，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当然，经过时间的推移，可能还要颠倒回来。但是，一个新措施的推行，总得让它稳定一个时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老是折腾。

§4.1.6 三十二字研究班

1979年我恢复工作以后，国画系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1980年教学体制改革；二是办了两期研究班，一期人物，一期花鸟、山水，学程都是两年。

人物研究班是1979年根据文化部的指令招来的，原定十二名，后又增加四名，共十六名。这个班由我负责，姚有多当教学班主任。开班的任务是培养较高水平的创作干部和院校后备教师，入学资格规定美术院校毕业，或具有同等业务水平者，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录取学生中，本院及其他院校毕

业生占一半，自学和文化艺术馆美术干部、中学美术教师占一半，他们都有一定的美术工作和创作实践的经验，并已显示出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我们根据这个特点，着重因材施教，发挥自学的积极性。两年中安排了几门必要的技术补课，开设了水墨写生、重彩临摹、人体速写等课，其余时间，按个人需要，安排自学；指定沈宗赛的《芥舟学画篇》、郭熙的《林泉高致》、邹一桂的《小山画谱》为必读画论。两年中还分赴敦煌和永乐宫学习古代壁画艺术，同时在两地附近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规定最后一个学期为毕业创作单元，交毕业创作一件和有关中国画的学术论文一篇。在教学过程中，提出了三十二个字的教學要求：

取长补短，因材施教；自学为主，启导为辅；涉猎中外，吞吐古今；鼓励独创，打破划一。

我和姚有多随时研究在学习上出现的问题，抓住课堂和实习单元的成绩观摩，鼓励学生自评与互评，充分注意各人的特点，尽可能引导学生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做到取长补短。记得我曾指出练笔要有内容、有目的，不能单纯为练而练，反对“无的放矢”；对人体写生课指出进过美院的人应特别注意人体在运动中的解剖变化，没上过人体课的人应补足解剖知识；学习古代壁画回校时，指出欣赏魏画变色效果，不是学习敦煌壁画的正确态度，同时对永乐宫形象的变体画加以鼓励，这是希望学生对生活形象具有面面观的想象力；有的同学的人物写生习作上添了一枝花或题几个字，当作创作，指出这是形象游戏，应该反对。

这一班的毕业创作，严肃认真，内容多样，形式多样，体裁多样，风格多样，受到美术界的重视。他们的毕业论文，也写得相当出色，有几篇分别在《美术研究》和《中国画研究》先后发表。浙江美院的领导还到我们系来交流经验，要我们把毕业创作送到浙江去展览，这对我们是一次极大的鼓励。

当1979年人物画研究班招生时，许多人责问我们，为什么不办花鸟山水班。这一问，问着了我們偏重人物、轻视花鸟山水的老毛病。1980年开办了花鸟山水两个班，学生每班五人，花鸟班由李苦禅、田世光负责指导，郭怡宗为班主任；山水班由李可染、梁树年负责指导，张凭为班主任。花鸟班还请南京艺术学院教师高冠华来京兼课，山水班请天津画家孙克纲来京兼课。这两个班1982年毕业时，分配工作遇到一点麻烦，学生都想留在北京工作，不愿回原地方去，但也不让学生自谋工作。这要追究到行之很久的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毕业生的制度，历来分配毕业生，不太尊重专业特点，往往不对口径，找错婆家，姑娘不愿，不得不退回娘家，重新分配。人物班有个学生，分配到山东，本来决定送到山东艺术学院去当教师，可是那儿的人事部门把他派到群众艺术馆当干部，他不愿意，于是回到北京，要求重新分配，扯皮扯了两年才解决。花鸟山水班也有这种扯皮现象，拖了半年才分配完毕。因此，考虑到我们的就业分配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条件，必须彻底改变，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才能避免这种麻烦。关于就业分配，除了打破现行的人事制度，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正在发展，就是：社会对美术人材的需求正在萎缩，对美

术作品的需求却在扩大。换句话说：社会上要画不要人，宁肯出稿费买画，不愿在单位里养一个画家。这个情况“文革”前已经抬头，“文革”中反“三名三高”的大浪把它打了下去。现在城市经济改革即将来临，大锅饭吃不长了，1985年美院招生，讲明不包毕业分配，考生不多，招不足额。看来，人事制度和办学制度不得不根据新情况，作出应变的准备。

美院领导层曾考虑改变办学方针，专办研究班，不办普通班，他们看到研究班的创作水平相当高，培养也省事。现在应该分析一下研究班的成绩如何得来？我认为根本条件在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乱，社会上积聚了大量被遗忘的有才能的好学之士，我们及时把他们收集起来，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合理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成绩的得来有其偶然性，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偶然性，看成必然性，似乎不符合实际情况。今后再办，是否有此成绩，值得研究。如看到1984年不太理想的进修班成绩，可能会清醒一些。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当前学风不稳，普通班毕业成绩内容空虚以及华而不实的现象，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4.2 我的政治鉴定

“文化大革命”后发还的抄家物资中，夹着一份人事科对叶浅予的“鉴定”，原文如下：

一、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但为人圆滑，平时不易暴露思想；和党的关系，故做清高，尚有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好，对右派斗争较积极，双反开始又想出去画画，后期烧得较透，逐步暴露批判，有所进步。

二、一般尚能完成任务，但对教学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工作不够负责，整风结束后有很大转变，工作比较主动。

1959年3月

此外，还有一份人事科所拟的“叶浅予小传”，原文如下：

叶浅予，又名叶纶绩，男，现年五十一岁，浙江桐庐人，家庭出身地主，无党派民主人士，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中国画系主任，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

1924年曾在厦门大学补习班补习半年，1925年开始曾在上海三友实业社、上海中原书局、上海漫画、时代图书公司等处任绘图员、漫画编辑等工作；1935年任南京《朝报》特约供稿人并兼任《扶轮日报》画刊编辑；1937年秋漫画界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叶任队长，在南京武汉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伪军委政治部三厅任科员、副科长等职；1942年在重庆、桂林等地旅行写生；1943年曾受美军司令史迪威邀请，以战地记者名义赴印度中美训练营画画半年；1944年秋在

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任专员半年；1946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参观一年，1947年回国后，任国立艺专教授；解放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科主任。

叶不是正规美术学校出身，是从画漫画报刊编辑奋斗出来的，漫画创作较多，成名较早。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画长篇漫画《王先生到农村去》及《小陈留京外史》，因取材滑稽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但当时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政治立场。后又先后出版《浅予速写集》、《旅行漫画集》、《今日中国漫画集》等画集十余种。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的成就，尤其在线条方面，在舞蹈速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用笔老练，博得读者喜欢。但由于政治思想及文艺思想上，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及美术界的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与电影、戏剧、出版、漫画界均有联系。

抗战前叶在政治上为自由主义者，抗日初期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对抗日一般表示支持与参加，后态度消极，对政治避而不谈，常说“政治是把戏”，与进步力量有一定的距离。抗战后期逐步倾向美蒋反动派。因1943年赴印度中美训练营为美蒋画画得到美特的欣赏，1944年由美特推荐，匪军统局处长王一心、王星衡介绍经戴笠批准并谈话后派往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任专员，负责漫画宣传工作，得到美蒋的重视，给予较高的待遇。任职期内经常与美特组长孟禄少校密谈并在中美所决策处主任秘书潘其武的楼下办公。究竟有何秘密勾当无法查清。另据中美所气象组长程俊检举，“叶是由

戴笠批准为军统局设计委员会派驻中美合作所”（目前尚无法查清）。后中美所受到舆论反对，叶即于1945年介绍廖冰兄代替其工作离开中美所。离开中美所后，与美国新闻处来往较密，为他们供稿作画，供作反动宣传。由于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作为文化使者，于1946年赴美参观一年，并在“美国之音”广播“美国漫画”。回国后又和美国新闻处经常来往，重播“美国漫画”。在课堂上宣传美国文化，成为美国文化的宣传者，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1947年由美返国时，乔冠华、夏衍同志曾劝其留香港工作遭到拒绝。解放前北京美术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绝参加，可见叶长期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参加美帝特务机关，政治上反动，但表现圆滑，为政治上的投机分子。

崇美思想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很深，为人圆滑，不轻易（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但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历次运动对思想改造不主动，工作一般尚能完成任务。但长期不安心系主任工作，数次提出辞职，对待工作是“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作风上不民主，家长式的领导。整风开始后态度开始转变，反右后期表现较好，“双反”中烧得较透，逐步有所暴露和批判，工作责任心加强了。但对党仍表现清高。

1959年3月

两个文件均为1959年所定，对叶浅予的看法可以归结为

下列几点：

（一）崇美思想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很深，为人圆滑，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是个投机分子。

（二）在政治上为自由主义者，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表示支持和参加，后态度消极，说什么“政治是把戏”，与进步力量有一定距离。1947年从美返国，乔冠华、夏衍劝他留香港工作，遭叶拒绝。

（三）1943年赴印度中美训练营为美蒋画画，得到美特的欣赏，推荐给军统局戴笠，由戴笠任命为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专员，负责漫画宣传工作；其后又与美国新闻处来往甚密，因此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作为文化使者，于1946年赴美参观一年，回国后在课堂上宣传美国文化，成为美帝文化侵略工具。

（四）叶不是正规美术学校出身，是从画漫画及报刊编辑奋斗出来，成名较早，他的长篇漫画《王先生》和《小陈留京外史》因取材滑稽，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但无明显的政治立场。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博得读者喜欢，但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

（五）叶为著名画家及美术界的活动家，与文艺界联系较广，因党对他重用，给了他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也愿意跟着党走，对党的政策一般表示拥护。历认政治运动对思想改造不主动，长期不安心系主任工作，数次提出辞职，自称“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

（六）作风不民主，家长式领导，1957年整风开始后态度

开始转变，反右后期表现较好，双反中烧得较透，逐步有所暴露和批判，工作责任心加强了，但对党仍表现清高。

1959年以前，在美院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叶浅予是个自由主义者，他之能在解放后跟着共产党走是有条件的。正如“鉴定”所指，是因为党给予了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什么共产党能给予较高的政治地位？可能也如“鉴定”所指的，因为他是著名的漫画家及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是个重要的统战对象。换句话说，是我的艺术地位换取了共产党对我的重用。在人事科的一些人看来，这个对进步事业表示一定距离的画家，跟共产党办美术教育事业，是政治上的投机行为。他们不知道我之进北平国立艺专，是徐悲鸿邀请来的，而北平艺专改组为中央美院，是共产党接管以后的必然结果；叶浅予之被继续任用，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怎么能说是政治上的投机呢？即使在叶浅予的灵魂深处有政治投机的因素，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来说，也是值得欢迎的。何况，在北平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曾经公开表示欢迎这种“投机”。照我对政策的理解，也认为“投机”革命比反对革命好，所以党对知识分子敞开大门，热诚相待。至于说我不安心教学工作，几次要求辞去系主任职务，看了我1985年为《美术研究》写的《任教三十六年》中的艰难历程，便能看清楚我为什么不愿意干这个系主任的原因了。

看来，这些人所最关心的是干部的思想动态和政治立场，他们不太了解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业务和政治的关系；一旦业务受到挫折，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必然产生消极情

绪。1982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的“自序”中，曾经直率表达过我对教学工作不习惯，有临阵脱逃之意。所谓“教学为公，创作为私，社会工作对胃口”，确实是我的真实思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除非是个大傻子，才会不这么看问题。我之所以辞职不干那个系主任，如果不从业务活动的角度看，而只从政治态度看，那就把一个有创作愿望的画家看得太简单了。我在“自序”里还说，经过一段时间，认识到教学生可以提高老师的业务水平，于是放弃了逃离教学岗位的念头，从此“甘为人师”了。可见思想认识有个发展过程，政治立场也有个渐变的经历。

北平解放不久，我和一些早年投奔延安的朋友在北平见了面，特别是有几位在武汉三厅同过事的老相识，我表示对革命的畏缩与无知，他们无不哈哈大笑，说“老叶你太谦虚了，我们了解你在大后方的活动，对抗日救国是积极的。”有个朋友甚至说，我们欢迎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你就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这话一半真，一半玩笑，意思是说，北平解放，你还留在北平，不就证明你是倾向共产党的吗？

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正确理解应该是党外的共产主义者，只有鲁迅才配得上；对我来说，不仅不配，而且荒唐，简直是讽刺，这我心里明白。

1948年我给北平《新民报》画过一套《天堂记》连载漫画，挖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疮疤，证明我不是什么“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在“美国之音”介绍美国漫画界的情况，就叫文化侵略吗？80年代的中国，大量文化艺术界的青年外流到美国，

这难道能叫中国文化侵略吗？也许相反，可以叫做向美帝赠送文化财富。

1979年10月，我治肠癌后期，住在三〇九医院，正值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纪念会上回顾党的三十年历程，我自己也回顾了三十年经历，在日记里写道：

1949年在北平围城中，和民主党派人士在大佛寺我的住处，密谋如何迎接解放，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民盟的沈一帆和党联系。沈汇报中共的话说：“北平解放了，我们成了北平的主人，应该由我们来欢迎你们。”不久，我们这些人被邀请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大会。主持这会的是叶剑英，将领中有林彪。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北平各界代表人物，还有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和谈代表团。

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地改革，在群众大会上画速写，受到工作队长的批评，才懂得搞政治的时候不能搞业务。以后的长期思想改造中，竭力想把这两者摆平，几次三番学习文艺座谈会讲话，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怎么也摆不平。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处于徐悲鸿和江丰之间作调和派。

1950年自动要求参加中央访问团，初次到新疆，什么都新鲜，画了不少速写。这次和土改不同，因为我是以画家身份参加的，作画不受干涉，但有土改那次经验，仍然缩手缩脚。心里想，访问少数民族，也是搞政治，怎么可以随便搞业务呢？

1953年画了《中华民族大团结》，1959年画了《北平和平解放》，1962年写了《我爱农民的一双泥脚》，自以为为工农

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其实是自我陶醉。

1959年没有被划为右派，因为我那时跟党的步子跟得紧，反右斗争积极批过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平时不发表个人的意见，遇事随大流，许多朋友都因错误言论戴上右派帽子，在反右小组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比自己陶醉实际得多。

文化大革命终于革到我头上来了。我戴上三顶帽子：第一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是反动学术权威；第三是文艺黑线人物。被造反报批出来，挨打住牛棚，最后还坐了七年牢。

三顶帽子的来由，看来和1959年的“鉴定”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第一项历史反革命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写得清清楚楚。在中美合作所当过漫画宣传的专员，受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礼遇，经常和美帝特务组长孟禄少校密谈，怀疑我和美特有秘密勾当，可惜无法查清。为了查清我这个美蒋双重特务的秘密勾当，“文化大革命”中美院一些人在我住牛棚期间，审了我一整夜，到底审不出任何秘密勾当。幸亏那时造反派还讲点文明和纪律，若是对我施加毒打刑讯，我可能会被屈打成招，真的成为不折不扣的特务恶棍。

第二项反动学术权威帽子，在“叶浅予小传”中也有根据。小传说：“漫画创作较多，成名较早，因取材滑稽，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出名；后来画国画，学了些中国画的传统技法，有一定成就，在舞蹈速写上能吸收民族形式，博得读者喜欢，他的艺术创作与今天时代的要求有很大距离。”因为我在中央美院是二级教授，又当国画系主任，肯定是学术权

威，给权威戴上一顶反动帽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况且我在反右斗争总结会上曾经自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抓住我的速写画稿狠狠地批了一通，可谓顺理成章，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跑得掉？

第三顶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来自小传中那一段所谓“叶为著名的漫画家和美术活动家，在文艺界联系较广”，以及和“四条汉子”中的田汉、阳翰笙、夏衍关系密切，抗日战争时期是第三厅郭沫若的部下，当过漫画宣传队的队长，肯定是黑线人物。30年代江青在上海文艺界活动过一阵，严格说来，她应当也属于所谓“文艺黑线人物”。为了涂改这一段历史，卸掉自己头上这一顶黑帽子，她利用“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大权，把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活动人物一概打成黑线人物，装扮自己为反黑线英雄，把中央美术学院诬蔑为黑色大染缸，把美院党委书记陈沛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走资派。在陈沛的羽翼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重用，百分之七十的教师关进了牛棚，“四条汉子”中的三条也被关进了监狱。

“四人帮”倒台以后，共产党的新领导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冤假错案平了反，而叶浅予这个黑线人物，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摘掉三顶帽子，恢复了国画系主任的工作。1959年的那个“鉴定”和“小传”，夹在退还给我的抄家物资中，不知是故意还是失误，至今还弄不清。如果是从我的档案中抽出，有意发还给我，让档案和本人见面，那就说明人事工作有所改进，这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因为工作疏忽，无意之中将档案漏出，那就说明保密工作出了差错，我以为

也是好事，而且比有意发还给本人还要好，好就好在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任教三十六年》这篇文章是美院院刊《美术研究》的编者要我写的，因为1984年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我从国画系主任的职位退下来，院刊要我写一篇总结性文章，我理所当然应该写。岂知一动笔，便勾起了三十六年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江丰的反国画路线发了牢骚。那时江丰已经去世，院刊原来不打算发表我的文章，后来编者找我，希望有些措辞稍加改动，显得态度平静些。我表示可以接受，便动手在某些地方加以修改。

从“鉴定”和“小传”看，叶浅予是个有问题的人物，比如“和党的关系故做清高，尚有一定距离，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为人圆滑，不轻易暴露自己，政治上看风使舵”。“反右斗争后期表现较好，对右派斗争较积极”，这就是看风使舵的表现，因为这是斗争的“后期”，反右胜利形势已经明朗，再不表现一点积极性，那就难免要戴上落后分子帽子，多不光彩。又比如“对教学行政工作长期不安心，几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想回到自由创作的地位中去，甚至想干脆打报告请求“离职”，可是又觉得“脱离革命岗位”太不光彩，于是又勉强当我的系主任，因而表现为“工作不负责”。

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所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类人，都有点个人的特长，并以之为职业，靠本事吃饭，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我属于拥有一定

读者的职业画家，用革命的语言来说，就是指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文艺工作者。解放后之所以能被留用，甚至竟被误认为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专业人事工作人员的眼光看来，必然具有迷惑性、欺骗性、投机性。我那些从延安来的老相识，因为都是文艺队伍中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中，除马列主义标准，也还有文艺工作标准。进城以后，见到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旧社会形态，也许能发生某种错觉，对留在大后方的同行，产生某种同情，把革命文艺事业看成整个中国人民所同当与共享的事业，带点人情味看待老朋友，因而能够以诚相见，不让老相识有自惭形秽之感。

1949年北平解放，我四十二岁，这一年是我进北平艺专的第三年，解放的浪潮冲击着旧社会的各个角落。由于在抗日大后方的活动，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联系方面较广，加上与进城的革命队伍中人有旧关系，成了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吸收我参加了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选举我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副主席兼秘书长。此外，还吸收我参加全国青年的代表会议，北平市人民代表会议。记得还曾被新成立的北平艺专工会推举为什么委员。总而言之，在这一年的许多会议中，凡挂得上号的，我都被挂上了。说实话，我当时参加这么多活动，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谓“统战对象”，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在模模糊糊中，也还明白我的主要任务在美协，要做好秘书长的工作。

美院拨出一间教室作为美协的总部，记得第一个任务是

筹办《人民美术》出版，该刊的主编者是王朝闻。王约美协的几个负责人写文章，我写了一篇，表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江丰也写了一篇，介绍解放区的美术活动；徐悲鸿写了一篇介绍西方美术的文章，赞扬希腊罗马艺术传统，把它作为发展中国新艺术的借鉴。王朝闻拿了徐的文章和我商量，认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不合拍，解放不久发表这样的文章不很相宜，要我和徐商量，暂不发表。我身为秘书长，有责任协调革命派和学院派之间的矛盾，便拿了文章去见徐悲鸿。当时心里很嘀咕，万一徐有不满情绪，怎么办？幸而徐的态度很谦逊，认为应该尊重共产党的意见，把文章收回了。

1952年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举行了小规模文艺整风，美协工作要做检查，秘书长只好硬起头皮向常务理事会作了言不由衷的书面检查。江丰、蔡若虹他们觉得我这个党外人士担当不了秘书长的重任，不久，接受我的推荐，由刚从华大学习期满的郁风接替了秘书长职务，使我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在这三十六年中，教学之外，社会活动较多，自从摆脱了美协的具体工作，又陷入到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中去。

“小传”云：“解放前，北京美术家协会为对抗北平美术会（张道藩操纵的反动组织）发表宣言时，叶拒绝参加，可见……政治上反动。”据我所知，北平美术会是国民党所利用的北平国画界反对徐悲鸿的一个组织，而北京美术家协会

正是徐悲鸿提倡国画创新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北平艺专的教师。我初到北平时，正是北平美术会向徐进攻，而徐进行回击的时刻，我是徐的部下，当然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小传”说我故意拒绝参加北京美术作家协会的宣言，有点近乎荒唐。

说实话，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到1937年，我到过北平两次，结识了不少知名的画家，1947年到北平，仍和他们交往，得知他们正在反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言论，我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尽管自己在创作上也是革新派，可是对传统画派也很欣赏，不愿意公开卷到这场斗争中去，所以没有积极参加美术作家协会的活动。我以为不应该就此一事，便诬指我是站在国民党张道藩方面的反动派。

北平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了北平艺专，艺专一分为二，音乐系分出去，自立为中央音乐学院；美术系和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原来的国画、油画、版画三个专业，合并为绘画系。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运动，在自己的学院是销声匿迹，其原因已在前文详述。总之，当时认为国画是封建糟粕，不能为革命服务，只能暂时靠边，原来的国画教师编为勾勒课的教研组，为普及美术的年画连环画服务。徐悲鸿本人，虽被尊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兼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他的原国画革新主张，也暂时被冻结起来。中央美术学院以培养普及美术干部为中心任务。徐悲鸿交给我的国画专业最后一个班，不久毕了业。我除担任勾勒课教研组的组织者，每天在一个教室里和其他国画教师一道画人物

写生，实行业务改造。

此时我还兼着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的秘书长职务，有责任去联系处于失业状态的北平国画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首先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然后再谋求如何为革命服务的具体工作。由于我和其中几位知名的画家早有联系，美协的党内理事，就顺水推舟，交给我组织“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的任务。以美院的国画教师为骨干，经过奔走联络，在东城租到一所院子作为活动中心，挂起研究会的牌子，向北京市挂了号，作为北京市文联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每月由市文联拨经费，吸收了几位积极分子担任研究会的具体工作，并且拨出一部分经费作为生活补助费，帮助穷画家解决生活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活动，选出了研究会的领导班子：齐白石为会长，于非阁、徐燕芬、博雪斋、汪慎生、吴镜汀、陈半丁等著名画家为理事，王雪涛为秘书长。我在研究会也挂上了理事的名。

在和画家们的交往中，了解到部分画家对徐悲鸿的国画革新还持有成见。他们对我说，要不是共产党出来领导我们，我们对你也不买账。在他们心目中，我当然属于徐派，而且认为我本来是画漫画的，半路出家画国画，他们根本瞧不起我。

反右以后，研究会经过整顿，归北京市文化局直接领导，派赵枫进会掌握行政，成为“北京中国画院”之外的一个群众组织。

在这以前，我作为美协的领导成员，兼管研究会的活动，

遭到上述种种攻击。到反右前夕整风期间，我在美院国画系的整风小组会上，向党提了一条意见，说党把我放到北京国画界做群众工作，成了某些人的攻击对象，受了许多委屈，美协的党组织却袖手旁观，不加声援，叫我寒心。提完这条意见，我宣布就这一条，没有其他。接着我就躲在家里赶画《子夜》插图，没有继续参加会议。“鉴定”说：“大鸣大放时以民主人士自愿为名不参加整风”，这与事实不符。对党提意见，我是提了的，提这条意见的目的是提醒党，在使用叶浅予的时候，是否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使他在风浪之中稍稍有点保护。

§4.3 追记大跃进年代

1958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农村公社化也迅速完成，党中央号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先是全民炼钢，后是农业大跃进，群众运动处于疯狂状态，一心以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已近在眼前。一切生活、生产常态都被冲垮，谁要是走得慢一点，不是被硬推前进，就是被踩倒在地，让敢想敢干的人从身上踩过去。那两年我不敢落后，从农民那里学会编顺口溜，歌唱社会主义；订创作计划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日计，唯恐订少了，被人笑话，戴落后帽子。现在事过境迁，从画筐里捡出我那本《大跃进诗画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第一页《多面手》，顺口溜写道：

体脑并用，文武双全，多面能手，干劲冲天！工农商学兵，一身兼。

第二页《农业中学》写道：

半日读书，半日出勤，既是学生，又是农民。教育与劳动关系紧密，脑力体力从此结合。

第三页《劈山大渠》写道：

黄羊山下桑干河，古来无人将它堵；如今劈山寻常事，桑干河水上山坡。

第四页《卫星玉米》写道：

庄稼顶上红旗飘，疑是麻雀遭围剿；
走进玉米试验田，十八罗汉一稳摇。

第五页《棉花盖棉被》写道：

深耕厚肥保丰产，覆被张灯却风寒；
日夜滋长无休时，艳称徐水棉花王。

第六页《万猪社》写道：

怀来万猪社，争夸西榆林；
场长善体贴，青春二十另。

第七页《果林拜师》写道：

到农村，事事新，知识分子走马赶先选
果树下，开讲座，农民老师演说大跃进。

第八页《猪圈无蝇》写道：

积极分子少先队，手执蝇拍除四害；
因何指标完不成，苍蝇不到猪圈来。

第九页《诗歌乡》写道：

怀来县委有诗人，下放作家是乡长，
主任原是老歌手，花园乡里诗满墙。

第十页《塞上江南》写道：

点点浮渔舟，处处忙插秧；
分明是塞上，一跃变江南。

第十一页《新村》写道：

为因避低湿，合力迁村庄，
不分你与我，一律向阳房。

第十二页《牛爸爸》，写道：

张北高原海子边，牲畜增产牛领先，
中原送来大红牡，黑白花黄齐配边。

1958年我还有一幅六尺立轴，标题《六臂神农》，题诗云：

多面神手是公民，身兼工农商学兵，
脚踩飞轮争上游，闯进共产主义门。

1959年春节刚过，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来到河北省束鹿县南吕村实习。全国农村掀起的诗画运动中，南吕村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七言、五言的排句诗歌，歌唱大跃进，歌唱三面红旗。我们学习艺术的人，自以为只要心虔意诚，谁能从农民那儿学到先进思想，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后来证明，那是刮“共产风”，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进村之后，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集中在小队食堂吃饭。那时，大跃过轰轰烈烈，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队组织男女青年两个突击队，建起两座大席棚，男女分两厢，集中全村最棒的单身强劳力，集中生产，集中生活，种集体试验田，吃集体大锅饭。上工、下工，吃喝、睡眠，都按吹哨打钟行事，俨然是个共产主义小社会。我们生活这样的环境里，看到近在眼前的共产主义，心里感到飘飘然。

这次下去实习，规定第一阶段向农民学习，着重改造思想；后一阶段画农民，搞创作，从艺术实践检验学生思想改造的成果。这种安排，足以证明我们带队的老师们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得多么简单，把思想改造看得多么快速。实习将近结束时，我们开了一次创作小稿观摩会，小稿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不用问，当然全是南吕村的疯男疯女，怪人怪事，比如青年突击队啦，吃饭不要钱啦，诗歌满村墙啦，婆婆扭秧歌啦，结果当然是构思雷同，题材撞车。独有一幅小稿，画的不是上面那些撞车题材，而是画了一个女学生，躺在炕上，房东老大娘坐在炕沿给她喂汤，同院的妇女都来慰问，题目是《我病了》。这个不同凡响的构思，促使我那浑浑然的头脑

立刻清醒过来，认为这是一张鹤立鸡群的好小稿。我问这个学生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她说，“我病了，吃不下饭，不能去食堂，房东老大娘发现之后，给我煮面做汤，邻居们也都来看我，有送鸡蛋的，有送糕点的。您知道，老乡在食堂吃的是白薯面窝窝，留下一点白面、鸡蛋是给孩子们吃的，都给了我，把我当亲人看待，我要画她们。”

那几年的创作指导思想是先有主题，后找题材，下到生活都带着框框，什么能画，什么不能画，都得服从这个框框。这个学生脑子里当然也有框框，不料她得了病，病中深深为大姐大嫂们对她的关怀所动，一股感情热流冲破了她的框框。我这个当老师的，脑子里的框框当然更多，叫我如何评价这个学生的创作构思呢？若是凭当时的框框来评价，这个构思当然应被否定，然而在那么多的公式化、概念化、神话化的创作小稿中，《我病了》这幅小稿犹如一颗明珠，发出强烈的冲击波，冲破了我头脑里的框框。我毅然决然肯定了她的构思，并且向同学们说：“《我病了》这幅小稿，表现农民对我们的关怀，反映了我们和农民之间建立了感情，这是从实际生活的感受发掘题材从而凝成主题的好例子。我们应该提倡这种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构思。”

这番话是这幅小画的真情实感引出来的。我敢于冲着那么多大跃进的豪情壮语而赞赏这富于人情味的生活小品，岂不太过份了吗？我意识到这番话是在和大跃进大潮流唱反调，心里有点嘀咕，可当时并没有受到反驳，相反，事后和老师们的交谈中，都认为我对创作《我病了》那个学生的评语是

对的。这么一说，我们带着特定的主题框框下生活是错了。

在“全国艺术教育会议”一节里，我回顾了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两次下乡的情景。从那时开始，我向农民学写顺口溜；学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和农民同台朗诵诗歌；也在绘画创作上发挥共产主义的大胆构思。那一年我画了《大跃进诗画》册页十二开，《六臂神农》一大幅，着实疯了一阵。但是，我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在许多事实面前，心里并不真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超科学、超现实的幻想。比如，肯定那个女学生富有人情味的创作构思，说明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又比如1958年带学生在永定河畔清白口傅家台实习期间，村干部用算盘子一打，说全村几百口人的口粮，只要在两亩地里撒上足够的麦种，就解决了，可以把全村的地匀出来种经济作物，那样，傅家台便进入共产主义了。他们说到做到，硬是在沿河的地里选上两亩，把全村口粮所需的麦种都撒到经过深耕的地里，盖上一层厚土，浇上大量的水，等候出苗。有老农在旁看着直瞪眼，说，你们这么作贱麦种，不怕老天爷发火，天打雷劈！村干部听了直笑，笑老农们只懂老黄历，不懂新事物。过了十来天，麦苗出不来，村干部有点急了，直叫“灌水！灌水！”过了几天，苗果真出来了，密密麻麻，挤满两亩地，于是敲锣打鼓，叫人来看，老农们也傻了眼。岂知再过几天，所有的苗全黄了，蔫了，村干部可真急了。我们美院的师生们原先也为村干部的大胆设想所迷惑，对老农民的意见不以为然，现在看到如此结局，心里开始明白过来。几百人的口粮种子，少说也得几百斤，把这

几百斤麦种撒在两亩地里，别说挤，怕还得重叠一两层；麦苗出来了，没地方扎根，不扎根，可不就得蔫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例，我亲眼见到了。

另一个违反生产规律的例子，真叫人可笑。那年在束鹿县南吕村实习，看到村干部的试验田，排列在村口一片地里，方方正正，同样大也一块连一块，每块地头插上标牌，从公社特派员排起，以下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小队长、妇女主任、会计、饲养员……总共十来块，每块标牌写明亩产数量。使人奇怪的是，最高产量是特派员，每亩一万斤，大队支书九千斤，大队长八千斤，职务愈小，产量愈少，依次序递减，也就是说，以职务大小而不是以干劲大小定产量。“人定胜天”这句古训，到了大跃进年代，变成了等级制观念。

我问特派员：“为什么全南吕村就你一个人干劲最足，产量最高？”

特派员板着脸回答：“你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吧？请问南吕村谁的胆最大，干劲最足？除了我特派员还有谁？”

我心里想，倒也是，他是由公社党委派来领导大跃进的特派员，要不是胆大干劲足，能领导得了全村的革命大跃进吗？

我问：“为什么你以下的试验田产量必须一级比一级少呢？这是你规定的吗？”

特派员这才收起严肃的脸变为爆笑的脸，说：“这叫相互客气，尊重领导，怎能由我规定。”

我问：“到秋后，产量准能达到吗？”

他回答：“产量嘛，多多少少总有点出入，还要靠老天爷帮忙吧！”

我又问：“什么叫‘人定胜天’？”

他说：“牌子上的产量，主要目的在鼓鼓群众的劲，这就叫‘政治’。你连这点都不懂吗？”

我连连说：“懂了，懂了。”

干部试验田的等级制，我们一群书呆子议论了好几天，都说特派员作风不民主，至少他那一万斤产量是说大话。为了这事，争论不休，我怕和村里关系闹得不好，便也学特派员的口气说：“这叫政治！你们连这都不懂，我们下乡来实习是干什么的？是来向农民学习的呀。特派员是农村工作的领导，我们首先要向他学习，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这一说，果然灵，以后再不议论这一类事了。

第二阶段要画农民，第一个任务是为南吕村画一幅大壁画，画南吕村的远景规划图。如何规划，当然要请示特派员，特派员要我们去找大队长，大队长说，你们见多识广，也熟悉本村情况，由你们去闹吧，该咋闹就咋闹，反正愈红火愈气派愈好。得此信任，就由学生去设计，不几天食堂临街的大墙画满了。乡亲们每天来看热闹，有的说，这也好那也好，缺少一座大礼堂；有的说，只画青年突击队，不画领导，还差点劲；有的说拖拉机只一辆，似乎少了点；有的说“芝麻大如瓜”也该画。这些议论，证明知识分子的头脑不如农民想得周全，想得大胆。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带来了大跃进的冲天干劲，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一跃而为初级社，再跃而为高级社，不到半年，全国农村普遍公社化了。接下去便是大炼钢铁，人们把铁门、铁床、铁锅都交出来炼钢了。

中央美术学院在大炼钢铁之前，来了一次共产主义大学习，思想大跃进。中国画系教师学习会，感染了农民的冲天干劲，认为共产主义即将来临，重要的标志应该是全体教师共产党员化，几年之内，所有党外人士一概发展为共产党员，要百分之百，不要百分之几。进一步讨论进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思想准备怎么样？有人说，到那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噢！马上就有位老先生搭话：“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一套《鲁迅全集》！”

“啦！嗨！别忘了，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限也没有了，到那时，看你还有时间读《鲁迅全集》”年轻的助教自以为最了解共产主义社会。

“不！体力还是体力，脑力还是脑力，劳动还是劳动，地要种，《鲁迅全集》也要读。”另一位中年讲师也自以为懂得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我已七八十岁，家务劳动都做不成，当然不能种地了。我爱读鲁迅著作，这点‘所需’总得给吧。”老先生对自己要一套《鲁迅全集》加以辩解。

“X先生，你错了。共产主义就在眼前，已不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多快好省，不是少慢差费，您别想太远了。”一个学生闯进来，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插进一段话。

这时，窗外一阵锣鼓喧闹声，加上鞭炮噼啪声。高音喇叭宣布党委书记把一炉钢炼成了，要组织队伍向区委报喜去。于是，这一场讨论暂告结束。

大家正要走，系秘书手里拿着一块砖来到办公室，大声喊：“王府井大街人行道砌的砖是耐火砖，可以炼钢，赶快去挖！去迟了就没了！”一阵乱，大家便都向王府井冲去。

美院U字楼大花园已经挖得坑坑洼洼，东一堆西一堆废铁，这里在砌土高炉，那儿在点炼钢火，党委书记那炉钢，围着大堆人在看。我钻进去瞧瞧，问书记，你保证这是合格的钢吗？书记一夜没合眼，脸上黑一块红一块，两手乌黑，浑身煤灰，正要开口，被一个报社记者截住，要他介绍炼成这一炉钢的经验，我只得让开。瞧着那一砣砣刚出炉的红铁块，我心里发问：这是钢吗？

不久，《人民日报》美术组邀我去徐水画速写，报道那儿的共产主义新农民。据说这儿的农民有炼钢经验，我还没进县，便见到路边到处是土高炉。我心想，美院U字楼花园里那个土钢炉，连个烟囱也没有，把废铁掺着碎煤和在一起烧，那也炼得成钢吗？但又想起老一辈人说的“百炼成钢”，兴许一堆废铁多烧几次就能炼成钢吧！1958年冬又去徐水看“棉花王”时，这一带的土高炉都熄火了，据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已经完成任务，现在要抓农业生产“放卫星”了，“棉花王”就是徐水放上天的一颗“卫星”。

棉花过冬是稀罕事，而单株棉花长得像株桃树，棉桃累累，花开花落，更为稀罕。《人民日报》美术组的人二次访徐

水，除了了解其他奇迹，这株“棉花王”确是重要的被访者。原来它是在秋季丰产棉花地里精心培养起来的一株特大棉树。这株棉花被移植在专为它建造的暖房里，四面玻璃，房顶玻璃，地下是沼气暖池，室内二十多度，上的是特殊肥料。我问看守这株“棉王”的饲养员：“一冬天能结多少棉桃？能摘多少棉花？——他说：“反正它活着就能开花结果，我们培养这棵棉王，是为你们参观的，不在乎它能搞多少棉花。”

我说：“暖房里种黄瓜，成本高，卖价也高；暖房里种棉花，若为摘棉花就不合算了。是不是？”

他说：“你见过我们玉米丰产地里一株玉米长十八只玉米棒吗？那也不合算。”

我问：“为什么？”

他说：“化肥、粪肥，加上人工，成本超过十八只玉米棒的价。”

我问：“棉王能活多久？”

他说：“这我说不好，请你去问我们书记。”

谈到这儿，另外一伙人来参观，我们退了出来，去参观养老院。养老院也是徐水的创举，一溜新北房，阳光直照到房内北墙脚，屋里暖烘烘，五六位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闲话。同样数目的老汉围坐在邻室炕桌边下棋。西墙门旁挂着扩音喇叭盒，正唱着河北梆子曲调，声音低沉悦耳，不像村头树上那张嘴大喇叭，叫得烦人。我们在这儿和管理员谈了一阵，认为这样实实在在为丧失劳动力的农民谋幸福，符合共产主义精神。我打开速写本，画了几幅速写，准备回去在报上发

表。

出了养老院，向导员带我们去看农民俱乐部，那儿陈列着一束束高秆麦穗，都标明亩产数量。前面提到的那株多穗玉米连根拔起靠墙站着，我上次来徐水时见到过，也画过，老朋友相见，特别亲切。屋中间一张乒乓球台，旁边一把老式座椅，贴着一张红纸条，写着：“主席坐位，请勿乱动！”这时向导员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前不久来过，坐在这把椅子上听村干部汇报。”靠着座椅，墙上挂着一把三弦，由它可以嗅出俱乐部的气味来。走出俱乐部，问起上次我们住过一晚的大王庙大队现在怎么样了，没等回答，那晚惊心动魄的行动，立刻从记忆中浮现出来。

还是我们这几个人，初到徐水，听说太行山下的大王店公社当晚有特别行动，要我们去见识见识，县里马上派车送我们到了大王店。那是个大村庄，一条老式街道，马店、车店、饭店、酒店、山货店、茶店、布店，一店挨一店，相当紧凑。街南头有座桥，直通保定；北面进山，有几条道通向山里的大小村庄，是徐水的交通要道。当晚行动是什么，向导也弄不清。进了街，到公社社部，公社干部亮了底，说今晚要把那条旧街的房屋拆掉，改成大马路，直通保定。这么一件大事，竟说得轻描淡写，家常便饭似地，不由得不佩服农村干部那股子干劲，真叫我们识不透。向导把我们安置在一家小旅店，关照我们，半夜有什么动静，不要大惊小怪。你们放心，这家旅店在山头，暂时不撤我们。一看时间还早，便到村里看看。不看则已，一看便大吃一惊。为了改建这条大街，已把公社

范围内的所有木匠、瓦匠、铁匠悄悄集中在几个大院子里做准备工作，迟到的人扛着铺盖卷刚刚到达，可见这个大行动，时间安排也很紧迫。

我们走到街上，两面店铺早已上门，向里张望，店里黑洞洞，货物早已搬空。向导顺便带我们去看两幢新建大楼，一幢住男青年，一幢住女青年。这些青年都从自己家里搬出来，住到大楼去，集体劳动，集体生活，实行共产。青年们的家里怎么样呢？我们也得去看看。一看，凡是墙连墙的，家家都打通了，可以随便串门，当然也做到夜不闭户了。每家的灶都拆了，铁锅也都集中，拿去炼钢。一天三餐，不用问，都进食堂吃大锅饭了。这种大锅饭制度，第一步自然应从革命老根据地算起，大跃进是第二步，已把大锅饭具体化了。

我们早上就从北京出发，近午到徐水，看了丰产田、县办大学等等新事物，下午又到大王店看了这么多，脑子里哪还装得下？这一天自身的“大跃进”也累得够呛，吃了晚饭，早早上床。睡到半夜，听到老远的叫喊声、敲打声、车轮声，心里明白，大王店特别行动开始了。这一切又像在梦中。早晨醒来，梳洗完毕，走出街去，一条原来琳琅满目的大街，竟在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瓦砾！我脑子转不过来，还以为是在梦中呢。八个小时拆完一条街，这是我在大跃进年代中遇到的最大奇迹。

三个月前的这段经历，犹如电影一般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那位向导说：“大王庙和保定之间已经通车了，你们想去看看吗？”

“马路两旁的房子盖起了吗？”

“那还用问，都盖起楼房了。”

“童男童女还分住那两幢楼房？”

“这我搞不清，去看看就知道了。”

大约就在这第二次到徐水之时，全国来这儿参观的人愈来愈多，我们住的招待所已经扩大了好几倍。听说徐水的粮食都被吃光了，现在由河北全省来支援。人们窃窃私议：

“这个共产主义样板可不能垮台呀！”

1958年5月，大跃进的形势已在全国铺开，报刊的报导特别喜人。文艺工作者在此大好形势中受到很大鼓舞，全国文联组成了一个参观团，选中靠近北京的怀来、涿鹿、张家口一线几个县社作为参观对象，让大家感受一下农民的冲天干劲，看看我们自己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参观团以文联主席郭沫若为首，调动了作家、画家十来个，其中包括叶圣陶、沈从文、萧三、韦君宜、田间、邹获帆、蒋兆和、邵宇、叶浅予。头一站是怀来县的花园乡。这个乡紧靠官厅水库，水库上游承受桑干河河水，下游接济永定河，有几处水力发电站。我们此行主要交通工具是京绥铁路的火车，在官厅下车，坐水库的大渔船先看看水和鱼组成的塞外水乡，然后在花园乡上岸，走不多远便到乡的所在地南水泉社。第一件新鲜事是沿街墙壁写满了诗。乡长是业余歌手，副乡长是诗人邹获帆，书记是诗人田间。这么多诗人，怪不得大家都叫南水泉是诗歌之乡。郭沫若诗兴大发，当场写了一首：

花园乡是花果乡，

花园乡是诗歌乡，
万株果树种满园，
万首诗歌写满墙。
葵花杆子成塔尺，
空酒瓶制水平仪，
仅仅学习个把月，
满满都是技术师。
五个电力扬水站，
一季工夫抵九年，
男女老少齐出力，
花园乡变小江南。
往前赶，努力钻，
赶到“七一”把水献，
技术革命已开端，
超过英国并不难。

大炼钢铁，赶超目标是老大帝国英国，这个目标被认为定得比较实际。南水泉要超的还包括其他项目：一是亩产千斤的五千亩果园；二是西榆林的万猪社；三是二千亩水稻田；四是官厅水库的几万斤鱼。所有这些，都有诗为记。

萧三唱道：

花园乡是大花园，南水泉是珍珠泉。
从前是沙滩和荒山，现在是鱼米乡，米粮川。
南面栽起防风林，北面修起扬水站。

社会主义干劲足，歌声直上九重天。
跃进跃进再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

韦君宜唱道：

没有共产党，哪有官厅湖，
往年忙抗旱，今年学打鱼，
手拉鱼满网，心念毛主席。

田间唱道：

党是一盏指路灯，引导人民过长城；
过长城，山水欢腾，坚决拿它四百斤；
种下社会主义树，扎下共产主义根。

叶圣陶唱道：

来访已过花时节，却见此乡到处花；
干劲远景说不尽，人人心上开红花。

农民唱道：

北京来了参观团，访问来到东花园；
鼓励我们勤劳动，不久就能过江南。
郭老对咱心正热，诗歌写在街头上，
咱们大家努力干，很快变成小江南。

作家留下了诗，画家留下了画。村里为我们刷了一垛墙，我们三人就在墙上画起来。我画了婴儿抱鱼圈，邵字画了妇女抱谷图，蒋兆和画了抱瓜图。

参观团第二站是怀来西邻涿鹿县。涿鹿有座黄羊山，山下是桑干河。这里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想利用桑干河水灌溉庄稼，可是河床太低，没法提上水来。大跃进东风一下吹醒了县委的头脑，决定在黄羊山腰部劈出一条渠道，把桑干上游的水引上山来，用以解除山坡地的旱情。参观团到达时，正是劈山渠道行将完工之时，参观既是为劈山农民加油打气的慰劳队，又是啦啦队。我们卸下行装，立刻上山擂鼓助威。到了中心工地，抢下农民手里的工具，郭老打头，团员个个奋勇上阵。鼓乐队跟着上山吹打起来，近处的施工人员也都围聚拢来，看拿笔杆的首都脑力劳动者表演体力劳动，参观者倒成了被参观者。我们这些文弱书生，来黄羊山之前，也曾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显过身手，尽管劳动强度不大，劳动态度却特别认真，也真流过汗；今天出现在黄羊山上，虽然是客人，可也是中国大地的主人，怎能不卖劲！这股劲卖了不多一会，手里的工具又被原来的主人抢回去，继续干活。这一场喧闹，比之坐在系办公室里辩论共产主义，要实际有效得多。我那十二开《大跃进诗画册》就是由这股劲带动起来的；《六臂神农》的大胆设想，也是劈山大渠给予的启发。当然，下一站张北县海流图水库工地的千军万马，更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海流图水库工地出现的英雄人物“铁老牛”、“铁老太”，不是平白无故使出那股惊人的干劲，而是过去的灾和难逼出

来的。张北县委书记介绍张北这地方，一到冬天，白毛糊糊（风雪）一来，雪同房高，封住门。解放前每年冻死人，无霜期九十天，小满一场冻，处暑一场霜，都是农民的大敌。去年狼窝沟一场冰雹，雹大如牛；山没头，水倒流，十年九旱长不收。海流图水库至少能解决十年九旱的问题。

在张家口看到业余“二人台”，采用了新内容、旧形式。我以此为题材，给该市的文艺刊物画了个封面。关于画，记得在怀来南水泉一个游艺晚会上还画了幅比干劲表决心的漫画，以决心书大小比干劲，最大的一张决心书比人还高。此画由《人民日报》记者朱树兰交该报发表，原画还仍留着。

由于文联参观团的诱导，我的诗细胞开始发芽。向南水泉农民学唱顺口溜，抄了不少墙头诗。回北京买了本《唐诗三百首》按照“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规律，居然写起五言七言诗来。先做绝句，后做律句，三四五六四句勉强凑成对，押韵不地道，又买了本新诗韵来翻。如此这般，在顺口溜的基础上提升了一步，10月间带学生到永定河山区实习时，留下《清白口小唱》四首：

（一）核桃

浑身翠绿披挂，盘踞高楼大厦，
一副大好头颅，生来供人捶打。

（二）枣

山村十月好风光，南山北坡拾枣忙，
人人嘴里尝鲜果，家家房顶披红装。

(三) 喜闻吃饭不花钱

国庆前一夜，中秋后三天。
河滩搭高台，主任来发言：
咱村明天起，吃饭不花钱。

(四) 深翻地

铁木工厂响叮当，七寸步犁正改装，
绳索牵引试深耕，乡社干部齐登场；
基干民兵作骨干，美术兵连也挥汗，
大面翻地深二尺，争取小麦翻几番。

农民的顺口溜，8月间在徐水共产主义样板县抄了不少：

(一)

进村抬头望，望见四面墙；
东墙写标语，亩产千斤粮；
西墙有漫画，社员劳动忙；
南墙光荣榜，表扬王大刚；
北墙黑板报，生产捷报闪光芒；
文化大跃进，一片新气象。

(二)

工农技术大改革，文化进军紧配合；
革命干劲冲霄汉，劳动歌声震山河；
放下锄头拿笔杆，敢笑大白诗不多。

(三)

黄金玉米一尺三，今年全面大丰产；
要把玉米造成塔，塔尖就把月亮穿。

(四)

扁担弯，颤三颤；花花衣，红脸蛋；
口唱山歌把粪担，坐家女赛过男子汉。

(五)

东风是福，西风是祸，
凉风压倒西风，人民生活好过；
帝国主义砸锅碎盆，社会主义开花结果。

(六)

向科学技术大进军，做新时代的新农民。

(七)

庄稼户不养猪，等于秀才不念书。

(八)

只要大家干干干，征服自然定胜天，
人人好比铁旗杆。风吹雨打腰不弯。

(九)

脚踏地球手托天，英雄面前无困难；
敢想敢说又敢于，思想生产双跃进。

（十）

瓜儿和叶一条藤，果儿和枝一条根，
红花绿叶一棵树，人民和党一条心。

（十一）

扁担不长七尺三，箩筐一双柳条编，
不要小看这玩意，明天担走两座山。

1959年在束鹿县南吕村，我代表美院实习队上台，以顺口溜的形式向全村父老兄弟表决心，具体内容已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可以想像当时的情绪十分热烈，要和父老兄弟赛一赛干劲。赛什么？当然不是赛种庄稼。难道和诗歌乡的农民赛诗？那怎么赛得过！要赛，只能和农民画的漫画比高低、比多少。我那幅《六臂神农》算得有点新意，却是从敦煌壁画“如意轮观音”那儿抄来的。十二开《大跃进诗画册》那个肩挑锄头、榔头、步枪、算盘、书本的农民，和老玉米塔尖冲破月亮的意象相比，只能甘拜下风。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带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站在高大的农民面前，只得自惭形秽，恨自己的头脑没长出两只想像的翅膀。

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跟着农民疯了一阵，把十六开诗画和《六臂神农》当作艺术的浪漫主义自我欣赏一阵。事隔三十年，再来追写这段史无前例的疯狂年月，值得回味的东西，

除了历史教训，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呢？仔细想想，我们对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到底懂得多少！马克思如果还活着，不笑掉牙才怪呢。不过，话得说回来，在那荒唐岁月里，我从农民那里学到了唱顺口溜，又从唐诗那里学到写五言七言绝句律诗，发现自己除了能画，还有做诗的细胞，岂不是一大收获？现在把南吕村的一首《剪窗花》，作为本篇的结尾：

食堂饭初罢，隔墙笑语哗，
南吕明月夜，八女剪窗花；
一剪蝶恋花，二剪果与瓜，
巧手竞新样，画师频频夸。

§4.4 综观我的创作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在上海画了十年漫画，作品只在报刊发表，从未想过要开什么画展，可是也在集体画展中展览过作品。记得最早一次是30年代初“天马会”的某次画展，由于丁惊老夫子的介绍，参加过一幅水彩小品，画了一个舞台强光下的跳舞女人，题目已忘。这幅画之在我记忆中出现，也许可以和我在40年代用中国画笔墨画舞蹈形象有点渊源。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作品，可惜原画早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但凭记忆还能默写出大概形态。第二次参加画展是1936年在上海大新公司楼上举行的中国漫画展。漫画在绘画行列中是雕虫小技从来不登大雅之堂。30年代初上海的漫画刊物风起云涌时，漫画家觉得只凭借报刊的方寸之地，不

能施展他们的雄才大略，要在展览会场中一显身手。那次漫画展，是在漫画家协会成立后不久举行的。除了卖门票收入，真还有人愿意收购其中的某些作品，作为个人的藏品，这不就证明漫画的功能在扩大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漫画刊物纷纷停刊。大后方虽有报刊，但由于缺少制版设备，无法刊登漫画。我首先发动一部分漫画界的老战友组织漫画宣传队，干脆画大画，以抗日为主题，到处开画展，标榜漫画救国，和演剧队合作，好像走江湖、出庙会，举行街头展览，用以吸引群众，成为漫画家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生活比较稳定，美术家开始借公共会场举行画展。漫画家得天独厚，40年代初期在重庆，个人专题漫画展大开风气。最早是张光宇的《西游漫记》影射蒋政权的腐朽；接着是廖冰兄的《猫国春秋》以辛辣之笔，写大后方的苦难与逆行；接下去有高龙生、汪子美的《幻想曲》，在成都有谢趣生的《鬼趣图》写现实生活中的鬼域世界。在这一连串的个人漫画展之前，还有个打头开道的漫画八人展。这八人都是先后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重庆来的第一代漫画家，包括张光宇、叶浅予、张文元、沈同衡、廖冰兄、丁聪、特伟等。

大约1940年至1943年间，我在桂林、衡阳、贵阳、重庆四处先后举行过“叶浅予漫画展”。展览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940年所作《战时重庆》，第二部分是1942年所作《逃出香港》。在重庆那次展览上，还曾试以中国笔墨画了几幅贵州苗乡的生活。《战时重庆》是漫画与速写相结合的体裁，把我

从香港到重庆旅行中所见所闻，用土纸与墨笔记录下来，曾于1940年尾在香港以《重庆行》标题展出。原拟展出后编印成书在香港出版，不料日寇发动的太平洋战争，香港沦于敌手，出版未成，幸而保存了原稿，得以带到桂林，成为上述四个地区个人画展的主要作品。1941年寄居桂林时，我将香港沦陷时惊心动魄的个人经历画成另一套漫画《逃出香港》。至于《苗乡生活》，则是1942年在贵阳时，深入黔西苗族地区的写生画稿，试用中国画笔墨，在略带棉性的贵州皮纸上，描绘苗族人民色彩丰富的生活面貌，以图摆脱我所惯用的漫画手法，向中国人物画的线描和施彩靠拢。我曾在7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写那次深入苗区后创作上的变化过程：

“1942年我在贵州苗族地区住了一段时间，发现苗族妇女打扮得非常漂亮，每逢赶集，人人都把漂亮的衣裙首饰穿戴上，集场上五彩缤纷，如百花争艳，任何画家见了都会动心。可是我那支惯于夸张的刻薄之笔，对着真正美妙的形象，只能瞠目而不知所措。心想，如果不改变手法，岂不是颠倒美丑，唐突西施吗？从那时起，我决心从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中解脱出来，另试塑造人物形象的新手法。找来找去，觉得应该下苦功向国画传统中的人物画先辈们学习，于是我从漫画创作转到国画创作方面来了。”

“速写是这二者之间的桥梁。以前我的速写为漫画服务，以后开始为国画服务。这个转变的动力是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我为自己画了一幅讽刺画：我躲在树干后面偷画一位苗族姑娘，姑娘用双手捂住脸不让我画。”

“十年漫画创作生活，在我的人生现中孕育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思想，在艺术观中形成了‘丑极则美，美极则丑’的观念。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挽救民族的爱国思想冲垮了这种小市民低级趣味，我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大道，思想境界豁然开阔起来，认识到对丑恶的东西固然应该坚决揭露，对美好的东西尤其应该大力歌颂。揭露丑恶的笔和歌颂美好的笔应有区别，但也不是截然相反，而是可以互相沟通，互相渗透。这种沟通与渗透反映在我的苗乡速写中便是美丑杂陈，真伪交错，待到加工为图画创作，便是一锅夹生饭。”

1943年我去印度生活了几个月，为印度妇女的优美服装和舞姿所吸引，从此我的人物中出现了“婆罗多”、“献花舞”等印度舞蹈形象。这些形象也都是从大量速写稿中整理出来的。那次去印度是为了到中美训练营去采访中国部队生活，顺便走了印度几个地方，欣赏了玄类到过的天竺情调。回重庆后，于1944年举办了一次“旅印画展”，除了介绍中美训练营的练兵生活，也提供了许多飘飘欲仙的印度舞姿。练兵为刚，欢舞为柔，刚柔相济，组成了这次画展的特殊情调。朋友们看了我的画展，大为惊讶，想不到叶浅予还有这一手。徐悲鸿看了之后，收购了我两幅舞姿人物画，并以他的一幅《立马图》相赠。1948年，徐在某报写了篇文章，赞赏我的人物画：

叶浅予先生素以漫画著名，驰誉中外。近年来从事国画，漫游西南西北，撷取民间生活服饰性格及其景物。三年前曾在重庆中印学会公开其随盟军至印度旅行之作与新国画一部陈列展览，吾特赴现，惊喜异常，满目琳琅，爱不忍去，即定

购两帧，但重要之幅已为人先得矣。

日本投降后，徐悲鸿在重庆组织教学班子，准备去北平接办国立艺专。他特派高足冯法授向我示意，要我参加。其时我正准备赴美国访问，一采新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所以拖到1947年从美国回来，才下决心，放弃我的卖稿生活，闯一闯高等美术学府，看我能否当好一个教书先生。想不到一晃就是三十六年，幸好我有自知之明，生来就是一个画坛草寇，走南闯北，以表现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为己任，在教学岗位上，始终不放松我的创作生活。在三十多年里，由于学生的督促和社会的鞭策，我认定创作中国人物画作为我的终身奋斗事业。

登讲堂和坐办公室之余，我抓紧时间作画。除了给琉璃厂画店供应商品，最大数量的作品是给朋友作应酬画，也偶然接受国家的创作任务，但那是屈指可数的几件。我自己认为值得一提的作品，是1953年画的《中华民族大团结》，那是为表达全国大解放政治情感的形象化；其次是1959年接受历史博物馆的任务，以民间年画形式画了《北平和平解放》，以纪念全国解放十周年；再其次是某年为参加北京国画展览，创作了一幅《夏天》，画一个站在玉米地里的老农对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发出会心的微笑。1962年我带学生到陕西乾县临摹永泰公主墓壁画时，见到平凉农民南下秦川包割夏粮的景象，以“社为五千粮，我为公社红”的赞语，拔高“平凉麦客”的形象。到了1975年，我从十年“文革”灾难中解放出来，以三年时间完成了山水画《富春山居新图》，表达我对故乡的眷恋

之情；1981年创作《长安怀古》四题，写“秦汉唐”，写“马前卒”，写“半坡文”，写“长恨歌”，以时代感情写历史形象，从单纯的生活叙述转到复杂的历史反思，标志我创作道路的新起点。

1976年，我怀着“四人帮”倒台后的喜悦心情，回到久别的故乡富春江畔。青年时期脑子里积淀着的山水情趣突然发酵，于是追踪黄公望的脚跟，画我的《富春山居新图》，当时只起一个提纲式的初稿，带回北京。第二年又去，爬山涉水，搜集资料，完成了第二稿。第三年一场大病，未去故乡，直到1979年才开始经营第三稿，1980年5月完成。

我长期以来只从事人物画创作，虽然在深入生活中也画些风景山水小品，但只能算是副产品，从未想过要在山水方面画什么大创作。这个《富春山居新图》，可以说是我的一件别具一格的特殊产品，它的产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我在此画的后记中提到了这一点：

中国画家在探索自然生态相互关系中的审美表现，发展了山水花鸟画。我是画人物的，我的职责是发掘人和社会的美，为什么富春山水竟能推动我花费三年精力经营这个长卷呢？简单说来，原因有二：一是经过十年精神创伤，使我不敢再去触动人和社会这两个领域；二是富春山水哺育了我，我要把它画出来，抒发我对祖国大地的感情。

富春长卷完成之后，故乡桐庐县成立旅游局，把屹立在富春江边的桐君山辟为旅游点。有人建议把《山居新图》放大，悬挂在山上“江天极目阁”的茶座四壁，作为大好河山的

点缀。我接受了这个建议，邀请中央美院山水研究班刚毕业的姜宝林和王镐两位同学，帮我放大，计高一米，长三十米，由我自己题上画题和后记，于1983年春节完成，作为我献给故乡的一份赠礼。

富春山居和长安四图完成，时间大约在1981年前后。计算我自1943年以来，从事中国画创作已近四十年，如果从1927年以来的漫画创作算起，那就快近五十五年了。当时我的年龄已七十五岁，心里盘算，是否可以开个个人画展呢？我把这意思透露给美协，美协同意，说当年不行，1982年春夏之间会场有空隙，定在那时怎么样？我问场租和其它开支怎么算？回答说，场租由美协承担，至于其它开支，给你出个主意，请中国画研究院参加为主办单位，由他们出几百元钱印目录请柬，也就够了。这么一安排，什么都解决了。1982年初，我开始编选展品，《富春山居新图》放大稿已在“藻鉴堂”制作完成，从中截取了春夏秋冬四段，删去其它部分，独立为山水四大幅；向历史博物馆借来《北平和平解放》，向中国美术馆借来《中华民族大团结》；也巧，河北省广宗县文化馆的施股辰给我寄来1966年在邢台创作的《民兵大演习》大幅，加上曾在1981年参加过中国画研究院院展的另一大幅《高原之春》一共凑成八大件，在美术馆的大展厅里足以压得住。当时还考虑要不要速写画稿，我心想，铅笔稿又小又不起眼，干脆不要。那么我这个以漫画起家的草寇，要不要把《王先生》和《小陈》搬出来和年轻人见见面呢？朋友们都主张要，可是原稿都在抗日战争中失散。咋办？有人出主意从画集中翻拍照片，结果，

只选了《王先生》一组，《小陈留京外史》一组，作为历史文献放大展出。最后，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赖以生存的速写画稿，铅笔稿不能用，便在大量的墨笔稿中选出十几幅，编入目录。与此同时，还从解放前的漫画稿中选出《战时重庆》和《天堂记》两套组画的个别作品，以反映我这一时期的创作面貌。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画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叶浅予画展”于1982年6月12日在中国美术馆右大厅开幕。作品八十一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漫画、速写、插图计二十二件；第二部分从《中华民族大团结》到《长安怀古》计三十一件；第三部分舞蹈戏剧人物计三十八件。举行预展那天，30年代《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来了；抗日时期的老战友胡考来了；美协负责人江丰、华君武来了；中央美院的老师李可染来了；研究院负责人蔡若虹也来了。

文物出版社的王仿子前几年把他收藏的全套图画《晨报》送给了我，那里面有我的《王先生别传》第一回到最末一回。他来看画展，看得特别仔细。影友鲍乃横拍摄了会场情景，宣相权拍摄了会场活动中的至亲好友，贴了一本相册送给我。那天到的几乎都是熟人，我的女儿叶明明把戴爱莲也请来了。最有意义的是这天中午在甘雨胡同我的住处举行了一次家宴，半瘫的老伴正人美亲自下厨监督做菜，几位熟朋友自我庆祝了一番。

在展览会场里，朋友们向我道贺，我说再过五年，我就八十了，解放前小型画展举行过多次，解放后却是第一回。这一回，把陈年老古董都搬出来了，可以算得一次从艺五十五年

的回顾展，既算空前，也算绝后。朋友说，这规模，对你叶浅予确实是空前的，可怎么说绝后呢？我说，再要办一次画展，就得拿新东西，可不能摆旧摊子炒冷饭。我虽没老到不能拿画笔，但是艺术生命到底有个衰竭的时候，老天爷让我再活五年十年，我能保证拿出五六十件好作品来吗？我是个要强的人，为筹备这次画展，思前想后，掂量过自己多少回，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于老着脸皮把一生的货色全端出来，若还不绝后，那就太不自量了。

现在风气，凡开画展，都要有个前言，一般都请别人写，我觉得最了解我的莫如自己，还是自己动手吧。

自序：

从1927年第一幅漫画投稿算起，我的创作生活已有五十五年了。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画的主要是漫画，老一辈人大概还能记得“王先生”和“小陈”这两个丑角的故事。

1933年起，开始带着小本本画速写，既丰富创作素材，又锻炼造型能力。

1937年到1945年这八年抗日战争，当过漫画宣传兵，在敌人的疲劳轰炸下，产生过《战时重庆》组画一百余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身陷敌后，将此经历画成《逃出香港》十余幅。

在大后方的日子里，为贵州苗族和西康藏族的风土人物所吸引，意识到要用另一种笔墨才能画得称心如意，于是拿起羊毫狼毫、花青朱砂，学画中国画。

抗日战争结束，把访问康定的一段生活写成《打箭炉日记》。

1948年的《天堂记》是这类体裁的另一形式。

形势的发展，使我这个从未受过正规美术教育的人，1947年间进北平艺专，当了教师。由于不习惯当老师的生活，总想逃跑。

三十年的磨炼，终于体会到创作和教学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也认识到学生的督促是推动老师上进的动力，才安下心来甘为人师。

50年代，报刊经常发表我的舞台人物速写，琉璃厂画店挂起了我的舞蹈人物画；有人为我担心，提醒我不要陷得太深，也有人鼓励我陷进去，以满足他们的审美情趣。

十年动荡，画笔被冻结，交了白卷。

1976年到1979年害了两场大病，在治病间隙中试画山水，完成了《富春山居新图》长卷，报答故乡和祖国大地对我的哺育之恩。

我曾多次访问西安，速写本里留下不少长安古都的美好形象。直到去年，才酝酿成熟《长安怀古》四幅创作构思，试图表达我对历史的感情。站在马克坡，想起“婉转娥眉马前死”这句诗，却不敢像白居易用直笔写这幕历史悲剧。我画的杨贵妃是倒在地下的一个美丽的“唐俑”。

年轻时没有机会进美术学校，我的造型能力全是各种职业实践培养起来的。我画过商业广告、舞台布景、教科书插图、花布图样，特别是漫画创作和长期画速写，得益最大。

我的艺术实践，基本上是按照社会的需要安排的。在五十五年中，我做了应该做的，不计较个人得失，那怕在受委

屈的日子里，也不抱怨什么。我对生活的态度是“知足长乐”四个字，对艺术的信念是“自强不息”四个字。

叶浅予1982年6月12日

“自序”提到“十年动荡，画笔被冻结，交了白卷”，是指那次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其中经历，详记在《十年荒唐梦》那一章里。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来，在美院监督劳动改造，好心的朋友怕叶浅予这个知名的画坛草寇在画坛消失，特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丹心谱》一剧录像时，为我穿插几个画速写的镜头，和电视观众见面，表示我还活在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上。1979年，我的政治冤案正式平反之后，美院附中的丁井文校长又为我组织了一次小型“叶浅予速写画展”。这个速写画展，是1982年在中国美术馆大型回顾展的前奏，为我填补了十年动荡的大空白，我心情舒畅，才恢复了心理的平衡。非常感激朋友和读者们对我的关怀和鼓励，我借这次速写展的机会，在“前言”里发表了我对速写这门造型基本功的观点：

1935年起，我带着小本子在生活中画速写，为漫画创作记录人物形象。1942年后，我从事国画创作，依靠速写作为人物形象的仓库。速写除了为创作服务，已逐渐发展为表现生活的新创作体裁。

快速和简练是速写的特性，因此，对生活形象的敏感并能概括而准确地表现它，便成为我们画速写的人所必须努力追求的本领，但不能单纯追求快速，而不顾形象的准确。凡是画都要求形神兼备，有人认为“得意”可以“忘形”，就是

说传神可以遗形，这是不妥当的。神依附于形，形不准，神也就失其真，所以我们常说“以形写神”。

一要画好运动中的形象，必须发挥记忆形象的能力。说实话，任你眼快手快，绝对赶不上演员的动作快，所以要靠脑子记，要记住运动中的规律和特征，以便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想像和推测。想像和推测是记忆的发展，是造型创作的重要思维活动。画速写是锻炼这种思维活动的好方法。

“速写展”的全部作品，事后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印了一本小画册《叶浅予速写集》；“回顾展”的作品经过筛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印为大画册《叶浅予画集》。

“回顾展”的冲击波，当年就冲到了我的故乡浙江省，由浙江美协主办，11月间在杭州展出；再一浪冲到了山东，1983年3月在济南展出。此后，1985年先后在南京、苏州、武汉三地展出。这股冲击波的另一层回浪，冲到了长沙的美术出版社，他们为我出版了《富春山居新画》长卷，接着是五本速写集：《印度风情》、《在大后方》、《冀晋秦蜀》、《甘肃采风》和《两访新疆》，原计划再出五本，合成十本一套，但1986年，出版界闹退潮，打乱了书刊市场，长沙出版社临时毁约，只得把已经编好的另五本速写集暂时封存，等待时来运转，看出版界是否能重新涨潮。这五本已经编好的速写集是：《舞蹈形象》、《戏剧人物》、《动物世界》、《北京漫笔》和《江南风光》。

§4.5 探索艺术规律

反右以后，陈沛的独立思考，坚定了我自1956年以来探索中国画艺术规律的信心，从而认识到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发展民族绘画的障碍。反右斗争克服了来自学院领导的虚无主义，但是全国解放以来在美术教育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一次政治斗争可以肃清的。存在于青年学生中的反传统思想，要做艰苦的学术思想工作，才能逐渐克服。为了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我在反右以后的几年里，鼓起勇气，抓紧时间，钻了一阵历代画史、画论与画迹，并试图从传统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画的艺术特征，分几个专题在国画系试讲艺术理论课，打破过去中国画教学只讲“法”，不讲“理”；只讲“史”，不讲“论”的习惯。

我以1956年在《新观察》发表《中国画的艺术技巧》为开端，在天津作了一次《关于线描》的专题讲课；1959年在北京画院讲了《中国画的构图》；1960年在美院国画系讲了《中国画的色彩》，在北京国画院讲了《中国画的透视》。这些文章和讲课，都是在短时期内现钞现卖仓促上阵的，既粗糙又肤浅，某些内容还可能似是而非。为了在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路来，我尝到了“打鸭子上架”的苦涩，也舔到了艰苦奋斗的甜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国画家专攻一门的问题。1961年为《人民日报》写了《掌握全面和专攻一门》的关系；1962年总结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把“八写、八练、四临、四通”定为“中国人物画的基本功”，前

后在中央美院国画系、民族学院艺术系、沈阳鲁迅美院作了专题讲课。1983年在山东艺术学院讲了《对中国画教学的设想》；1981年为《中国画研究》写了《师古人之心》，探讨“以形写神”、“不似之似”、“迁想妙得”、“以大观小”诸传统美学问题；1978年写了《基本功、赶浪头、抄近路》一文，评论当时中国画创作中存在的不良风气。1980年向《美术》编者谈论“吞吐古今，涉猎中外”问题，总结我的学习和创作的历程，分四个题目：“从漫画到中国画”、“用画家的眼睛看生活”、“中国画发展的几个问题”、“关于我画的舞蹈”，表达我对美术创作的基本观点。

除了通过理论研究、画法分析和个人创作探讨中国画艺术问题。还通过对当代和近代画家的分析评论，发表我对中国画创作的观点。例如，1963年我写过一篇《钱慧安与清末人物画》。着重谈人物画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1958年写过一篇《齐白石艺术的人民性》；1982年写过一篇《齐白石衰年变法》，研究齐白石的艺术成就；1980年写过一篇《关于张大千》。1983年再写《张大千的艺术道路》，介绍张大千的艺术风格；1980年写了《读听天阁画谈笔记》，评潘天寿的艺术思想；1981年为“赵望云遗作展”写了一篇《中国画闯将赵望云》，介绍赵望云以传统笔墨写农村生活的创举。

自从投身到中国画创作以来，我对漫画仍有兴趣。全国解放初期，画过不少政治讽刺画，笔锋专指美帝与日寇，有时也触及没落的蒋家王朝。1956年笔锋曾碰着社会主义改造的一角，在《漫画》月刊发表了《大同行》组画，“文革”期间被

诬为反社会主义黑画，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虽经平反，但历史还在，也许要到盖棺才能论定。就这一段历史，证明我仍然是一个漫画家，并未脱离漫画阵容。1981年画的《长安怀古》四幅中国画，把杨贵妃画成一个“唐俑”，足以证明我的漫画细胞又在复活。对漫画界老战友的丰功伟绩，我一直引以为荣。我写过一篇《冰兄其人》，称颂他的《猫国春秋》；写过一篇《张仃的漫画》，为他的漫画集作序。

“文革”十年，创作空白，教学无门，科研也成空白。1975年我从监狱解放出来，在原单位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我的政治问题公开平反，恢复我的系主任工作之后，社会上对我的教学成果才逐渐予以追认，于是我又开始我的教育活动。

1980年广州美院邀我讲学，对国画系师生作了一次画舞蹈人物示范表演，讲了有关中国画学习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涉及国画系教学当前存在的问题；对教育部规定大学生外语考试不及格不能毕业，有不同看法，介绍了我在中央美院对此政策的相应对策，说：“外语教师评分不及格，学院不给毕业，系给毕业。”我这条土对策一说出来，马上有人向教育部告状，并且对广州美院国画系外语不及格的学生，施以留级处分。该系主任杨之光向我反映并讨救兵。我说，作为系主任，应同情这类学生，可以向外语教师提建议，给学生补课，由系主任安排补课时间与条件，保证他们补到及格为止。杨说，学生不好好学，怎么能保证呢？我说，这是给外语教师下台阶，留面子。老实说，学中国画一定要学好外语，这政策本身就脱离实际。我以为即使学油画，也不一定要学好外语，

倒是应该学好中国语文和中国画论。

1978年我在文联扩大会议美术小组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要求美术界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第一要为齐白石平反。“文化大革命”，批齐白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他的墓碑也被人砸碎，据说是江青在幕后指挥的。反齐批齐，并没提出什么罪状，至多是说他是所谓“封建余孽”。当时齐已死去十年，鞭挞死人，目的在打击关心过齐白石的周恩来。第二要恢复漫画的战斗作用。漫画不仅对敌人要用，对人民内部也仍有必要。现在报上有些短文，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态，十分辛辣，还有的三言两语，揭露风派、溜派、抗派的形象，为什么不曾用漫画这个武器呢？第三，要为“黑画”平反。1964年江青发动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中央美院为试点，找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黑画，内部展览；1966年那次，也由中央美院发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役，公开展览，并揪出作者在画前批斗，我还挨了皮带抽打。1973年那次是以“黑画”反周总理，政治陷害更甚。这三次“批黑画”运动都是政治野心家江青造的孽，必须为有关画家平反不白之冤。

文联扩大会议之后，乘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东风，我的论画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定为禁区的“形式”问题。那时我还在北京西北郊三〇九医院治病，治病之余，读点书，写点笔记，脑子的活动量相当大，想钻一钻绘画的形式问题。当时拟定了十个问题，预备写一篇大文章，闯一闯别人不敢闯的禁区，可是始终不敢动笔，后来写这个题目的文章多起来，我也就把它搁下了。1982年和1983年之间，在中国画研究院的人物画

研究班和中央美院国画系教师学习小组上抛出过论形式的十个问题，并对每个问题作了简单的介绍。不久，形式问题已不成为禁区，我的十大命题用不着再做文章。

这十个问题是：

- (一) 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
- (二) 没有形式，就没有艺术
- (三) 生活的形式
- (四) 艺术的形式
- (五) 形式的依附性、独立性、继承性
- (六) 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
- (七)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 (八)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 (九) 形式的魅力
- (十) 形式的命运

在论形式的命题时，我举了一些例，如：“内容决定形式”是指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而言，不能否认艺术的独立性和形式的独立性。

“突出政治”可泛指艺术的思想内容，非指特定的具体政治内容。

“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使经济崩溃，也使政治崩溃。

“算政治账，不算艺术账”，标语口号概念公式横行，形式消灭，艺术死亡。

强调“政治第一”是政治的普遍性，但不能忘记艺术的

特殊性和个性。四人帮的“政治第一”是不要艺术的形而上学，是极左路线谬论。

艺术好坏应算艺术账，内容好坏才算政治账，不能一锅煮。

四害横行，不敢谈形式，谈形式就怕戴形式主义帽子。资产阶级艺术是形式主义，谈形式就成了资产阶级，谁还敢谈形式。

陈辞滥调，人云亦云，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才叫形式主义。

模仿生活，照抄生活的自然主义是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相对立。

形式美感的客观性即其独立性。

艺术的魅力在于引起主观共鸣，在于引导客体的潜移默化。

形式的完美与否，可决定内容的生死命运，因此形式反过来决定内容。

片面强调“内容决定形式”，而否定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否定形式决定内容的作用，必然导致政治作用的绝对性，从而贬低形式，否定艺术的魅力与威力。

内容决定形式，指形式的从属性；形式决定内容，指内容的从属性。二者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矛盾统一体。强调一面，否定另一面，便是取消艺术。取消形式，内容无法存在；取消内容，形式便成空壳。

指研究形式为形式主义，可否强调内容为内容主义？某

个时期，选画的标准只看内容是否正确，不看形式是否完美，这就叫内容主义。有些人为了迎合此等审查标准，一心在内容上下工夫，造成“唯题材论”风气。

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以后，渐渐可以探索形式问题。这些年来，也有走向“唯形式论”的人，走到另一偏面去了。

没有形式，内容无所依托，艺术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绘画，没有雕塑，没有文学，没有诗歌，没有音乐，没有说唱，没有戏剧，没有电影了。

§4.6 近几年的业务活动

§4.6.1 山东讲学

1983年3月份，山东省艺术馆约我去开画展。展品装一木箱，由艺术馆派徐川青来取去，但一星期不见回信，心里有点急，打电报去问。一天清晨正要出去走路锻炼，徐川青截住了我，说画已由他送到济南，画展定3月30日开幕，请我期前赶到。3月28日我由侄子叶柏风陪同去济南，艺术馆秦胜洲来接，寓南郊宾馆。宾馆在马鞍山下，1958年建成，看来是大跃进年代产物。

单应桂，中央美院国画系60年代毕业，是秦胜洲的夫人，在山东艺术学院任课。她对我说，艺术学院和曲阜师院请我讲课，我认为这是传播我的艺术观点的好机会，同意了。

29日应桂来接我去美术馆看展览会场，《富春山居新图》长卷单占一壁，可从头一览到尾。其他作品小画分两层，比1962

年北京美术馆壁面更宽。下午应桂介绍济南画界情况，说那里邪气相当厉害，某人专走上层路线，想挤进省美协领导层，但选举时落选，某领导于是出面力保并强制分享副主席席位。应桂又提到派性斗争，说那些人巧施文人相轻的故技。

30日上午9时半《叶浅予画展》在济南美术馆开幕，省文化局长致开幕辞，我站在他身旁，他讲完后介绍我与群众见面，还要我致答辞，这不是硬要我像演员一样亮相，背几句堂皇而又谦虚的台词吗？我身不由己，只得照办。答辞完毕，进入会场，顺理成章地由画家本人向贵宾们作解说员。我特别指出在“文革”中被诬为黑画的几幅作品，如所谓“三仙姑”、“空降特务”、“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下午准备4月1日将在艺术学院讲课的提纲。我有两种想法：一是按1980年广州美院讲的《学习与创作中国画的主要问题》，一是另拟新提纲，讲《中国画的教学设想》。据了解，山东美术界中国画家最多，着重讲中国画问题也许是符合实际的。4日将有一次济南美术界的座谈，由我主讲，准备着重谈创作问题，设想如下：

（一）艺术作品的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

（二）深入生活的新内容新形式以及深与广的关系。

（三）艺术作品的服务对象与出路问题，商品画、应酬画、任务画。

（四）艺术家的道德气质、人品修养与画品的关系。

4月1日在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讲课，集中谈中国画教学

新设想，批评了长期以来以人物为主的方针，提出人物、山水、花鸟三者并重的方针。如果不改变人物为主的思想，三者并重的方针就无法实现。讲话还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 （一）教技术同时要教艺术
- （二）工笔与写意的关系
- （三）造型与笔墨的关系
- （四）人物画的基本功
- （五）油画与雕塑向民族民间传统学习
- （六）不同画种的特长与局限

4月2日上午由单应桂、吕学勤陪同游千佛山。事先听说千佛山古代岩雕佛像经文化大革命破坏，疮痍满目，后由本省雕塑家王昭喜修补，已复旧观，可是我担心怕修得不伦不类。今天是怀着疑虑的心情去探访这一古迹的。初看之下，觉得天衣无缝，再看造型风格和六朝造像相一致，感到很满意，就和单、吕二位谈起现在修复古文物中如何塑像的问题，感到这位王昭喜的路子走得对。她们说王老现正住在灵岩寺修复宋代彩塑，决定5日去灵岩拜访这位有民族文化修养的雕塑家。

灵岩寺地处泰山西北诸峰之间，在津浦铁路线东侧，最近的车站叫万德站。我和单应桂搭的是一辆面包车，车行二小时，行程八十公里。寺周围有名胜多处，我的目标是千佛殿的四十座罗汉像，据说是宋代塑工的作品，王昭喜自1982年起在此为罗汉塑像修补。殿前有一梁启超1922年（民国十一年）所题石碑，誉之为“海内第一名塑”。据我自赏过的三处来塑

像比较，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女官神态性格应属第一，苏州保圣寺的罗汉应属第二，灵岩罗汉应属第三。但灵岩罗汉的衣格运动虚实、贴身变化等艺术手法，当居首位。可惜王昭喜这几日在济南开政协会，我未见到本人；罗汉群像都已封锁，只能从几扇玻璃门窗窥见并领略塑工的妙技。感到遗憾的是，导游讲解员还保留了一些阶级斗争的观点，说什么和尚也有贫富之分，有的穿得整齐华丽，有的穿得邋遢，而且说其中有个罗汉叫做“济颠”。宋代罗汉是否已有济颠其人，我颇多怀疑。又说罗汉是从别殿移来，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所谓宋塑，恐怕唯一根据是梁启超那通石碑。苏州保圣寺的罗汉，最早由某些文人艺术家误指为唐代大塑家杨惠之的作品，经江小鹤、滑田友等修复后，确定为宋人之作。这也不过从塑工风格和服装式样推断而定。今天所见罗汉，从其衣饰和手法看，可以定为宋代作品。佛教艺术到明代已走下坡路，北京西郊法海寺的明代壁画，还体现了一点来艺余韵，本塑对衣格处理的精到生动，是典型的来塑写实作风。

4月6日单应桂请来王昭喜，了解到他修补千佛山的经过和修补四十罗汉的计划。他说他发现罗汉的木架支柱上有“宋治平三年六月胶州临邑盖忠立”朱笔题名，他以为是木工的笔迹。我介绍了康定喇嘛寺塑工立架、和泥、施彩，都是一手所为。此题名应该是原塑工的题名。我顺便介绍苏州保圣寺专建水泥新殿保护塑像的措施，希望此四十尊来塑能得到妥善和长远的保护，目前如仍留在千佛殿，恐非良策。王老正在济南参加市政协会议，我希望他向政协提个保护新方案。

4月4日上午应美术馆之约，为济南市美术界讲话，内容是30日准备的有关创作问题。讲了两小时共五个问题，谈到艺术抽象与抽象艺术的界限，以赵无极为例，我们请他来北京开画展，并非要提倡抽象艺术，而是表示我们能容忍不同流派的艺术，做好团结海外中国画家的的工作。我们艺术家要胸襟开阔，这是最大的政治。

4月7日晨8时5分搭济徐快车去曲阜，在车上准备了明天在曲阜师院的讲稿。两个题目：一是审美教育，一是造型基础。10点40分车抵兖州，师院派面包车来接，费时20分到曲阜，同行者有单应桂、龚之方、叶柏风和《大众日报》记者李绩庭。

下午约了几位美术专业教师了解教学情况。他们认为目前师院、师专艺术系培养的教师有供过于求的趋势，原因之一是下面中小学不重视美术课，有的不设美术课，致使分配下去的教师改教其他课程。

这次讲课内容，由师院教师王天一整理为文稿，在一个师范教育期刊上发表。它就“美术教育与美术创作”、“高师美术专业与美术学院”两方面的关系与区别，指明师院美术教师的职责是向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即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美育不是孤立的。在美育里，会自然地贯彻德育、智育和体育。我认为最高的道德教育包含着美的教育，美育本身又是智育的一部分；至于体育，更是供人感受到人体运动的美。师院美术教师应理解这一点，作为师院美术教师，传播审美教育是自己的神圣职责。

4月9日参观曲阜的孔庙。这地方我曾于1935年来过，最深的印象是大成殿雕龙石柱，其次是孔府的宅第。今日游程先看孔府，因有县委和文管会的人陪同，连孔德成的寝室和后花园都进去了。这里像一座小型的故宫，第一进大厅，陈列着仪仗车轿之类衍圣公官衙用物；第二进是视事大堂；过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进，最后是孔家末代子孙孔德成的寝室。这位孔德成已随蒋政权去台湾，现在不知是第几代子孙了。孔德成的寝室，地板沙发，已经现代化，床铺还是老式。后花园有现代书画展览厅，都是北京画家的字画，看来是文管会给布置的。

从孔府侧门进到孔庙，主要看东庑的历史碑刻。这里陈列着著名汉碑“乙瑛”和“礼器”，除了唐宋诸碑，还留下一通赵孟頫的大字碑。转到大成殿，察看雕龙石柱久之，导游者说，此殿系清代雍正年间火灾之后重修的。殿前为“杏坛”，应为孔老夫子讲学的地方，当然也是后人为纪念孔圣人而建的一座独立建筑物。师院老师云，师院历史系教授有时带学生到杏坛来讲课，我的头脑里立刻升起一幅“现代孔子授徒”的画题。闻中央决定重修奎星阁，东院已经堆积了从东北运来的特粗特大木材，只待动工。又闻拟树立一孔子新塑像，任务交给山东艺术学院雕塑系。据说省内诸大人物对此特感兴趣，提出不同方案，大致分两派，一派主张复旧，一派主张创新；重旧者认为按雍正年间原型重塑，创新者主张把孔子塑得像个大学者。两派相持不下，使接受任务者不敢轻易动工。

4月13日游著名的趵突泉。这地方我1935年也来过，池中

泉眼多处，趵得很高。这次一看，大失所望，泉眼已涸，池底朝天，散发臭气，只得掩鼻远避。园中李清照纪念馆，小巧紧凑，淡雅有致，是一处民族风格的现代好设计。出趵突泉，在大明湖兜了一圈。这里只要有汽车，买了车票可以直接开进公园内畅游，因而进公园如逛马路，喇叭声不断冲进双耳，有碍游兴。回宾馆午睡醒来，写了一首打油诗：

垂柳衰老泉眼涸，趵突池畔掩鼻过，
柳泉名城何处是？喇叭声震大明湖。

某晚离休老干部、名士高某在蓬莱春小宴，青岛啤酒、扇贝、对虾、黄河鲤等山东名菜得以一一品尝，口福不浅。席间谈起重塑孔子像问题，高主张恢复明代王冕原型，并说中央某委员也同意。我说明代重建孔庙以前，一定也有个塑像，也应是原型，可惜已无从依据。不过，我所见清代原塑，是个庸俗的帝王像，不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大学者，我以为应该让雕塑家发挥想像，不能只循旧规而无所创造。听我一说，主人表示沉默，不便反驳。我进一步说，如果得不出结论，不如暂时不塑，留个空白，以保安全。主人乃说，日本人早就希望看到孔子有个塑像，我们不能再拖了。看来，这类有关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事，一要外国人来逼，二要头头们拍板，真是积习难改啊。

应烟台画院陈兰英之约，于4月14日搭京烟列车赴烟台。次日参观烟台市博物馆，馆址系原福建会馆天后宫，清代旧建筑，所有石雕部分皆由福建海舶运来。一对龙往楼空深雕，

游龙作潜水状，其手法和我1930年在浙江宁波天后宫所见近似，乃福建石作品。其灵活游动之状，和曲阜大成殿龙柱雕工颇异其趣。孔庙记载云，明代重修大成殿，由徽州聘来石工雕凿龙柱，徽闽均属楚地，雕龙应是楚文化的一部分，为什么风格差别又如此？这是个艺术源流的疑问。仔细一想，明清以来，宫廷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很大，明式家具单纯朴素，而清式家具繁琐累赘，徽州的雕工已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楚文化遗留影响较深，因而闽雕灵活，徽雕凝重。我在山东博物馆看到大江口楚文化陈列，对楚文化的灵活生动个性发生很大兴趣，因而认为烟台博物馆的龙柱是楚文化的正传，曲阜则是其变种也。

陈兰英反映，国内画家来烟台开画展的近年多了起来，多数是山东籍人，其中有韩美林、张立成、杨先让、王明明，外籍人张步、姚有多、周韶华也想来。张立成来过三次，最近一次带了刘汉来，这里对刘汉的怪异风格不能接受。又说本地区画家多数是业余的，对中国人物画感兴趣，有的画得很好，希望我谈谈创作上的问题。

4月18日上午8时对烟台地区美术工作者一百余人作了有关创作问题讲话。提纲如下：

（一）生活与艺术

（二）内容与形式

（三）共性与个性

（四）艺术实践诸问题：

1. 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

2. 深入生活与表现生活
3. 画种与工具，特长与局限
4. 形与神、情与景
5. 中外与古今
6. 美与丑
7. 人品与画品

综合上面所举问题，提出了我的几个基本观点：

（一）艺术反映生活，不是生活原型，而是浓缩并提高了的生活。

（二）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决定内容。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内容决定形式”的片面认识。

（三）戏曲演技的规范化，和笔墨技法的规范化是艺术基本功的共性。演员流派，画家风格是艺术家根据生活所独创的个性。

苏东坡云：“智者创物，能者述焉。”学老师必须离开老师；光有手上工夫，而无形象思维能力的人，只能做别人的尾巴。

4月16日游长山岛，晨7时由烟台出发，面包车坐六人，一路阡陌纵横，深绿麦田夹赭色耕地，点缀红瓦白墙农舍，不时嵌镇几群红黄白绿头巾，好一片早春景色。比之江南，季节晚十来天。8点半到达蓬莱县城，车直开港湾码头，赶上9点长岛班船。大统舱可坐一二百人，早到者除自己占一座位，还给行李占一座位，如此这般，后来者只得陪笑脸说好话，向早到者匀个座位。有的人硬是不肯让，不得不由船员出面强制

执行，“五讲四美”真不易做到啊。船行45分钟，到达主岛长岛县所在地，有车来接，直奔月牙湾。此为长岛后岛，两岛原系孤立，现两岛间筑一长堤，可以通车。这一带渔民聚居，从事养殖业。见一院子堆满海带浮标，如一座小山，海岸停满小船，使我联想起1978年大连棒锤岛海带养殖场所见。十来分钟后，车到月牙湾，因事先知道此处盛产圆石子，约半小时，个个满载。搭12时15分回程船返蓬莱，在县招待所食堂午餐，鱼腥满桌。饭余，我出一对以记游程：

车、船、车、船、车，

龚之方对曰：

鱼、虾、鱼、虾、鱼。

饭罢略事休息，上蓬莱阁，照片上看蓬莱阁不过几座小庙，高居濒海小山上，一进山门，却有道家三观、佛家一寺、天后一宫。山下是戚继光御倭寇的小城，时正退潮，小学生在此赶海拾贝。蓬莱久负盛名，有仙山楼阁之称。登阁望海，颇有欲仙之思。可惜阁内陈设五颜六色，相当庸俗，尤其是阁内所画八仙图像，粗俗之至。另有一座拉洋片盒子，为游客拉蓬莱十景洋片，如看天桥杂耍。东西两壁悬挂当代名人题字，可谓雅俗具陈，琳琅满目。烟台文化局长说，我们这里名胜古迹管理上有个大矛盾，就是保护文物和发展旅游的斗争。文物要保持原样，旅游要锦上添花。我说全国都如此，不足为奇。

§4.6.2 沈阳、哈尔滨之行

山东回来之后，沈阳美协姜振国来北京约我利用暑假到沈阳去休夏，顺便讲点课，并让我带点画给大家看看，我同意了。

6月24日，乘下午3点50分153次车赴沈阳，陪行者是美院国画系新毕业的胡伟。车行颇速，颠簸幅度很大，且无餐车，乘务员给软卧旅客每人发牛奶一杯，面包一个，花生米一袋，共费八角。只吃得一半，余者留作明晨早餐。次晨6时30分到达沈阳站，姜振国来接，把我们安置在三经路招待所住宿。这是当年的苏联领事馆旧址，俄罗斯式老建筑。房后有个大花园，早晨可以在园内散步。火车进沈阳时，铁西区一片烟雾，烟囱林立，车站是张作霖时代德国人设计的。上午在招待所和沈阳美术界朋友见面，有鲁迅美术学院的任梦湾和张望，美协的王冠、周皎，《辽宁画报》的高颖，美术出版社的赵敏。商定了沈阳的活动日程。

食堂进早餐时，见到两三桌远道客人，男子西装，女子亮片背心连衣裙，服务员说是新疆来的锡伯族客人，特地来探访满洲故乡的。如真是康熙时代的满洲移民，倒可以给早已洋化的满族土著重温一下老祖宗生活情调。

晚上，美协设宴招待我，席上冷盆颇有特点：

黄瓜片堆成青蛙松花蛋砌成金鱼凤尾鱼拼成热带鱼西红柿、叉烧搭成螃蟹鸡杂、小磨菇砌成花篮中间一大盆冷拼鸡丝粉皮

厨师在模拟生物的手工上下工夫，给人以视觉错误，是

浪费人力的一种表现，也是当今饮食文化中的邪门歪道。据说是从外国传来的新食谱，始作俑者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最初不过是几盆萝卜花，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大盆大盆的百鸟朝凤或龙凤呈祥，只可看，不可吃。今晚的六冷盆，捣碎了都能吃，可惜不但不能增进食欲，反而倒胃口。

6月27日，上午按照既定日程，在中华剧场楼上小会堂对二百多省市美术界人士讲话两小时。上半段讲笔墨问题，中间插入达木兰神话，引出商品画问题。下半段讲创作有关问题，强调艺术的民族性与地方性，希望出现辽宁画派；又谈到深入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反映生活的厚度；最后谈到画家修养和职业道德。今日在会场见到徐霖，他说黄镇当文化部长时，有成立“美术局”之议，他曾到北京参加筹备，黄下台后，此事作罢，他回到沈阳当辽宁画院院长。

为什么讲艺术要提到“达木兰”？因为这几天净听到“达木兰”神话。这是到沈阳以来的新鲜事，不得不专写一段以记其神。

（一）说鞍钢有个李百万，经营达木兰起家，养了条大狗看守花棚，免遭盗窃。据说他还结交附近的民警，在远距离外遥为看守。

（二）某工人养了一盆名种，小日本旅客见了要买，主人说不卖，不过，为了中日友谊可以送，日本人得之大喜。回国后酬谢他这机那机，还送他一辆汽车。主人一概不收。

（三）今年4月，我在山东牟平县某大队花房里看到有一盆标价二千元的君子兰（即沈阳的达木兰），我已感到神奇，

沈阳有高到二万元的。我想，无论哪位富翁总不至于如此挥霍，花两万元买盆花。

（四）据说此花满洲帝国垮台时从官庭中流散出来，东北人视若财宝。此花我在广东石湾陶厂看到一盆，北京中山公园唐花坞里也有的是，沈阳长春竟如此名贵，岂不是人为的奇迹？我以为此花有价无市，只是投机商之间互相倒腾的把戏。

（五）一天我到招待所花房里看达木兰，仅见幼种四五盆，叶七八片，值一百元；又二叶幼芽数十盆，值十元，均系新从长春买来。原有成熟开花的两盆已被盗。鲁美电教室人云，不久前中山公园花展中有一盆名种，标价三万元。

（六）耳闻为虚，眼见为实。有天早晨去南湖公园和青年公园看花市活动，见三五起卖达木兰的，把值钱的品种藏在皮包或草筐里，有索价六百、八百者。有一大盆已花谢而结籽者，索价一千六百元。

（七）几个北京美院老学生反映，达木兰在沈阳是走后门、拉关系的好媒介，花千把元送这么一件高雅礼品，回敬的必然是具有重大价值的果实。目前许多高干要退下来，但仍有权有势，白得一盆达木兰，何乐而不为？由此证实这类消费品市场大有可为。

29日上午在招待所为美协学习班示范作四尺对开画二幅，费一小时。然后由听讲者提问题，作了解答。

问题一：国画危机——只画小品，不画重大题材。

问题二：张大千的画是否有时代精神？

问题三：老一辈画桂林、黄山、少数民族，大家也画桂林、黄山、少数民族，为什么？

问题四：生活轰轰烈烈，极受鼓舞，传统方法用不上。

问题五：对“情节性”怎么看？

有些问题反映“唯题材论”影响，有些问题似带排斥性质，因我前天强调学习传统笔墨。不管怎样，在沈阳放炮针对民族虚无主义有现实意义。下一日程到鲁美讲课，还得强调学传统，且讲艺术的片面性与画种的局限性，讲人物画的基本功，要讲八练、八写、四临、四通。

7月4日晨6时15分鲁美派车来接。9时起，先示范作四尺纸一张，画了两个献哈达的藏民，费一小时。继之，讲中国画的传统方法，由临摹入手的科学性。因无扩音器，听众多，不得不用大嗓门讲，讲了一个多小时，精疲力竭。饭后稍稍休息，任梦障带我去看国画、油画两系的毕业创作，眼睛几乎睁不开，只得告辞。

鲁美的中国画太缺少中国画味道。他们用的方法是墨笔素描加淡彩。学生贪大贪多，所画人物比真人大，墨气重，色彩乱，给人以精神压力。有个学生以狼为题，画了组画五六幅；有个学生画了十五幅盘古神话连环画，都是大幅。强调生活，不讲究传统笔墨，不追求美感，是鲁美中国画的突出风格。油画受罗中立、陈丹青的影响。两系都有歪曲形象的倾向，看了使人压抑。

在沈阳的日子，接触了大清皇朝发迹的历史。28日参观沈阳故宫，那是大清帝国的发祥地。努尔哈赤从1583年开始，

用了十一年时间，统一了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建州女真部落；1625年迁都沈阳，开始建造宫殿，宫殿模式基本上是汉制，也就是当时的明式。这说明满族地区早已汉化，宫中唯一的女真标志是殿后的一根标竿，北京故宫的中和殿后也有这么一根，是游牧民族以兽肉饲猛兽的器具。

30日参观东陵，这是努尔哈赤的陵墓，又叫福陵。陵门一对石狮，与北京故宫的一对相似，雕工较精。入门豁然开朗，墓道两侧古松数百株，高冲云霄，气势甚壮。陵在一山丘之顶，登一百零八级，过一碑亭，入陵园大门，围以城墙。城周约一里许，陵前屏以前后两殿，前名隆恩殿，门上匾额题字，满文居中，汉蒙两体居左右，与北京诸殿所题左右满汉二文不同，盖此为爱新觉罗祖坟，当以满文为主。陵道两侧所列石兽为明制，雕工粗劣，不能与北京十三陵相比。

北陵为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之陵。其外围为公园，体制与东陵相似，彼为山丘，此为平地，老松围绕，矮屈多姿，大异东陵，乃叹规划者的匠心。此陵狮子惊鳞雕工甚佳，墓道两侧华表首群尤为出色其中驼象两对，手法简练，造型厚实，富于雕塑感。形体轮廓线官弹力，有近代感，胜过南京明孝陵与北京十三陵。想不到三百年前大清故都有如此石雕高手。次日参观沈阳博物馆，询之馆长，北陵石雕群是否墓葬时即完成？答云可能是分几次完成。现知康熙、乾隆几次来沈阳，对东北二陵都有所增建。问是本地石工所造抑从北京请来石工所造？答云，可能是外来工人所造，但又云，东北地区早有汉文化，秦汉以来即受汉人统治，文化随之而来。在关内战乱

之时，汉人大批来满洲避乱并定居，文化之盛，不亚于关内。辽阳汉墓的墓葬器皿及壁画可以作证。该馆东廊陈列北魏隋唐墓志甚多，辽代墓志盖所刻白线人物，图案花纹有唐宋风格。

东廊有一日宋代所铸铜钟，上饰帝王出巡仪仗，云系徽钦二帝被俘时金国的战利品，遗弃在途，搜集移来。

此行改变了我过去认为东北地区缺少文化的错误看法。努尔哈赤战斗一生使女真民族由部落制转为奴隶制，再转而为封建制，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使我大感兴趣，从而遍找文献，钻读史书，探索这一奇迹的创造过程。由于这一史迹，使我对大清末代皇帝溥仪的满洲国，也想一探其奥秘。

7月5日晚9点15分搭275次列车赴哈尔滨。次晨5时半抵达。刘忠和、晁媚、贾平西等师大、美协、画院的七八人来接，住哈尔滨师大专家楼。

师院派车参观哈尔滨市容。南岗区为重工业基地，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等三大名厂称之为动力区。下坡到道外商业区，道里为俄化区。车停松花江畔，有一座防洪纪念碑，圆廊及碑座为苏联人设计，碑顶群像是中国人设计，两者造型前者强，后者弱，不相称。廊头两个浮雕，做上标语，自己破坏自己。江边公园有许多水泥圆雕座，为50年代产物，在画报上见过，还不错，今见原作，乃显造形之弱，盖缺少圆浑、稳重、简练、厚实等感。

过了几天，潘绍棠陪我再到松花江边看雕塑，有50年代的工农兵形象，手法拘谨、软弱。我说这不是低于生活吗？在

工农之间穿插一件掠江涛起飞的天鹅，说是象征哈尔滨这个城市的，是苏晖的作品，有水平。同行者说，“文革”中诬天鹅昂首北面，有向往苏联之嫌，被砸烂，现物是作者重制的。潘问看了他们的作品有何意见，我迟疑了一会，答云：题材范围较窄，表现手法拘谨，看来思想不够解放。潘说大庆任务共十余件，其中有钻井工人形象，大庆公园方面放手让他们发挥，可见创作有自由，而自己思想有框框。我所见三件泥塑样品，都是赤身少女，一跳水，一舞姿，一憨态，我怀疑他们目的在表现人体美。我从来对崇拜人体美的艺术思想不表同情。我认为审美情趣有民族性，单纯表现人体美的画或塑，是西方人的审美传统，不能勉强移植。至此，我看了不少雕塑，发现哈尔滨是欣赏雕塑艺术的先进城市，希望他们能摆脱西方艺术教条的束缚。

7月9日8时半，哈师美术系借化学系梯形教室由我讲课。前半段讲三个有关美育的现实问题：

- (一) 四美中的环境美——美院不美
- (二) 实用美术的审美——陶狮垃圾箱的丑
- (三) 当专家还是当教师——师院学生30%不愿当教师。

后半段摆三个观点：

(一) 美育不是别的，是审美教育。当年蔡元培提倡美育，八十年前南京两江师范开设图画手工课，当时的中小学都设国画、手工、音乐课。我读小学时喜欢做手工，学过拓碑技术，学过装订洋装书。德智体三育都和美育有关系。

(二) 培养创造美与欣赏美两种审美能力，需要学两门

课：审美知识技术和文艺人品修养，鉴别美与丑，发扬美，消灭丑。

（三）审美实践。再论陶狮与铁鹅垃圾箱之丑，提高社会审美水平，消灭丑化的实用器具，为社会审美实用服务，指导美化生活。

谈到我那篇《街头动物园》小品文时，全场空气活跃，哄堂大笑。

有好几位原中央美院毕业的老学生来听课，其中有几位是1953年和我儿子叶善来同班的同学。

陪我从沈阳来哈的胡伟，昨晚回北京去了，我有点寂寞。好在我的孙女叶蔚宁，在南京学园林设计的即将来哈，加上自己涮痰盂、洗澡盆、收拾屋子等劳动，排除了寂寞。

7月13日3点半醒来，考虑明天对哈市美术界讲什么？仍然讲沈阳或山东讲过的创作问题吗？不行，那是我的老一套，虽有与众不同之处，究竟是空话多，结合实际少。因而想到今年在外旅行中所见所闻，都和艺术实践有联系，如曲阜和牟平两个生产大队的比较，北陵石雕和松花江防洪纪念塔及江滨雕塑群的对照，沈阳达木兰虚假市场和北京琉璃厂书画市场的联系。从实际问题引到理论问题，听者容易接受。

在沈阳，对大清帝国开国史作了些了解，头脑里装了些历史资料，这几天偶然想到溥仪的满洲国，虽只昙花一现，究竟是中国现代史一段特殊的插曲。由于满洲国的垮台，使许多故宫名画如《韩熙载夜宴图》、《薄湘图》流散到古玩市场，流到张大千手里，又流归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是一个好题目。

对，就这么讲。

7月11日上午就以下四个题目，对哈市美术界讲了一次即兴谈话：（一）两个生产队（二）两种雕塑（三）两类市场（四）两个朝廷

即兴讲话和当前所接触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阐述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亮出我的世界观。

7月12日上午对哈市美术界作第二讲，搬出我在山东和沈阳的老题目：（一）生活与艺术（二）内容与形式（三）深入生活

着重谈了艺术形式的十个命题。

蔚宁在南京乘沪哈车，午间到达哈尔滨。刘中和派人到车站举“叶蔚宁”名牌接车。蔚宁说，10日半夜上车，过徐州才抢到座位。行车三十六小时，两昼一夜。一路跑单帮的甚多，会跳车，乘务员也带大包小包。一般跑单帮者都在小站下车，逃避检查。怪不得哈市物价比京沪贵得多。

7月14日，托人买到一本《清朝开国史研究》，抓紧时间读。作者立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摘引了一些史料，处处上纲，而对后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具体问题，不加评论，我大失所望。

午餐时和厨师谈话，知这里黄瓜冬季卖价每斤一元余，当前西瓜每斤三角五分。按此推测，此地物价较关内高出百分之五十。蔚宁在德州车站买来一只扒鸡，价三元，厨师说此地卖五元，资将近一倍。

整天下雨，出不去，按计划为哈师大作示范画。美术系四

人来访，交换教学问题，涉及现代美术教育的得失，我大胆提出徐悲鸿的功过得失分析。解放初期，延安革命学派与徐氏的西方写实学派相结合，相安无事。1954年苏联派马克西莫夫来中央美院开办油画训练班，从此契司恰可夫的俄国素描学派垄断了全中国，徐氏的法国式古典素描暂时退席。“文化大革命”后，1980年杭州素描教育会议，初步推翻了这种垄断，复归徐氏素描。美院国画系1981年入学考试免考素描，加考书法，才从素描中解放出来。但中青年人物画教师仍不能彻底解放，不放心以白描为中心的造型练习能培养造型能力。

7月19日，老学生季进城陪我参观博物馆，看了黑龙江的历史陈列。有史前原始社会的出土文物，隋唐时期渤海国资料，辽代契丹文物，金代文物。解说员李士良说，北宋徽钦二帝被俘后，流放在今之阿城。文物中有金章宗《女史箴图》题跋，写的是宋徽宗瘦金体，说明女真民族受汉人文化熏陶之深。又唐温庭宪赠渤海国皇子自长安东归诗，都证明唐文化传布之远，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当时不也都接受汉文化吗。此外又看到解放后出土的恐龙、猛犸象、披毛犀三大化石骨架。博物馆创立于1922年，俄式建筑，位于南岗恒中心，邻近有一座中苏友谊纪念碑，纪念1945年苏军解放哈尔滨。

7月22日访黑龙江书画院，由院长沈重及秘书长满广善接待，介绍专业画家王道中、于志学……诸人。谈了建院经过，主要靠省领导主持，现有画师十九人，年经费十万元。办院方针是搞创作兼研究。这里的政权领导对文艺有兴趣，外来文艺界人士以礼相待。今日陈雷省长特从会议中赶来与客人

相见。谈到建设游乐区太阳岛有两种意见：一派主张仿江南园林，彻底消除现有的外来影响；一派主张重视哈尔滨特色。问我有何看法。我说任何艺术，硬搬不行，仿江南园林就是硬搬。至于哈尔滨特色是什么，也要具体分析，好的要继承，不好的要抛弃。比如，全家到郊外或江滨野餐，是西方生活方式，已成为哈市人的生活习惯，应该考虑适合这类因素，因为生活方式随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发展，不能一成不变。

省美协招待北京来客船游松花江，有冯法探夫妇。冯是来哈市办个人画展的。船在江中行驶一小时，穿过铁路桥，然后泊北岸的太阳岛。岛上全是俄式小屋，遍布饭馆、游乐场。岸上到处是叫卖汽水、冰棍声，树上则有高音喇叭声，地上有游客自带的录音机流行歌曲声，江上有汽部汽笛声，游泳者拨水声，熙熙攘攘，叮叮当当，可以谱成太阳岛交响曲。突然想到书画院谈论建设太阳岛的计划，今日身临其境，觉得硬搬江南园林的确不合适。这儿的洋味儿若是全都去掉也不合适。

第5章 十年荒唐梦

1987年3月31日是我八十岁生日。这天早晨7点半，走出中国画研究院大门，沿着北京西三环北路，开始我的晨步锻炼。北向，转东，走紫竹院路，进紫竹院公园，在湖边长椅上坐了一会；出园，走三虎桥小路，沿北洼沟，过北洼东桥，回到研究院画室，吃完规定的两片面包、一只煎蛋、一碗牛奶，漱完口腔，在画案边坐定。费了20分钟，写完前一天的日记，然后盘算，今天该干什么活？忽然想到今天是我八十岁生日，研究院将在午间叙餐为我祝寿，脑子里发出信息，似乎该做一首诗，用以纪念得来不易的八十寿诞。略一思索，凑成八句自寿诗。诗曰：

一年一年复一年，似水流年又十年；
古稀尝叹路崎岖，而今笔老身犹健；
惜瓮蜗居足三载，甘雨小院遭拆迁；
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

诗稿既定，于是裁纸研墨，一口气写了八条自寿诗条，谁来看我，就送谁一条，秀才人情，不怕献丑。写完字，忽又想到自寿诗的最后两句“画思渐稀文思寄，细叙沧桑记流年。”表明我今后的工作应该实现这两句话，一时心血来潮，决定暂封画笔，改握文笔，写我的一生经历。

从何写起？是个问题，正在反复考虑，一位作家朋友闯来，便向他征求意见，朋友说，就从你的十年厄运写起吧。这一说帮我开了窍，“倒叙流年”，也是一种写法，那么，就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荒唐梦》写起吧。

老伴王人美因为长期瘫痪，卧病积水潭医院，1987年4月12日忽告断气，送进太平间，我这时也因心脏病住在空军总医院，不能前去探视，直到4月23日，人美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我还不能亲去告别，成为生离死别的一大憾事。这天，在病床上写了一首悼亡诗，其中有一段写我们之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遭遇：

回首文革：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闹，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王人美，30年代电影《渔光曲》的主角，湖南人，心直口快，有股子硬劲。1952年从香港回到上海，碰上文艺界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十周年，有人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大头子戴笠有来往，把她逼成精神分裂症，住进精神病院，不久调来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1955年和我结婚。“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影的造反派根据上海那次材料，又领会江青的意旨，把她揪上台去批斗。她天不怕地不怕，硬挺硬碰，在台上耍赖作公鸡鸣叫，弄得造反派瞠目不知所措，只得草草收场。“文革”后期，把她送到干校去劳动，在劳动中，造反派还派人监视她，逼得她神经病复发，送回北京治疗。

至于我的七条罪状三顶帽子，现在回忆起来，可以归纳如下：

七条罪状：

（一）丑化革命领袖：我于北京解放初期画过一幅毛泽东的肖像，用的是国画笔法，不合时兴的革命肖像规格。

（二）丑化社会主义：1956年我画过一组《大同行》漫画，触犯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不健康现象；1962年在洛阳写了一首打油诗《冰糕颂》，造反派认为故意讽刺三面红旗。

（三）丑化劳动人民：1962年画了一幅《秦川麦收》，造反派认为那个割麦的农民是《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同年又画了一幅《沈家门即景》，造反派认为那个渔民是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

（四）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在我担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基本练习和创作两门课应该结合，不可分家，我自发担任了高班的创作课。那位独揽创作课的共产党员教师贴出大字报，指责我“与共产党争夺青年”。

（五）美化叛国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于成都解放前夕出走香港，我和徐悲鸿曾联名写信请他回来，后来还通过出国文化代表团的关系和他联系，动员他回国。大字报指责我朋谋勾结反动画家统治国画界。

（六）拉帮结派巩固国画系独立王国：大字报指责我聘任郭味溟、高冠华、陶一清、何海霞来国画系任教，是搞独立王国。

（七）寄情敌人：1962年我画过一幅《印度献花舞》，画上钤了一颗《寄情》图章，大字报说我在中印交战之后画这幅画是“对敌人有感情”。

三顶帽子：

（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二）美蒋特务；（三）历史反革命。

三年牛棚：

1966年到1968年在美术学院的牛棚住了三年。

七年牢：

1968年4月23日凌晨1点，公安人员把我送进安定门外拘留所；秋冬之际，从这里转移到城南半步桥老监狱；1970年由半步桥转到北郊的秦城监狱，一直住到1975年4月25日才被释放。

§5.1 从反右运动说起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江丰是革命美术学派的首领，人人心目中的大左派，突然被打成大右派，完全出人意料。他的罪状，一是“反中国画”，二是“反文化部”。江丰是版画家，早先刻木刻，抗日期间投奔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主管美术系，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后期在华北解放区担任华北大学的美术系领导工作，全国解放后，先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副院长，1952年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当副院长。我自1954年起被任命为美院的国画系主任，国画教学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主要一条是院领导认为国画不经过改造不能为革命服务；另一条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苏联学院教条统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学生向文化部作了反映，文化部支持国画系试行双轨制教学；一轨是顺从江丰的“素描

制”，一轨是遵循从临摹入手的传统制。江丰有不同意见，反对双轨制。这事传到党中央，毛主席批示：“中国画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江丰被戴上右派帽子。这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对中国画家来说是极大的支持，国画系的教师都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被推上台去批江丰。

在反右之前，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国画家，被江丰看成是国画的革新派，所以把国画系的教学大权交给我，让我执行他的革命学派路线。老实说，我也自认为是革新派，对某些老先生的教学方法不以为然，有时受到老先生的指责，说我坚持传统不力，心里经常打鼓。直到反右关键时刻，才把脚跟站稳。在批判台上振振有辞，历数江丰反中国画的民族虚无主义言行，理直气壮，一扫过去那种遇事不敢表态的畏缩情绪，觉得如释重负而浑身痛快。批斗发言之后还专为美协机关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揭露江丰在中国画问题上的反党面貌》，经过这一场斗争，似乎懂得一点艺术和政治的关系。

§5.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到了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发动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江丰下台，陈沛当了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主张美院培养“提高”人才，美院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两个批示下来后，以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美术学院三个单位

作试点，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美院的陈沛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办学体系的罪魁祸首，大会小会，大批特批。1958年以来，我一直认为陈沛是正确的领导，我这个在他麾下的国画系主任，当然也难免挨批，而且还得批他。好在这一次运动主要是批党内的走资派，我们这类非党分子，只不过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一向爱惜自己羽毛的我，即使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也有被暴风雨袭击之感。

在院部批陈沛的会议桌上，我的思想处在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认为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头，大家都在批，我怎能默不作声？只得搜索枯肠，找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凑凑数，表示积极；一方面却记得反右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系主任，虽不在党，但在陈沛的“提高”路线指导下，也在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江青说过，中央美术学院是个黑色大染缸，当然有我的黑色染料掺和在里头，只恐到头来还得批我自己，因而说话不硬，底气不足。这次批判会上，记得指出过，在某次政治学习会上，在一片“普及、普及”声中，陈沛独排众议，指出中央美院是高等学府，当然要培养“提高”人才。会上这么说，当然要揭发他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其实我在那次学习会上，从心底佩服陈沛的远见卓识，从此陈沛成为我心目中一个有胆识有气派的好领导。如今坐在会议桌上，把他的远见卓识当做裴多菲俱乐部批，岂不背离自己的初衷？思想斗争归斗争，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在政治运动中容不得犹豫疑惧。昨天右了，今天改过来，变成左，才叫识事务者为俊杰，忽然想起这条政治权术，也就心安理得。

经过反复批判，陈沛就此打成“走资派”，送到下面去改造。

我呢？在国画系的批判会上，最后轮到烧我一把火，有位青年教师，原是我的学生，最了解我的思想行为，拿了我的速写本，一片一片翻，一画一画批，批来批去，无非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啦，风花雪月啦，眼不见劳动人民或有意丑化劳动人民啦。奇怪，为什么不揭揭我的历史问题或生活问题呢？一打听，原来这次运动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思想，不追究个人历史和生活。批完之后，自己表了态，表示今后要彻底改造，做一个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画家。

这次运动，在教师内部进行，和学生隔绝。上午照常上课，下午关起门来搞批判，批的时候，思想斗争相当激烈，批完之后，脑子仍然紧张，回到家里才能松弛下来。第二天上课，和学生打交道，换上一副清醒头脑。这节课是指导学生的毕业创作，心里仍在打鼓，昨天下午会上批我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会不会漏出来？有时在教室里发呆，学生问我，才又醒过来。一忽儿又想到下午还得开会，不知道还要批我不？便烦恼起来。

这个毕业班由两个教师教，一个管思想，一个管技术。我是老教师，管的是技术，指导表现技术问题，另一个年轻党员教师，指导构思立意方面的问题；他走第一步，我走第二步，他是主导，我是辅导，一个学生画一幅创作，分做两半施教，以政治统帅艺术，艺术性服从思想性。我觉得这种教法很别扭。有时我利用系主任的职权，单独担任一个班创作课，那位管思想的创作教师便不高兴，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

揭发我一条罪状，说我“有意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

自从我吃批判以后，虽没正式戴上帽子，可是名声在外，美术界的人便另眼相看。第一个反应是1964年夏天，我给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画了一幅大画，画名《高原之春》。画的是藏族青年男女在桃花林中跳舞，1965年退了回来；第二个反应是1965年我为北京市美展准备画的《中国妇女解放史》，组稿人来看了几次草稿，忽然不来了；第三个反应是王府井和琉璃厂的画店接到某单位通知，不收购和出售我的作品了。

§5.3 邢台四清

1965年秋季开学，全校师生开赴河北邢台参加农村四清整社运动。上学期的社教运动，国画系揪出一个教师是地主成份，一个教师是坏分子，他们都算是阶级敌人，不准参加；我以为像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画家大概也无权参加，想不到四清队伍榜上有我的名，看来我还没有排在敌我矛盾之列，所以得以保留此种权利，心里当然高兴。可是，临出发前，新到任的支部书记板起脸和我谈了一次话。

“只管下去，好好改造自己，不要错过机会！”

从侧面打听，我是被带下去监督改造的。

1950年我参加过北京京郊土改，1963年参加过京郊整社运动的尾巴，懂得农村整社和四清的目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整顿干部。还知道上次整社，整出了什么走资派，什么桃园经验，这回要回炉，重新整一整。

在邢台，国画系师生派在南石门大队，我所在的一个小队，发现一个土改中的漏网地主，小组长派我对这个地主做调查，但是不放心，另派一个本地四清工作组成员陪我一起做调查。我们到这个地主家串了几次门，又对有关的知情人做了调查，由我起草把材料送到大队部工作组。想不到这份材料起了催化作用，工作组把这个地主定为重点批斗对象，开群众大会斗了一通。

全国解放初期，十分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任务。1950年我曾参加京郊土改运动，不理解这是促进思想改造的手段，简单地把这看成是帮助农民斗争地主平分土地的工作，而且认为这是获取创作素材的好机会。在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上我大画速写，而在生活会上受到批评。工作组长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农民解除封建剥削同时也为了改造我们自己；搞自己的业务，就是对土改三心二意。这番话使我懂得，知识分子除了真心实意在为农民服务中改造自己，别无他途可走。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把阶级斗争提到空前高的地位，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尤其显得严重。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指出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所以搞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我的身份是指明被带来改造的，而又是一个将近花甲之年的老知识分子，种种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鞠躬尽瘁而已。我对那个漏网地主的处境是同情的，因为他已经很穷，工作组逼得又紧，要死要活，简直叫我揪心。那次斗争他的大会，我在会场里画了许多速写，感情上好象无动于衷，因为我已经完

成了调查研究的任务，如何斗他，是工作组长的事，我成了一个旁观者，乐得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自由活动。那是60年代，工作组已经不采取土改时期不准搞业务的严格纪律，因而我能保留下一份四清运动的形象资料。

说实在，农村干部还是欢迎我们能利用自己的职业特长，为他们的历史性运动留下一点形象记录。大概在年底以前，石门乡工作组决定派几个人到外村去画一套村史。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事先要到县里去领取有关的资料，顺便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顿饭，按理这是犯“三同”纪律的，好在谁都想在肚子里加点油水，吃了之后，彼此心照不宣。这笔违纪帐，当时谁也不愿揭发，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人便乘机向我开炮，此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那顿犯纪律的饭是我发起并由我会钞的，指出我的资产阶级劣根性，不但自己贪嘴，还拖人下水。大凡政治运动，有的人手上掌握了某人的关键性材料，可以打出重磅政治炸弹，致人于死地，有的人手上只有一点点生活小节，加油加酱，无限上纲，贴出大字报，告人一状，无非向众人表态，我和某人划清界限了。这是后话。

按理，作画并不轻松，可在四清特殊环境中，弄到这样一份差使，确是轻松愉快的事。为什么要调我这个“监督改造”分子去画村史，岂非认为我改造得还不错？给了我这份美差，可以比之为皇恩大赦。其实，工作组的真正想法是挑选几个业务尖子，为邢台地区留个美好的纪念。不管怎么样，我从此走入了另一个环境，用自己的专业为农民服务，减轻了思想包袱。

画完村史，调回南石门画民兵组建史，最后调到邢台市画阶级斗争史。在南石门时，遇到邢台大地震，地震中心在铁路东，我们在铁路西，震动不大。这时我们正在画民兵史，为了安全，民兵指挥部为我们挖了一个防震大地窖，工作和休息全在地窖里。我画民兵史特别来劲。我被分担画一幅民兵演习大场面，试用壁画构图法，打破时空限制。事先做了不少准备工作，踏勘地形，参观练兵，指挥部还派了一个青年战士做我的助手，他名叫施胜辰，学过京戏，专工武净，也喜欢画，在指挥部当电影放映员，和我旨趣相投，创作这幅画时，一直跟着我。民兵画史全部完成时，四清领导班子来审查，我们系的党支部书记看到我那幅《民兵演习图》时，以一种怀疑的眼光问我，“这是你画的吗？”我回答“是”。他又再三审视，仍然有点怀疑，我在旁只能默不作声，揣摸他的心思，可能这么想：

“真没想到老头儿有这么一手，资产阶级看起来也不简单，可是只能怀疑，不能肯定，肯定了会翘尾巴，对改造不利。”

这时我心里尽管别扭，却也相当得意，原来资产阶级画家也能为农民服务。

邢台地区“阶级斗争”史画任务完成，小组做总结，我做了自我批评，说我正面人物画得不理想，思想感情和农民有距离。同组的一位女教师说：“这不是思想感情问题，是立场问题！”这一记闷棍来得厉害，如果要分辨，那么棍子打得就更厉害：“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懂吗！”

§5.4 “文化大革命”号角吹响了

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抛出，“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北京已经闹腾得相当紧张。在邢台，“阶级斗争”画展刚开幕，参加制作的师生洗刷完画笔，收拾好画具，行色匆匆，准备回北京。我发现有些人互相交头接耳，斜眼看我，心里不由得嘀咕：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小组已经指出我这段工作有立场问题，比如，最近总是分配我画地主资本家之类反面人物，我还以为是发挥我的漫画才能呢。想到这儿，却又安慰自己，这是分配给我的任务，又不是自己讨来画的，怎能算是我的立场问题呢？觉得很委屈，但愿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事情可真来得其快无比，白天小组总结，当晚就开系的师生大会，系支书主持会议，矛头指向系主任叶浅予，七嘴八舌，连珠炮开得十分猛烈，说我叶某专了他们的政，从现在起要和我算账。遭到如此猛烈的袭击，我只觉得头昏眼花，晕晕乎乎地坐到终场。心里盘算，按照过去的规律，一次运动最多三四个月也就完了，咬紧牙关熬过去就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从此当了靶子。我精神毫无准备，好象走路不小心，撞了车，抬进医院去动手术，不管住院多久，这把老骨头由大夫去折腾得了。

不两天，全院师生在邢台上火车，送回北京。车站上有新上任的党委书记陈播迎接，他和老师们一个个握手问好，见到我却扭转头，装做没看见，我也乐得知趣，快快走开。革命干部怎么能和阶级敌人握手呢。

美术学院的四清队伍在北京市委门前下车，接受新市委的检阅，高呼口号：“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也许这就是参加运动的宣誓仪式，和过去的政治运动有些异样，记不清我有没有喊口号。我从那次夜审以来，老把自己当做阶级敌人看待，在这场合，按理只能默不作声，但是觉得不应该放弃这个权利，不拥护“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不是天生的反革命，我有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要奋不顾身，投入“文化大革命”，心甘情愿当个反面教员，烈火炼金刚，有什么不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会不带着抵触情绪，我干嘛要凑这个热闹，对自己过不去！我是“文化革命”的对象呀，能像生活中的丑角那样当着别人的面劈里啪啦打自己耳光吗！

这个仁义之师的返航程序，排得相当紧凑。向市委宣誓之后，立刻开回学院，揭开早已安排好的斗争序幕。为什么说早已安排好的呢？整个队伍一齐从邢台出发，同到北京，同上卡车，同到学院，怎么能立刻揭开斗争序幕呢？谁不知道中央美术学院历次搞政治运动，哪次不是幕后有指挥，幕前有准备。大队返航之前，早已派出先遣队伍，回北京准备今天的揭幕大典，这和演戏一样，是经过一番精心排练的。大队一到，各单位在大礼堂稍事休息，先遣部队带领本单位的群众，到本单位开辟第一回合前哨战：国画系走廊贴齐了大字报，电光闪闪，把第一号阶级敌人叶浅予推上板凳，站立端正，一阵口号，一阵唾骂，轰得我六神无主，两腿发软，身子摇晃，几乎从板凳上摔下来。继而一定神，意识到自己正在

台上演主角，怎么可以怯场！这台戏必须好好演下去！这么一想，反而心定了。这时急于想看看大字报写的是什么内容，然而口号声、叫骂声此起彼落，干扰太大，聚光灯也太强，我双眼直冒金星，只得暂时打消看大字报的念头，争取时间养养神。我这个人平常性子急，但到紧急关头，反倒特别镇定，盘算今晚会不会闹到深夜？可这时谁的肚子都是空的，主角可以任凭摆布，群众可得填肚子呀，我看这场戏演不太长。我要求革命群众给点时间让我看看大字报，好认清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这场前哨战的司令员不是国画系的新支书，是一个学生，他叫什么名字，记不起了。他说别忙，以后有机会尽你看，现在你仔细听着，我来揭发你的罪行：

“同志们，同学们：”

“根据大字报揭发的很少一部分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中国画界的祖师爷，这个中国画界的南霸天罪恶累累！”

“他画漫画攻击污蔑丑化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能放过他吗！”

“他谩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能允许地吗！”

“他写《冰糕诗》猖狂攻击我们的三面红旗，我们能答应他吗！”

“他与文化特务张大千勾结，企图把这样家伙弄回来再对我们进行统治，我们能答应吗！”

“他对我们工农子弟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打击排挤，我

们能答应他吗!”

“他与陈沛和校内外牛鬼蛇神一起篡夺我们党的领导权，进行无（注：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能答应他吗!”

“是的，我们不能饶了他！我们要清算！我们要斗争！同志们，这个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曾经当过上海反动漫画刊物《时代画报》的主编，他画过大量诬蔑我们中国人民的漫画。”

“他投靠了中美合作所头目戴笠，戴笠亲自接见过他，在中美合作所做反动宣传。这个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居然得到当时美军总司令史迪威的赏识，邀请跟随美军去印度画画，画了开画展，还给美军二百多张画。这还不算这个反革命分子一步登天!”

“他应美帝国国务院的邀请，竟然登上《美国之音》作广播演说。他画了大量歌颂美帝国主义的画，取名为《天堂记》，这个一贯反党反人民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竟然当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窃踞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这个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在江丰、陈沛包庇下，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都滑过去了，他自称‘不倒翁’。同志们，过去不倒是因为有江丰、陈沛保护，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他这个‘不倒翁’彻底砸碎，把他永远打倒，让他永世不能翻身！同志们说，应不应该彻底砸碎？应不应该彻底打倒？”

“这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骑在人民头上，那么多罪恶，解放后又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疯狂攻击我们党和毛主

席。”

“同志们，我们能容忍吗？”

“不能！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现在代表中国画系的革命师生提出四点要求：“

“第一，他和国内外反动分子有着广泛的联系，限他两天内交出他的反动信件和日记。同志们说好不好？”

“第二，多年来他画了大量黑画，限他两天全部交出来。同志们说好不好？”

“第三，大字报和今天会上揭发出来的罪恶事实，一件件写成材料彻底交待。同志们说好不好？”

“第四，建议院革命委员会从明天起令其打扫厕所，在校内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令其写思想检查。同志们说好不好？”

“打倒反革命分子叶浅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革命叶浅予滚蛋！”

这篇斗词为什么记得如此清楚，一字不落呢？原来1980年中央专案组发还给我一大捆交待材料中，夹着几片小纸片，密密麻麻、横七竖八、用铅笔记的斗争发言稿，正是那位造反派头头那晚气势汹汹的原话。感谢中央专案组居然能为我保留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落到了我这个阶级敌人手里，使我的回忆录增添最最真实的材料。

这次首场正式斗争会，造反派头头那句“反革命叶浅予滚蛋！”话音刚落，我如释重负，匆匆离开会场，滚回家去看老伴，填肚子。老伴也刚从山西四清前线归来，说是明天就

要赶去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参加文化部学习班。我说造反派规定我从明天起打扫厕所，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到了明天，美院革委会决定，凡是牛鬼蛇神，一律送到文化部学习班去参加学习。这么一来，社会主义教育学院便成为文化部系统的大牛棚。

§5.5 在文化部大牛棚里

社会主义教育学院集中了文化部的部长、局长、院长、校长、大作家、大演员、大画家、大音乐家、大导演、大教授、老延安、老重庆、30年代左联、四条汉子，等等人物。集中在这里，名为学习，实质是互相揭发，俗语叫做“狗咬狗”。这里出现质量较高的大字报，例如，其中一张揭发文艺界某大领导：

“某人在某日某处说，国民党统治下犯了法，有地方逃，共产党统治下出了事没地方逃。”

这话出自一位负责的共产党领导同志之口，怎么叫人相信？一定是断章取义，陷人于罪。以我为例，美院有张大字报诬陷我骂美国共产党比妓女还贱，原来是截取我旅美日记中的一段话，混淆是非黑白，我日记的原话是这样的：

“彼得是一位进步的漫画家，在《新群众》当美术编辑，从他口中得知美国社会对共产党相当恐惧。他讲一位女党员因罢工被警察抓去关监狱，同监女犯人多数是妓女，她一进去，管监的当然认为她也是妓女，一面向她取笑，一面安慰她

说，‘不要紧，住几天就可以出去。’这位共产党员回答说：‘不！我是“红”！’把那个管监的吓得辟易三步，连叫‘不！不！’从此讨厌了她。看起来妓女要比共产党更高尚些。”

造反派截取“看来妓女要比共产党更高尚些”这句话，说我骂共产党。于是我的罪状之中被栽上一条“他谩骂攻击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中“叛徒”“特务”帽子乱飞，我的一顶帽子叫做“美蒋双料特务”。原因是抗日战争期间我给中美合作所画过一批抗日宣传画，在敌占区散发，大字报恶意诬蔑说这是陷害敌后老百姓。这么一说，我的罪行岂不更严重了吗？

我的罪状之中还有一条什么“他与文化特务张大千勾结，企图把这样家伙弄回来再对我们进行统治。”争取画家张大千回国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有上面的指示，却说成是我和张勾结，企图阴谋统治国画界。

把我说成是国画界的“祖师爷”、“南霸天”、“不倒翁”，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反正用种种恶名往你头上栽，搞到你臭名远扬，永世不得翻身，其实不过是阿Q的行径。

最不可思议的是将我1953年画的那幅《中华民族大团结》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1962年《秦川麦收》中那个农民是什么“三仙姑”；《沈家门即景》那个渔民是什么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1962年我们和印度人在麦克马洪线打了一仗，我那幅《印度献花舞》因为钤了一个《寄情》印章，便说我对敌人充满感情。如此牵强附会，难怪四人帮在1975年

把大批优美的国画，诬蔑为影射政治的“黑画”，把中国画家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那首《冰糕诗》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我带毕业班学生在河南、陕西学习民族艺术传统，第一站在洛阳看龙门石窟和公园汉墓。正是夏天，满街叫卖冰糕，触动了我的幽默感，我写了一首打油诗。诗者，思想感情的分泌物也，况且正逢那几年天灾人祸、生活困难之际，难免要触动当时的生活情态，一经上纲，便成了一首影射政治的黑诗。诗云：

冰糕、冰糕，
声震洛阳街道；
头戴白帽，
瓶罐围腰，
一手数钱，
一手分糕；
甜解口馋，
冷可醒脑，
赛似那烟酒茶，
又当作糖，或糕；
六月正当时今，
寒冬那怕牙倒；
孩子爱闹，
一塞便了，
朋友相见，

无茶有雅；
姐妹娇小，
最堪慢吮细咬，
顽童兴豪
连吞十七八条；
会议冷场，
叫人心焦，
忽听一声冰糕叫，
个个眉开眼笑；
冰糕、冰糕，
真是得天独骄。

§5.6 抄家

经过无数大字报的揭发，又经过无数次斗争会的批斗，叶浅予被打成反革命。反革命的财产，按照封建制度的成规，就算敌产，敌产就得没收。没收敌产的方式，按照《红楼梦》中查抄大观园的旧例，抄叶浅予的家。

1966年八九月间，时间是火烧教具之后，国画系楼道大字报展开关于处理敌产的争论。有人主张看敌人能否自觉，由自己主动交出；有人主张对敌人不能手软，应立刻抄家。过了两天，造反司令部贴出布告，勒令牛鬼蛇神两天内交出书画、文物、存款，我当然照办。又过了两天，抄家行动开始，我由几个红卫兵押着步行至大佛寺西大街47号后院。他们翻箱倒

柜，把全部画稿、藏画、书籍、笔记本、贴相本、纸张、画具、衣裤、现款等等，装满一卡车，胜利凯旋而去。留下几个人审问我那架16厘米的电影摄影机哪儿去了？我说去年就卖掉了。又问，有没有其他秘密窝藏的违法物件？我说没有。他们说搜，搜出来咋办？我说搜出来算我是现行反革命。此话一出，他们把早就准备好的铁镐、铁铲拿出来，在我那间小储藏室里挖地打洞，挖了一大片，挖到房外那棵大杨树的大根，问这是什么；又挖到下水道的瓦管，问这是什么；我默不作声，随他们去挖，去问。看来这无偿劳动，他们有点泄气，便自动下了台阶，说“今天咱们就抄到这儿，希望你老实点儿，我们还要来抄。”当他们收拾完毕，将要开拔，我说，所有东西都抄走了，留下一屋子箱柜桌椅也没用了，你们全部搬走吧。他们说，暂时由你保存，必要时再来抄。临走时用美院革命委员会的封条封了两间房。

过了两天，果然又来抄家了，这回不是原来那伙人，是美院附中的造反派。我说你们来晚了，他们不信，硬是撕了封条，进屋去乱翻一通，捡了些烂纸破本，扬长而去。以后街道造反派又来抄了一次家，抄去王人美一只衣箱，里面有一架“莱卡”照相机。

我住监狱时，有人打通房管所的关系，强占了我那两间画室，把家具堆到院子里。这时老伴进了干校，幸亏看家的老阿姨通知美院造反派，派车把家具拉走，免得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物。

大抄家之后，房管所乘我之危，逼我匀出两间房，让给缺

房的人居住。我和老伴商量，决定卖掉一部分家具，腾出空房。家具卖掉之后，邻居向美院造反派告发，造反派立刻向我问罪，说我无法无天，胆敢私卖公物，勒令交出卖家具的钱。“文革”期间，牛鬼蛇神之家，哪家不变卖家具过日子，拍卖行乘机压价，只得当作破烂卖。被告发卖家具之事使我明白，牛鬼蛇神一切行动，都由周围邻居监视着。

1979年美院宣布我的政治结论，撤销以前的诬蔑不实之辞，决定发还抄家物资，留在美院的那部分私产，陆续发还给我，其中书籍画件约损失20%，还算幸运。不过，其中比较重要的书画文物，由于中央文物局的某次命令，调归国家保管，被北京市文管会调走，此时只发还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剩下三十三件，声明已在某年处理掉了，没法归还。经我调查，原来北京市文管会认为叶浅予的反革命罪行翻不了案，他的财物可以自由处理，大权在握的人，如陈伯达、康生之流，虎视眈眈，谁不想乘机捞一把，而文管会的抬轿子、拍马屁老手，乘机献媚，请这班权贵人物随意挑选，大发横财。谁知叶浅予的反革命帽子竟然摘掉了，这三十多件原属叶某之物，一时没法退还。我说这批文物到底如何处理，处理给谁，开个单子给我，注明每件的去向，我自己想办法找回来。北京文管会得此下台阶机会，乖乖地开了个清单给我。现将此文件清单抄录如下：

《北京市文管会叶浅予提供书画文物抄件》

编号	名目	去向	件数
2-1510	张大千仕女条	陈伯达	1 件
2-1512	张大千仿敦煌壁画	陈伯达	1 件
2-1517	张大千唐装仕女图	陈伯达	1 件
2-1581	潘天寿野趣图轴	曹轶欧	1 件
2-1606	张大千华山图	陈伯达	1 件
2-1613	仿马和之兰亭图	林彪	1 件
2-1620	任阜长花卉屏	林彪	4 条
2-1627	张大千华山图	陈伯达	1 件
2-1630	张大千荷花扇	曹轶欧	1 件
2-1571	张大千青绿金地扇	林彪	1 件
2-1565	张大千仿华宏绢本山水	陈伯达	1 件
2-1572	张大千荷花鸟扇	林彪	1 件
2-1573	张大千青绿山水	陈伯达	1 件
2-1671	苏仁山画条	曹轶欧	1 件
2-1341	兰英 绢本山水	李作鹏	1 件
2-1623	钱慧安人物画册	林彪	1 册
2-1349	徐悲鸿立马图	陈伯达	1 件
4-1221	石章	林彪	3 件
4-1222	章料	林彪	1 件
4-1226	石章	康生	1 件
4-1227	石章	康生	1 件
4-1231	石章	陈伯达	2 件

《北京市文管会叶浅予提供书画文物抄件》（续）

编号	名目	去向	件数
4-1232	吴昌硕刻狩纽章	曹轶欧	1 件
4-1255	叶浅予各色章	曹轶欧	2 件
4-1250	曹群伯制墨	江青	1 件
4-1251	陈洪缓款雕人物臂格	汪东兴	1 件
4-1252	孝穆刻竹臂格	林彪	1 件
4-1254	刻花子石随形砚	林彪	1 件
4-1257	琥珀羊纽章	曹轶欧	1 件
4-2941	嵌银丝漆木镇尺	江青	1 件
4-2942	嵌银丝漆木镇尺	江青	1 件
4-1215	奎照斋圆柱墨	林彪	1 件
4-1216	胡开文兰花墨	林彪	1 件

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了我的政协委员职务，这年开会时，第一次小组会上，我严肃地声明，我是戴着反革命帽子来参加会议的，希望政协能够帮助我把问题弄清楚。这一说，会议顿时冷场，秘书处的人马上向我了解情况，表示一定向中央专案组办交涉，劝我安心参加会议。

在此期间，我两次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告了状，要求向那班吸血鬼追回我的私产。可惜收效甚微，截至1986年，只追回七八件，不到全数的1/4。这是后话，先在这里提一下。

造反派诬蔑我画了大量歌颂美帝的画，取名为《天堂记》，恰恰相反，《天堂记》是讽刺美国生活方式的一套漫画，发表

在北京解放前半年的《新民报》上。明明是讽刺，硬说是歌颂，除非造反派的审美思维是特殊神经反应，否则决不会弄到如此颠倒黑白。

又比如我那套《大同行》漫画，不过稍稍反映一下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某些不正常社会现象，造反派大兴问罪之师，诬蔑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为这套画，在美院大操场专门开了一次斗争会，把我那几幅画放大了挂在楼窗下，逼我跪在水泥台阶上，面对革命群众，比坐喷气式还恶毒。群众拿小石子砸我，幸亏有个好心的学生，在我身前一站，作我的盾牌，高喊“砸不得砸不得！”这个学生是山东人，在“文革”中不知犯了什么罪，被革委会开除学籍。1983年我到济南开画展，托人找到他，向他在“文革”中保护我的仗义行动道谢。

设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的文化部集训班，每个单位都有革命积极分子掺和在牛鬼蛇神之中，因而“狗咬狗”的把戏表演得相当认真。除了张贴大字报揭发所谓反动言行，还开过几认斗争会，把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揪出来批了一通。组织这种揭发斗争和各组学习批判会议，都由文化部特派的工作组负责。尽管班内气氛相当紧张，秩序还比较正常，星期天可以休息，由各单位派车接送。如此过了几个星期，各单位渐渐调人回原单位批斗，批斗之后，有的单位仍然把人送回来学习，有的单位干脆不放回来了。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工作组的人也在交头接耳，纷纷议论，传说文化部新领导有问题，集训班是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又说是刘少奇耍的把戏，集训班马上要撤销，所有牛鬼蛇神

都将由原单位领回去。这一下，形势大变，传说各单位成立了红卫兵，工作组被遣散，红卫兵掌了革命大权，牛鬼蛇神将面临新的厄运。集训班寿命一个半月，眼看就要被封闭。

8月9日下午4点光景，美院开来一辆大卡车，车上站着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卫兵，袖缠红臂章，呼五喝六，把我们这批罪犯赶猪似地赶上车去。虽没把我们反铐双臂，可真有点像送法场行刑的滋味。

§5.7 中央美术学院的小牛棚

车到学院附近，停下来，红卫兵点了一下名，指挥几个人先下去，各自回家。只听得其中一人发出怨声：“我不是牛鬼蛇神，干吗把我送到学习班去！”这才使我明白，为什么学习班里夹着一些左派；后来使我更明白，为什么在牛棚里有所谓“红色牛鬼蛇神”——他们是执行任务，奉命向造反司令部打小报告的。

左派下车后，卡车直开学院。这时天已黑下来，学院大门里人声喧嚷，灯光明亮，我们排队进入院门，一个个脖子挂上牛鬼蛇神牌子，戴上高帽子，鱼贯而行，穿过群众，登上临时在操场上搭成的高台。排好队，点完名，红卫兵每人揪一名牛鬼，主席领喊口号，领一句，群众应一句，喊完口号，会场移到大礼堂，主席宣布，今晚斗争对象是美院走资派头子陈沛，其余的反动派低头听着。接着，各单位的代表轮流登台揭发控诉。斗争完毕，已10点多，主席交待所有牛鬼蛇神

明天起一律带铺盖，带换洗衣服，带毛巾牙刷，带粮票，向牛棚报到，如不按时报到，当心你的牛头！

今晚的斗争会，有点象戏曲舞台上的夜审场面，阴森森，凶狠狠，和几星期前刚从四清前线调回的那次斗争会颇异其趣。对我个人来说，那次是突然袭击，当主角，头脑迷迷糊糊；这次是心里有准备，当配角，虽然气氛恐怖，可不怎么紧张。回到家里，独自一人，老伴还在社教学院，她们单位的红卫兵不久也会把她拉回去。今后命运如何，只能听天由命，自顾自了。有一点我心里比较明白，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复杂，我的日子比她难熬。好在此时已经到家，老阿姨看我平安归来，问我肚子饿否，此时确实没想到肚子是否饿了，经她一提，胃酸立刻涌上来，才明白还没吃晚饭。

红卫兵兴起后，工作组被迫退出革命阵容。红卫兵贴出大字报：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我们说要在‘用’字上下功夫，就是说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因此要抢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起好。”

美院红卫兵第一大棒，是火烧旧教具，把石膏模型统统砸碎，堆在操场中央；又搜集旧讲义、旧画册作烧料，烧起熊熊大火，从牛棚里拉出来全体牛鬼蛇神，跪在大火周围。红卫兵宣布，我们这些人是旧世界的渣滓，要为旧世界殉葬。我

们背后站着革命造反派，稍一挪动，后面的伸手就将你拨正，不许乱动。火越烧越旺，脸上烤得发痛。我旁边跪着的是国画系副主任，他有风湿症，膝盖痛得不行，连声叫饶，造反派哪管你死活，你越叫他越吼你骂你。我有股子硬劲，既叫殉葬，那就殉吧，咬紧牙关熬一阵，实在熬不成，那就躺下装死，让造反派把你丢进火里去，和旧世界一起毁灭；要么把你送到邻近的协和医院的太平间去，叫家属来收尸。我心里这么盘算，可不敢向这位邻居建议，怕他心怀叵测，引出他的将功赎罪之意，向造反派告我一状，真的将我丢进火里去。正在胡思乱想之际，火已渐渐熄灭，这场喜剧也告闭幕。我们回到牛棚，管理牛棚的牧牛郎发出命令，要每只乖牛在《造反日记》里写下今天殉葬的感想。

乖牛分成小组，包下全院的清洁卫生工作，原有的清洁工便是我们的监督指挥员，除了这一日常工作，还要派临时劳务。每天劳动完毕，要写《改造日记》，检查本人的灵魂，当然也欢迎触及别人的灵魂。《改造日记》每周交一次，由牧牛郎红卫兵审批。日记既要交红卫兵审批，那就难免说假话，让造反派欣赏自己的改造效果，表现自己的思想日益向工农兵接近。我在这场殉葬喜剧中的真情实感，既如上面所述，当然不会在日记里如实反映。可喜的是，1966年到1967年两年中所交的《改造日记》，已经由专案组于1981年退还给我，我一有机会便把这份历史档案翻出来，顺藤摸瓜，看看自己在那个遭难的日子里到底怎么混过来的。不摸则已，一摸便摸出我这个“不倒翁”“南霸天”“祖师爷”也真有蒙混过关的本

领。日记写得真动感情，假使我是红卫兵，也会欣赏这位“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改造自己的硬心肠。

请看我在1968年8月24日写的日记：

砸不砸外国石膏教具的问题，在大字报上讨论了几天，今天由于北京师范大学革命派同学来我院造反，迅速促成了这件事。决定砸！凡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不论中外古今都砸，牛鬼蛇神赖以欺骗青年毒害青年的工具和教条将一起宣告埋葬。

大会在操场上开，雕塑系一位同学控诉：

“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依仗这些东西毒害了多少青年！今天要砸烂这些东西，让牛鬼蛇神永远不得翻身，永远害不了我们！”

接着是一位工人同志控诉：我们当模特儿，每天连续三四个小时，动也不能动；有时候要我们穿着厚衣服在太阳底下晒，他们这些老爷们却躲在大洋伞底下画。文化大革命，我们才得翻身。我们要斗臭他们，斗倒他们！

听了这些愤怒的控诉，头脑里立刻出现了上课的情景：我们对待模特儿像对待石膏一样，不当人待。这和工厂主对工人们压迫剥削完全一样，我们把这套教给学生，让学生跟我们一样对待模特儿。这就是阶级压迫！又是和平演变！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无产阶级的政权下面，居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我们有两件法宝：一件是业务上的“专家权威”地位，欺骗无产阶级文化低，得向我们请教；又一件是组织上有靠山，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利用我们

作为和平演变的工具。我们今天跪在石膏面前，是教我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教我们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丑恶灵魂，应该和石膏教具一样，一起被砸得稀巴烂！

跪在地上，膝盖骨很痛，痛得冒汗，这短暂的痛，抵不了我们长期的罪！这痛，是彻底改造的一服良药！

这篇日记的记事相当真，体会也相当深，可惜和当时内心独白距离很大，这是强迫改造的必然反应。那么，是不是内心毫无触动？回想起来，确实有所触动，这触动可能是一刹那的灵感，并非理性的升华。写到《改造日记》上倒很合适，它可以蒙骗管教人员，借以过关。那两本日记的内容，基本上属于过关性质。现在看来，思想改造，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钢刀搁在脖子上的时刻，叫冤枉喊救命是人的本能，红卫兵以高压手段强迫牛鬼蛇神服罪，岂有不服之理。8月24日那一场斗争，今天看来，是一场驱神赶鬼的宗教仪式，红卫兵高踞祭坛，手执神剑，念念有词，小鬼们畏畏缩缩，伏地认罪，演得非常认真。那天即使不叫写感想，我也会主动写这么一篇“改造八股”。

翻看了“文革”中的日记，使我记起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往事，可也看清了我在狂涛之中如何保全自己的曲线求生之道。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只能软抗，不能硬挺。住牛棚前后三年，这次殉葬，肉体稍稍受了点痛楚，当然能抗过去。那次黑画展览中挨皮带抽打，才叫硬挺。日记对此事也有记录，日期大概在殉葬斗争前一天，8月23日日记写道：

今天早晨我面临的这场风暴，对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教

育。我的罪行激怒了群众，挨了打，但群众仍然是有分寸的。不然，即使把我打死，也解不恨。这一打，更深一层认识我的罪行的严重性，使我的头脑更清醒些，对待运动的态度摆得更正确些。我坚决相信党，相信群众，准备迎接任何考验，相信党和群众会给予我自新的机会。

这天挨了打，挨得不轻，背上衬衣血迹斑斑，后脑勺打了个洞。日记上却不敢如实描写。为什么？怕暴露不满情绪，引来更重的惩罚。日记后段又写得如此超脱，如此光明磊落，标榜自己站在革命立场看待这场惩罚。假使我是一个精明的造反派，一定会发觉叶浅予这个胆小鬼在耍花招愚弄革命群众，千万不能上当受骗。叶浅予真是在耍花招欺骗造反派吗？他哪敢！实际是他被打懵了，而当天的日记又不能不有所反映，于是硬着头皮写了那么一段漂亮门面话。

那次挨打的一共三个人，一个罗工柳，一个黄永玉，一个叶浅予，都是在黑画展览会场挨的打。

提起黑画展览，是中央美院革命造反派的拿手好戏。1964年社教运动演过一次，规模不大，黑画作者不点名，给作者留点面子，展览也不公开，只限内部参观。“文革”中又第二次上演，规模极大，U字楼的教室占满了。重点牛鬼的作品及有关照片和资料，特辟专室陈列，叶浅予是重点中的重点。

23日那天上午，黑画展刚布置好，头一个被拉去的是罗工柳，因为他画了一幅油画，画的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一”那首诗的词意。造反派说他歪曲毛的词意，让毛孤零零一人站在一只小艇上，漂泊在茫茫大水中。一面批，一面用

皮带抽他。等他从会场出来，把我叫去，红卫兵押着我走进一间教室，里面挂满我的画稿和生活照片：正中是毛泽东的肖像草稿，四周挂着其他画稿和照片，那幅被指为“空降特务”的《沈家门渔民》，那幅被指为“三仙姑”的《秦川麦收》比较显眼。我一到，罚我面对那幅毛泽东肖像草稿下跪，由一个红卫兵发号令，喊口号。

“叶浅予丑化革命领袖罪该万死！”

“叶浅予丑化劳动人民罪该万死！”

“叶浅予毒害青年罪该万死！”

“大混蛋叶浅予里通外国，该死该死！”

四五个身穿绿色军装的中学生红卫兵，手握皮腰带，站立两厢，随着口号声，一阵一阵挨打。这时我被推翻在地，背上一阵一阵发烫，发麻，发辣。喊口号的那位执刑官，喊到后来，没词儿了，便只顾喊：“打，打，打！”皮腰带的铜扣扣碰到后脑勺，感到有点痛，不知道脑袋开了花。皮肉受罪，头脑还算清醒，心里在想，不知是哪个混蛋在喊口号，抬头瞄一眼，是个陌生脸，拿皮腰带的也是陌生脸，自己班上的学生一个也不露面，他们大概不好意思下此毒手。故意躲在暗里指挥。在这生死关头，我心里明白，要有骨气，决不吭声，由你们这些小刽子手们行凶。

打着打着，大概看到我背上头上出血，怕真打出人命来，便住了手，一声令下，“滚蛋！”我挺起腰杆，走出刑场，几个红卫兵踢出来，来到操场，叫我躺在地上，由一个红卫兵在我肚子上踏上一只脚，另一个红卫兵拿起照相机，咔嚓一响，

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纪念照，体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句话：打倒土豪劣绅并且踏上一只脚。事后有人告诉我，这张照片在美国的画报上发表了。也好，叶浅予活在这世界上，总算留下了一件大可纪念的历史文献。照完相，还罚我在操场上拔草。

这时，国画系的学生出场了，拍拍我的肩说，你背上有血，后脑勺有血，到医务室去上点药吧。由他领我到医务室去，脱下衬衣，擦洗伤疤，在背上和后脑勺上敷上药，贴上纱布。不知是同情还是遮丑，他竟然叫我回家休息去。这个学生好面熟，叫不出名字来，后来知道他是叶浅予专案组的头头。他有责任而且有权力指挥我的行动，也许在暗里指挥行刑的就是他。

回到家里，老伴赶紧帮我洗脸、擦身、换衣，让我伏着身子躺下，还喂水喂饭，问这问那，叫我松心躺着。这时正是8月下旬，天气还热，又是正午，身上出汗，全靠老伴忙着给我擦汗。我这时心潮起伏，早晨那一场判官和小鬼行刑作恶场景，是真事还是梦境？是政治运动还是武装革命？实在弄不清。老伴说，你这点皮肉伤痛算什么，这几天中学校里闹得更凶，西城一个中学的女校长给打死了，送去抢救，医院不收，那才急死人呢。

挨打之后第二天，照常到牛棚报到，到大礼堂看大字报，碰到几个小将，看来是昨天打过我的那几位，拦住了我，问我服不服？我说：“服！服！服！”他们看我表情不对，有抵触情绪，立刻叫我跪下，一齐解下腰间的皮带，向我背上再来

几下，然后扬长而去。这不是惩罚，而是侮辱！

有天晚上，牛棚开生活会，那个专打小报告的“红色牛鬼”，检举叶浅予挨打之后，第二天还穿着那件血衣，不是有意叫人看吗？另一个牛鬼检举我在宿舍里让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我解释说天热出汗，背上红药水从纱布里渗出来，自己擦不着，只好请人帮忙。这时牛棚里议论开了，说，明明亮伤疤给人看，还解释什么！生活会的作用是“狗咬狗”，抓住效果追动机，追得你承认动机不良，才能算完。为了表达我的豁达大度，这天的改造日记就这么写着：

关于李可染给我擦背上的红药水，记得还有一次是李苦禅，一次是文中信，都是因为汗出得多，自己擦不着，叫他们帮我擦。当时曾考虑该不该这样做？自己的回答是：反正他们都知道我挨过打，背上贴了好几块纱布，几天没擦汗，请人帮忙擦一擦，一次这样做了，二次、三次也就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今天经人一检举，才认识到影响极坏，的确像故意拿伤疤给人看。别人对我的怀疑是出于革命的警惕性，对我这样一个严重的牛鬼蛇神，应该如此，我愿意接受大家的监督。

今晚又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现在记下一段话，提醒自己这样看问题：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关于劳动，牛鬼们分组分工包干全院的环境卫生工作。

国画系四个老头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郭味菜为一组，四人中我的体力较强，其余三人较弱，干活我总是抢在前头。劳动中间谈体会，三人有怨言，怪我干得太多，抢了他们的劳动份额。这叫吃力不讨好，我心里也有怨气。

有一晚牛棚里作思想汇报，各人谈的都是些拥护运动愿意改造的表面话。国画系派了造反派听我们小组汇报，他用两句话揭穿了我们四个人这星期以来的基本态度。他说：“四人观点一致，你们团结得很好。”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把真实的思想摆出来，灵魂深处的东西不愿意和革命群众见面，我们之间只有包庇，没有斗争，谁也不斗谁，没有真正站到革命这边来。

以后在劳动中留点时间，交换意见，谈谈体会，谈来谈去，还只那一套，怪我干得太多，故意不让他们干，意思是我剥夺了他们的劳动权利，按革命派的观点说，就是阻碍了他们的思想改造。到了思想汇报会上，大家还是说门面话。造反派怀疑我们之间有攻守同盟，天晓得，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谁敢有胆量订什么攻守同盟！说老实话，我们各人肚里只有一本帐：好好劳动，好好改造，早点争取宽大，摘掉强戴在头上的帽子。除此之外，我们思想上立场上一个共同点，可能是反革命阶级友爱，有这友爱，用不着什么攻守同盟，我们的行动就会一致，达到团结，互相包庇。管牛棚的造反派，用尽各种手段，或硬或软，要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结果收效甚微。

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四人开了半小时会，首先谈谈对劳动的态度，彼此展开了一点批评，李苦禅批评我打扫厕所时把主要的活都占了，一味照顾他，他认为是缺点。经他一提，我立刻认识到，这是我参加劳动以来很不对头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对各人的劳动应该互相严格监督，不能有一点点温情，我对李苦禅的照顾，不是真正帮助他，而是在他改造道路上设置障碍。

从这段日记看来，我的自白是和革命立场一致的。这说明“狗咬狗”的策略，在我们之间起了一点微妙作用。

在牛棚里制造“狗咬狗”的另一个策略是动员牛鬼蛇神写大字报。

我在牛棚里前后贴出十一张大字报，其中一张揭露那位专打小报告整人的红色牛鬼，写得比较真实生动，可惜造词用语，学造反派的口气，近乎矫揉造作，不合我的身份。除此而外，其具体内容都符合其人其事。现在抄在这里，算是改造中的一点贡献。这是一篇正面文章，是黑牛造红牛的反。

伪君子XX

（一）对群众是党，对党是专家。

XX是个一本正经、道貌岸然、高人一等的人物。在国画系里，既是青年教师的班头，也是老年教师敬而远之的权威。他认为自己“自来红”，天生革命，别人都是他改造的对象。他常常捧着一本线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装出一副毛主席信徒的神气。他的马列主义用来唬人整人，用来保护自己，其实是个伪君子。他有一段非常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只要别人有不同意见，非得把人说服，才肯罢休。在群众

面前他是党，在党面前他是专家。他是陈沛的六大台柱之一，是陈沛反党的重要参谋人员。他要陈沛咬咬牙，维持学院派，错就错到底。做党的工作，他认为妨碍当画家，又说“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做一个党员画家很舒服，有名有利之外，还有权”。这权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权。

（二）一个可怕的聪敏人。

XX是个可怕的聪敏人，很会利用机会，利用人，打击人，给自己制造特权。他以一种特别的嗅觉，去发现别人的缺点和毛病，加以夸大，给人戴帽子。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有位教师XX交出他过去对党不满的一些言论，他马上抓住辫子，给XX戴上反党帽子，整了他，使XX长期抬不起头来。后来党发现整错了，向XX道了歉。1958年他当支部书记时，故意在群众中抬高叶浅予的威信，说什么业务上应该听叶的。其实那个时期，系的一切工作，事先都在他的宿舍里开了会，听他的指示，然后交叶去布置，让叶做他的驯服工具，他站在后台发号施令。

自从黄铸夫来系当副主任以后，XX就利用机会，专心致志搞业务，故意拿不懂传统、不懂基本练习作借口，推脱教学任务，但不放弃高年级创作课，可也常常借口有病不到班上课。这个时期，XX好像一个玩票的票友，爱唱不唱，谁也管不着他。

（三）宁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该犯生活错误。

XX在假整风时说，宁可如钟涵、艾中信犯方针路线错误，不应犯个人生活的错误。个人生活的错误最糟！在XX的心眼

里，不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犯大罪，只有个人犯了生活上的错误，即他那次被人揭发出来的流氓行为才是最糟的。他为什么这么羡慕钟涵、艾中信？原来黑帮工作组已经对美院的做整风定了调子：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当作执行方针路线的错误，只要检查，不加处分，一切由工作组包着，而XX的流氓行为则早在党内受到处分。XX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犯罪问题上，也搞个人突出，真是反动透顶了。

§5.8 游斗示众内调外调

8月27日起全院牛鬼蛇神集中到学院牛棚居住，总共三十余人，生活纪律和劳动强度比分散时严格很多。白天学习、劳动、写交待，晚上开生活会亮思想，老头子们被整得精疲力尽。我这时候只有一个想法，一切听天由命，由人摆布，把这条老命豁出去了。自从“黑画”展览开始，我吃了造反少年的皮鞭后，这种消极思想更为强烈。革命司令部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可不听那一套，手痒了，不打人不好受，我们随时准备挨打，皮肉之痛倒可以减少一点精神创伤。然而革命风暴有时也会变调，变得阴森而低沉，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大概是革命派内部发生什么磨擦，从牧牛郎的精神状态可以觉察出来，这种时候，他们表现得色厉内荏，心不在焉，可见革命派也是不好当的。

美院的大规模“黑画”公开展览后，革命群众如同潮水一般奔腾而来，抓机会开眼界找刺激。我的“黑画”占了一个教室，成了革命群众嘻笑怒骂的重要对象，我随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斗争。这一拨散了，另一拨补进来，围着高台轮番臭骂。有些人故意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逼得你哑口无言。例如，问你为什么要丑化革命领袖？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如果为了满足这些人的愿望，直截了当说我恨革命，恨社会主义，那就得挨皮鞭，逼得你非拐弯抹角在动机和效果上兜圈子不可。我心里明白，群众的愿望，不过象看猴子耍把戏，借机取乐而已。不过到了晚上开生活会，便会有人咬你一口，挨骂挨斗，习以为常。

前面说过，红卫兵把我从文化部集训班揪回来，打得头破血流，我已经把老命豁出去了，无论怎么斗怎么打，不过是一堆臭狗屎，打得瘪了气也无所谓。问题是站在高台上，当着一群看把戏的年轻人，这幅老面皮实在扯不下来。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总想到自己还是人，不是猴子。古人说士可杀而不可辱，造反派不打你，而笑话你，比挨打还难受。难怪老舍在一次斗争会上丢尽脸皮之后，走到太平湖里去自沉。在这个关口，我幸而有一股豁达自负的气度，有一个漫画的心态，没有走到绝路上去。几次辱骂之后，脸皮厚了，嘴也滑了，笑骂由人笑骂，坏人我自为之。“黑画”展览期间，揪斗频繁，对群众是一幅面孔，对红卫兵监督又是一幅面孔，总算勉强熬过来了。以后造反派全国串联期间，美院住满外地串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偶然也有揪牛鬼蛇神寻开心

的，这叫“示众”，我的示众次数也不少，比之“黑画”期间却少多了。

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变，学院的“革联”“红旗”“井冈山”等不同派别的革命组织，忽然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1967年1月26日下午，突然宣布开大会，把三十多个牛鬼蛇神揪出来，一个个宣布罪状，把其中的十来个戴上高帽子，分乘两辆大卡车，上街游斗，一路敲锣打鼓，吸引路人。这十余人是几个大号反动派，其中当然有我。出王府井南口，东出建国门，转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再转到朝阳门里的文化部大门口，车上革命师生员工喊口号，车下行人被吸引过来，口号锣鼓一阵吹打，果然引来了不少人。有人大概认识我，指着我喊：“那是叶浅予！叶浅予！”车上便喊：“打倒叶浅予！，砸烂叶浅予的狗头！”我那个被高帽子压着的脑袋瓜，哪敢抬头，眼睛闭着，耳朵听着，心里盘算着，希望快快结束这场搅人灵魂的把戏。口号喊完，车往西开，我以为还要到美术馆去演出一场，可车在东四（？）往南一拐，开回美院。在东郊那段路上，车开得很快，路旁群众连喊：“开慢点！开慢点！看不清哪！”有群众指着我们骂：“混蛋混蛋！”我始终低着头，不是不想把脸给人看，脸皮早已丢尽了，还怕什么。所以低着头，是动脑筋想问题：今天为什么要游斗？是不是从三十多个牛鬼中挑出我们十来个，游斗一番，算是定了罪，定了案？其次是想，今天怎么游法？怎么斗法？游到什么地方？游到什么时候？心里不免嘀咕。可是又一想，既然上了车，无非再当一次反面教员，但愿时间快些飞过，早点回牛棚休息。

心定之后，便思考如何度过这段示众的时间，于是心生一计，这几天正在读“老三篇”，背“老三篇”，何不利用这大好时间，闭着眼睛默默背诵“老三篇”？由于背“老三篇”，全神贯注在“老三篇”的逐字逐句，把一切杂念都打退了，耳朵虽然听到一些叫喊声、咒骂声，也就不往心里去了。

大约是1968年年初，具体日期记不清，老天下了一场小雪，路相当滑。这天上午我被通知准备一星期粮票，带点零钱，下午上路。我问去哪里，造反派说甭问，到时自然知道。心里实在纳闷。下午准时在校门口集合，一辆大型吉普车停着；造反派四人，其中一人我认得是国画系毕业，分在天津艺术学院工作，心里便有数了。牛鬼之外，还有一个蒋兆和，大型吉普前后三排座位，前座是司机和天津那个学生，中座是我和蒋兆和，后座是美院造反派，是押差。这一车人，很象《水浒传》里充军路上解差押犯人的情景。车出建国门，向通县方向走，看来今晚要赶到天津。去天津干什么？是充军改造吗？蒋兆和是个病号，没蹲过牛棚，怎么经得起折腾？临行指定带一星期粮票，不象长期充军。正在胡思乱想，车已过通县，往廊房方向奔。1966年以来，除了住文化部集训班，关牛棚，一年多不见郊区农田了，眼睛一亮，观赏起自然景色来了。一路车辆不多，但时有会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吉普车头和前面一辆大卡车车尾相撞，吉普左轮盖板撞坏，车头引擎受震，开不动了。造反派下车办交涉，那份造反威风镇住了卡车司机，那卡车是通县一个修车厂的，交涉结果，吉普由卡车拖着，到通县去修。到了通县，天已大黑，我们两个被押罪

犯成了旁观者，看卡车司机满头大汗，给吉普治病。大约费了一小时，吉普能发动，押差宣布今晚开回北京，明天上午换车再开天津。此时人人肚子里在唱空城计，解差发令在东单转角一家饭馆停车，解差和司机占一桌，犯人占一桌，装饱肚子后，解差头子关照犯人各自回家，明天上午再到美院集合。这一晚本该有思想斗争，怕睡不好，无奈身子在严冬的风寒里受冻，又受了吉普的颠簸，疲乏已极，反倒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午那辆伤车不见了，换上另一辆大吉普。一路好太阳，近午进入天津市，直往市北开，开进河北艺术学院，由那个天津造反派把我两人送进一座教学楼，塞进一间已住了四五人的牛棚，双层铺，蒋睡下铺，我睡上铺。情绪稳定后，我俩向老住户打了招呼。原来这儿是天津市文艺界的总牛棚，其中有几个熟人，如河北省作协的XX，美协的XX，艺院教师XX，再一打听，我二人此行任务是在河北美术界反动派斗争大会上作示范。借重我们二人是北京老牛鬼资格者，尤其因为我是全国美协的老牌副主席，和天津美术界素有联系，和几个头头关系密切，把我押来领衔挨斗，一则显示天津造反派的气派，二则威慑天津牛鬼蛇神的反动气焰，三则犹如大剧场邀请名角登台借以吸引观众，提高票房价值。谜底揭开，我们心中石头落地，情绪稳定了。在这牛棚里，我和蒋是客人，又是老人，年轻牛鬼以主人身份接待我们。我们把粮票饭费交给他，三顿饭由他向食堂打来。这种反动阶级友爱的表现，在北京牛棚里是非法的。前面提到过，1966年住牛棚时，国画系四个老人组成一个劳动小组，包下十个男女

厕所，我们互相合作，干得干净利落，造反派讽刺我们说我们“团结友爱”，便叫我们挖反动思想，批判这种反动的“阶级友爱”。

几天以后，那个河北美术界斗争大会在一个剧场里举行，七八个本地牛鬼，加上我和蒋兆和两人，排成一行，站在台前，个个戴上纸糊高帽，我的帽上写着“美蒋少将特务叶浅予”，蒋头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蒋兆和”，其余的人顶着什么牛名，记不清了。会上，一个个轮着批斗，其中一人不知犯了什么罪，斗完后立刻由公安人员给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第二天天津的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有名角客串的斗争大会，叶浅予的臭名传开了。

回北京不久，叶浅予也被送进监狱去了。1968年春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所谓“斗批改”阶段，准备清理阶级队伍，美院的牛棚已经解散，牛鬼回到各系，由本系的造反派派人管理，进行筛选，把问题最大最多的人筛出来，确定为反革命分子，送进监狱去交国家管理。毫无疑问，叶浅予不但是国画界的头号反动派，也是全美院的头号反动派，从此以后，我的地位升了级，成为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监狱里住了七年。

1967年夏季某晚，我被叫去提审，主审者是XX造反派的高级参谋，另一人是记录。这个XXX曾经管过全院的人事档案，反右时期江丰之被划为右派，社教时期陈沛之被指为走资派，主要是靠他抛出的档案材料。社教后，他被调来当国画系支部书记，他手上有叶浅予的黑材料；社教时我已被定

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系里批过一通，由于社教运动坚持只整党内不整党外的原则，原已整好的黑材料没被抛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之后，我就在邢台四清前线被揪出来斗争了。我心里纳闷，那晚斗争会上，抛出那么多材料，究竟从何而来？等到1967年美院造反司令部把原社教工作组成员揪来美院，拘留了几天，追究包庇黑帮的阴谋，他们才在国画系交待了包庇叶浅予的实情。原来国画系早有一本斗争叶浅予的黑材料，1964年社教时被压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抛出来。这时XX是红旗造反派的幕后参谋军师，这晚由他出场主审，主要是追究我和中美合作所的关系，逼我交待我和国民党军统的组织关系。我的回答是：“我是美军请去的，任务就是面宣传漫画，配合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日军在华东的据点；至于和军统的关系，因为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方面的雇员，由蒋介石的军统发工资。”

XX说他为我的问题跑遍全中国，搜集材料。他指着我的鼻子问：“你的工资比国民党少将拿得还多，为什么？”我说：“这不能证明我就是国民党的少将。”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谁都知道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军政机关，那个时期大后方的抗日军政机构都按国民党军政机关编制行事，在三厅工作的人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是当时的政治部副部长，由他直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三厅能是反共的吗？至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画漫画，任务很明确，是抗日，决不是反共。至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见我，也是为

了要我好好和美军合作，为中国人争面子。他们知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虽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但不是共产党，才敢于聘请我为抗日工作效力。他们给我少将薪金外加津贴，所以比一般少将拿得多。我是他们的客卿，和他们绝对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你们拿今天的社会关系来衡量那时的社会关系，实在太迂。不过，你们要怀疑，我也没办法。这一晚，兜来兜去，就是想把我把成名副其实的军统特务，经我摆事实讲道理，整得我精疲力尽，还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审判到半夜，他们饿了，拿出预先备好的冷馒头啃，我却挺着，将近拂晓，三个陪审官都有点支持不住。XX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愿意这么审你，虐待你，我们也是很疲劳的。”意思是我不能怨恨他们。这时我当然也十分疲累，听他这么一说，精神反而振作起来。我找到一条草席在一个教室角落里静静躺下，等候天亮。

住牛棚时期，外来调查材料的人十分频繁，这叫做“外调”。这些外调的人，多数是年轻无知之辈，凭着那一身红卫装，态度极坏，叫人不能容忍，有时只能以沉默相抵抗。可是偶然也有个别彬彬有利的外调者，我当然也以诚意相待，帮助对方完成调查任务。看来这些外调者比较有修养，理解黑帮的脾性和处境，因而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免得对方胡编乱造。有一次，一个自称是清华的造反派，有介绍信，态度特别谦恭，我怀疑此人是冒牌造反派。我主动问，什么事找我？他以轻微的声音向我表白，说他父亲是清华的教授，非常喜欢我的画，问我能不能送他一幅。我大吃一惊，半天说不出

话来；他急了，又小声地说，你放心，美院造反派不会知道，现在没有，过几天约我来取就是。这时，我装做生气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造反派吗！造反派能这样向黑帮要东西吗！他听了之后，相当尴尬，我便换了副面孔对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被抄家抄走了，老实说，抄得连一枝毛笔也不剩，想画也画不成。他只得默默告辞。这算是我住牛棚以来的一次奇遇。

1966年夏至1968年春，头尾三年，住了三种牛棚：最初住的是文化部集训班大牛棚，接着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总牛棚，最后是国画系的小牛棚。美院总牛棚开始用上班制，中间用关押制，后期恢复上班制，小牛棚纪律比较松弛。在总牛棚，进校挂牛鬼蛇神牌子，出校卸牌子，到了后期，宣布取消挂牌。三年里，由于造反派的派性矛盾，一度抢管总牛棚，开始军训后实行联合，宣布总牛棚解散。黑帮回到本单位，进了小牛棚。不论大小牛棚，劳动制度始终贯串，三年来我们个个养成了劳动习惯，特别是打扫厕所成了我们的专业。不管造反派如何歧视我们，一进厕所，也难免夸我们几句：“美院厕所从来没这么干净过。”算是牛鬼蛇神的一点贡献。

除了劳动，思想也有收获，触痛过灵魂表面，也打动过灵魂深处。开始时一味迎合“革命”，写《改造日记》表明心迹，其实言不由衷，做表面文章。所谓“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等等谎言，造反派心里有数，有时故意赞扬几句，表示管理有效，可以向造反司令部交帐；有时也刻薄几句，敲敲警钟，免得我们翘尾巴。在每晚的生活会上，有的人真能够把丑

思想丑事情亮出来，对我们一些老知识分子也是大好的一面镜子。可是某些爱整人的人，利用机会造谣惑众，打击报复，也使我们擦亮眼睛，看到共产党员队伍里确实有些投机当官的小人。到了后期，我也学到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前期所写的带有水分的思想认识，看到了自己的假面具和侥幸心。例如，对待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即使与事实不符，也不敢正面回答，装出一副死相，吞下全部苦果，免吃眼前亏。慢慢意识到这实际是蒙混过关，逃避罪责的表现，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翻了翻1967年5月9日那篇改造日记，如何记录我的思想斗争：

今天读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一，肯定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有向两面转化的可能。

第三，监督人员说：“你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那么，是敌是友未做结论。

第四，大字报的揭发，群众对我的斗争，以及几个月的专政，显然是敌我性质。

第五，我不是党内走资派。可也算得上是反动学术权威。

第六，我的错误言行，是否受反动路线影响？我肯定是执行者，是不是受害者？

第七，我是不是一贯反动？有些问题是不是一时的错误？

第八，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下结论，看来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动机有问题。

第九，我的要害问题是不是《冰糕颂》和《大同组画》？

第十，关于丑化劳动人民和革命领袖是立场问题，是不是也有艺术方法问题？

第十一，对自己扣上政治投机帽子是否合适？

第十二，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在政治上要负多少责任？

提出这么多“是不是”，我的基本想法认为我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造，于是由朋友转化为敌人。如果认真改造，当然可以转化回来。现在用不着自我鉴定自戴帽子，更不能回避矛盾，缩小罪责。

需要的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问题，让群众去作结论。

另一篇触及灵魂的记录，是1966年10月4日的日记：

今晚继续思想汇报。有人揭发：

1、人家揭发什么，他也揭发什么，人家不揭发的，他也不揭发，两面派，很狡猾。

2、专制作风仍有流露，打饭时态度专制，两只眼象狼。

3、告说漂亮话。国庆会上第一个抢发言，说得很漂亮，今天日记上又说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有一天黑画展览会上，革命小将问他在中美合作所干了什么坏事，他说在那里画抗日宣传画。明明是说谎。

加上昨晚那一条，谈经济躲开政治。总起来是一个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是不是狡猾？是不是两面派？

昨天谈劳动和贫下中农斗争我的事，情绪是正常的。斗争以后，有“躲不如斗”的想法，是不是思想很明确，而且解决问题了呢？不是。思想斗争仍然有，斗的滋味到底不好受。象我这样一帆风顺过来的人，初次遇到这样的大风浪，的确顾虑重重，不知道怎么办。最近一个时期，认为自己是不愿当顽固派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触动灵魂深处，一旦要触动它，总有些乱，不免产生不实际的想法。有些问题没有认识透，甚至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拿来自欺欺人，说漂亮话，真是自欺欺人。

主观上不想当顽固派，客观上是两面派，仍然是顽固派。我真愿当臭狗屎吗？

§5.9 第一座监狱

1968年4月23日凌晨1点，有人敲门，急忙从被窝中起来，打开灯，开了门，两个穿灰制服的陌生人，迎面就问：“你是叶浅予吗？”我说“是。”他们说：“我们是公安局的，奉命来抓你。”我问：“为什么？有证明吗？”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逮捕证交给我看。此时我心里一愣，来不及看清逮捕证，立刻想到一定是“美蒋特务”的罪名，抓我去住监狱，而且也想到这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必然命运。老伴拿起逮捕证看了一眼，大概也没看清，她心里也有数，马上进卫生间拿了毛巾、牙刷、

牙膏递给我，帮我穿上棉袄，送出房门，站在房门口呆呆地望着我的背影。这时我脑子像一盆浆糊，什么也不想，默默地跟着两个便衣警察走。走出大门，把我塞进一辆黑色轿车，两人夹着我坐在后座。车一开动，我脑子才醒过来，注意车行的方向，是一直往北开，出安定门，然后往东拐，开进一处有门灯亮着的围墙里，停在一座小屋门前。小屋里走出一个穿制服的人，把我领进屋里，验明我是他们要逮捕的那个叶浅予，叫我脱衣服，搜查全身有无可疑之物，搜查完毕，叫我穿上衣服，自拿毛巾牙刷之类他们叫做“牙具”的东西。将出口时，给我铐上手铐，跟原来押我的那两个人弯弯曲曲走了一段路，走进一座大建筑的一间大厅里，那儿有几个办公桌，桌上亮着灯，看来有人在守夜。押送的人和守夜者交换了几句话，从这大厅转进一条长长的小巷，巷顶亮着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一扇扇小门。走到一扇门前，拔开门锁，开了门，推我进去卸了手铐，另一人递给我一条军毯，一个铝皮桶，说这是便桶，又指地下一块铺板，说这是床，说完退出，听到门外上锁的声音。这一连串奇特的经历，似在电影中见过，全过程不到一小时。我头脑顺着这过程，愈来愈清醒，它告诉我，我已是一个犯人了，今后的岁月是长是短，上帝也许知道。

回忆录写到这儿，二十年前这一晚的情景，重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站在那间小牢房里发呆，头脑对周围环境的反应和那晚一模一样。我的神经官能退回到那晚的后半夜，既兴奋，又颓丧，忽又回到老伴目送我出院子的那一刻，不知道她在房门口站了多久，她可能也在想，今后的岁月是长是

短，上帝也许知道。如今是1987年，老伴在4月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间，我还活着，正好年满八十，正在奋笔疾书，写这段永世忘不了的荒唐历史。似悲，似痛，似怨，似恨？各种滋味全有。笔忽然停了下来，竭力追忆当年的真实情况，过了一会，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回到了当时的一举一动。

新环境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四堵水泥墙，地面六平方，报纸糊铁窗，头顶灯长亮。”

估计离天明还有二三小时，我兴奋过度，脱下棉袄当枕头，躺下再说。脑子里胡思乱想，闭着眼睛等天亮。不一会，小巷里出现脚步声，牢门小窗忽然打开，塞进两片草纸，领会到这是催我赶快大便，我便遵从无声命令，坐到那铅桶上，使劲挤，挤出两段便尿。这时小巷里走动声频繁起来，偷偷推开小窗那块活木片，留出一条缝，观察小巷动静。只见有人提着铅桶往巷尾走，接着听到倾物声、放水声、洗桶声，声停，那人提桶走回来，接着是关门声、锁门声。不一会，又一人提桶走过来，往巷尾走，又是倾物声、洗桶声，明白巷尾是大厕所，我也得按这顺序做一遍。等着等着，在那小窗的小缝里忽然出现一个熟面孔，是个比我老的老头儿，我一下就认出来，他和我一样，是个政协委员，东北人，上次开会还打过招呼。他怎么会送进监狱来？是特务？是汉奸？是什么样的反革命？自从成了黑帮，养成了一种新习惯，对每个熟人都会产生怀疑，怀疑他的历史有无问题。这位老人乍一出现，看他低着头，行动迟缓，我马上想到解放前他在北京办过报，我给这个报画过漫画；他的儿子我也认识，抗日时期在大后方办过外

文书刊进口业务，解放后在北京仍然从事旧业。这老头儿的姓名当时还记得，现在记不得了。他怎么会进监狱？是历史问题吧？过了一会，他洗完便桶走回来，他的牢房在我对面不远，看他进门，看到狱卒关门锁门。继续看，看是否还有熟人走过来。熟人愈多，我愈不寂寞，可是又怕再看见熟人，熟人愈多，精神负担愈大。一夜未睡，眼皮张力逐渐衰竭，两条腿也感到支撑不住，颓然坐到地铺上，养养神。不一会，我的牢门打开了，轮到我去厕所洗便桶了。去时匆匆，回也匆匆，怕两旁的小窗口一双双眼睛盯着我这个新来乍到的反革命。

早晨这一行动，监狱里叫做“放茅”，第一次放茅既新鲜又有奇遇，过了二十年，还记得清清楚楚。

放茅之后，便是开早饭时间。小巷入口处摆着两个大桶，狱卒开牢门，犯人轮流去领。每人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菜，用手拿，不用碗，回房吃。行动路线和放茅一样，一个领回，放第二个，不让彼此见面，所以费时较长。午晚餐也如此，有时给一碗汤菜。每人发一双筷，碗筷餐后收回。

在小说或电影里看到过监狱生活中有所谓“放风”这回事。放风者，让犯人到牢房外活动筋骨呼吸新鲜空气也。这是文明监狱的一种人道主义待遇。对犯人来说，除了吃饭拉屎必不可少，“放风”是每天急切期待的事，这期待，比“开饭”还急切。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二十三小时以上关在密不通风的小盒子里，或坐，或立，或躺，活动天地就这五六平方米，放风的天地可大啦。就我住的这所监狱来说，是初级监狱，叫做拘留所，各种犯人都有：小偷、流氓、强盗、妓女、

刑事犯、政治犯，样样都有，混合关在一起，等待审查判刑。像我这样的人，叫做政治犯，独占一房和他犯隔离。因为政治犯带有一定危险性，轻则闹事，重则散布反革命细菌；古史上有所谓“文字狱”，新史上则所谓叛逆是也。小偷流氓之类案犯，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放风时一起放，惟独政治犯单独一人放。今天早餐后，听见窗外有人跑步，这窗户较低，虽由废报纸糊严，却留有破洞，可以往外瞧。只见四个青年犯人沿着墙根跑，老远有狱卒监视，并叫口令。犯人之间互相谈笑，看来是小偷流氓之类刑事犯。看着看着，背后小窗口有人叫喊“不准看！不准看！”牢门立刻打开，一个狱卒走进来，申斥我犯了狱规，拿了条小木片，在我后脑勺脖子上打了十来下，罚我面壁站着。站了好大一会，牢门又打开了，叫我出去放风。刚才受罚，现在受惠，来了个突变，脑袋瓜一时转不过来。刚才还在胡思乱想，现在突然刹车，大脑呈现一片空白，两条腿却已跟着狱卒走出牢门，向右转，走向巷尾。抬头观察了一下小巷的结构，人字巷顶，檐下开着两排窗，透进天光。没几步，走过放茅那个大厕所，走出巷尾，向左转，强烈的阳光迎面射来，眼膜一片白，待瞳孔缩小，才看到外面是一片大院子。狱卒把我交给出口处的监视哨，监视哨命令我沿着一条小圆径跑步。这时我突然感到暂时获得自由，心里有无法形容的幸福。跑着跑着，眼睛四周瞻望，院中有树，一边是牢房的铁窗，三面是高高的围墙。大约跑了四五圈，估计时间不到十五分钟，监督哨发令“回去！”狱卒在巷尾等候，立刻押我回牢房。

身上微微有点汗，想松开裤腰带，拿毛巾擦擦身，一摸，皮裤带不见了，才想起是昨晚进监时搜走的，给了一条短短的纱布条，系在穿皮带的两条措瓣上，免得裤子滑下来。这一摸，摸到了从昨晚以来时刻在脑子里思考的问题：“不自由，毋宁死！”从昨晚起，已被剥夺了自由，关在这个小盒子里，连一条裤腰带都被剥夺了。不但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意志的自由也被剥夺了，牢房以外的一切都不敢想了。如果多想，便多苦恼。中国的革命者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到了紧要关头，都会拿“不自由，毋宁死！”这句法国革命者的名言激励自己，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句名言对我也是一个启发，“死”是一个大解脱，大解脱便是大自由。从此刻起，一个“死”字牢牢缠住我的思维活动。

狱卒开门叫开饭，我迷迷糊糊走出了牢门，打饭回来，没精打采。狱卒看我精神恍惚，两腿没劲，摇摇晃晃，进牢门时在背后踢了我一脚。这一踢，使我醒了过来，两个窝头一口气吃完。吃完饭，狱卒吹哨子催午睡。昨晚一夜未睡，正好利用午睡时间补足。睡着睡着，梦见某剧院一个小提琴手，在斗争之后的休息时间，解下自己的裤腰带，悬在窗格子上，把脖子套了进去，等到造反派叫他去继续斗争时，他已经断气了。一觉醒来，念念不忘这个简便的死法，似乎已经下了决心，仿照这个方法解脱自己，然而一想到那条被搜走的皮带，可就泄气了。

求解脱的念头时刻索回在脑子里，没有皮带，是否有别的办法？曾经想起1936年在南京时，一个朋友从国民党反省院

放出来精神恍惚，卸下一个灯泡，用手指伸进灯头，意图用触电结束生命，结果被强力的电阻打了一下，没有死成。牢门外有个电灯开关，如果借机会快速旋开盖子，死劲捏住电流两极，我想大概不至于被电阻打出来。吃饭、放茅、放风，都有走出牢门的机会，可老是有狱卒监视，没法动手。最后一条死路，用脑袋死劲担水泥墙壁。我用力撞了四五下，痛得不行，若能坚持，也许能控晕过去。忽又想到一个没出息的下策。常言道：“好死不如恶活”，暂时忍着，好歹“文化大革命”会有结束的一天。再一想，假如解脱成功，造反派给我定个“畏罪自杀”的恶名，岂不弄巧成拙？经此一想，渐渐醒悟过来，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弯，忠告自己：千万死不得！

求解脱的思想在我身上碰了钉子，但仍然有反复。

自从那天在小窗缝中见到那位老政协以后，放茅时间总想再见他一次，但一连几天闹情绪，忘了这回事。等到情绪稍稍稳定，才又想起来。有二天早晨放茅时又偷偷拨开小窗活门，正好瞥见狱卒打开斜对面那号子的门，等了一回，那老人不出来。狱卒便进去，只听得“哎呀”一声，从号子里退出来，急急忙忙向长巷进口那边跑；少时，带来一副担架进那号子，把老人抬出来，向大厅送去。那狱卒又忙着到厕所提水，冲洗那牢房号子的地，流出的水略带红色。怪啦，这老头哪来的凶器，又哪来这么大勇气，从容不迫，偷偷脱离了苦海！简直是对我一大讽刺。于是，我的解脱思想又上升了。

记得“三反”“五反”运动中，有受不了禁闭的苦恼，割破手臂动脉，任其滴血，静待死神光临。这是个好办法，不妨

试一试。不久，机会来了。监狱规定，犯人每两周洗一次澡，洗完澡，可以借剪刀修剪手指甲、脚趾甲。可是小窗洞里老是有只眼睛监视着，况且自己也还有思想斗争，一时下不了手。以后的日子，这种轻生的心愿慢慢被偷生的思想所溶解。大约一个月以后，我能在这个小盒子里，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展翅歌唱。我身上带有一本“红宝书”，是搜身时特准保留的，感到寂寞苦恼时，便拿出语录本翻翻读读，借以消磨时间，忘了我那念念不忘的“自由”。

记得进牢的第二天，牢头提我去谈话，问这问那之后，他总结一句话：“送到这儿来，红卫兵造反派找不着你了，有我们保护你，不是很幸运吗！”初听这话，觉得有点意思，好象牢头狱卒同情我们这类犯人似的。继而一想，这不明明在讽刺我吗？恰恰相反，此时此刻我宁愿让造反派揪去斗一通，斗完回牛棚学习劳动，怎么也比在此作笼中鸟强得多。这么一比，更加品味出牛棚生活的甜味儿来。假如此时此刻放我出去，哪怕斗得我死去活来，也心甘情愿。听完牢头的话，回到牢房，我一再品味，觉得也有道理。我现在远处火线斗争之外，至少不再有斗后的羞辱和苦恼了。若被重新揪到火线上，七斗八斗，也许我还宁愿躲在这平静安逸的小牢房里。

两星期洗一次澡，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澡堂。澡堂在另一座建筑里。狱卒领我走出小巷，穿过中间大厅，转入另一小巷，走出那条小巷，走进澡堂。澡堂是个大池子，政治犯不能别人同浴，这大池子便由我一人享用，多浪费！可是也难怪。政治犯在平时是少数派，这回“文革”，数量大增，大池

子独占时间就得缩短。脱完衣服，跳进池子，不大一会，就叫起来穿衣，穿完衣服，带回牢房，然后须另一犯人走往澡堂。这一去一回，摸准了路线和地形，原来那大厅是六条辐射小巷的枢纽，坐在大厅里，一转身，可以看到六条小巷的动静。这种设计，可能是现代监狱管理学的创造。半年后我被转移到另一监狱，分上下两层，半辐射形，楼梯装在枢纽大厅里，每层四条辐射巷道，上下共八条，管理调度比这儿复杂得多。每次洗澡，既要通过楼上大厅，也要通过楼下大厅，才能去到澡堂。一次，因为调度失误，我从楼上下来，走到楼梯尽头，眼前闪过一个穿红毛衣的女犯背影，狱卒赶快把她拦到楼梯底下，险些碰个面对面。在那个监狱里，我曾被领去见一个外调的人，在提审楼的大门口和另一犯人面面相觑，似曾相识，但始终记不起此人是谁。这样猝不及防的遭遇，可谓平静中的不平静，带有一点传奇性。

最不平静的遭遇是美院派人来提审。来人是叶浅予专案组的负责人，和他同坐在提审桌上的是一个公安人员。公安人员神气平稳，而我那位红卫兵学生却显得有点紧张，装出一副凛然的样子。我站着，后面还站着一个狱卒，手里拿着一片小木片，这木片在我进狱第二天见过面，是现在还保留在文明监牢里的刑具。审讯开始，问的还是在牛棚里问过多次的“中美合作所”，我说那晚在国画系教室里审了我一整夜，什么都交待了，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主审官公安人员指着墙上贴的八个大字，口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狱卒举起小木片在我脖子上劈啪劈啪打几下，那个红卫兵看了有点

惊讶，我猜想惊讶的是为什么共产党的监狱还用刑具。红卫兵马上和主审官咬了一会耳朵，示意狱卒不要打了，狱卒露出悻悻不悦之色。主审官意识到叶浅予老奸巨猾，榨不出油水来，作出“刑讯”收场的指示，向我交待了几句话，要我继续反省，好好改造，狱卒领我回归牢房。此事发生在进狱后两个月光景。我以为造反派把我交给公安局，从此撒手不管了，怎么今儿又来插手了呢？再一琢磨，他今儿不是主角，他是被请来陪审作证的。这一估计大概没错，因为从这以后，再没有美院的人来过，而提审照常，只由公安人员问话，有时还让犯人坐着答话。

这些日子外面造反派实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犯人进提审室先要向毛主席画像行鞠躬礼，表示请罪。每天早晨可以听到狱卒们在举行“请示”仪式中的口号声。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做梦的科学规律，而我在牢房里，却是日无所思，夜有所梦。是违反科学规律吗？否！原因是怕白天闹情绪，不敢胡思乱想，大脑皮层被压着，到了夜晚，大脑皮层放松，兴奋灵敏度加剧，梦就多了。可以这样认为，我在监狱里的表现，每天相当平静，但一到夜晚，吹哨归寝以后，脑子就活跃起来。先是东想西想，想这想那，双眼一闭，我便进入自由世界。见到妻儿父母，见到亲朋好友，见到名山大川，见到帝王将相，见到牛鬼蛇神，见到初恋的女友，见到死了的祖父母。有时饱餐美食，饱赏美景；有时握笔练字，构思作画；有时站在泰山之巅观日出；有时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倚在太平洋邮船栏杆上看大海；有时坐在巴黎

大剧场看芭蕾；有时遇到梅兰芳、程砚秋；有时引吭高歌；有时拨弄蟋蟀。一觉醒来，屋顶25支光电灯亮着！窗外黑洞洞，努力追寻消失的梦境，追呀追呀，有时也能追上，便继续做我的美梦。

白天潜伏在囚笼里，夜晚则游走在自由世界里，这种反常的生活方式，足足度过了七个年头。这么漫长的道路，怎么能一天一天熬过来，现在想都不敢想。在当时，头脑却是十分清醒，却也相当糊涂，在清醒又糊涂中把时间一分一秒滑过。我们在正常的自由日子里不也是这样既清醒又糊涂的状态中把时间轻轻滑过的吗？我把时间倒过来，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岂不也照样过舒泰日子吗？我看所有坐牢的人，都会自觉地找到一条生活的道路。

从想死到不想死，把黑夜变成白天，虽然是被逼出来的，可也算得一种变态的人生哲学吧。

§5.10 第二座监狱

1968年4月进牢，1975年5月出狱，七年中蹲了三处监狱。上面所记的第一所拘留所，蹲了大约半年，4月进，9月出。换到第二处，方向约莫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后来探明，这地方叫半步桥，是北京的老监狱，号称模范监狱。记得1949年参加北京市人民代表会议时，参观过这座监狱。我在这里蹲到1970年初，转移到北京北郊小汤山以北的“秦城”，这地方原来关押国民党战犯，设备现代化，有抽水马桶、自来水洗脸盆、暖气

管道。1975年邓小平代总理执政，秦城的政治犯全部被释放。“四人帮”倒台，经过人民公审，判刑之后，也被关进了秦城，这是后话。

1968年在北郊拘留所关了半年，春秋日子不好过，身上会长虱子、跳蚤；夏季也不好过，有臭虫咬。有一次来查卫生，问身上有虱子吗，如长虱子，把衣服脱下拿去用药薰。又一次医生来查健康，问有什么病，这时我已满六十一岁，身体挺壮实，无须治病。有一次来查牢房，查看有没有人偷吸烟的，幸而我因气管炎，早在1956年就把烟戒掉了，否则的话，进监狱硬戒烟，倒是一桩极痛苦的事。既然查烟，当然有吸烟的，进狱时脱光衣服搜身，谁还藏得住烟与火？这世界任何滴水不漏的地方，总免不了有透风漏水的角落，况且这儿还关着小偷扒手之类人物，自然有偷漏的渠道。

有一天，听到斜对面一个号子里，狱卒拳打脚踢，打一个犯人，问他为什么不听话，在牢房里要花招。那犯人说，受了同房犯人的挑唆诱骗。于是狱卒又去打另一犯人，如此轮番逼供，揭露了狱内犯案的罪证。至于犯的什么案，因为关着门逼供，没法听清楚。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监狱也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到了秦城，人人隔离，犯人内部无矛盾可言，要有矛盾，那就仅仅是犯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了。

1968年秋天一个夜晚，狱卒通知我收拾衣服牙具，要转移了。过了午夜，也是一辆轿车，由一个公安人员押着，开出监狱大门，东转西弯，路灯明亮，偶然还见到霓虹灯广告，确定

我还在市区转游。半小时后，进入一座大院门，进门向左转，停在一座楼房门前，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二层楼牢房。进门便是楼梯，先在梯旁办公桌前办了登记，换了一个人领我上楼。这里的辐射巷道叫做“洞”，沿着圆形走道走进第X号洞，打开第X监号，里面是个大木炕，可睡三四个人，面积约七八平方米。炕头有个大窗，窗沿高过胸口，照例是一条条铁栏杆封着，没铁丝网，也没有糊窗纸，仰头可以望见天上的星星，我面向天空端详了好久一会，心里痛快极了。等到铺开被褥，躺下休息，发觉身上痒痒，定睛一看，臭虫们已经出动，急不可耐，要尝尝新来乍到的新鲜血液。用手一抓，全是干瘪的，看来这间牢房已经空了很久，今晚我来大摆筵席，慰劳这帮饿鬼。如此一想，也就无所顾忌，老老实实献出鲜血就是了。一早醒来，浑身发软，马上想到第二第三晚以及往后的消耗，不得不向狱卒诉苦，要求打一回滴滴涕。狱卒说今年夏天已经打过，怎么还有？我去请示，是否能再打一次。

三天以后，狱卒板着脸对我说，上面指示，今年不打了，明年夏天再打，你自己花点工夫捉虫吧！这回话在我意料之中，这三晚把虫喂饱了，以后可能会好些。再有，就捉，花点工夫，练就本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半年多来，培养了非凡的耐心，这点小问题，哪有克服不了的。这件事就以自我安慰的方式排解了。

在宽敞的新牢房里，生活方式和以前不同：放茅不定时，大小便要喊“报告”，狱卒给你开门上厕所。洞子长度不长，一条洞子没几间号子，来回走动不费时，厕所如果有人占了

就得等候，因此练就了憋尿憋尿的本领，假使憋不住，那就提早喊“报告”，在厕所里多蹲一会。牢房里不放便桶，鼻子里少咽臭气，这是个进步卫生措施。那么，拉肚子怎么办？老叫狱卒开门关门，岂不要挨骂？事实却不尽然。

新牢房新鲜事真不少。第一个白天，约莫九、十点钟，听到近处有打锣、吹沙呐、拉胡琴的声音，象是京戏班子在排练节目。过了一会，听到高音喇叭响了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寿无疆！”接着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报告最新指示，报完指示，来一段革命歌曲，歌曲之后，报革命组织的通知：上午10点在大礼堂斗争XXX反革命老顽固，勒令全体牛鬼蛇神到场，革命群众踊跃参加，如不参加，那就抓游鱼。高音结束，左近大礼堂人声鼎沸，不一会全场鸦雀无声，只听得口号声此起彼落，最后听得人声冲出礼堂，斗争大会结束了。

这一上午喧闹，估摸是一所学校，而锣鼓乐曲吹拉声，则颇象一所戏曲学校。我知道北京市有所戏曲学校办在陶然亭附近，而1949年我参观过的那所模范监狱，就在陶然亭一带。这一下初步摸着了我被监禁的方位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已经临近，牢房窗口正对东方，如果计算准确，国庆那晚可以在窗口北角看到天安门焰火的闪光。

为了饱尝眼福，10月1日这晚，吃过晚饭，静候幸福时刻到来。犯人不准带表，进监时手表已被搜走，半年多来，只凭感觉计算时间。今晚过分兴奋，老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于是采用当年站大卡车游斗的绝技：背“老三篇”以消磨时间。此

法固灵，三篇没背完，窗口亮光一闪，赶紧站到窗口，向东北方向张望，第二闪，第三闪……看到第一拨焰火放完，坐在炕上等候第二拨，忽然听到牢门小窗口狱卒问话：“天安门的国庆焰火看过瘾了吧？”这一问，心里感到甜丝丝，无异承认我的偷看已被批准，成为合法行为。我们之间的敌对状态似乎已经溶解，表明我们暂时站到“爱国主义”的同一立场上，我可以大胆充分享受今晚的幸福时刻了。等到第二拨焰火放完，催睡的哨子吹响了，幸福的时刻已经告终，只得乖乖地钻进被窝。国庆之夜的闪光，继续从遥远的天空一闪一闪通过窗口射进来，怎么也睡不着。

自从调到第二座监狱来，提审的次数多了，外调的人也多了，三天两头被叫到提审楼去。这里的提审人员似乎水平高些，态度也温和些，这对犯人来说，似乎感到自己是个人。狱卒手上也不带那敲脖子的小木片，感到这地方像个人间社会，不像地狱变相图里的阎王殿，因而在提审或外调时情绪比较松弛。由于松弛，有时忘了自己的罪犯身份，说话和动作有些随便。某次提审，主要问题讲清后，我说现在报上在批评某些文艺作品，我能否写点文章，参加批评？提审员瞪了我一眼：“这是工农兵群众的事，工农兵会批，你是什么人！用得着你批吗？乱胡说！”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又一次，逢到中秋节，我说漏了嘴，叹息“每逢佳节倍思亲”，向提审员陈述自己的思想苦闷，他咧开嘴一笑，马上板起脸说话：“你们这些文化人，不要以为住一阵监狱，把你们放出去劳动改造就算完了；别做梦，你叶浅予问题够严重，对你说明白，给你

判个无期徒刑，也不算过分。别想得太美了！”

这一次敲打，专政机关的铁板面孔显示出来了。

回到牢房，仔细琢磨“无期徒刑”这句话。虽然吓人，到底不是法庭的正式判决。就我的问题而言，大字报可以无限上纲，“美蒋特务”的帽子可以乱戴，究竟没有确实证据。逼供信对红卫兵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某些老油条来说可以天花乱坠，胡诌一气，无中生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全自己，不惜中伤他人，用以欺骗那些毫无头脑的造反派，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残害了多少无辜好人。但监狱里的提审员毕竟不是一般造反派，他们有一定是非水平。如此奚落吓唬我，表现了他们一定的政治警惕性，也表示其地位的权威性。我若认真当它一回事，弄得自己谨小慎微，事事掂分量，今后的烦恼就更多了。经过这一番思考，意识到我命运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只怕像国民党那样，不定罪，不判刑，长期关着，把你折磨到死，才是真正的无期徒刑。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次政治运动，不管时间多长，总有结束的一天，既然闯过了求解脱的一关，必须坚定求生的决心，熬到最后一天。

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忽然命令又要搬家，不是远离，而是近迁，搬到另一所监房里去。那监房在监狱大门西侧，是平房，独立的一条长洞子，牢房窄小，只四五平方，有暖气管，安在紧靠房顶处，举手碰不到，当然为了安全。在这儿住了两个月，出过几次外调，凡是外调，一般总和被调查者的政治面目或政治历史有关。记得在某次调查中，竟是一桩生活

小节。原来有个朋友向造反派交待，叶浅予在重庆”时，曾在他家存放过一卷日本“春宫”画，在某一天和某某某某一同观赏过，要我交待这几个同观者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这使我伤了好一会脑筋，总算交待出来了，没让那位外调人员空手而回。一卷春官画，为什么如此大惊小怪？仔细一想，区区小事，也可能上到政治大纲上去，在叶浅予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下，记上一笔诲淫诲盗的账，也能对运动立上一功吧。我在这篇回忆录里记上这一笔账，可能和我那位朋友一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两个月后，回到原来的牢房，发现长洞里安上了暖气管，走进牢房，和暖如春，这时正是数九寒天，得此待遇，感到无比幸福。坐到大炕上，忽又想到饿了两个月的臭虫群，今晚必有一场房战。正在忧虑之间，眼睛注视到大炕的木板上，有一样新鲜东西投到视觉里来，仔细一看，发现一排用刀刻的小字，是日文，不认识，不管它什么内容，可以肯定这间牢房曾经关押过日本人。由此推断，抗日战争那八年，日本统治者使用过这座监狱，禁闭过他们的同胞，也可能是汉奸统治北京时关押过日本人。这么看来，这间牢房象征着某种国际关系。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种人世因缘，值得长期留在记忆里的事件。这晚我做了一个梦，和一个日本人在这间房里相遇，言语不通，吵了一架。

自1968年秋季到1970年春季在这儿过了将近两年。冬季好过，夏季难过。每到盛夏，楼里大规模打一次滴滴涕，地上密密麻麻布满臭虫尸体，心理上得到一点安全感，可以安安稳稳

睡几晚了。但时过不久，小动物又很快繁殖起来。总之，在这座监狱里，最头痛的事是和臭虫打交道。自从1970年春季迁到“秦城”，这种苦恼解除了。

§5.11 第三座监狱——秦城

“秦城”是座现代化文明监狱，据说是全国解放以后新建的，原先在此关押的是国民党战犯，“文革”初期把战犯释放出去，腾出监房收容重要的反革命政治犯。它地处小汤山温泉疗养院以北的燕山南麓，远离北京市区。那晚从半步桥起程，走了一个来小时，从明亮的城市走入黑暗的郊区。我心里反应很特别，以为要将我送到秘密集中营，严密封闭起来，或者送到XX劳改农场，修补地球。车行不到两小时，停在一座大楼之前，楼后面是幢幢山影。大铁门哗啦一声打开，押解人员带我上楼，在灯光里看到走的是水泥楼梯，上到二楼，右转弯，一条长巷，排列着整齐的牢门，牢门上下有两个小方窗，上面的小方窗有个小圆孔，经验证明这是监视哨用以窥视犯人动静的。进得房来，对面一口大窗，高出人头；近门一只抽水磁马桶，靠马桶是个白瓷洗脸盆，当然也可以洗脚；靠近窗下，一只一米宽的小木床，离地约一尺，磨光的水泥地面，狭而长，房间面积约八平方米，干净明亮，和前两处监狱那狭窄、昏暗的情状颇不相同。对着床位，是暖气片，用铁丝网围着；床是新制白木板床，可以移动，估计今晚不至于受臭虫围攻。特别的是高窗外还有一道监视哨，窗户启闭，

由持枪哨兵掌握。

睡下不久，有人打开牢门上方的方窗，交待这儿的规矩：睡时头对牢门，伸在被外，不准蒙头。这规矩前两处监狱没交待过，为什么这儿特殊？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人已关窗走了。这个疑问，一直没解开。

放风的时间照旧，在早餐之后。不过，半步桥是个大院子大围墙，可容二三十人在里面跑步，围墙相当高，院顶张着铁丝网，防止犯人爬墙。可见那儿是集体放风，政治犯独自一人占用偌大院子，未免太浪费。这儿一律一连串小院子，面积比牢房大一倍，够一个人跑步打拳。一连串小院子由一条长长的天桥连着，荷枪的监视哨在桥上来回巡逻，小院子里一切活动尽收眼底，谁也没法要花招。这种放风的设施，相当科学，每一犯人占一小空间，同时可容十来人放风，既节省空间，又节省时间。放风时按号子分前后一个一个押过独院，收风时仍按号子一个一个押回，上楼下楼，进院出院时间要算得很准，谁也见不到谁，达到严密隔离的目的。可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次收风时，正循楼梯上二楼，一转身，前面有个矮个子同犯背影，由一狱卒押着，走得很慢，可能腿脚有病，押我的狱卒立刻把我拦住扭转身，等那人进了隔壁牢门，才让我继续前进。上文提到我在半步桥监狱下楼时见到一个穿红色毛衣的女犯，弄得狱卒很紧张，这类撞车事件，七年中遇到不过三次，可见是偶然的失误。对我来说，倒是希望多遇到几次，在寂寞枯燥的生活中起点波浪，多点刺激。

进秦城时，发《毛选》一套，每月《红旗》一份，每天

《人民日报》一份，此外还有个“秦城图书馆”，可以借书看，书目全是马列经典著作，附鲁迅小品文集几种。这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造集中营，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五年中，我把书目中所有的书基本读完，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以前在狱外读过，在此重读一遍，对《自然辩证法》特别感兴趣，《资本论》初读不易懂，再读才读进去。

在这八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只读书读报太单调，我创造了一套练腰的体操，并来回走动，免得背弯腿僵，造成体型歪曲。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健康的身躯，将来才可能东山再起，否则的话，到了翻身的那天，驼着背，弯着腰，拄着拐棍回家去，多没劲！

为了练习说话发声，读报读书故意读出声来。在半步桥时，没书读，便学说书人，每天早晚，编两段故事，练习说评书。开说之前，靠壁盘腿坐在床上，并作手势，拍惊堂木，自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请叶浅予先生自编自说《松树湾》长篇故事……”。故事内容是某个农村的土改运动，背景是我的老家“富春江”。开说时，坚持交待故事梗概，免得遗忘。这个故事前后编说了三年，每天规定时间说，风雨无阻，越说越来越来劲，发声未免大了些，惊动了巡逻的哨兵。他打开方窗问我念什么咒，我说我在编故事，他便去报告管理员，管理员传我谈话，我如实汇报了说评书的意图，他说这是犯狱规的，又说编什么故事，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滚蛋！以后不准你发神经病！经此训斥，并没把《松树湾》吓退，我照常坐

床说书，不过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让门外的人听见，便平安无事了。

《松树湾》故事的主角是个年轻的贫下中农，解放前受苦受穷，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从此思想开窍，懂得了团结贫下中农闹革命的道理，就在自己村里暗暗串连了一批青年，迎接即将到来的南下解放大军。接着，他便成了本村的革命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立了功，入了党。故事的许多情节和生活细节，基本上根据我少年时代接触的生活环境和各种人物，联系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改工作的具体内容编组而成。故事的地点人物有名有姓，本来打算在出狱以后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我十年空白的唯一贡献。可惜出狱以后，百事待举，恢复断了线的画笔生命还来不及，怎么有时间另谋贡献呢。生活在我脑海里一个个英雄人物，经不起世事纷坛，渐渐离开了我的记忆，故事轮廓至今还能记其大概，人物面貌性格全给忘了。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伴随我三年之久的亲密战友，依靠他们，使我在寂寞苦闷中排除许多烦恼。当我走出牢房，拥抱失去七年的现实世界时，他们却被我抛弃了。

每天的《人民日报》把我和隔绝的世界连接起来，使我兴奋，又使我懊丧。兴奋者，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文化大革命”的讯息将对我发生什么后果；懊丧者，这些变化与讯息，在我尘封了的仓库里转了一圈，停留不久便被排斥出去，因为那一切都不属于我，没法在我脑子里停留，有些东西对我是讽刺，必须把它们排挤出去。

1973年某日，牢门突然打开，哨兵通知中央派人来看我。说完，一个穿便装的人进来，开门见山传话：“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监狱对你们是否有虐待行为？如有，可以上告。”但不交待如何上告。好在秦城对囚犯相当文明，生活上也比较合乎情理。据说我们的伙食费每月合十四元，每天两粗一细，过年过节吃饺子，秋天果子下来，每人还分到几个苹果。这里有医院，除了随时看病，还给配眼镜；每半月洗一次淋浴，冬季暖气常热，比之以前两处，有天壤之别，因而没有什么值得告发的。要告，也只东北郊那个拘留所打脖子的小木片，狱卒的脚踢与罚站，但这比之红卫兵小将们罚跪、抽皮带，可轻松多了，所以也不值得一提。自从这次传达指示以后，秦城的空气似乎有了明显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准许犯人家属探监。

1974年春季某天，我被通知，老婆女儿明天要来看我，叫我作好准备，穿干净些；还借给我保险剃刀，让我刮了胡子。这一晚我当然睡不着。第二天早晨，管理员带我下楼，沿着一条长长的水泥小马路，往南走，走到监狱大门近处，两边接连几间接待室。走进其中一间，看见老伴王人美和女儿叶明明坐着。她们见我剃了光头，刮掉胡子，变了样子，先有些发呆。我第一个反应是双眼发酸，母女二人皱起双眉，好久说不出话来。管理员看见我们无言相对，似乎故意讲几句话，打破沉闷。他说：“会见时间到午间为止，你们可以尽量谈谈家常，带来吃的，最好吃完，不要带回监去。”经他一说，空气开始松弛。此情此景，真像戏曲里的探监场面，先静默一

会，然后诉说离情，继而号啕大哭。我们都把泪水压着，等到互相拥抱，便夺眶而出。女儿打开提包，拿出花生瓜子、糖果饼干，这些东西好多年不见了，我便抓起吃，她们陪着嗑瓜子。老伴急性子，先说此行和谁、谁、谁同车，谁知谁、谁、谁也在秦城。一次二次探监之后，探知秦城四座大牢里，关押了不少三十年代文艺人物。老伴说，我们得到通知可以探监，但要向公安部门写请求报告，而且只限直系亲属，于是由女儿具名写报告，并先去向一个远房亲戚征求意见。岂知这位远房侄女，板起面孔说，你们虽是父女，应该划清界限，表示反对。女儿将此说告了母亲，气得老伴从此不让这位“左”派侄女登门。我劝慰老伴，应当原谅人家的“革命原则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的问题未做结论，人家要和我划清界限，做个响当当的革命派，是大势所趋，管她干嘛！“文化大革命”的账，错综复杂，没法算。现在回忆此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原则性不强，为了息事宁人，好和稀泥。要算账，到底谁是谁非，也得算清楚，免得以后算倒账。

写到这里，我得提前交待一下出狱后的思想。老朋友见面，不免要回首往事，发泄胸中怨气，数数“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与胡作非为。我却常说，不管吃了多少，受了多少罪，我并不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有好处：第一，住牛棚、蹲监狱的经验，用钱买不来；第二，在牢房里读了几年书，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提高了，对事对人的判断明确了。损益相抵，还是益处多。以前对事对人不敢轻易表态，有人怀疑我是两面派，现在胆子大了，对事对人敢于表态。1979年文化部指

令中央美术学院给我公开平反，恢复国画系主任的职务，我大胆施行教改，彻底改变半洋半土的教学路子，许多青年教师对我这种敢说敢干的作风，张口结舌。我说，再一次“文化大革命”，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坏事能变好事”这条真理，在我身上应验了。

§5.12 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1975年4月间，听得左邻右舍收拾行李，心里有点慌张，莫非要把我留下坐穿牢底？思想正在激烈斗争之际，狱卒突然打开牢门，传我谈话。我默默跟在他后面，走进提审室，一个既面熟又陌生的提审员端坐在问案桌前，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示意我在对面凳子坐下，慢吞吞问：“这两天你都听到左邻右舍的活动了吧？你心里一定很急，是不是？现在告诉你，明天一早，中央美术学院就要派人来接你回去。你要明白，你的专案还没有做结论，回去以后，留在本单位继续改造，等候结论。不过，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你自己去考虑吧！”

三年牛棚七年牢的初步结论是“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十二个字。最后的政治结论可能还得熬上几年，还得在本单位的群众监督下继续打扫厕所。这几年蹲在监狱里，吃了睡，睡了吃，什么也没干，练成了一副懒骨头，现在又开始锻炼筋骨，补偿七年的禁闭，也是一件好事。何况，明天起，将要呼吸现实世界的空气，未来的光明已出现在地平线

上，管他妈严重不严重，充其量不过是一顶“反革命”帽子，横竖已戴了十年，再戴十年也还是一个假想的反革命，只要“文化大革命”在某一天结束，什么乌七八糟的帽子都得去掉！我叶浅予还有十年二十年艺术生命，不怕翻不过身来！

1975年4月25日，大晴天，好太阳，是北京的盛春季节。自由的喜悦，带着心酸的苦闷，等候新解差到来。一个是保卫科的老X，一个是人事科的老X，司机老X开车来到，秦城提审员最后交待几句，重复昨天的两句话：

“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

然后退给我进监时扣下的手表和皮带。审毕退堂，狱卒押着我走出“秦城”大狱，美院的小轿车在监狱大门外停着，狱卒将我交给美院解差，我钻进汽车。这回不是深夜，而是阳光普照的白天，保卫科在前座和司机并排，人事科在后座和我并排，开出不久，便是北京有名的疗养胜地小汤山，向车后一看，秦城四座大字仍然在望，它的背后是燕山山脉，气宇不凡。我在此当了五年囚犯，今天才看清楚这片隔绝人间的“世外桃源”。

小时候读小学，描红本上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而我则有“狱中已七年，世事一如昨”之感。自1968年从美院扫厕所的岗位上押走，事隔七年，仍然回到美院厕所来。美院不是没有变化，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掌权的是新一代革命委员会，头头不叫院长，叫主任。当天解差把我押到美院后，革委会派了个秘书和我谈话，表示接受我这个留原单位监督劳改的反革命分子，并当即命令我到行政科报

到，由该科支部书记XX负责管我。书记叫来专职打扫教学楼厕所的清洁工，是一位中年妇女，由她分配指导我具体工作，从即日起，我在她的监督下打扫男厕所。三年牛棚，练就了扫厕所的一套技术，也养成了闻不到臭气的一种习惯。可惜七年监狱生活，剥夺了劳动权利，白天一小时“放风”，是唯一可以活动身子的时间，浑身肌肉松弛萎缩，如今重操旧业，不知能担得起劳动否？精神上又添了一重负担。

记得当年住牛棚时，曾经揭露一个伪君子，这个伪君子暴露思想说，“宁愿犯政治错误，也不愿犯生活错误。”我处此新环境，忽然发生奇想，和此人相反，“宁愿犯生活错误，不愿犯政治错误。”当小偷作流氓，算是生活错误，在公安局捆住短时期，然后派去劳改，见见天日，活活筋骨，有益健康；像我这样一个政治犯，送进监狱，与世隔绝，剥夺劳动，养成一副懒骨头，该多痛苦！究竟什么叫正确的世界观，我真有点怀疑。回美院头几天，不怕周围人们斜视、凝视、直视的目光。就怕自己这副懒骨头受不了劳动的折磨。

七年牢房，都是单身，除了一床、一盆、一桶之外，别无长物。空间虽小，行动无碍。在秦城的八米空间里，我还编了一套练腰的健身操，可以奔走跳跃。回到家里，八间房已压缩成二间，所有家具挤满空间，最怕磕磕碰碰。我问老伴这是什么原因？老伴想了一下说，你对这家陌生了，是不是？我也想了一下说：“牢房宽敞，家里挤。”老伴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以为你悟出了什么大道理，原来嫌家里房间不及牢房大。你可千万不能犯神经病，变成个大傻瓜！”

美院革委会给我的待遇，不但劳动受监视，还特地通知我住家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视我的行动，“反革命”帽子戴定了吗？

1975年国庆节前后的某一天，驻中央美院军代表找我谈话，说中央专案组的结论来了，说“叶浅予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属敌我性质，为了宽大，不戴帽子。今后由原单位另行安排工作”云云。和摘帽右派一样，不戴帽子也是一顶帽子。十年苦刑，听命改造，落得如此下场，如高谷跌入深渊。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当然不签。军代表板起面孔说，不签也罢，不过，我们仍然按结论办事，从明天起，你可以不打扫厕所了，听候分配新工作。

我把结论告诉了老伴，老伴的急性子突然发作。她正在灶上做饭，立刻摔掉炒菜铁锅，对我怒目相视，大声叫道“想不到你真是反革命，这回真要和你划清界限了！”

她二话不说，马上到屋里收拾东西，塞满一个大提包，气冲冲骑上自行车，往她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了。约有一个来月，她不和我来往，我不得已只得请女儿出马，一同到北影劝驾，但怎么说也说不动她，她就是不肯回到反革命丈夫家里来。后来还是靠北影的朋友反复做工作，把她送回到大佛寺老窝，不过有个条件，我必须把事实讲清楚，到底是真反革命还是假反革命。为此，我们两人在一天上午来到玉渊潭一个僻静处所，开诚布公畅谈我在重庆时期为中美合作所画抗日宣传画的前因后果。我发誓，如果有假，咱俩就离婚。经此一谈，老伴的气消了，不但不疑我、恨我、气我，

反而为我动脑筋、跑腿，请人执笔写报告，向上面申诉辩解，要求重新审查，经此一谈，也使我头脑清醒起来，认识到在目前这个是非颠倒的情况下，一味俯首听命是不行的，不采取主动行动，便不得翻身。

正在此时，戴了“叛徒”帽子的原美院党委书记陈沛，由于美院领导班子改组，把他的问题查清，平了反，恢复了原党委职务。他见到我，主动表示要帮我把问题弄清。他说到做到，亲自翻材料，动笔杆，为我平反出大力。

陈沛在1964年社教时被打成走资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斗争他时，我也陪斗，群众指责他包庇叶浅予，他理直气壮在台上答辩，说叶浅予在中美所干的是抗日工作，绝不是反革命！尽管红卫兵造反派无理取闹，他还是挺直腰杆，侃侃而辩。指他是叛徒，他坚决否认。我在牛棚里对牛友说，“陈沛是条硬汉，我们有他的十分之一硬劲就好了。”我由秦城回美院初期，他还在厨房劳动，洗涮锅碗瓢盆。在厕所见到我时，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没下结论，他说美院的牛鬼蛇神全解放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一个党内，一个党外。他叫我别着急，最后我们也会解放的。他的乐观情绪对我是一大鼓舞。第一次结论以后，我情绪低沉，他告诉我他的问题快解决了，等他恢复工作以后，一定为我出力平反。

这年10月以后，美院革委会把我调到展览楼去打杂，负责管事的XX，是1957年的女右派；另一个打杂的是男模特，戴着坏分子帽子。不久又派来一个打杂的，倒是个女造反，见到我们几个戴帽子人物，心里老大不高兴，专磨洋工，干了

没几天，擅自在进门处摆了一个办公桌，表示自己是个干部。她在外扬言，“南楼里一个右派，一个特务，一个坏分子，联合起来反攻倒算，专我这个造反派的政。我是教务处派来监视他们的，我可不服他们调遣！”不久她就拿这个歪理向教务处头头告状，气势汹汹，大吵大闹，教务处拿她没办法，只得把她调开。造反派的威风，连她的上司也不敢碰。至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天然的是她的专政对象。幸而她被调开，我们这所新牛棚才平静下来。

我在南楼期间，主要工作是动动笔杆，写写展品文字说明。擦窗、扫地之类勤务，不让我干。三人之中，我年龄最大，体力劳动诸事，年轻人包了。这也合情合理，在造反派眼里，认为我们反革命专了革命派的政，实在可笑。

南楼贮藏了几大箱历年收购下来的画卷，趁此业务清淡之际，清理一下十年“文革”以来被人遗忘的角落，很有必要。我自告奋勇，要求做个藏画编目计划，得到教务处同意，便动手干了起来，等到画目编完，已是1976年了。

1976年是国家遭逢大悲大丧之年，是“文化大革命”敲丧钟之年，也是国家由乱变治之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哀悼，而“四人帮”却百般打击和阻挠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哀思与悼念。清明节天安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怒潮吓破了他们的胆，于是心生毒计，诬蔑邓小平是天安门“反革命活动”的后台老板，想把反右倾翻案风这把邪火烧得更旺。岂知“文化大革命”的气数已尽，革命元老们揭竿而起，推翻了骑在人民头上的邪恶势力。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

的“四人帮”成了人民法庭的被告，关进了人民专政的监狱，真是天翻地覆，大快人心。

1976年也是我个人大悲大丧之年。我的儿子叶善来，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分配在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后转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1958年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下乡劳动，因负重致腰部受伤，患慢性肾脏炎十多年。“文革”中因他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他也受到冲击，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挫伤。1976年病情恶化，3月14日以尿中毒病卒南京，年46岁。老年殇子，又在逆境之中，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

1976年夏季，某日下午，忽感胸闷，下南楼去医务所诊断。走出大门，两腿乏力，心跳加剧，突然昏倒，被人发现，把我扶到医务所。量血压，正常；量脉搏，正常。这时我已逐渐苏醒，反映胃部不适，值班护士给我包了助消化的药片，让我回家休息。二十四小时内我食欲不振，饭食乏味，睡眠不稳。老伴急了，第二天送我去首都医院看急诊，血压脉搏依然正常，待到查看心电图，才发现是心肌梗塞。幸好急诊大夫是熟人，马上通知病房给我找床位，送进内科病房，叫我躺着不许动，输液输氧两星期，才让下床活动。这时两只厚脚皮全部脱落，换成新皮，留给我有生以来极为新鲜的一次记忆。住院后期，遇到唐山大地震。头天晚上，明明陪床，凌晨时刻，忽见窗外白光一闪，接着房屋一阵摇晃，明明急忙爬上我的病床，以身体掩护我的身体，以为房子要塌。我心里明白，1965年邢台地震，我有过经验。我说不要怕，这是地震，医院建筑牢固，摇晃几下没问题，就怕连续震动，那就难说。

此时大病房里骚动起来，好多病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邻床病号这是地震，不要惊慌，医院会有措施。几分钟后，护士长宣布，内科三楼病号全部转移到本楼地下室，能行动者自己走，不能行动者派人背负下楼。我的心脏病虽已度过危险阶段，还不能自由行动，由一个壮年医生背我下楼。

在地下室安置好，天已大亮，急忙让明明回大佛寺家中看看情况如何，如果处在震中地位，大佛寺房屋会塌。一小时后明明回来，说院子里塌了一垛矮墙，正屋没事，妈妈、阿姨在院子里休息，预防地震继续。大概过了几小时，医院宣布，地震中心在唐山，离北京好几百里，北京塌了一些旧房，没什么大问题。不过，医院已得到通知，不久将收容唐山方面送来的伤员，本院决定轻病号提前出院，让出床位给唐山的伤员。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学院，住进我女儿明明的防震棚里；随后，经亲友商议，决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飞机送我去上海继续治疗我的心脏病。

10月间，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马路上，突然发现“四人帮”垮台的大字标语，才知道形势已经大变，我的历史问题应该彻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脏病彻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会已经撤销，恢复了院长制，恢复了招生上课。我的最后工作岗位展览楼，自从我进医院以后，似乎已经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后，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领四十元工资，按照这个待遇看来，被监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没有变。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该由谁来确定，是一个大问题。可是从另一种

情况看来，叶浅予的社会地位尽管没有落实，社会关系却逐渐在解冻，显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连棒桥岛招待所请北京画家画宾馆画，全国美协推荐的画家中有叶浅予其人；在大连，画家们住在中央大首长住的一座大别墅里，还给《大连日报》作画写文章，向大连美术界示范表演并讲话，新闻记者给拍照。这一事实，证明我已从十年荒唐梦中苏醒过来。再前进一步，回到北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丹心谱》，请我去画速写，上电视；美院附中请我去讲课，美院国画系招考研究生，请我去评考卷。这些活动，不证明叶浅予已经回到“文革”前的工作岗位了吗？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一个造反派头目提了一筐苹果来探望老师，说了些慰问的话，忏悔的话，抱歉的话；另一个叶浅予专案组的小头目来请示，要求听我讲课。有几个本系的教师，斗争会上斗过我，大字报上揭过我，见面时，低着头，闭着眼，装做看不见，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十年以来惯于在人前低声下气，靠边行走，此时此刻，突然换了个地位，真使我感到换了人间，反而嘀咕起来，自己发问：“这难道是真的吗？”

1976、1977、1978这三年，如同长夜梦醒，心理很不平衡，幸而在几次旅行中接触了人间，接触了自然，接触了美好的事物，恢复了健康的思维，心理逐渐恢复平衡。

1978年到1979年，我大便长期带血，以前的老毛病痔疮发作，用坐浴方法治，总不见效。1979年夏天到医院检查，诊断是结肠肿瘤，动了手术，切除鹅蛋大小一个毒瘤，看了病历，才知是癌。手术期间，顺便取出一粒胆结石。治癌期间，躺

在病床上，肉体伤疤尚未愈合，而打开精神枷锁的灵丹妙药突然降临：中央美术学院通知我，定于8月2日召开全院大会，宣布叶浅予政治平反。我只得由女儿叶明明代表我出席大会，会上宣读了文化部党组为叶浅予所作的复查结论，结论原文如此写着：

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小组：同意你院报来的《关于叶浅予同志的复查结论》。叶浅予同志于1944年9月至1945年春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担任漫画设计工作，是对日伪军进行宣传，应属抗日宣传工作，叶浅予同志并未加入过军统特务组织。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975年7月24日和1978年1月10日两次所做结论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在适当范围宣布复查结论，恢复叶浅予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补发扣发工资。按有关政策规定，归还抄家物资，安排适当的工作，消除家属子女所受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

1979年6月13日

§5.13 文革厄运（诗六首）

林彪立竿见我影
江青懿命抽我筋
红卫勒令戴高帽
游斗押送到天津

北京街头大字报
臭名处处点叶老
朋友相见不相认
子女牵连逼成妖

北伐误授蒋家军
抗日喜当漫画兵
访美之行负恶名
动乱十年洗不清

三年牛棚七年牢
斗争会上压弯腰
灵魂未触胡检讨
皮带揍打不叫饶

全国串联掀狂浪
牛鬼蛇神大遭殃
造反小鬼搜牛棚
轮番批斗瞎骂娘

为审巨奸立专案
几番抄家破我产
侦骑四出访罪证
掘地三尺追逐赃

第6章 婚姻辩证法

1987年是我的八十寿辰，我开始动笔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个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么公开写，岂不影响自己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生活写出来，反而能破除社会对我的怀疑。罗彩云，是明明和你父亲的亲生母亲，可惜是个文盲；我和她之间，除了生儿育女，无感情可言，是我抛弃了她。梁白波是个画家，才情横溢，与我一见钟情，可是她不能忍受情妇的地位，终于抛弃了我。戴爱莲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我倾心于她对艺术事业的奋斗精神，她对我的艺术事业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当然我也在艺术上给了她很多帮助，可惜在相处十年之后，由于环境的变迁，她另有所爱，抛弃了我。在独居四年之后，由于朋友的推动，我和王人美结了婚。岂知我们之间，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如此不同，竟至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共同语言，貌合神离三十年，迫使我专心一意事业上寄托感情。王人美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自尊心太强，由于在事业上力不从心，很苦闷，容不得别人触犯她的自尊心，特别是长期高血压形成脑血栓之后，她性情更加乖戾，使我难以忍受。但想到我们已到垂暮之年，不得不强迫自己克制和容忍，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在向孩子们叙述这段历史中，也提到另外几个插曲，表明自己在男女关系上是凭理智行事的。

1989年夏季开始，我用了两个月时间，为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认识到这四位女性在我身边的时候，都具备妇女固有的美德，处处照顾我的生活，抚慰我的性情，梁日波甚至不惜屈居于情妇地位，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而我，虽然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也有委屈情绪，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总不自觉地暴露出某种优越感，忽视了对方的委屈，因而在叙述共同生活的细节中，常常指责对方的缺点大大多于指责自己。比如，当王人美指出我的大男子主义态度时，我不但不加以自省，反而反唇相讥，说什么有大女子主义的人才会看到对方有大男子主义，逼得她向我让步。写完后重新审读这一份原稿，看到自己某些观点很不实际，觉得有重新改写的必要，而且觉得《爱怨四人传》这个篇名也太露骨，曾经想把它改为《晴雨半边天》，似乎含蓄些，然而这仍然是在摆脱自己的困境，企图把责任推到“半边天”去。最后决定改变立场，以《婚姻辩证法》为篇名，分五个专题，以哲学的眼光来看我的婚姻观和家庭生活实践。这样，许多章节得重写，先后次序也得重安排。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我愿意担起这个重负同时打破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先例，向读者全面、彻底、老实地暴露我个人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真实情况。

§6.1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十五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进私立盐务中学读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有个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接受新思想比我早，逢到星期天，我去看她，她总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还说下次看她时，她一定介绍个同学给我做朋友。我这时已近十七岁，曾经从《红楼梦》中懂得了一点所谓男女之间的“爱”，但是分辨不出宝玉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和宝玉与宝钗之间的关系，究竟何者对，何者不对。在此之前，还从伯父家看到一本流行的现代小说《玉梨魂》，是描写家庭教师和学生的母亲（寡妇）之间偷偷摸摸谈情说爱的，我把这和戏文中间公子小姐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情节联系起来，以为这就叫爱情。至于男女学生之间如何交朋友，我不大懂，只知道可以写情书表达感情。我堂姐说给我介绍女朋友，对我有一种吸引力，促使我去探索一下男女之间之友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还流行一种思潮，认为男女之间至高无上的爱是精神的，不是肉体的。

1924年某一个星期天，我坐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和那位刚介绍的女朋友王文英见了面。会客室就在进校门的大过厅一侧，进进出出的人个个能看见我们，迫使我们这男女两个学生老老实实坐着。本来可以细声细气说说话的，但两个都不满十七岁的孩子，实在嘴上无话，心里也无话，假使坐在西湖边的长靠椅上，也许还能寻些有关课堂的话题谈上两句，现在却坐在众目睽睽的过厅里，大有如坐针毡之感。坐不

多久，我只得告辞，也不懂说客气话，倒是女方开口，问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可心里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回到自己的学校，同学们围了上来，问长问短，第一问那位女学生漂不漂亮？第二问我们说些什么话？第三问能不能给他们也介绍个女朋友？我说，第一，我们并排坐在会客室里，我只能斜眼从侧面看她几眼，正面什么样子始终没看清楚；第二，两人自始至终默默相对，临别时约定下星期在湖滨再见，没说别的；至于第三，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怎能提这种要求。结果，那位借给我一套毛料学生装的同学发话：“别人不给介绍，我总得给介绍一个吧？”这话对我是一种威胁，我说，下次去见，不再借你那套衣服，别来神气！

见面以后，我和王文英之间开始写“情书”。对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想方设法借现代文学作品看，好从中得点灵感或抄点什么，写起来不至于干巴巴。每到星期天，我必到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下工夫写情书。

20年代，社会上虽有了新风气，旧风气还是固守阵地，男女防范很严，学校一律实行男女分校，学监有时要拆看学生的信，以防写情书；有时还监听电话，看有没有人私自和女学生通话。我们宿舍的电话间和学监卧室只隔一层纸窗，王文英打电话来问星期天是否在公园见面，我只能唯唯诺诺，说去，不敢多说，也没什么可说。她又问下星期杭州各中学开运动会，你参加什么项目？我说什么也不参加，却还要添上

一句，说同学有参加一千码赛跑的，校队也参加足球赛，表示我校并不落后。从此，我就拼命在操场上练跳高，希望有一天能在田径场上出人头地。

春夏之交，是江南的黄梅天气，经常下雨。一到星期六下午，如果天不好，我在课堂上就着急，两眼老望着窗外盼老天爷行行好，别再和我过不去。心里不住地说：雨快停吧，雨快停吧，明天已约好女朋友在第一公园见面哩！

一来一回的情书，一星期可以写两次。淡绿或淡蓝色的信封，有时由门房交来，有时到学监房去领。开始有点心惊肉跳，几星期下来，也就没那么紧张了。每次读来信，虽然是些平平常常的语言，可人家就是词汇多，有些语言竟好像在某篇小说里见过。她投之以挑，我当然也得报之以李。这期间为了寻觅文学语言，我读的书真不少。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偶而在字里行间流露爱慕之情，特别是经过几次游湖之后，西湖的山水以至与西湖有关的风流韵事，竟然也在情书中反映出来，好像我们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情绪一激动，情书中的语言也热烈起来，几个月之后，竟然大谈人生的憧憬，直率表达出难解难分的感情。女朋友似乎是天生的才女，信总是写得那么富于柔情，逼得我也故作多情，表现出戏文中的才子模样，竭力写上几句诗一般的甜言蜜语。这一下可不得了，对方亮出了“既然你那么对我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表明我们在情书中私订终身了吗？当时我的反应好像并不怎么强烈，把它当作写情书必然到达的高峰，犹如孩子们玩“过家家”，用积木垒起了

一座房，坍了，可以再垒，并没看成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爆发。现在回想起来，王文英情书上的这个誓言，在我这情书接受者心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应，所以回信时也并未表示接受或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它。

在这个阶段里，学监已经发现我在交女朋友，彩色的洋信封经常被学监截留，又经常有女声的电话叫我去接，再加上我在学期终了时，煽动同学向学监请愿，要求免考英语。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我这学期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至于学业，因为交女朋友，散了心，没好好学习，也被评了个“丙等”。我父亲那方面我倒不用担心，他是个开南货店的老板，只管拿钱送我上学，不管读书成绩如何，我把成绩报告单藏下了，下学期照升四年级没问题，可是见了老师同学总觉得太丢面子，心里直打鼓。

消息传来，厦门大学上学期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脱离厦大，集中去上海办了个大夏大学，厦大则在上海大报登广告，招收江浙籍学生。碰巧盐中有一个姓金的同学与厦大的一个助教是金华同乡，那位助教鼓励他跳级去考。金同学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又鼓动另外两个想跳级的同学一齐去考。我把这个行动计划通知我那个女朋友王文英，不知她中了什么邪，或许是要实行那个“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去厦门。到了厦门大学，考期已过，怎么办？还是那位助教出主意，介绍我们五个浙江学生去见校长

林文庆。林校长说，许多江浙籍教师学生闹风潮离开了厦大，你们远道而来投奔新厦大，我表示欢迎，决定给你们补考。若能及格，就留下；若不及格，可以办个补习班，明年再考。现下江苏督军齐文元和浙江督军卢永祥在上海打仗，你们也回不去了，就安心在厦大住下吧。

补考结果，只那位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其余四人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我父亲打听到我和女朋友结伴去了厦门，也没考上大学，立即汇来旅费一百元；催我回去。其他两个同学也动摇了，于是我们四人结伴，搭了一条带客的货轮回到上海，转回杭州。此时江浙二省形势大变，福建督军孙传芳钻了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后门空档，一举占领杭州，再举而占领南京，自称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成为奉直二系之外的独立大军阀。说也奇怪，孙军开进杭州之日，也是西湖雷峰塔倒坍之期。两年之后，广东的北伐军分两路进军，西路攻克武汉，东路攻克上海、南京。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一败涂地，江南一带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天下。

我回到杭州，住在一个小旅馆里，迟迟不敢回桐庐老家。王文英是杭州人，回父母家去了，有时来看看我。我所苦恼的，是今后怎么办？和女朋友热了一阵，这时已经冷下来，为自己找出路要紧。父亲知道我没脸见他，见我一直不回去，急了，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所以亲自到杭州来把我押了回去。我是他的大儿子，好不容易读了三年中学，只差一年就毕业了，忽然出花招，要跳级，白白在厦门浪费了半年，花了他一百多块钱，他实在痛心，非要我回盐务中学去补读不

可。我是好马不吃回头草。

回到家里，父亲直骂，我一赌气，一个人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思前想后，心里直生气，但并不想死。母亲急了，派人四处寻找，竖拉横拉把我拉回家去。这一闹，父亲的骂声没了，母亲的劝慰多了，可我心里更烦。

母亲说：“阿羊呀阿羊，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一百块大洋，是拿两亩田抵押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你阿爸叫你回盐中是句空话，还是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吧。”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醒来，什么读大学，什么交女朋友，都成了泡影，唯一必须考虑的是，抛弃一切幻想，找个独立谋生之道。

那天我父亲闯进小旅馆，王文英也在场，她看形势不妙，便自动撤退。她也许和我一样，什么叫“恋”，什么叫“爱”，一概不清楚。小孩子“过家家”的日子结束了，从此我们之间断了联系。

§6.2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1925年，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一心钻事业，把十七岁交女朋友之事忘得一干二净。此时已到二十三岁，父母急了，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在浙江

老家给我定了一门亲，逼我回去成亲。

这一逼，逼得我想起当初交女朋友之事。谈情说爱虽无结果，婚姻自由的权利怎能放弃？但反复思考，又觉得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当时我并没有一个合适的女朋友；再一想，旧社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见得个个家庭都是怨偶，何况父亲信里说女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呢。不如顺从了父母之命，既荣宗耀祖，又得个人实惠。当时我除了满脑子封建意识，还加上赌徒的侥幸心理，所以就让父母去决定自己的命运。此外，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我也很感兴趣，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一尝当新郎的乐趣。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和我的旅游猎奇心理是一致的。许多因素凑在一起，把终身大事当成儿戏，当成赌博，还美其名曰尊重父母之命，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旧社会，在男女关系上，把“始乱终弃”的男人看作歹徒，而我以父母之命为掩护，把罗彩云娶了来最后以“文盲”、“好逸恶劳”、“只生不养”等等借口遗弃之，不正是歹徒的行径吗？追根寻源，看一看我十七岁的那一次不成熟的初恋，正是从那里走向反面，让父母为我建造一个幸福的天堂，说穿了，我的行为是逆反心理的表现。罗彩云最后被抛弃，成为封建婚姻的受害者，是我逆反心理造成的恶果。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熟识的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用的长袍马褂，还为父亲筹措了一笔钱，帮助他把喜事办得体面些，就这样回了老家。

叶家大厅和往常一样，由肖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潢，迎亲花轿和新娘穿戴的凤冠霞被，也由他们办。从亲族家借来了桌椅板凳、椅垫桌围、从轿行请来了轿帮和吹唱堂茗；又约好厨师一伙，十六回切艺人一伙；还特请族内权威一人，名为“账房”，实系全局总管；加上采购、担水、打杂、跑堂的班子，总计二十来人。迎娶吉期前三五天就把工作班子招齐，其中以厨师一伙任务最重，必须最先到位。我家二房、三房的长子，两三年前就在这大厅里操办喜事，现在轮到我第四房的长子办喜事，一切都按旧规办，缺哪一项也不行。所谓“旧规”，就是按富裕人家的惯例办事，其日程是：

第一日：起媒。请男女双方媒人吃一桌。

第二日：发嫁妆。由男家派人到女家抬嫁妆。高标准是四箱四柜、挂帐大床、四仙桌、绸面被八条，以及子孙桶（马桶）、衣橱、衣架、等新房用具。

第三日：发轿迎新娘。鸣锣开道，迎新花轿在前，媒人陪同新郎在后，并以吹奏乐队相随，到女家迎亲。女家鸣鞭炮相迎，设筵宴女家人、娇客及迎亲队伍。宴毕，奏乐，催轿，新娘盛装加头盖，由一长者抱进花轿，后堂发妇女哭声，表示惜别。

花轿到男家，新郎新娘先拜祖先，后拜公婆，然后对拜，送入洞房，抛喜果，饮交杯，礼成。是晚盛筵宴女家送亲者（新娘的父或兄），宴毕，众宾客持烛台送新郎入洞房。红烛高照，众宾退出，新人共入驾帐。

第四日：专席宴新娘，俗称“请新娘子”。新娘盛装，凤

冠霞被，坐首席，四女傧相（俗称“照灯姑娘”）陪之。新娘不饮不食，伊若神明，意即为族中迎来传种接代之人，或系女系社会之遗风。

第五日：行“三日入厨下”古风，新娘由婆母陪同到厨房，持葱切三刀，象征移交持家之职。是晚设筵宴请族外宾客，俗称“人情宴”。

第六日：宴请诸执事，俗称“洗厨宴”。宣告喜事办完。

第三日、四日、五日之宴，皆用十六回切古制。一席六人坐三面，空出一面，围以红毡桌围，桌活燃红烛一对，标志喜庆。所谓“十六回切”，即坐席前已在桌面上摆好的十六样冷盆：四水果、四干果、四甜食、四冷荤。坐席时主人唱名，客人到位，主人敬酒。宴新娘那晚，一般由小姑子敬嫂子，交礼乐中两人互换位置，互相敬礼；女戏文中宴大宾客，交错走步，颇有乐舞意味一般要事先在新房中排练，以免出错。

凤冠霞披为贵妇礼服，沿用已数百年。

筵席十六回切，即分之冷盘，饮酒一巡毕上热茶，先是四热烩，继之为四大菜，四点心。上大菜时，须奏乐，表示宴会高峰。四点心之后是四饭菜，饭菜中双鱼一味，不许动筷，以示“吉庆有余”。整个筵席菜肴连十六回切，共计碗碟三十六味，所谓“饭菜”，不过象征性地扒一口饭，然后奏乐散席。

如此规模的喜庆场面，所费当然不少，而且夜以继出前后七八天，许多人忙来忙去，为着一对新婚夫妇。当时我一时冲动，要尝尝这兴师动众的古礼的滋味，使自己和罩上头盖的新娘如同戏文中的演员，又像提线戏中的木偶，由人摆

弄。喜事办完，戏文散场，新郎仍在自己家，生活照常，而作为新娘，从娘家被人抬到舅家，既是客又不是客，经过“三日入厨下”的表演，成了这家的主人，就得像主人一般行事。我母亲是个能干人，要求媳妇也得能干，可是新娘还处在似客非主的地位，那日子实在不好过，稍一不慎或一失手，就得看婆母和姑子的脸色，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和自己共床第的所谓丈夫姑爷了。对着姑爷，不妨耍耍姑娘脾气，姑爷成了她唯一的保护人。

当我要回上海之际，新娘费尽口舌，非得跟我去不可。我以为大礼已成，她得乖乖地在老家当儿媳妇，所以不同意带她走。她口出怨言，甚至寻死觅活，闹到婆婆开口，站到媳妇一边说话。母亲有母亲的算盘——儿媳一走，可以避免许多口舌，保住当婆婆的名声。因此，我不得不接受母命，带着罗彩云到上海，过起小家庭生活。

那时，《上海漫画》编辑部从四马路麦家圈迁至南京路，我还兼着云裳公司的服装设计员，两处上班，薪水不低。小家庭租在爱文义路某弄堂里一个前楼，厨房在楼下灶披间，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把家务事托给房东太太照顾。新娘子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头几天小心谨慎，不敢走快，过了几天，自以为走熟了，一不小心滑了脚，从半楼梯摔下来，幸亏房东太太把她扶上楼，躺在床上不敢动窝。我回家吃饭，刚进门，房东太太拦住我，把发生的事说了，告我不要紧，只闪了腰，贴上了止痛膏药，就会好的。我上楼一

看，新娘子好像孩子见了妈，一副委屈相，差点流眼泪。我直道歉，表示不该把新娘子一人撂下不管。知道她还未吃饭，马上下楼请房东太太帮我下了两碗汤面，端上楼，把新娘扶起来，面对面吃了。新娘认为，这顿饭该是她做的，现在反而要我伺候她，她很抱歉。饭罢，我扶她躺下，又去上班。傍晚回来，发现她已在厨房里做晚饭，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我这个老上海，怎么能把一个乡下姑娘撂在家里瞎摸瞎闹呢？回头一想，要是娶的是上海姑娘，经这么一摔，起码要耍耍小姐脾气，埋怨我一顿，躺上三天，逼我找个阿姨伺候她。罗彩云闪了腰，躺了半天就下楼做饭，到底是个贤妻，以后必然是个良母。这一意外事故，把老家吵吵闹闹的事洗涮得一干二净。为了讨好她，我特地一天下午，陪她到三马路选购衣料鞋袜、胭脂花粉等妇女用品，使她感到她所嫁的是一个会体贴老婆的男人。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去休养，我则算好她分娩的日子，按时赶回老家。也真巧，我回去第二天她就生了个儿子，小名申布，族名善来。四年后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一儿一女都是请奶妈喂大的。生明明时，申布已四岁，丢给我母亲抚养。罗彩云无事一身轻，早已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饭有娘姨，喂奶有奶妈，一切家务不用操心，还学会克扣家庭开支，积攒私房钱。我那时正画《王先生》稿费收入每月超过一百元，同时兼编《时代画报》，加上零星稿费，总共将近二百元，在漫画群体中，算是拔尖的，但工作也很辛苦。《王先

生》局面已经打开，每周《晨报》一篇，每月《时代》一篇，每半月《北传》一篇，创作负担相当重，白天到时代图书公司上班，晚上绞尽脑汁画《王先生》，有时熬到深夜。这位罗氏夫人起初还亲自下厨，做几样好菜陪我吃顿饭，后来却逍遥自在，成天泡在朋友家的牌桌上，回来得很晚。因为她是文盲，和书无缘，精神世界非常狭小，为人之道懂得很少，我们两人之间无共同语言，总是话不投机。她的唯一美德，就是把家务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说一句话。我也乐得独自一人安安静静搞创作。久而久之，我们之间，除了所谓生物人的关系，毫无社会人的交流。我们之间，无所谓“貌合”，也无所谓“神离”；她的世界观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儿吧！”

生第一个孩子，罗彩云说自己没有奶，非雇奶妈不可。我不信，由我母亲验证，才雇了奶妈，那是在浙江老家；生第二个孩子，在上海，未生之前早已找好奶妈，孩子落地，奶妈进门。我很奇怪，罗家族内嫁到县里来的姑娘，几乎个个生而不育，都雇奶妈，难道这是她们罗家的遗传？生第二个孩子时，我故意问她，为什么没有奶？她虎起脸说，我当姑娘就束胸，我们结婚那晚，你把我那件小马甲撕破了，难道忘了！她这么回答，我还问什么？

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或成双成对的情

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我变了吗？变了。

罗彩云变了吗？也变了。

为什么？怎么变？

先说我们的客观环境。上海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是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交错的社会，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娱乐条件、生产条件、消费条件，千变万化。在这个交错复杂的大社会中，分出许许多多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一边是生产系统，一边是消费系统，生产系统又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各种工厂属之；工厂生产的成品，通过流通渠道，转到消费者手中，成为消费品。精神生产可复杂了，报社、书店、戏园、剧团、乐队、学校、游乐场、旅馆、饭店，甚至妓院、舞厅、杂技班等等属之，只要走出门，走上马路，两旁商店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货大楼，小而如烟纸店、食担、摊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个消费的大世界，一个乡下人到了这里，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穷光蛋，都会目迷五色，身堕雾中，六神无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过来。

我自1925年从浙江一个小县来到上海谋生，决心要在漫画出版界混出个名堂，认清了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强不息的为人之道，养成了不计成败，全力以赴的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我们的漫画群体，把我当成一

个能吃苦耐劳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手。1928年4月这个群体联合出版《上海漫画》周报，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外出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的信赖。有一时期，画报被租界当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画报出庭受审。幸亏请了一位好律师，又逢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之际，在租界里设立了中国法院，我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是对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场考验，增强了我办出版事业的信心。这种信心，推动我在漫画创作方面对自己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艺术修养不足，而提高艺术修养又得靠文化基础的提高。我认真读书，不管有用无用，见书就读，把有用的时间全部投入自强不息之中，感觉这样才心里充实得多，对创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要说变，这是我变化的一方面。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忘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

实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根，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抢到一个美满家庭；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带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彩云之为为人，最不可饶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这一点，就不能和我般配。那么，我事前怎么不做点调查呢？我曾想过，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初小毕业，一个高小毕业，小妹还当了几年家庭教师，至少都能读点通俗浅近的书。罗家是书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不用调查，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怎么也不会是个文盲，可她偏偏是个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为什么说半文盲？因为她还识得几个字，记得1935年我和梁白波谈恋爱时，她曾费了大劲，写过一封似通非通的信给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长”。此外，麻将牌里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中发”十个字，她不用看，手一模就换得出来，在娘家早就练成一副摸牌的本领。到了上海，左邻右舍，朋友眷属，没一个不摸牌的，因而她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乐在其中。这是环境给她造成的生活方式，无法抵抗。

碰上我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不给我制造太大的麻烦，

我会随遇而安。在初到上海阶段，她人地生疏，我自认为对她有保护的责任，比如那次她从半楼梯摔下来，我承认是我失职，事后陪她逛街买衣料鞋袜，弥补我的过失，记得我还陪她到一个朋友开的照相馆，经过特别设计，拍了两张婚后合影，两人相对微笑，看来相当融洽而富于情谊。直到今天，我还从旧相册中找到那两张照片，给我女儿和孙女看，表示我当年对罗彩云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程，我们两人各自所处的地位，所接触的世界，差距愈来愈大。到了1935年，我认识了那位女画家梁白波，吸引我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内心世界都获得某种程度的和谐，原来的这个不太协调的家庭就被破坏了。

这个家庭是被梁白波破坏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所积累的心理变态破坏的。上面提到，每当我感到寂寞空虚时，就会独自出去寻乐，寻觅势补（寻求弥补？）。白波的出现，真正填补了我心灵上的空虚，促使我下定决心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以求灵魂获得比较稳定的充实。但是要改变处在夹缝中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道德对我的束缚。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我和白波的同居生活就如同逃犯那样，时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而罗彩云则如缉私的巡警，随时可以追踪袭击。记得1936年被袭击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请到罗彩云的住处，优利相待，罗氏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看成我的姨太太，我为白波的受辱而不知所措。罗氏大概请

教过她的牌友，设此圈套，迫使白波听命于她，保持她的权力地位，与她分享同一个男人的利益。这个苦肉计理所当然被我拒绝，我和白波便躲到了南京。半年之后，罗氏又生一计，带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名份上的岳父大人，闯来南京廊东街我和白波的避难所，由其父作证，逼我定个名喻，确定罗氏的正统地位。白波不得不躲在邻居家暂避，我则被牵着鼻子送罗氏父女回上海，由律师作证，立下字据，保证罗氏每月应得的生活费，才把我放回南京。经过这后一次袭击，白波如惊弓之鸟，表示要结束这种耻辱的浪漫主义生活。我把这次回上海立字据办分居手续的详情告诉了她，保证以后她再不会遭到袭击，她才回心转意，继续同享新才子佳人的生活。

我和罗彩云之间为什么不能办离婚？一是她本人不同意，她所传的理由为她是明媒正娶，处于正统地位，照旧习惯，除非犯了族规家法，才能办离婚。另一方面，按当时上海习惯，要离婚就得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有个变通办法，叫做“变相离婚”，即由男方保证每月付给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保持女方的夫人地位，但二人分居。按照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变相离婚办法，以换取我的自由地位。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对半封建半开放的社会采取了妥协态度，造

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局面。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8月13日进攻上海，我急忙从南京赶到上海，把罗彩云和刚断奶的女儿送上沪杭列车，平安回到浙江老家。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罗彩云带了儿女在老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日寇投降，次年我曾回浙江探望过她们，当时儿子申布已进中学，女儿明明才上小学。

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之前，把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嘉兴张乐平家。第二年我从美国回来，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明明就在戴爱莲的照顾之下，进小学，升中学，最后进了戴爱莲的舞蹈学校，继承后母的事业。儿子申布于194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了美术事业的后继者。1953年申布从美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当教师。他结婚后，把母亲接到无锡一同生活。在此之前，由于儿子的劝导，罗彩云在浙江老家和我办了离婚手续。以后她一直和儿子、媳妇生活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住了三年牛棚七年监狱，无力支付罗彩云的赡养费，全靠儿子、女儿供养她。有一个时期明明曾接她母亲到北京住了一阵。后来也许因为罗彩云是反革命分子叶浅予的老婆，被赶回南京，仍然依靠儿子生活。

1975年我从秦城监狱释放出来，女儿告诉我她母亲已于1970年某晚吞服了过量安眠药离开了人间，最后一句遗言是向儿子说：“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听了这个消息，我神经为之一震，立刻感到自己对此负有严重责任。这是她对生活完全绝望的控诉，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回首当年由于我的

轻举妄动，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始乱终弃”，我后来又被梁白波、戴爱莲所弃，可以说也应了一句名言叫做“因果报应”。

我真信什么“始乱终弃”和“因果报应”吗？不！自从和罗彩云办了离婚手续，我以为再也不欠她什么了。认真回忆1935年那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两极。我要向上，她却拉我后腿；我在创造精神财富，她却在一百三十六块麻将牌上浪费时间；我要求灵魂解放，她却拼命往我身上捆绳索。我挣扎得好苦啊！所谓“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站在罗彩云的角度看是合乎情理的，然而，从叶浅予的角度看，不也是挣扎得好苦吗？！

现在是1989年，我正在写婚姻生活的回忆录，首先想到的是罗彩云。是她，使我切身体验了男女之间爱的基础是什么；是她，使我明白包办婚姻本身就是罪恶，结婚双方本人不能负责。我之所谓同情或怜悯之心，是封建人道主义的迷药，我曾被迷药迷住了心窍；我的一些忏悔语言，实际是虚伪的。封建道德不知伤害过多少人，罗彩云被伤害了，我也被伤害了。个性解放是人的固有权利，谁也无权阻止。我完全肯定我和梁白波的结合是合乎情理的。至于罗彩云之处于文盲地位，她自己不能负责，她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对这次婚姻的盲目性。后来一旦清醒，一旦觉悟，应该坚决纠正，不应该拖泥带水，阴阳怪气地拖累对方。我有内疚，也是实情，等到变成白发老翁，才来暴露内疚，未免太虚伪了。在罗彩云问题上，我不怕人骂我害人，也不怕人骂我虚伪，我是徘徊在封建与开放夹缝中的一个怪胎。1954年我儿子劝他母亲和我办离婚

手续，是下一代人挽救上一代人的合理行动，我很感激他这一大胆的行动，使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6.3 一见钟情第三课

1935年，父母包办的结婚生活已经过了五年，罗彩云为我生了一子一女，儿子丢给了祖母，女儿还在襁褓之中。这位罗夫人是个文盲，并因束胸，自称乳房分泌不出喂孩子的母乳，所以两个孩子都是奶妈喂养的。当时我也曾想过，到底是天生没奶，还是学了上海一般少奶奶的作风，摆派头，不愿喂奶，把时间都消磨在麻将桌上。

无巧不成书，正在为雇奶妈烦心的时候，《时代漫画》编者鲁少飞座位旁，来了一位女画家，正给编者看她所画的一幅漫画：《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我抢过来一看，又用眼神在女画家身上从上到下溜了一转，思想上似有所动。动什么？当时摸不透，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所有向《时代漫画》投稿的人都是男的，没见过一个女的，而这幅讽刺上海少奶奶的画，似乎也在讽刺我那位罗夫人，正合我的心意，它偏偏出自一位女画家之手。只这一幅画，就显示出这位女画家的才华和机灵。她名叫梁白波，作品只签一个英文笔名——BON，不知是何来源。

鬼使神差，我篡夺了《时代漫画》编者的权，和这位女画家打交道了。她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上过学，学的是油画，上一年曾在菲律宾

一所华侨中学教过画，最近才从那儿回国，正处在失业当中，有人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她问我她那幅讽刺现代妇女的画怎么样，我说编者已决定发下期封面了，至少可以拿稿费五元。我问她现下要用钱吗？她说身上还有点，不需要。经过这次接触，发现她似乎对我有好感，问我能不能陪她出去吃晚饭，我当然愿意。不知为什么，她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在把我吸过去。从此以后，我每天从出版社下班。就往女子公寓走，已经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吃晚饭呢。经过几次晚间的幽会，我和白波两个漫画细胞愈贴愈紧，彼此心里都以为是天作之合，无可抗拒。当然，她知道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但只要我能抛开那个家，她是无所谓。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

1935年春，我和白波受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他们的卫生宣传列车，从浦口去天津。每到一大站，停下来开群众大会，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在大会上悬挂，路局的技术人员则为站上的卧车车厢做封闭消毒。第一站浦口，第二站蚌埠，第三站徐州，第四站泰安，第五站济南，第六站沧州，第七站天津。上述例行活动做完，即游览名胜古迹。在蚌埠看了安徽的地方戏；在泰安登上了泰山；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在沧州看了半身埋在土里的大铁狮。这一路见识不少，增加了生活的乐趣。到了天津，任务完成，全体工作人员乘坐一辆卧车，挂上去北平的列车，畅游北平，算是慰劳宣传大军。在北平三天，路局的人回去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并畅游古老而神秘的故都。我以上海漫画家身份结识

了北平许多画家、记者、摄影家；白波以我的女友身份和许多新相识相周旋，闯进了另一个社会。我们白天游故宫、天坛、天桥、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演出，有时杨小楼和郝寿臣同台；有时荀慧生和吉菊朋同台；有时杨宝森和程砚秋同台；有时王又宸和王瑶卿同台。我从小喜欢看戏，青年时迷上了京戏，自己也能哼两句，但在上海只能偶然看到北京名角的戏。到了北平，几乎每天晚上可以看到不同名角的演出。那时“富连成”科班白天在前门大街广和楼上戏，盛字辈刚出科，无字辈刚接班，演出十分精彩。连看几个老式的剧场，我也增长了见识。白波平时不画速写，受了我的影响，也拿起速写本画起戏来。我是那几年受了墨西哥漫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影响，才开始画速写的，这次和白波畅游北平，每次出游似乎打足了气，出手飞快，画了几百张速写，后来在上海编印了一本《旅行漫画》。

北平之游，开阔了眼界，增进了我和白波的思想交流，在艺术创作和欣赏方面增进了切磋机会，彼此感情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回到上海，却不得不忍痛分手，因为我是一个有妇之夫。

不久以后，上海时报传出“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个作家朋友从罗彩云那儿访到的“第一手”消息，说“《王先生》作者因感情突变，逃离家庭出走”云云。想不到个人的家庭问题作为报社头条社会新闻捅向了社会，这对我和白波来说倒是有利的，因为从此以后，可以不用躲躲闪闪了。

罗彩云口口声声说她没有白吃叶家的饭，没有做对不起

叶家的事，你叶浅予怎么可以变心！

说起来我也真是不应该。当年实在不该把婚姻大事当作儿戏而作了一次不负责任的冒险。本来，1930年以后，我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个文化相称、志趣相投的对象，可我偏偏要像赌徒一样，把命运押在赌注上，这不能怪父母，只能怪自己。1935年以前我能忍受，1935年以后怎么不能忍受了呢？因为这一年遇到了文化相称、志趣相投的梁白波。早五年遇不到梁，要是遇到了梁，她没有成熟，我也没有成熟，热乎不起来。到了1935年，我极端苦闷，梁也曾经沧海，二人相见恨晚，星星之火一触即燃。奇怪的是，她明知道我有妻子儿女，还表示可以忍耐；“我虽然还残存封建家教意识，此时此境，也只能孤注一掷。我决定避开上海那个家，和白波一起到南京找个窝，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同时，请上海一个律师朋友出面，向罗彩云提出离婚，离婚不成，达成了和罗氏分居的协议。这么一来，我获得了和白波另组家庭的条件。白波甘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我共同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勇气，证明她对我的真诚和热恋。”

从此以后，我们三人的地位，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我抛弃了罗彩云，可她仍是我名份上的夫人；白波虽然和我同居，只能算是我的情妇。我是什么身份？有双重性，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从1935年到1938年四年间，我跳出了混沌的封闭家庭，浮游在艺术的浪漫天堂，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结婚那

样新鲜。我和白波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事业的搭档。我们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用不着互诉衷肠，迅速地合成自然的一双。我当时的处境，身上始终背着一个罗氏夫人的包袱，在追逐甜蜜的生活时，既甜又苦；因其苦，才更觉得甜。

在南京，我好像从笼子里逃出来的小鸟，找到了本属于自己的天堂。对方怎么样？问过她有什么反应吗？没问。为什么不去了解对方的反应？我觉得即使有藏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也不如不说的好。不过我也能理解白波的心情。她比我大胆，因为她是自由的，可以摆脱世俗的议论，放开胆量，占有她所爱而本属于别人的男人。可以说她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在南京的生活相当恬静而富于生气。我摆脱了上海的业务，以全部精力为南京《朝报》创作《小陈留京外史》，着重反映南京官场的丑态，曾经几次揭了官僚们的疮疤，报社老板顶不住了，不得已停画《小陈》，代之以《王先生到农村去》，以民不聊生的内容，间接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面貌。前后一年多，我大大开阔视野，不能不认为这和新生活所培养的精神世界大有关系。

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在和我共同生活期间，受到我的启发，曾为上海《立报》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漫画，着重心理描写。主角是一个腰细得和蜜蜂一般的姑娘，以细腰显示其挺胸突臀的外形。这样的造型，打破了从外形出发的外观法，而用从人体本质特征出发的内现法，腰细到只剩胸臀之间的一个交点，夸张到近乎变形。故事情节也夸张到了荒唐的程度，例如，蜜蜂忌妒她的女朋友，恨不得一刀把她

斩成两段，图画里真的把那女朋友斩成两段，把心理状态画成现实形象，看来不近情理，其实真合情理。“梦”是现实形象的思维反映，和现实生活相比，它就既是合理的，又是荒唐的。白波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所喜欢的书，如王尔德的《林格莱画像》、郁达夫的浪漫派小说，殷夫的诗等，都同属一个类型。

白波在参加漫画群体之前是“决澜社”的成员，画的是油画。决澜社由倪貽德、庞意琴为首的一群青年油画家组成，首次画展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大厦举行。他们的创作道路以表现现代生活为目的，庞意琴《机器》一画可以代表决澜社的创作方向。白波在这次画展中，参加了一幅躺着的无头无脚的人体，我当时认为这是概括人体美的一件杰作，好像吃鱼，斩头去尾，取其最最鲜美最富营养的部分，嚼而食之。有人说，没了头脚，人体还成什么美？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最重实际的欣赏家，女人体最富于性感的部分是否就在上自胸部下至大腿之间？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女画家把女人的性美表现得如此露骨，比之男画家要高明得多，大胆得多。就这一幅画的构思，反映了梁白波过人的才智和超群的胆识。回头看看她那幅《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的讽刺画，对上海少奶奶的批评有多辛辣。

从事漫画创作以后的梁白波，思维逻辑和那幅女人体画一样，表现了对事物透彻的洞察力。那位挺胸突臀的蜜蜂小姐有多泼辣，可惜由于它不合一般读者口味，被报社腰斩了。

据我后来了解，白波曾给殷夫的诗画过插图。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到，给诗画插图，除了必须具有诗人的气质，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头脑，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抽象图象。白波的绘画才能，正好长于这方面的思维与技巧。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感到是和诗人相叙在一起，她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推动我在创作《王先生》漫画时，获得了新的想像力。比如《王先生到农村去》那套画，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能够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有时灵机一动，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和农民的依存关系。这对社会的深层发掘，使我的想像力长起了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的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我的灵魂之中，催化和异化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库、宣文杰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和画队战友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画大幅布画外，在武汉时，每期还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构思与造型独具风格。通过战时生活的锻炼，我们的共同生活本应该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没有想到战争对每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尽管我已摆脱了旧家庭的牵累，白波却在考虑个人的前景。以往她无所畏惧，在这战争的环境里，却似乎恢复了理智。她在想，难道一辈子做叶浅予的情人吗？我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异常，我

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动乱时期，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我自己由于全身心贯注在漫宣队的工作里，很少和白波交流这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武汉后期，她对漫宣队的工作已开始消极，我却没有觉察。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各干各的，到了晚间，就可能交错位置，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思想有负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免要寻找发泄的机会。白波就在此时刻，和当时最受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她虽不是美人，却有妇女的媚力，何况她是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呢。在一段时间内，她渐渐和我疏远，漫宣队的人已有所觉察。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颇想让白波同去香港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转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这才明白，客观形势已经变了，主观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不过，在受到打击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

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白波告诉我，30年代初，她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还谈起过她曾经和一个男朋友睡在一起，却不让他贴近自己的身体。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在我的世俗眼光中，简直像一个星外来客。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1938年我和白波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她终于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于是，漫画战线失去了一颗发光的慧星。

§6.4 妇唱夫随第四课

1938年，我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后，回到武汉，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夜走出长沙，撤到桂林。随后，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两个话剧女演员和我作伴，我与其中一个发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时颇有点神魂颠倒，时相往来，得以解除我的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处总潜伏着那位才女画家的情影，无法抵抗。最后不得不割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联系。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广州沦陷，香港成为孤岛，英

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对我们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见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厅，这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闭着，戴氏每天上午在此练舞编舞。我与她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晚会的海报。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通过我，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我还带她到香港湾仔、官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我的英文口语渐渐可以和她对起话来，我们之间去了一层障碍。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杭城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告诉她，我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触过。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戴爱莲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岛（现称特立尼达）一个三代华侨的家庭中。祖

籍广东鹤山（现新会县），祖父小名阿大，年龄很小就被作为华工招募，因广东话中“大”与“戴”同音，人们叫他“阿戴”，并认定他姓戴，究竟本来姓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了。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也是侨生。爱莲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亲爱好音乐，她自幼受到熏陶，常常在母亲的琴声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进岛上唯一的一所舞蹈学校习舞。十五岁那年，她随母亲去伦敦定居，就在那儿继续学习舞蹈。不想好景不长，因父亲破产，家境贫困，她不得不勤工俭学，自己设法谋生。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她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打下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莱斯里·伯·万森办的现代舞工作室学习。在艺术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有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并经过严格考试，成了欧洲现代舞权威拉班的学生尤斯所办舞校的学生。靠着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刻苦学习，她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返回祖国，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庆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作过募捐，如今，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亲自参加抗战，决心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是她回到祖国后最亲密的朋友，我

俩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们快速的谈情说爱过程中，九龙半岛酒店那场舞蹈表演会是一个重要契机。我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的抗日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建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莱菜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深。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戴家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叶家到了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宇、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探和冯亦代等。

一周后，1940年春天，我们踏上回大陆的征途。先措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赶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尾（自行车）奔玉林、资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略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待到柳州，才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欧阳予倩的接待，看了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离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广州湾赤坎算起，已经走了十五天了。旅途极其劳累，幸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三十三岁，她二十四岁，要是现在，我们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时，当朋友们从重庆北岸到南岸来接我们时，我俩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包围住我们，要看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家。爱莲不懂中国话，见了他们目瞪口呆，只顾问我朋友们议论些什么。我把实话告诉她，说朋友怀疑我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她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

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问，你看的東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够多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国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问，若去延安，是否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她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武汉时期，国民党履行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诺言，在大本营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郭沫若第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我是三厅成员，被派在香港工作。武汉撤退后，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周恩来、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还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应回去办移交。我顺水推舟，立刻送上辞职书，不久就被批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陪爱莲去见了恩来。周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开展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因为我这条鱼适合在大后方的水域里游泳，爱莲的工作又离不开我的帮助，于是决定暂时不去延安，就在重庆打开局面。

正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二十四小时内夜以继日向重庆倾泻炸弹。这样继续了一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搅乱。起初我们寄住在张家花园一个朋友家里，

第一批炸弹就毁了那座房，只得另找别处。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我们一星期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炸毁了旧房，第三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整整一星期的疲劳轰炸，日寇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可以乘机逼迫蒋介石投降，岂知中国人就有这股子宁死不屈的硬劲，倒是日本人挺不住了，疲劳轰炸宣告破产。

爱莲经过这一番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战时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之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重庆房屋一片片倒坍，伦敦房屋可结实得多；希特勒逼邱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蒋介石投降，重庆人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可是也挺住了。她觉得这次下决心回祖国来，和重庆人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演出的节目和香港那次基本相同，使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和现代舞蹈揉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戴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把马的两个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在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所见所闻的材料画成《重庆行》漫画八十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与爱莲一同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表演舞蹈，我举行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们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个农民家中，为时将近一月。后来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和几个朋友混在难民队伍里，通

过澳门、石歧、新会日寇占领区，在江门买了良民证，走到自由区，在肇庆搭上西江拖渡，回到桂林。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二十三幅，纪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子背疯》一折，成为以后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此组织话剧会演，集中了南方几个演剧队表演节目，广西艺术馆乘机请爱莲办了一次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员作形体训练。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放松，爱莲只知英语“relax”这个词，不知中国话该怎么讲，幸亏丁聪在场，当了临时翻译员。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保卫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和巧茉莱夫妇也从日本集中营逃出，偷渡到了桂林，和我们同住一处民房，后来他们和美联社取得联系，先期去了重庆。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我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说实在的，除了我，谁也摸不清什么节目该穿什么服装，该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爱莲在换服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戴爱莲的“跟包”。跟包者，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1949年重庆那次“边疆乐舞大会”，戴爱莲是主演者，我则既是节目组织者又是海报设计者和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5年，爱莲为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成立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组，决定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采访藏族乐舞资料。我

们两人先期到成都，寻求去西康的关系，同时我托人卖画，筹集旅费。最后，我们通过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贸易公司的双重关系到了康定。在康定住了一个月，爱莲采集到大量藏族乐舞资料，编成了《春游》和《巴安弦子》两个节目，我写成了《打箭炉日记》四万字，两人双双获得丰收。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戴爱莲反过来成为我的跟包，当我的对外联络员、翻译和画展招待员。但她开表演会，我仍然是她的跟包，而且是乐队成员，《哑子背疯》的锣鼓点子，就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

1943年我们住在四川北温泉时，爱莲是电化教育训练班的舞蹈教师，我作为家属住在学院的松林宿舍里，因生活艰苦，用不起做饭的阿姨，我们有时在小饭馆包饭，有时则由我掌灶管两人的饭。这次在纽约期间，因跑唐人街饭馆花钱太多，住处又有厨房，就仍由我来掌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副食品买齐。那时老舍也在纽约，我们经常请他来共享我做的美味佳肴，一同解馋。

爱莲十五岁离开千里达老家，随母亲在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她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1947年我四十岁，她三十一岁，她思家心切，决定从美国回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他们见见她从祖国带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这女婿和她一样有一手吃饭本领，必要时还能做一顿祖国的美味孝敬老岳父和二姨哪！可惜，千里达的华侨全是两三代华裔，祖籍广东，自己老家是哪县哪乡都弄不清。戴家连自己的姓都没了。平常说的英语，满带乡土口音。他们引以

为自豪的是出了一个陈友仁，当过北伐时代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戴爱莲是回过祖国的唯一舞蹈艺术家，千里达人民特别欢迎她，不久前她在纽约表演两场节目，千里达报纸一片赞扬，盼望她回来为故乡表演一场精彩节目。为了表演《春游》和《巴安弦子》，我们特地从纽约请来一位男伴舞的名叫乔治。演出那天，我照例只能躲在后台管服装，但为了显示戴家女婿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把我在纽约展览过的画全部带来，在爱莲的表演会前几天展出。岳父虽穷，还搜索钱柜，买下了我的一幅画。

回纽约时，海关检查行李，发现爱莲衣箱里装的都是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服装，以为我们是服装贩卖商，要上税，经再三说明她是舞蹈演员，是表演节目用的舞台服装，才免税通过了关卡。

1949年春北平解放，7月举行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队伍会师，成立了文学艺术联合会和各协会，我当了美协副主席，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1950年文化部聘请爱莲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来，冷不防戴爱莲向我提出离婚，这真像晴天霹雳，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她说，她已爱上别人了。我问是谁，她说是个在我家住过的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捏指一算，从1940年到1950年，我们在一起生活整整十年。

翻阅画筐，发现1944年在四川北温泉松林宿舍画的一幅

题为《松林人物志》的画，其中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们两人生活的写照。

§6.5 磕磕碰碰第五课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王人美出版过一本回忆录，书名《我的成名与不幸》，最后一章写的是“我的丈夫——倔老头叶浅予”。且看她是怎么看我的：

“我和叶浅予在1955年结婚，是老夫老妻了。过分熟悉，反倒觉得不知从哪儿谈起了。这样吧，就先说说眼前这座房子。这是座老房子，大门关不严，水管漏水，地板腐朽，房管所修了几次也没全修好。我催他再去找找房管所，他不但不找，反倒帮着房管所说话。说什么房管所也有难处，这些房子百孔千疮，房租收来都不够修缮费用，还说不要为生活琐事烦恼，要知足常乐。你看，这老头子多倔！想起我们搬家的时候，正急需钱用，他却不声不吭，把补发的三万元工资全部捐给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作为毕业班优秀学生的创作奖金。这三万元是他十年的补发工资，钱捐出去了，搬家要花钱怎么办？只好向荣宝斋借了一千元。叶浅予借钱，有人不信，他们认为有点名气的画家，都是腰缠万贯。其实，叶浅予

经常两手空空。记得我们1955年结婚时，他四十七岁，我四十一岁，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民等等。叶浅予花了将近二百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二百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叶浅予这个人从来不爱攒钱。”

“现在叶浅予的画荣宝斋一张标价两千。许多人以为，画价这么高，他分成一定不少。我说，那是你们不了解情况。叶浅予从来不赞成画价过高，相反，他主张压低画价，而且从80年代起，他拒绝向任何画店售画了。”

“他对青年画家是爱之深，责之严。有一位女画家周思聪，是他的学生，很勤奋，也有才气。有些地方约她去当场挥毫，一些港商也以优厚的待遇邀她去香港卖画并表演。老头子知道后，心急火燎，专门把周思聪请到家里，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他告诉她，成功标志着新的起点。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必须再下苦功，如果到处去表演，那会毁了自己。他不但苦口婆心开导周思聪，还告诉约请周思聪去香港的画商，不要毁了我们的年轻人。”

“叶浅予受到墨西哥画家河佛罗皮斯的影响，从1933年开始手不离速写本。有趣的是我们1952年认识以后，有时也到公园茶室里坐坐，他掏出速写本，勾画周围的茶客和过路的行人，一画半天，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几乎忘了我的存在。”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家中里里外外的事全要我操心。如今我半身偏瘫，管不了那么多。你看这个家，搞得多脏多乱。嗨，还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也别说了。我告诉你一句话，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我的成名与不幸》由王人美口述，作家解波执笔写成。这篇被我删节了的“倔老头叶浅予”，也是以口述的方式由解波记下来的。“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一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也不懂。”这是王人美对我的真实看法。我应该根据这个观点，回忆我和王人美的共同生活。

王人美，原籍湖南湖阳。父亲王正权，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教师，桃李满天下，毛泽东也是他的学生。人美从小在长沙长大，原名庶熙。兄弟姐妹七人，她最小。七岁时，母亲因脑溢血突然逝世，那时她已进小学。1926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对数学特别有兴趣，满以为将来会像她父亲那样当个数学教师。没想到这年夏天，父亲被黄蜂螫了一下，化脓成疾，竟至危及生命。

父亲去世后，人美随姐姐到武汉，姐姐都在汪精卫的政府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实行反共，许多左派人物被杀或逃亡，王氏请人易散。人美和三哥王人艺随二哥王人路到了上海，进入黎锦晖的美美女校学歌舞。

1928年5月，黎锦晖组织的中华歌舞团乘船离开上海，用了十个月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按榔屿、曼谷、马六甲、雅加达、苏门答腊等城市表演。次年中华歌舞团解散，王人美

回到上海，进南洋招商附属英文专科学校读了一年英语。不久，黎锦晖重振旗鼓，组织明月歌舞团到北平、天津演出，接着又远征东北。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他和胡布被称为明月团的“四大天工”。电影导演孙瑜慧眼识英雄，把王人美由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之一变而为联华影片公司新片《野玫瑰》女主角。影片获得很大成功，王人美演得自然而真实。为什么会这样？导演说，因为她自己演自己。待到《渔光曲》出现，小猫那个人物，实际是王人美自己演自己又深化了一步。《渔光曲》是导演蔡楚生的成功作，是王人美电影演技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走上新路的一个里程碑。它获得了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荣誉奖。《渔光曲》的主题歌曾经风靡一时，人们提到《渔光曲》便会想到王人美；见到王人美，便会想到《渔光曲》。那以后，王人美又主演了一些影片。解放后，她成为上海长江电影制片厂的演员，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她忽然神经错乱，我把她送进北医的精神病院。在治疗过程中，逐渐知道1950年她从香港回上海之际，正赶上文艺整风，有人向她身上泼脏水，诬蔑她和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来往，她受到极大刺激，曾经被送进疯人院。幸亏她二姐王明霞把她接到北京，住在她大哥王人碰家，她神经获得松弛，病才好起来。从此以后，人美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

我和人美的婚姻是1955年由朋友们有意撮合的。那时人美和金焰已经分离十年，据她的回忆说：

抗战爆发后，金焰和我缺少共同生活，他认为丈夫应该养活妻子，不赞成我独自参加大鹏剧社，更反对我报考美军

打字员。他不了解我经历流亡生活后的思想变化，我怎么能安心当一只家猫。他不理解我，认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我们的离异既没有吵闹，也没有眼泪……我觉得夫妻之间即使爱情已经消失，友情仍然可以存在。爱情有时是自私的占有，友情却是无私的依存。

我呢，1951年通过官方手续，和戴爱莲离婚。说实话，我是流过眼泪的。到1955年，我已独居五年。

王人美当年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丁聪家里见过她，这次经朋友介绍，目的明确，希望我们合组家庭，解除寂寞。应该说，我们彼此对性情脾气都不甚了解，但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有一定透明度，所以经过几个月交往，我便直率地提出要求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她正在长春拍片，在一封信里她这么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厌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过去的环境、生活，养成了我某方面的依赖性，1952年病后更造成了过分自卑心理。我也曾想到如果有个知心的人，能够在事业上帮助我，生活上关怀我够多好呢。因此形成了

目前的恐慌。这是我的心情，也许你要批评我吧，我愿意接受。”

信中反映的谨慎态度，也许是一个女性的常态。这里面可能隐藏着第一次结婚的幸与不幸；也许是对我的警告，语言叙中带硬。

事实证明她的考虑是有预见的。我们按照世俗传统习惯，在北京西单一家饭馆定了两桌席，请朋友吃了一顿，就算结婚了。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的性格急躁，又好强，硬要摆出当主妇的身份，因此在家务上开始发生矛盾。结婚才一个月左右，某一天，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们两人顶撞起来。她一本正经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才一个月便要离婚，简直荒唐！

我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

乍一听，这顶帽子新鲜，但也可以理解，可能冒犯了她什么。

我说：“咱们都四十多岁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

她说：“就是因为四十多岁了，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

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

给我这么一反驳，她好像有所憬悟，口气变了说：“那么，

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从此以后，我们之间除了作为生物的人，特别注意如何做一个社会的人。我逐渐摸到王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是，这内外之间，界限很难分清。例如，她对甘雨胡同的住房总不满意，老是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总给她“拖”，拖得不耐烦，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采取“顶”的办法，也就是“倔老头”那篇文章所说，反过来站到房管所的立场，替房管所说话。内掌柜火了，拿出她的杀手锏，说要搬到北影去住。她是北影的演员，有权向北影要住房，但北影的领导却认为王人美和叶浅予结了婚，住了叶浅予那七间房的小院子，怎能再占北影的宿舍楼呢？王人美屡次碰钉子，便屡次和我闹别扭。闹的中心内容是不该和我结婚，以致丧失了她在本单位应得的权利。

在我们第一次闹离婚之后，为了保证内掌柜的职权，人美借故辞退了跟我好几年的北京老阿姨，换了她的老乡湖南阿姨。干了没多久，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她，她又把湖南阿姨辞了。对这件事，外掌柜不以为然，内掌柜却板起面孔说：“别噜嗦，这是我的事，你别管！保证不亏待你就是！”

这样吵吵闹闹，人美也感到有点过火，在一次信里她写道：

关于求同存异是不是运用于夫妇之间，我没有很好研究过，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感觉上不认为能行。因为如果像目前情况，我们分居两地，所要求者是赶快见面，别的一切都

可以不顾及到对方，当然会过得很好。可是两人每天在一起，还有说舌头碰不到牙的吗？只顾着求同，现实生活还过不过呢？总之，让我们经过实践再改进吧。

在一次通信里，我写到希望在生活中有点幽默感，不要老是那么紧张和严肃。她回答道：

“生活中带点幽默当然能使人轻松愉快，问题在于幽默和讽刺的界限很难划分。如果过了那个‘度’，是会使人难堪的。我虽然一般地说对事物较比认真，但不至于到完全不懂幽默。可能是在我的印象中，你不是富于幽默感类型的，因此常引起误会。”

“我本来就是不好说话的人，拼命在培养自己多说，然而经常都感到话似乎都是多余的。就拿你举的例子来说吧，你的结论还是‘废话’。其实我倒同意你后来的一句话：‘谁都没有知道谁肚子里在想什么。’这出戏按我的舞台指示是这样的：

人物：我（对事情比较认真，想得很周到，这在某些方面来说是好的，然而常得反效果）

你（有意识地在改造自己的大男子主义，然而仍不免经常流露）

时间地点：文登路早餐进行中

我：（吃完要去冲茶，想着糖盒应该带回去，你尚未吃完，可以让你带）你吃完把糖带回去吧！

你：（责问地）为什么你不拿呢？

我：（心想我也不吃糖，不爱喝茶，凭什么这点事你都不

肯做，有点生气，直率地）你就不能拿一下吗？

“根据你我两人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完全说明我们之间是不够了解。我确实希望通过我们这次的通信，比较冷静地把该说的都说个明白（哪怕过头一点）。摸清楚毛病在那里，以便纠正，如何？”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人美如何在抓我的“小辫子”，用以证实大男子主义的症结所在。而我呢，仍然我行我素，大大咧咧，不以为然，认为小事情无关大局。这可把她惹急了。在另一封信里，她非常严肃地提出：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开头来写这封信，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儿什么。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然而我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你呢，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主妇。因此，在双方认为适合的条件下，我们结了婚，而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我爱的是金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犯神经病（关于这病，你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毕竟是我们已同处了五年，双方的感情也在逐渐增长，然而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片断都可以看到，如果只有我们俩在一起时，那就该沉默寡言。记得我们也曾同去过北海公园等处，那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以后咱们也不用试图同出同入，而应采取各自为政的办法。总之，在我这方面来说是不愿意沾你叶浅予的光的，所以在有一次我托吕思买票，她使用了你的名义，你听了不高兴地说：‘不要乱使用我的名义’时，我是非常生气的。从那次以后，我就更是离你远了。很多问题，我精神上得不到解脱，工

作也不顺心，而客观上和主观愿望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因此在这次特定的写申请入党的材料时就又犯了病。对于病，我是有信心使它痊愈的，但是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彻底解决，我认为我是还会犯的。”

“昨晚我又梦见了金焰，他现在的情况也不比我好，身体糟透啦！那还是次要问题，我相信他精神上的痛苦更厉害（这当然是我主观猜测）。不过，这些我觉得我是不应负很多责任的，也许是他罪有应得。我只有一句话评他：本质是好的，以后受环境影响太厉害。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从现在起，我决定将与他千丝万缕的情绪割断，好好做你的爱人、主妇、同志，并使我们共同的事业更迈进一步。”

1962年我外出旅行，收到人美同样内容的一封信，但口气比较缓和：

关于这一次临走前的别扭，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因此相互不够了解，各人都抱着对对方成见的看法，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又加上一个，越发展距离越大。末了，我们之间的对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话说出来就像枪子儿一样，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不知你能否同意我这种看法？今天没有时间，过一天我希望着能将思路整理一下，好好交交心。望你也能在闲暇时冷静地想想，谈出你的看法，或者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让我们沟通一下思想，以便改造这种家庭没有温暖的现状。我相信我们双方还是有这样愿望的吧？

收到这样的信，心里很受冲击，难免要在回信上说几句，

必要时还得解释几句。可我的待人之道，有时总要替对方多想想。我了解人美思想偏狭，最怕别人小看她，而我对事的态度总认为自己宽宏大量，不计较对方的粗言碎语。在家里我忙着自己的事，不关心身边还有个人，只知道王人美是个管家务的能手，不注意她是个女人，需要男人去抚慰，去关心。回想起来，也许这就叫大男子主义，所以嘴上尽管说要改，实际上不认识大男子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何况我对她的大女子主义也有成见。因而，我们之间的距离愈扩愈大。幸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政治运动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不论矛盾如何尖锐，也不至于搞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们有时语言过火，难免伤了对方心灵，等到冲击停止，心情平静下来，谁都会想到我们之间是一家人，总有个与人为善的好心，不管怎么样，和平的日子多于战争的日子。人美在信里刺痛了我，说什么我爱的是戴爱莲，她却不知道戴爱莲现在在别人的怀抱里；她把金焰那位电影皇帝的宝座看得如此神圣，也刺伤了自己。最后还得抚慰自己，割断千丝万缕的情丝。

整个50年代，谁都在政治运动的枪尖上生活，平常说话或者写起信来，人人都不免有一套政治术语。人美在1957年前后，一心要入党，不知写了多少次申请书，当然得有一到自我标榜和自我批评的面孔。我这个被讥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人士，处在政治运动中，也得有保护自己的本领，因而，在给主妇写信的时候。也总得有张好看的面孔。可巧，在回收抄家物资的文件中，发现了几页叶浅予致王太美的信稿：

（一）

老实说，青岛的日子过于舒服了。我是带工作来的，可没有完成。第一星期写了五千字，劲头还有，第二周就放松了。一算，时间反正不够，玩了再说吧。况且，青岛原是个休养的地方，大家都“松”着，我“紧”什么呢？临走时还有些恋恋不舍，回家空荡荡，怎么受得了？上车的时候有些无可奈何的情绪。……

1956年王人美参加文化部青岛哲学学习班，我以家属身份去玩了几天。回家后写了这么一段颇带感情的信给她。

（二）

……大佛寺很安静，但是门铃和电话的响声对我威胁很大。据说海涛在香港发表文章，其中有谈到大佛寺的一节，题目叫“人美的家”。很荣幸，这回我做了你的配角。

这几句话，略带幽默感，是漫画细胞的表现。

（三）

接到你的信，难过了半天。生活里许多任性和主观的表现，过去曾经害我不浅，自问已经改了许多。但是这一年来伤害你的地方还是很多。我不预备作检讨，只希望时时提醒我。不过，有一点是我的优点。就是，尽管我们之间有点小小别扭，我从来不耿耿于怀，因此我对你不存在什么戒心。希望你也不要对我存什么戒心，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让互相容忍代替互相成见吧！我想。两个都有点小脾气的人凑在一块，是天作之合，来个“相克相生”，岂不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生活？

（四）

今天接到17日来信，非常高兴。好不容易送来这么一句很有分寸的问话：“很奇怪，为什么你不给我来信呢？”其实，你刚发出这封信的时候，答案就马上到了你的手上了。

全身心投入学习哲学的日子里，匀出一点点时间来谈谈恋爱，是极为必要的。我觉得我们结婚结得太快。应该补一补恋爱的课程。上回你信里有些牢骚，逼得我想起去年刚结婚不久和我赌气的那几天，那股子别扭劲儿，真使我有些害怕。我想那时候我们的确还不是很了解的，可是彼此都以为很了解对方似的，这是因为彼此自尊心很强。老实说，那就是自欺。等到开始互相真的了解时，不免要发现一些不很如意的情况。这时候我们的自信心便受了打击，感觉有些委屈。如果积极一点，勇敢一点，把这种委屈解剖一下，看看那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情由，那么对促进彼此的认识和培养彼此的感情有极大的作用。你曾对我下过警告，在我说起来也是一种委屈，虽然我在口头上不大满意这种压力，可是我认真地考虑过你为什么表示这样的态度。我的结论是，责任在我！因为我没有真正了解你。现在我认识到：由于历史的原因，做一个妻子是不简单的，尽管历史改变了，人们的意识还远没有改变，所以做妻子的还背着包袱。

（五）

昨天下午从天津回来，接到你的信。文登路六号早餐的一个小镜头有了发展。我同意你的进一步分析，以及对我的批评，可是不太同意对你自己的估计，好像一切都为了我，而往往吃力不讨好。为什么那么容易抱怨呢？因此，我懂得你

的沉默就是抗议。我仍然希望你对我不要有成见，杀大男子主义不要杀得太激烈，太激烈，老头子吃勿消。

五号到天津那晚，写过一封信给你，感情比较冲功。那晚我的确想得很苦，因为在这次通信中，我们似乎更接近了。

我们两个生活习惯和个人爱好有许多不同之处，过去我们或许觉得遗憾，但这回却觉得应该有“存异”的必要。夫妇的和平共处原则，也不外乎求同存异吧。

以上的几封信，估计都是1956年青岛之行和人美重度蜜月之后写的。为什么叫“重度蜜月”？这是因为自1955年以来在共同生活的一年中发生过多矛盾冲突，彼此之间积压了许多成见，一时不易解开。青岛之行，她是主，我是宾，周围都是朋友，加上最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家庭琐事干扰，心情舒畅，胸襟开阔，比较能容纳对方的意见。所以在信里强调恋爱补课的必要，这是在感情上有了交流的收获。

1980年为了大佛寺换房的事，人美骑车跑房管所多次。5月12日那天上午又骑车上房管所，下了车忽然跌倒，待要开口，却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住过神经外科病房，确诊为脑血栓。治了一个来月，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幸声带恢复机能，消化系统完好无损。出协和后，移三〇九部队医院继续治疗，又经三个月，能下床扶拐杖行动，才出院回家。这时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的房子已换成甘雨胡同二十四号，北房三间，西房五间，相当宽敞。但家庭主妇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嫌地板破旧，大门腐朽，和房管所闹个没完。她可能在想，自己送了半条命，换来这破房，实在倒霉。同时

又四处张罗，托人寻找治偏瘫的神医，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脚治活过来。可是事与愿违，愈性急，愈难治，愈难治，愈性急。我怕她精神分裂症的老毛病会再犯，说也怪，自从患偏瘫症以来，患了十多年的高血压似乎不治自愈，精神分裂症也被脑血栓吓退了。人美的急躁脾气却愈演愈烈。稍不称心，就对专职侍候她的保姆和做饭的阿姨破口大骂，或借故把人家撵走。保姆阿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邻居们窃窃私议，连居委会都出面为保姆们撑腰，甘雨胡同二十四号成为众矢之的。有时这位家庭主妇矛头指向家主公，我只好忍气吞声，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闹，惊动四邻。几年过去，人美自知这病难以彻底解除，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甘雨胡同二十四号有过一段平静的时期。

1986年春，派出所通知甘雨胡同路南段居民，这一带已划归台湾饭店建造新楼，一年之内要准备搬迁。搬迁条件将由台湾饭店和各家协商。不久，拆迁协议确定：叶浅予在西三环北路22号中国画研究院租画室二间，王人美在北影招待所租住房二间，各暂住一年，应付房租由台湾饭店担负；台湾饭店在北总市胡同为拆迁户建新楼两幢，限一年内建成。

我们于1986年秋季迁出旧居，从此分居两处。我每周末到北影招待所看望人美，她也有时到研究院来看望我，两人互相来往，像走亲戚似的，倒也别有情趣。不料好事多磨，这年12月4日，传来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走向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在地，神志不清，现躺在积水潭医院急救病房。我赶去看时，她双眼紧闭，右颊碰破，肿了一大块，全身瘫痪，

口不能言。医生确诊是脑溢血，说还可能变成“植物人”，无知无觉地长期躺在病床上；也可能形势突变，永离人间。

1987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开会，由于会开得紧张，又为人美的病情伤心，忽然感到心脏隐痛，经医务室做了心电图，立刻把我送到空军总医院。和1976年那次“心肌梗塞”一样，则我躺在床上，不许动，输液，输氧，我心里有数，大概心脏老毛病又犯了。此时我还惦记着老伴，不知她最近情况怎么样了。幸亏有个好女儿叶明明，忙着两边跑。待到4月12日早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2时，妈妈呼吸停止。女儿劝我不要难过，说这样也好，假使长期做“植物人”，妈妈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这四个月，她的消化系统已逐渐丧失机能，全靠输氧灌奶维持生命。到了最后，生命濒临绝境，一切人工救治都已失效，只好与世长辞了。这时我也躺在医院病床上，只能默默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1987年4月23日，人美遗体在八宝山火化。火化前，生前好友向她遗体告别，而作为她三十多年的家庭伴侣，我却只能从空军总医院窗口向空中遥祭。我口中念着下面一首悼亡诗：

急讯传来：
人美跌了一跤。
神志不清，
昏迷不醒，
快去积水潭医院探明！

急诊病床：

手背连着葡萄糖瓶，
鼻孔塞着氧气胶管，
右颊肿起一个大包。
闭眼，喘气，僵身，平躺，
床沿站着小子，
那个黑龙江姑娘。

一阵心酸：

倔老头儿默默盘算。
为什么只顾画思呀文思呀，
不分点心思给半身瘫痪的人呀，
一代大演员不是在埋怨吗？

三十年代：

赫赫名声，闪闪明星，
《渔光曲》激荡人心。
五十年代遭到突然袭击，
要你交待什么见不得人的经历，
逼得你精神分裂，
有口难辨，声嘶力竭。

一九八〇：

血压升高，阻塞了脑血管，
四方求医，不幸成了左偏瘫。

活蹦乱跳飞车手，
莫奈何，支着拐杖，扶着姑娘。

回首“文革”；
你那儿，嘻笑怒骂公堂闭，
我这里，七条罪状三顶帽；
你那儿，装聋作哑蹲干校，
我这里，三年牛棚七年牢；
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两口，家破人散，政治平反。

各有千秋：
平反冤假错案，补发工资三万，
难煞老翁穷汉，捐乞浑身舒畅，
老伴生性好强，搜出多年积攒，
五千一架钢琴，送进小学课堂。

吵吵嚷嚷：
你说，宁可撑破肚子，也不占个盘儿，
我说，宁可占个盘儿，也不撑破肚子。
你说，菜么，就得讲究色、香、味，
我说，不开饭馆，讲什么色、香、味。
你懂得治家、养生；我信的玩世、活命，
你的细胞是“儒”命，我的细胞是“道”命。

一代名优：

早已写下遗言，
一反常态，暗暗自叹自贬；
共产党员，怎可心急气粗！
家庭主妇，何必絮絮叨叨！

老汉八十：
多么想老伴你为我做一顿生日美餐，
政协会议正酣，老汉心脏查出异状，
急忙送进医院，和你一样躺在病床。
“四·一二”噩耗传来，
生离死别是什么滋味？
八宝山最后一面，无缘赶上，
遗憾呀，遗憾！

编者后记

著名画家叶浅予同志，在1987年八十寿辰之际，“放下画笔，拿起文笔”，开始撰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原计划写八个分册，1988年首先写成记叙“文革”经历的《十年荒唐梦》，交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作为《百家丛书》之一出版。近几年，又陆续写成《抗日行踪录》、《师道与世道》、《上海创业记》、《“天堂”开眼记》和《婚姻辩证法》五册。另两册因健康等原因暂时搁置。我们征得叶老同意，把已写成的六册，按时间顺序排列，结集出版，各册仍保留独立成章的特点。叶老并为每一册配制了精美的插图，使这本书在众多的自传体回忆录中独树一帜，既记叙了个人经历，又反映出我们国家与社会丰富深刻的变化，而且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编者

1991年5月

电子书制作者后记

退休以后我读过很多人写的回忆录，但像叶浅予先生写得这样坦诚、这样真实的回忆实不多见。无论是写他青年时创业、中年时抗日、抗战后当老师，以及解放后思想改造，文革挨整等等都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特别是第六部分写他的几段婚姻，本属个人隐私，也能秉笔直书、毫无顾忌，真是十分难得。还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五部分《十年荒唐梦》里他公布了偶然得到的他自己档案里的部分内容，也是别的回忆录中很少有的，值得好好玩味。

这个电子书的材料均取自网路，特别是取自上世纪末的以凡书屋。排版是用的latex系统，并加了目录。还选了一篇网文《叶浅予：民国艺术之魂》作为“代前言”。排版后还仔细改了明显的错别字。

萤火虫

2022年2月